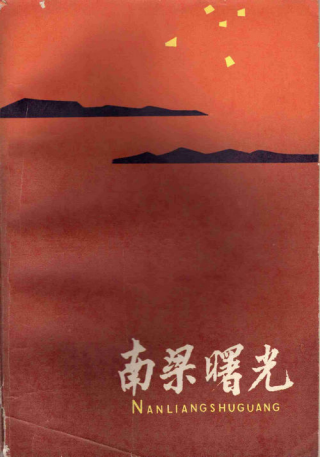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ep red with a subtle, mottled texture. In the upper portion, there are two dark, silhouetted mountain ranges. Above the first range, several small, yellow, diamond-shaped star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red sky. The title '南梁曙光' is written in a large, white, calligraphic font in the lower right area.

南梁曙光

NANLIANGSHUGUANG



中共庆阳地委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南梁曙光

编辑例言

《南梁曙光》搜集了老同志、作者撰写的作品五十三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南梁苏维埃政府时期和以后各历史阶段陇东革命根据地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作品共分四组：一组是老同志早年撰写的有关反映陕甘边斗争的文章；二组是老同志新近写的回忆录；三组是根据史实编写的革命故事；四组是综合性的资料。

本书收有聂荣臻、习仲勋、肖华、张秀山、刘景范、蔡子伟、王世泰等同志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文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书末有陇东革命斗争大事记，帮助读者了解陇东革命斗争的发展概况。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目 录

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	聂荣臻 (1)
堡垒战斗	聂荣臻 (1)
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	习仲勋 (9)
红旗漫卷西风	肖 华 (22)
裹革沙场 虽死犹存——缅怀刘志丹同志	张秀山 (32)
刘志丹太白镇起义	刘景范 (42)
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黎子伟 (52)
夜战山城堡	姚清亮 (67)
奇袭合水城	王世泰 (73)
西华池歼灭战	王世泰 (79)
回忆陕甘红军三路指挥部一支队	王秉祥 (84)
马踏环江岸 智袭曲子城	高锦纯 (100)
当年在曲子	李培福 (105)
“环县事件”的回忆	雷思均 (116)
夜攻马掌子山	邓克明 (124)
回忆庆环分区	高伯祥 (130)
铜墙铁壁	武海潮 (135)
刘志丹在南梁的几件事	王西格等 (141)

活捉三匪首.....	毛羽鹏 (145)
一斗麦剧团.....	范雨 (153)
记陇东青年学生参观团的延安之行.....	侯宗儒 (158)
我给毛主席演过戏.....	黄润 (163)
抗大七分校大生产侧记.....	张应宽 (166)
三打双柳堡.....	胡宗彦 (173)
英雄团长马福吉.....	张应芳 马占彪 (180)
孤胆英雄王玉成.....	杨子勋 (183)
我在电字战场见到了彭总.....	李春显 (186)
一次难忘的会议.....	马得邦 (190)
负伤之后.....	万青山 (195)
(26) 山东革命老区回忆录——鲁南革命老区回忆录	
奇袭嘉园堡.....	巩世峰 武敬东 (200)
记徐治贵烈士.....	徐殿武 (205)
“旋风队”的故事.....	高文 高寒 (209)
李炮匠.....	武敬东 巩世峰 (221)
张景文在南梁.....	巩世峰 姜梅 (228)
机智勇敢的游击队长黄克秀.....	赵汉山 杜时月等 (233)
人民重生亲父母.....	高文 (241)
赵铁娃的故事.....	杨宪法 等 (248)
艰苦细致 唤起民众.....	赵静 程占功等 (252)
宝贵的精神财富——记马锡五同志在曲子.....	赵汉山 (259)
为民除害.....	王炳凯 (264)
赠.....	马占元等 (272)

刘占山智取敌军火.....高 文 巩世峰 (280)
 智驱马家军.....王博艺 (283)
 石秀山革命活动片断.....徐殿武 高仲选 (288)
 智勇双全 威震敌胆.....高 文 (299)
 战斗英雄师学久.....李亚川 (304)

新宁县建立前后.....罗金财 李仲立 (312)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庆北县.....李仲立 王忠堂 (320)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李仲立 (327)
 大风川纪念碑.....李含福 (338)
 陇东老解放区的群众文化活动.....罗映飞 (342)
 刘志仁与南仓社火.....王育福 贾治龙 (349)
 红色的大学 革命的熔炉——记抗大
 七分校.....巩世峰 乔孝堂 (356)
 陇东革命斗争大事记(1911—1949)

.....李仲立 张 峰 (366)

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 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

董 荣 璋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环县山城堡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一个师。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斗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成作用。

历时十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以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彻底失败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而结束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一年的时间，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北。中央红军一到陕北，就与由鄂豫皖北上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会同在一起，共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从而扩大了红军声势，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并且迅速地打开了新的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进一步地向华北进攻。

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全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疯狂侵略，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存。广大爱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外不抵抗，对内加紧反共反人民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罪恶面目，因而更加同情和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由“一二九”学生大示威而掀起的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标志着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英明地预见了这一大好形势，适时地提出了全党的任务：“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仍然坚持其反动政策，进一步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继续向红军围攻，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周围大量地增加兵力。山西阎锡山也沿黄河布置层层军事堡垒，置以重兵，企图拦阻我军向华北抗日前线开进。宁、甘马鸿逵、马鸿宾等回族封建军阀部队亦加紧阴谋活动，不断向我军挑衅。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党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直接对日作战，以求进一步推动抗日运动，实现党的抗日主张，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举行了东征作战。在东征作战中，红军给了阎锡山部以有力打击，共歼灭和击溃敌三十一个团，毙伤俘敌一万七千余人，粉碎了其沿黄河的封锁堡垒，一度解放了同蒲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直逼太原近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七页。

红军东渡后，蒋介石一面增调十几个师进入山西，阻止我军东进抗日，一面以陕甘驻军积极向我后方进攻。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东征回师通电，但是蒋介石集团悍然拒绝议和。为此，红军回师之后，紧接着又进行了西征。西征作战先后击溃了马鸿逵、马鸿宾等部，解放了环县、预旺、定边、盐池等县城，以及东西一千余里，南北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大大地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团结和教育了回族人民，推动了回族人民的抗日运动。

通过东征、西征作战，陕甘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声威也更加扩大了。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已成为广大人民的一致要求。

二

在中央红军、陕北红军积极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同时，红军二、四方面军在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和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后，正迅速由川康地区北上，一九三六年八月底，红军二、四方面军主力进到甘南、渭源、陇西地区。

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中央决定红军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直插西兰公路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二、四方面军。八月底，我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预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经过连续几天急进，于九月初突然插到静宁、会宁地区，迅速打破了西兰公路敌人的封锁，占领了会宁城。十月八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静宁地区胜利地会师了。会师后，主力即向北转移到海原、打拉池

地区休整，并在打拉池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

红军主力的会师，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围追堵截的彻底破产，给全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极大地增强了爱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但是，蒋介石集团对于红军主力的大会师却震恐不安，不甘心失败，不顾民族危机，不顾全国人民的意愿，不顾我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竟继续坚持其反共打内战的政策。蒋介石错误地认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连续作战，力量已大为削弱；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于是急忙调集了二百六十个团的优势兵力，企图乘红军十分疲劳，尚未来及休息之际，一举将我消灭。

当时仅在静、会地区，敌人就集中了第一、三、三十七、六十七、新一等五个军。当红军主力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时，敌人分四路展开追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一路敌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一路敌第三军王均部，两路同时由会宁地区出发，分别经冯家堡、郭城驿向靖远追击；一路是敌胡宗南部主力第一军四个师由静宁地区经新营向海原追击；一路为东北军第六十七骑兵团由隆德地区经固原向黑城镇追击。

在当时敌我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敌毛炳文、王均部则予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王以哲部由于他们当时已有了不愿继续打内战的倾向，并秘密地与我军建立了某些联系，因此则采取了积极进行统一战线的方针。

红军主力转移到打拉池、海原地区稍事休整后，即继续向预旺堡、同心城地区转移。当时各路敌人前进很快，十一月初即进到了海原及以北地区。敌人压得很紧，情况很紧张。当时天已下雪，部队衣服单薄，粮食又不足，困难很多。当我们转移到海原以北时，海原之敌马鸿逵第三十五师及东北军一个骑兵师曾向我侧后攻击，企图截击我军，我们以红一师及七十三师予敌以坚决反击，于何家堡消灭敌两个团，俘敌千余人，余敌逃回海原。

我军转移到同心城西南地区后，曾准备利用同心城西南之关桥堡、皖厂堡地区有利地形打一仗，以求粉碎敌人追击。后来由于敌第三军由贺家集迁回到同心城我军右翼，东北军也进至预旺堡并向我右侧后迂回，我们遂改变原来计划，而继续向东转移。十一月十九日先后集结隐蔽于环县以北之山城堡南北地区。山城堡地区土寨很多，地形复杂，很便于我隐蔽和依托，是个比较好的战场。

敌占同心城后更加骄纵，认为红军已不堪一击，已向盐池方向撤退。因此竟以胡宗南部第一军孤军深入，急速向惠安堡、盐池方向前进。主力两个师直插盐池，十一月十九日侵占惠安堡，其七十八师经预旺堡、古城，二十日侵占山城堡。敌人企图从两翼合围我军于盐池以南地区，与此同时，东北军六十七军亦由预旺堡地区东进策应。

十一月二十一日，当敌七十八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攻击时，预伏在山城堡周围之我一军团及十五军团一部，突然地向敌展开猛烈的反击，首先截断了敌人西逃的退路，尔后由东、南、北展开三面攻击。敌人凭借围寨顽抗，战斗十分激烈。经过一昼夜战斗，将敌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

旅两个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的敌人也被我二十八军击溃。经过这一战，敌人遭到沉重打击，主力即向西撤退，整个进攻被我粉碎。

三

山城堡战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后的第一次战斗，尽管我军经过长征，蒙受了重大损失，总数已不到三万人，装备又十分低劣，但是这支人民的军队，由于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和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它永远是无敌的，它的胜利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蒋介石集团在红军长征中千方百计地想消灭红军，遭到了彻底失败；在红军主力会合后，不管他再用多大优势兵力，同样也逃不掉失败的命运。中国工农红军能不能取胜，人数和装备固然十分重要，但不是最根本的因素。根本的因素是它的政治军事指导思想、部队的团结、士气和作风；一旦人数增多，装备改善，它的胜利就必然更大更快。红军主力会合——山城堡战斗及以后的发展充分说明，只要我们紧紧地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指的道路前进，认真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一定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与此相反的是张国焘在红军将要会合时坚持分裂，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强令四方面军主力渡黄河向甘、新西进，结果是一败再败，最后虽然有部分同志抵抗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回到党的怀抱来，但是所遭受的损失是十分沉痛的。

山城堡战斗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这个战斗是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情况很复杂，外有强敌，内有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三个方面军刚刚会合，部队十

分疲劳,又是寒冬季节,衣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趋利避害,以少胜多,争取主动,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毛主席在每一个具体的策略和战役战术上都给了我们及时而明确的指导,例如:毛主席在给我们的电报中一再指出:要坚决打击蒋胡军主力,歼其一部或全部,以达到分化孤立敌人的目的,以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由于毛主席的这些正确指示,所以从迎接二、四方面军会师到战役转移,直到山城堡战斗的胜利,使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始终是明确的,坚定的,行动上始终是主动灵活的。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是山城堡战斗制胜的关键。

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又是毛主席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胜利。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仅在全国人民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而且在包围和进攻我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中也引起了日益强烈的反应。当时各路敌人矛盾很多,胡宗南部是敌人的主力,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嚣张;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深受蒋介石集团的排斥、驱使,都表示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特别是在东北军中,广大官兵家乡遭受日寇蹂躏,他们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张学良、杨虎城是两位有民族正义感的将军。他们亲眼看到红军在长征后,力量更集中了。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更加迫切和红军坚决北上抗日的英勇行动影响下,他们已逐步认识到继续被蒋介石驱使打内战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曾先后与我军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抗日友好”协定,在这些部队里抗日救亡的情绪日益高涨。当时被迫与胡宗南部一同向我进攻的右路东北军王以哲部,曾表示决不愿意与红军为敌,不愿意见到“其豆相煎”的不幸局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

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坚决打击敌主力、孤立分化敌人，以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指示，一方面集中力量给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以狠狠打击，一方面对王以哲部则严格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积极进行了工作。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等口号。当时很明显，只要给敌主力以痛击，整个进攻就可打破；只有有力地打击和孤立顽固势力，才能迫使其接受我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也才能团结和争取中间和进步势力。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山城堡战斗的胜利，更加促使张、杨两部进一步认识到内战再也不能打下去了，只有掉转枪口一致抗日，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经过山城堡战斗，他们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矛盾进一步尖锐深刻化了。十二月十二日终于爆发了“西安事变”，经过我党倡议和积极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此就打开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民抗日的新的的大好局面。

山城堡战斗由于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不怕疲劳，发挥了我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它象我军的无数个胜利战斗一样，在我军战史上将占光辉的一页；它是我军在历史伟大转折中的一个重要战斗，回忆它、研究它对我们有着重要意义的。

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回忆刘志丹同志

习仲勋

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同志的名字，也听到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他原名刘景桂，渭华起义失败后，回到陕北，领导饥民斗争，组织革命武装。一九三一年春天，我从敌人的通报中看到，他带队伍到旬邑一带打土豪，分粮财，闹共产。次年春天，我们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把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志丹同志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当我们准备攻打永寿县城时，遭到当地的土匪头子王结子的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失败后，我秘密回到家乡富平，党派我到照金地区工作。我在照金南面的杨柳坪，才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象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他一见到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只有十九岁，没有斗争经验，因为两当兵

屡失败，心情很沉重，也不知说什么好。志丹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象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我们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很久。他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他知道我搞兵变前担任过营委书记，又听别的同志说我坐过牢，还搞过群众运动，我们的谈话就更活跃了。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志丹同志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同志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不久，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领导的陕甘工农游击队，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武装，打死了民团总指挥党国芳。到了秋天，游击队出发游击，筹粮筹款，

征集冬衣。我到照金北面的金刚庙向志丹同志汇报工作。他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还留下他的特务队，由我领导，开展游击运动，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当时党任命我为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我们按照志丹同志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我为副主席，并任党团书记。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至此，照金根据地才初具规模。

照金属耀县管，是桥山南端的一个小镇。因为靠近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敌人经常来“围剿”。照金西南的三原武字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还建立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大革命失败后，这里还保存着党的组织和农民的革命武装。陕甘工农游击队成立后，在这一带打游击，三原武字区出人出枪，经常给游击队补充新战士，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志丹同志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氓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但是有的同志对志丹同志的正确主张很不理解，不断提出非难，志丹同志耐心解释说：“革命需要建立

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他们把这些忠告都当耳边风，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坚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因为这些同志是按省委的指示办事的，志丹同志虽不同意这些作法，也不好违抗，所以处境很为难。

一九三二年冬，党中央决定把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由于各地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也出现了新问题，不少地方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犯了“土匪路线”的错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一九三三年三月，侯家堡子战斗后，红二十六军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黄子文同志为总指挥，我为政委。我们整编了各县游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二

可惜这种大好的革命形势，后来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担任军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把刘志丹看作眼中钉。他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还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面临这种“无情打击”，志丹同志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仍然积极协助王世泰同志（他是红军战士选举的红二团团长。红二十六军只这一个主力

团)做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他尽一切可能来维护军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拟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打胜仗,减少损失。他虽然没有正式职务,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老幺(原名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杜衡强令红军北上,要打通“国际路线”。结果碰了钉子。在杨柳坪会议上,杜衡又提出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说什么那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秦岭山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刘志丹同志坚决反对南下,他说:“渭华起义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不但不听,反而拿大帽子压人,诬蔑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吓得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不敢说话了。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终于南下。到了三原武字区,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当我军进到蓝田时,被敌人重兵包围,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而杜衡这个胆小鬼不久也被捕投敌,做了叛徒。刘志丹和军队主要干部王世泰等同志,在地方党的帮助下,相继化装突出重围。

当时陕西省委也被敌人破坏了。我因身负重伤,正在薛家寨休养,听到这些消息,只得带伤坚持工作。正如志丹同

志预料的那样，照金根据地度过了难关，又有了新的发展，国民党部队中的王泰吉同志率领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陕甘边特委和部队党委在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会议对这种错误倾向作了批判斗争，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

中秋节的夜晚，我们日夜盼望的刘志丹同志历尽千辛万苦，和王世泰等同志一起，回到照金。大难之后又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根据志丹同志的提议，开始进行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工作，决定先编一个红四十二师，由杨森同志任师长。照金、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区游击队编为红三团，渭北游击队编为红四团，王泰吉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共同组成一个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为了避开敌人“围剿”，刘志丹同志率军北上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一带。一九三三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就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三

我们回到南梁以后，刘志丹同志提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陕甘特委和四十二师师委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狡兔三窟”的设想，建立三路游击区，逐步把南梁同关中地区的根据地和陕北游击区连接起来。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就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的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工农兵政权。一九三四年秋，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我任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边区党政军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关心群众生活都有明确的规定。还办了军政学校，刘志丹同志任校长，我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同志负责教学工作，培养军政干部。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发行了用布印的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经济日益稳定和繁荣起来。

志丹同志十分注意军政关系。旧社会谁有军权，谁就是霸王。志丹同志为了革除这种恶习，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我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手足无措。我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论年龄他也比我长十岁。但他却以身作则，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

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

我还清楚记得，在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以后，他曾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枪毙。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为刘志丹同志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十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高岗犯过纪律，也受过撤职的处分。

志丹同志具有共产主义者的宽阔胸怀，能团结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凡是同情革命的，倾向革命的，他都热忱相待。在他的教育启发下，苍沟哥老会头目马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岩民团团总罗连城，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郭宝珊同志本来是黄龙山的“大王”，经过刘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志丹同志作风十分民主，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都愿向他谈。他总是等人把话说完，再谈自己的意见。打了败仗，他首先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绝不诿过于人。他善于团结同志，包括那些反对过他的正确主张而又认识了错误的同志。对不同意见的争论，他始终坚持以理服人，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或耍弄权术，暗地整人。即使自己受到误解，遭到打击排斥，也不急于辩白。他对所有的同志都开诚相见，一视同仁。

志丹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不考虑成熟的话不说，没把握的事不做。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坐在炕头地角，找人拉话，了解民情。哪些村子有几孔窑洞，有几口铁锅，他都记得很清楚。因此行军打仗，从不用向导，人们都称他是“活地图”。

志丹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生活中没有一点特殊，经常自己动手做饭、炒菜、喂马、抬伤员。他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开始不赞成儿子搞革命。一九三四年春，国民党抄了他的家，烧了石窑，刨了祖坟，还杀了他好几个亲属。逼得刘老先生和一家老小走投无路。我知道后，把他们接到根据地来。但刘志丹同志忙于工作，却顾不上去看望。我还以为他和父亲赌气，开玩笑说，“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子和孩子，你快去看看他们吧！”志丹同志说：“工作太忙，有空一定去。”他妻子同桂荣同志一到革命队伍，他就叫她去给战士做被服。

四

这期间，陕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也有了发展。从陕甘边派回来的同志，在安定、清涧等县建立了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夏，以马明方同志为首的新的陕北特委成立。第二年，刘志丹同志率红二十六军挺进到陕北，和谢子长同志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共同战斗。在河口战役中，谢子长同志身负重伤，不久牺牲。陕北游击队编为红二十七军。两支红军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并肩战斗，横扫顽敌，消灭和击溃了敌人好几个师，使陕甘和陕北连成一片。

一九三五年八月，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率红二十五

军，由鄂豫皖根据地经陕南长征到陕北，我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同志前往永宁山迎接。陕北群众也象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这年九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徐海东、刘志丹同志亲密合作，率领红十五军团，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迎头痛击。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竟然在革命队伍内进行所谓“肃反”。他们始则诬蔑刘志丹同志“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还使用欺瞒手段，把他抓起来。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我当时身为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也被他们抓了起来，别的同志更不用说。

“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手法是极为恶劣的，他们惯称要刘志丹同志去根据地首府瓦窑堡开会。刘志丹同志走到半路，碰上了从瓦窑堡来的通信员。通信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信，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同志打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下命令逮捕自己。他对“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但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安危，竭力避免发生冲突，镇定地把那封信

交还给通信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便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同时把他带着五岁女孩的妻子也打入了劳改队。面对着随时有可能被枪毙、活埋的残酷现实，刘志丹同志泰然处之，他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倒行逆施，使亲者痛仇者快。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旗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同志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保卫局。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到瓦窑堡，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同志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我们的工作。同时毛主席、周副主席严厉批判搞“左”倾机会主义的人害了“疯狂病”。我后来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批评保卫局长戴季英时，戴季英还狡辩，周副主席说：“象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象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中央决定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五

刘志丹同志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释放了！”“陕北根据地得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

“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中央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

毛主席、周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刘志丹同志，毛主席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同志毫无怨言，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他和毛主席、周副主席在窑洞的火炉旁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不久，党中央任命刘志丹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副主席兼）、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毛主席和刘志丹同志还联名发表了告根据地人民书。这时有些受迫害的同志，要求他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处理犯错误的人，刘志丹同志说：“不要着急么，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的结论。”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强调指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要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同志当时常常向大家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一九三六年初，刘志丹同志率部队东征抗日。那时我在党校任三班班主任。在从安定回瓦窑堡途中，我碰到了正奔向前线的刘志丹、宋任穷同志。他俩见到我，跳下马来，同我紧紧握手。志丹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

地方工作。”我和他依依不舍地分了手。他上前线后，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

但是，没有想到，四月一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志丹同志在前线不幸中弹阵亡。三个月前我和他的那次告别，竟成了永诀。我们敬爱的刘志丹同志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陇东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同志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没有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志丹同志牺牲时只有三十三岁，但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和曲折，进行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建立了那么多的功勋。毛泽东同志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题诗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这就是党和人民对他最崇高的评价。

志丹同志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使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以后，这里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成为革命的大本营，成为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我们今天纪念刘志丹同志，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在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作出新的贡献！我想，这也就是我们向已去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刘志丹同志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红旗漫卷西风

肖 华

一九三六年五月，东征的红军因受到蒋介石大兵的阻挠，回师陕北之后，略事休整。为防止日寇侵入大西北，推动驻扎在西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抗日，开始了西征。

陕北的五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从驻地出发，经吴旗镇向甘肃的曲子、环县一线开进，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阻击盘据在三边和宁夏之敌。吴旗镇背负土山，俯靠洛河，城堡建筑在河堤上。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们曾在这里打垮敌追击的骑兵，结束了为时一年的名震世界的长征，而进入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旧地重游，引起了人们亲切的回忆。我们的队伍进入城区之前，战士们都整理了行装，把东征缴获来的新武器擦得发亮，居民们好奇地以为我们是一支哪里来的新红军呢！当他们发觉我们就是去年在这里落过脚的中央红军时，奔走相告，从四面八方送茶送饭欢迎我们。在这里，军团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聂荣臻政委作了政治动员，部队准备了炒米和玉米花等干粮，大约是一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开始了战备行军。

—

我们红二师是军团的前卫。为了荫蔽和迅速，我们在夜

行军和强行军中，宿营地和具体任务是不便交代的，每天下午四时出发，第二天九时以前宿营。一路上只见起伏的山丘、荒凉的草原、长角的羚羊、群飞的野鸡，很少见到村落和人烟。本来，西征的任务大家都是明确的，这样走了几天以后，不少战士却产生了疑问。（我经常穿行在长长的队伍中，检查战斗准备，和战士们聊天。）有的问：是不是去攻占兰州和宁夏城（今银川市）呢？有的说：是要回江西老区了吧？又要过草地了吧？也有的人怀疑要到新疆去……总之，议论很多。经过解释和教育之后，疑虑消除了，都知道我们是要推进全国抗日的高潮，情绪很高。

三天以后，我们到达曲子镇附近。曲子镇原是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庆阳通宁夏的要隘，是我师西征要夺取的第一个目标。当我们进至城东五六里路的地方，一个回民打扮的青年人，骑着马向我们飞奔而来，原来是我师便衣侦察员，他喜气洋溢的神情里流露出压抑不住的高兴，说：

“报告师长、政委，马鸿逵的骑兵旅长‘冶骡子’，带了三百多名骑兵由庆阳向宁夏巡逻，现在刚进入曲子，正打尖喂马。”

经常总是红军未到，敌人早就闻风而逃。今天却给送上门来了，真是盼之不得的好消息。

侦察员报告的情况是确实的，敌骑兵旅长“冶骡子”，我们曾经听说过。他本名叫冶成章，是马家军的“勇将”，性情急躁，打仗强悍，所以人称“冶骡子”。他这次带来的三百名骑兵，都是他的亲信，行动迅速，善于奔袭作战。我们最“欢迎”这样的作战对象。

这时不过是早饭时分，为了防止“骡子”闻风跑掉，我

们很快下了决心，命令先头二团迅速地去包围曲子镇。在连续急行军之后，能弄到一个好仗打，对于我们红军的战士来说，比什么都高兴。不过一小时，他们就团团地围住了曲子镇。“冶骡子”虽然以快速著称，但比起我们“飞毛腿”的红军战士来说，却不免相形见绌了。

曲子镇的土城方圆不过一公里左右，城墙高二丈厚六尺许，城四周有碉堡，垣外有壕深达丈许，易于守备。如果不给敌人一点厉害，非但“冶骡子”不肯驯服，群众得不到解放，而且还会影响整个西征战役。我们在察看了周围地形之后，立即派出了对庆阳方面的警戒，决定由二团主攻，五团助攻，迅速地夺下这个要隘。

二团选择的突破口是城的东南角，这里正好有十几幢房子，和一个碉堡相距三十多米，只隔一条护城壕。下午二时半，我们来到主攻连。战士们有的忙着捆绑云梯，有的在挖通墙壁，有的在构筑工事，十分紧张。战士们为自己能受领这样的重要任务而感到光荣。当地的老乡们听说“冶骡子”被红军包围了，也纷纷来帮我们烧水煮饭、准备担架。我们周密地检查了主攻连的登城准备工作之后，下午三点开始攻城。

二团的战士们在猛烈的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之下，真是“攻如猛虎”，很快地登上了堡子东南角的小碉堡。半个小时左右，即占领了东南城角及这一带的街道。敌人被迫退到城西北角的一些居民区顽抗。二团的同志们打惯了运动战，他们没有构筑工事，也没提防敌人可能的反击，两个尖刀连就沿着街道不停地扫过去，直逼城西北角。他们满以为一鼓作气就可以把敌人消灭，没料到这时候“冶骡子”抽足了大

烟，亲自带着他的全部兵马，从城西北角大街的各个巷子里，钻了出来。敌人是一群被金钱收买了的亡命之徒，大都光着膀子举着马刀，来势汹汹。我们正攻击前进的两个连队和敌人打了一阵交手战之后，由于缺乏巷战的经验，也没有反击敌人的准备，只好边打边撤，“冶骧子”的队伍一股劲追逼到南门口。好霸道的家伙呀！这时我们正在城门口二团指挥所研究如何解决敌人，看到敌人冲了过来，立即命令让城门口的部队全部开火，由一个排坚守城门上的碉堡，巩固这个突破口。同时组织二团其余三个连，由正面和两翼进行反击。五团也相机在城西北角方向攻城。下午四时半左右，在一阵激烈的冲杀之后，“冶骧子”被打得精疲力尽，丢下了一些死尸和伤员，又退缩回城西北角了。这时西北的城垣已被我五团占领，敌人只好龟缩在几个大的石头窑洞内妄图顽抗。

从伤俘和人民群众的口中得知，“冶骧子”确是马鸿逵部最强悍的打手。我们向部队说，“冶骧子”的队伍一定要消灭，但必须既要勇敢又要机智。这时太阳已西下，苍茫的夜幕已经降临。二团的同志们因为半天没有解决战斗，很不服气，请求立刻再攻。担任助攻的五团是原中央根据地的模范团，是有名的“夜老虎”团，也坚决请求主攻。我们考虑到晚上必须解决战斗，便决定二团、五团各以一个连从两个方向进攻。

五团的一个连只派了一个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就把西北城垣的碉堡全部摸下了，他们自上往下压，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了敌人盘据的最后几个窑洞。

二团的一个连，接受了下午攻击受挫的教训，用掏房、

挖墙的办法，逼近敌人。等敌人发觉时，已分不清谁是谁了，就乱打起来。我们用重机枪压制了窑洞上敌人的火力，一串串的手榴弹打了进去。打得敌人马嘶人叫，到处乱窜。有的跑到老乡家里，换了便衣躺在炕上装病，有的头钻在炕洞里，屁股露在外边，什么怪样子都有。到晚上十点钟的时候，除“冶骧子”自己盘据的一个窑洞之外，全部敌人都向我们缴枪了。

“冶骧子”为什么不投降呢？据俘虏说，他是马鸿逵部下的“健将”，对我们的打法不服气。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一个战斗小组向他喊话，见他不理，就爬上窑洞把手榴弹从烟筒里丢下去。“冶骧子”的马弁被炸死了，他的腿部也负了伤，这才乖乖地缴了枪。

五团的同志把“冶骧子”带进师指挥所的时候，我们正和俘虏谈话，医生和卫生员忙着给伤俘敷药，暂时没有理会他。半小时过去之后，他大概觉着有些奇怪，一双灰黑的没精打采的眼睛，闪烁着惊异的神色，被搅乱的茅草般的小胡子向上翘着，好奇地端详着我们。我们当着他的面给伤俘裹好伤，由当地老乡把他们用担架送回宁夏，没有受伤愿意回家的都发了路费，放回家了。当卫生员给“冶骧子”敷药的时候，他也不拒绝了，青瘦的脸上还微微地出现了尴尬的苦笑。后来，我们也把他放回马鸿逵那里去了。

环县曲子镇的战斗，打响了我们西征的第一炮，马鸿逵部望风披靡，被迫困守宁夏，不敢和我们较量。我们就奉命西进至七营川清水河一线，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二

在七营川清水河一线和我们对峙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是被蒋介石卡着脖子赶到西北来当炮灰的。对于他们的处境和遭遇，我们很了解。根据上级的指示，部队自上而下介绍了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关于争取东北军抗日救国的政策教育。政治部的宣传队、连队工作组，以及广大的指战员们都参与了以争取东北军抗日为内容的宣传活动。部队中也普遍教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感人的歌曲。

开始，东北军上层中某些人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总想和我们较量。六月初的一天，他们又派两个团的骑兵向我们挑衅。我们向他们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兄弟们！掉转枪口，打死卖国贼蒋介石！”谁知他们在上级严密控制下置之不理，直逼我们驻地七营川的堡子下面。看样子不教训一下，他们是不肯接受意见的。我们从三面进行了反击，一举消灭了他们四个骑兵连。我们对俘虏来的官兵，都待之以礼，给他们讲清楚必须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道理，揭露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消灭东北军的阴谋……，大部分被俘官兵都被我们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和对他们宽大的行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并向我们介绍了东北军广大官兵这几年来渴望国内和平、要求打回东北的心情。我们把缴获的三百多支步枪和一些马匹、行李等，很快交还了他们，并列队欢送他们回去。许多东北军官兵依依不舍地对我们宣誓说：“我们再要和红军打仗，就不算是中国人！”

从此以后，我们和东北军对峙的清水河一线，成了一个奇特的战线。白天我们是碉堡对峙的敌对双方，战线上鸦

很无声。晚上就是另外一回事，首先是清水河东边我们的部队传出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接着河西边东北军的堡垒中也传来“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的歌声。我们部队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就唱“打回老家去”。唱到辛酸之处，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呜咽声，唱到愤怒之处，可以听到激昂的咒骂。

这样，两军就渐渐地互相熟悉起来了。我们经常送纸烟和其他东西给他们。在我们提议下，双方不断地互相会面，在战地开联欢会。在数百里的西北战线上，名义上是敌对的东北军和红军，实际上变成了要求抗日救亡的好朋友。一天，在固原东北的杨郎镇，和他们的骑兵联欢之后，我们的代表朱瑞同志还和东北军的一个师长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何应钦及一切卖国反共的投降派，妄想用东北军进攻红军，从而削弱和消灭东北军的阴谋，被我们红军西征中的正义行动给彻底粉碎了。我们还把当时消沉颓废的东北军，引向了抗日救亡的光明大道，并直接为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国内停战抗日的局面创造了条件。

七营川附近，都是回民聚居区，作不好回民工作，连脚也站不住的。我们在对东北军进行争取工作的同时，也大力进行了团结回民的工作，向部队发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驻清真寺；二、不准吃猪肉，不准提“猪”字；三、不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的土豪。部队中掀起了尊重回民、帮助回民的热潮。在西北高原上，吃水是困难的，有的村庄，要到十几里路以外的山下去挑水，我们就实行了“满缸水”运动。回民是最爱清静的，我们就帮助他们打扫街道和院子，还把在回民区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分给穷苦的回民。这样，

就得到了回民热烈的拥护。回民最讲感情和信义，他们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是“回民的军队”，把长征后期我们送给他们的锦旗都挂了出来，还请我们洗澡，逢节日请我们吃全羊，把我们当成是回民的亲人。我们帮助回民组织了自治政府，并依靠回民摧毁了清水河一线的反动的地主武装，把军阀马鸿逵残酷统治下的这一地区，变成了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

三

西征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红旗漫卷西风，祖国的西北已进入了晚秋季节。一天我们忽然接到上级的指示，说二、四方面军已出了腊子口，要我们前去迎接。战士们高兴极了，我们多么想念这些战友们呵！这真是一个极其愉快的任务。上级决定由我亲率五团和师政治部宣传队，携带一些慰问品和慰问信，越过六盘山到西兰公路上的界石铺一带，一面向西安、天水方面警戒，一面等候经过艰苦转战即将到来的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战士们都穿上最新的军衣，把枪擦得发亮，打着红旗，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到达界石铺的那天，我们就碰到了二方面军的同志们，看到了闻名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他们虽然军衣都破了，吃的也很不好，十分辛苦，但情绪极高，精神很好，热情地向我们问候。我们送了大批毡子、羊皮作见面的礼物，并为这支兄弟部队筹送粮草。战士们把自己亲手做好的热饼，塞进二方面军同志的口袋里。我们还特别请二方面军的首长们参观了我们的营舍和俱乐部，看了我们宣传队

的演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两支部队浸沉在炽热的革命同志情感中。

一天晚上，我忽然接到从九十里以外会宁县城打来的电话。会宁县我并没有朋友呀！是谁从县城里给我打电话呢？当我拿起电话听到：“你是肖华同志吗？毛主席好吗？中央其他同志好吗？”从这熟悉的四川口音听出了：是朱德同志，我们的总司令。还是一年前，在长征到川黔交界，赤水、土城地区的一次战斗以后，我们就分手了。一年后，经过艰苦的长征，他也率领着红四方面军同我们胜利地会合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十月十日我们接到了党中央发来的关于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的贺电，贺电中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全国红军主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更起决定的作用。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这就是创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新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在山城堡联合打了一

个大仗，经过一晚激烈的战斗，把尾随二、四方面军而来的胡宗南先头部队的一个旅又两个团全部消灭。这个大胜仗是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由于我们红军主力的大会合，由于我们西进争取东北军工作的成功，由于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推进了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不久就爆发了“西安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就在这巨大的浪涛中来临了。

裹革沙场 虽死犹存

——缅怀刘志丹同志

张秀山

刘志丹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是西北红军和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他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此，党和人民一直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志丹同志与西北人民血肉相连，多少年来，称颂他革命活动的许许多多的歌谣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他一直活在西北人民的心中。但是，志丹同志也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他曾几次坐过监狱，既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也坐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者的监狱。就是在他壮烈牺牲之后，他的英灵也久久不得安宁。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犯边区时，他被掘墓扬尸。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大搞“文字狱”，对刘志丹横加贬斥和诬蔑中伤。但是，历史不容歪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中的丰功伟绩是抹煞不了的。如今，“四人帮”垮台了，志丹

同志曾经蒙受的不白之冤业已得到澄清。为志丹同志昭雪，西北人民高兴，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也深感欣慰和鼓舞。

我与志丹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当时，他刚刚出狱来到甘肃的平凉，我也从定西到了那里。他因搞兵运工作被军阀苏雨生缴械拘捕，后经陕西省知名爱国人士、杨虎城的高级参议、志丹同志在榆林中学时的老师杜斌丞先生营救出狱。在这之前，我同他虽未见过面，但对他的名字却相当熟悉，也听到过一些他的革命事迹。他是西北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一九二四年入团，第二年春入党，住过黄埔军校，在广州受到过我党当时著名的活动家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他参加过北伐。“八七”会议后，他任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参与部署陕西各路的起义计划，亲身领导一九二八年著名的“渭华起义”。党的“六大”后，他任陕北军委书记，后并代理陕北特委书记，直接领导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他的这些经历，使我及和我一起来的同志十分敬佩。当时，我们都住在刘宝堂的团部。刘系旧军人，与志丹同志是老乡，很讲义气，在交往中他与志丹同志结成了朋友。刘是军阀陈珪璋部特务二团团长，陈很信任他。志丹同志告诉我，根据省委指示，他正准备通过刘的关系到陈部新编十三师搞兵运工作。我听了很高兴，同去的同志也都愿意在志丹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我们都希望在陈部建立一支由党直接掌握的队伍。当时，陈有一定的实力。后来，陈珪璋同其他军阀之间存在着争地盘尖锐矛盾，腹背受敌，急于求助，便委任志丹同志为十一旅旅长。以后，由于形势逆转，难以立足，志丹便离开了陈部。行

前，他要我们先去刘宝堂部继续做兵运工作，等待他的消息。

刘志丹同志到了陕甘边的南梁，因为他在陈部搞兵运工作时，在山里搞了一支农民武装。他去后，这支部队马上整顿扩大为一支有三百多人的队伍。一九三一年秋，晋西游击队和商队一起来到南梁，与刘志丹同志的队伍会合，谢子长同志也由陕西省委派到了游击队。一九三二年二月，组成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子长、志丹同志先后任总指挥。游击队成立后，转战陕甘广大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为西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二年冬，根据中央指示，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但就在这时，“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杜衡，以中央代表和陕西省委书记的身份来到了红军。他一来，便对刘、谢横加指责，把他们的正确主张诬蔑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桃山主义”、“逃跑路线”等等，并撤销了刘、谢的领导职务，把子长同志送到上海“受训”，只是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再三请求，志丹同志才被留了下来。但不给分配重要工作。一九三三年六月，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放弃已经建立起来的照金根据地，南征渭华，到敌人重兵设防的西安附近作战。志丹同志再三提出反对意见，杜衡拒不接受。结果，红军刚刚开到秦岭山区，便被敌人重兵包围，苦战月余，使我党辛苦创建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给毁掉了。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突出重围，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周折，才回到了照金根据地。而“左”倾要命的杜衡却临阵脱逃，最后当了可耻的叛徒。

红二十六军南征时，照金根据地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仍在坚持和发展。一九三二年春，三原武字区已创建了西北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渭北游击队，此时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它和由王泰吉同志起义军组成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以及耀县起义的游击队，先后来到了照金根据地。为统一领导，特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甘边指挥部，由王泰吉同志任总指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游击队连续出击获胜，并打下了旬邑县城张洪镇，使根据地得到了发展。

志丹同志回来后，大家既关心他的身体，也关心他的工作。谈到工作时，他说：“你们原来怎么做的，还照样做，以泰吉同志为主，我可以协助他工作。”这样，他就担任了总部参谋长。这时，志丹同志提出了进军南梁，在陕甘边界的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同年十一月，总部党委决定把总指挥部改为四十二师师部，师长王泰吉，参谋长刘志丹，并把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编为红三团。这样，红二十六军就有两个团了。在王、刘指挥下，红军在关中、陇中和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攻势，接连打了许多胜仗，扩大了主力红军，建立了地方游击队，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泰吉同志要求出去搞兵运工作后，志丹任师长，又打了许多胜仗，在几个县建立了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六月，志丹同志回后方任军委主席，全面负责陕甘边区红军和各路游击队的作战指挥。入冬，陕甘地区已经有了十几个县的根据地。十一月，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由习仲勋同志任主席。这时，陕北一带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发展。一

一九三二年，陕北便开始进行游击活动。一九三三年夏，以马明方同志为首的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划分四个游击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各县游击队顿趋活跃，延川、安定、清涧、神府游击队连打胜仗，初步建立了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一九三四年春，谢子长同志回到陕北，统一了各县游击队，组成了陕北游击队指挥部。陕北游击战争迅猛展开。同年八月，子长同志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根据地。陕甘边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有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推子长同志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后，红二十六军三团由子长同志率领到达陕北，同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连打胜仗，使陕北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不幸的是子长同志在河口战斗中负伤，不久牺牲了。

一九三四年底，志丹等同志来到了陕北。次年二月五日，在赤原县周家硷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西北工作委员会。会议决定由志丹同志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志丹同志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和调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的命令。四月下旬，红二十六军三团及抗日义勇军来到了陕北，在志丹同志的指挥下消灭了寺尔畔的敌人。五月一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李家岔会师。之后，在玉家湾会议上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同志任总指挥。两支红军，在志丹同志指挥下，抓住有利战机，连续作战，先后歼灭了杨家园子、张家塔台和定仙塔的敌人。随即南下，横扫顽敌，历战历捷，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和保安六座县城，消灭了敌人大批的有生力量，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物资补充了自己，使陕甘、陕北两个

根据地联成一片，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这样，根据地就已发展到了三十多个县份，红军和游击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正当西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党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灾难。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央苏区和临近各根据地的瓦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北上。在这前后，王明路线也进一步波及陕北。一九三四年一月，王明路线的推行者从平津来到陕北。他无端指责陕北特委执行正确路线的马明方、马文瑞同志，大反所谓“富农路线”，推行王明路线的土改政策和过“左”的肃反政策。在军事上，他鼓吹“全面出击”，打“阵地战”、“攻坚战”，在所谓“肃清苏区内的白点”的漂亮口号下，命令红军去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他蛮横霸道，动辄给人扣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志丹同志是个重视实践、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政策和处理问题的人。他有坚强的党性，不同意这个人推行的那一套，并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志丹同志尖锐指出：他所推行的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早已为革命所证明只有害而无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货色，是“立三路线的复活”（那时还没有听到王明路线这个名称）。志丹同志还针对他那种“钦差大臣”的作风，严厉地批评说：狂妄自大，自以为是，领袖欲强，净要别人听他瞎指挥。王明路线的推行者对志丹同志怀恨在心，诬蔑志丹同志是“右派”。他们经过策划，在所谓“肃反”中，对志丹等同志进行政治迫害。一九三五年，劳山战斗刚一结束，志丹同志就被逮捕。这时，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吴起镇。当地驻军和群众纷纷向中央反映：刘志丹等大批陕甘、陕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被捕。毛泽东同志了解情况后，立即派王首道等同志前往瓦窑堡帮助解决问题。不久，被捕的同志便被释放。当我们走出监狱后，首道同志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好同志，中央宣布你们无罪。”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拯救了我们，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我们怎能不被深深地感动呢！之后，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还亲自接见了志丹同志。志丹见到恩来同志时，很亲热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恩来同志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接着，恩来同志便领志丹去见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志丹同志，并对他进行了亲切的慰问和鼓励。之后，志丹同志被任命为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等重要职务。一九三六年春，志丹同志率部在神府地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恢复和扩大了神府苏区。随后东征，不幸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志丹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和共产主义精神仍然深刻地留在我们心中，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志丹同志在创建陕甘、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从而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觉得，关键的一点是：他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处理得较好。他重视理论，也善于学习，而且学习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于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他善于从革命的实践

中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用于西北革命的具体实践。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志丹同志联系自己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深深体会到中央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他在军阀陈珪璋部搞兵运工作时，几次同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并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争取带兵，千万不要做“细腿子”（当时对旧军队中文职人员的称呼），讲了他在大革命时的沉痛教训。他说：那时，他本来可以在北伐军中带一个营或一个团，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允许，让他在马鸿逵的部队中当了个政治处长。结果，“武汉政变”一发生，他便被从军队中赶了出来。他说：如果我那时带兵，本来是可以起义的。志丹同志在陈部搞兵运工作时，并没有忘记农民，他曾多次派人去陕北、南梁一带组织党员，联系当地的农民武装，建立革命队伍。后来，这支队伍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重要力量。他向往井冈山的道路，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象毛泽东、朱德同志那样建立根据地，搞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他说了，也做了，陕甘、陕北根据地就是学习井冈山的榜样建立起来的。

志丹同志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思考问题。他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九三三年冬，他根据西北形势的特点，起草了“陕甘边关于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的决议”。这个决议提出，在陕北、陕甘边和关中建立三个革命根据地，以利我军取得较大的回旋余地，机动作战，各个击破敌人。这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在此之前，红二十六军已派强世清、魏武、杨仲远、白雪山、王兆

相等同志去安定、绥德、清涧、神府一带在地方党领导下建立了游击队。同时，志丹同志在关中、陇东地区展开攻势，建立了合水、保安、庆阳游击队，派杨琪同志任二路总指挥。在关中，红二十六军派出张仲良、王安民等同志组成三路指挥部，开展游击战争。经过反复的斗争，上述设想终于实现，为粉碎敌人“围剿”，把各个苏区联成一片，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志丹同志有高度的军事指挥才能。他能及时抓住有利战机，积极、主动、灵活、果断地消灭敌人。一九三四年二月，志丹同志指挥红军由照金北上，沿途歼灭了姚曲、小石板、店头、五雷镇等地的民团，经张村驿、直罗镇、黑水寺直到东华池。在从东华池出发时，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扬言部队要向安塞、安定进军，但部队进至保安县刘家砭时，突然掉头西去，经三道川，奔袭蒿家砭，出敌不意，一举消灭了张廷芝的一个营，又在崖窑歼敌一个骑兵团。接着，封锁消息，断绝了西去的交通。第二天，迅速出击，消灭了元城子、李家梁两地的民团。之后，又麾部南下，经合水抵达西华池。这时，敌人随后追来，红军乘敌尚未展开之际，立即发起攻击，红三团正面出击，骑兵团侧翼迂回，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一举歼敌两个营和一个机炮连。就这样，红军在短短的半个月连续作战，打了九个胜仗，消灭了大批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打得敌人闻风丧胆，我军则越战越强。志丹同志指挥作战，之所以常常取得胜利，还由于他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长期战斗中，他争取一些地方势力，哪怕是极不稳固的同盟者，如建庄、小石崖等民团，暂时保持了中

立，从而使我得以集中力量，打击了主要敌人。

志丹同志党性强，守纪律，有全局观点。他虽身处西北一隅，但心怀全局，一直向往着全党，向往着中央，关切着其他苏区的斗争形势。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陕北时，他十分高兴，大力动员群众热情接待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他还一再号召大家向红二十五军学习。当他得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北上陕北时，他立即建议红十五军团去接应中央红军。志丹同志曾多次遭受错误路线和宗派活动在“整军”、“反右”、“肃反”等名目下进行的打击，但他一直能从党和革命的利益出发，坚持真理，顾全大局，从不计较私人恩怨和个人的得失。他胸怀坦荡，作风正派，联系群众，深受西北军民的爱戴，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

志丹同志牺牲的时候，年纪很轻。他没有能够看到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他在九泉之下知道我们的党历经千难万险，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一心奔向四个现代化，该是多么高兴啊！

刘志丹太白镇起义

刘景范

永宁山是保安县（今志丹县）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政府就设在这个山上。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进行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也在这座山上。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黄昏，保安县民团团总曹力如（永宁山中共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坐在团局团总办公室的炕桌边，一面看着几封向他打听刘志丹的信，一面自言自语地叨念着：

“为什么还不见消息？……”

忽然门外喊了一声：“报告！”曹力如抬起头，一个站岗的团丁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说：

“外边有个人要见团总。”

曹力如警惕地收起信件，问：

“是什么样人？”

“穿一身蓝布衣服，头上戴顶大麦秆草帽，中等个子，瘦瘦的，深眼窝，高鼻子，看来有二十几岁，口音象本地人。”

曹力如笑了笑，心想：一定是刘志丹同志，这个新来的团丁不认识他。忙说：

“快请他进来！”

曹力如忙下地，抢先跑了出去，一把拉着刘志丹的手笑着说：

“老弟，我正在念算你，你就来了。真是起风就是雨。”

刘志丹笑道：“雨是雨，就是不及时。”

刘志丹进门把草帽往桌上一扔，坐在炕沿上。曹力如从文件箱中拿出几封信递给刘志丹。刘志丹靠在炕桌上，左手托着额角，翻着从宁夏、榆林、延安等地做兵运工作同志的来信。

两个老友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儿。他们谈起今后如何继续开展兵运工作的问题。

刘志丹说：“党要我们搞兵运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组织自己的武装。根据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南方搞武装的经验，革命的武装必须是在同反革命武装的斗争中形成和壮大起来的。这次我向特委汇报了‘三道川事变’的经过后，提出辞去军委书记职务，专心在陕甘边界搞武装斗争，特委同意了意见。特委说要组织个行动指挥部，要我当总指挥，我说还是把队伍搞起来再说吧。”

曹力如说：“这就好了。‘三道川事变’时要是你在部队，不会有那样大的损失。我们必须趁目前边界敌人力量空虚的机会，瞅准目标，坚决地消灭他们，搞起自己的武装，打游击……”

“可是人、枪一时搞不起多少啊！”

刘志丹思索了一阵，一字一顿地说：

“哪里能抓就抓一把。人还是有，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卢连长、刘连长集中了一部分人枪，再把老杨找回来

呀！干革命，不下决心可不行啊！周围这些反革命武装，我们为什么不想法先搞掉它个把呢！”他沉思一会儿，又盯着曹力如问道：“周围这些民团，我们掌握哪个情况多？哪个武装好？”

“比较起来，还是太白民团的情况了解的多些。据说他们都从寨子上搬到街上来住了，住得很分散。这个民团自改编为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后，勒索老百姓的粮款很多。营长黄毓麟是大恶霸地主，太白方圆百里的农民没有一家不受他盘剥压榨的。他的军队名为官兵，实是土匪，经常出去抢人，最近借口‘剿匪’，还在保安县边境打死了几个百姓……”

刘志丹说：“咱们一定得想办法把他搞掉。”

谈到半夜，曹力如送刘志丹到另一个房子睡了。

早晨，曹力如走进刘志丹住的房间，看见地上扔满了烟头。刘志丹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两手盘在胸前，靠在罗圈椅上。一双沉思的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

“昨晚睡得好吧？”曹力如用亲切的口吻说。

刘志丹扭过头来向曹力如笑了笑，拿起两个哈德门香烟的空盒子说：

“这就是昨晚的成绩，我给你们站了一夜岗……”

开会前，卢连长、刘连长、马福记等七八个同志，陆续集中到永宁山团局。还有从宜川、延安、瓦窑堡等地来找刘志丹的贺彦龙、魏佑民等四五个同志。刘志丹和这些同志们商谈如何搞武装的事。恰好，老杨也从庆阳回来了。他对刘志丹说：

“我在三道川脱险后，逃到庆阳，见到了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谭世麟还骂张廷芝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看来张廷

芝搞咱们，他没参与。咱们准备起义的事，他也没发觉。但他对你也有怀疑，说你脱险后，为什么不到庆阳来？要我把你‘招回来’，还是担任他的骑兵第六营营长。同时他还把驻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的王营副叫来，当面交代，要他协助这件事。王营副自然看主子的眼色行事，满口答应尽力帮助……”

刘志丹听完老杨这一席话，沉默了一会，就笑着向老杨说：“老杨，我们这两天正愁没法搞他们，你倒给咱带来了办法。”他又回过头对曹力如说：“力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象有了，办法也有了。”

大家商量了很久，第二天，曹力如把这个计划提到党支部作了研究。决定将计就计，一面派老杨再去太白镇通知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要他们准备粮草，骑兵六营随后就来，先稳定敌人。

刘志丹和其他同志分头集合人马，屯积粮草。他们设法从永宁山民团抽出一些枪支和马匹，加上民团军第六营集合起的人马枪支，一共凑起长短枪二十多支，战马二十多匹。此外，还赶做了一些军衣和旗号。

过了两天，人马调齐了。一天晚上二更时分，刘志丹带着这支二十多人的骑兵部队，静悄悄地从永宁山出发了。天明以前到达距永宁山四十里路的白砂川。

白砂川，古来是个大镇，经历代战争的破坏，现在只住着几家穷人。周围森林繁密，前些年，除了土匪以外，很少有人来往。

第二天早饭后，刘志丹向全队作了动员以后，把队伍带到村子外面的野地里，进行临时训练，不会打枪的人学着打

枪，不会骑马的人练习骑马，然后，又练习了突然袭击敌人及收缴敌人枪支的动作。

九月二十八日拂晓，趁着云雾弥漫，刘志丹带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从白砂川出发了。通过森林，队伍沿葫芦河前进。刘志丹骑着一匹铁青色的高头大马，全身穿戴着民团军军官服装。一个战士打着一面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子走在前头，后面一长串人都穿着民团军的军服，骑着各色各样的战马。当天下午，队伍进了太白镇。

太白镇是合水县东北葫芦河边的一个小镇，镇上有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南面靠山，北临葫芦河，街上有几家店铺，街的东南头有个烧坊，掌柜的外号叫“蒜客”，刘志丹的军队这天就驻在蒜客的烧坊里。黄毓麟的第一连住在烧坊西边一家骡马店里，王副营长也住在这里。第二连和黄毓麟住河北黄家砭。

蒜客官名叫李绪增，约五十多岁，此人仗义疏财，爱打抱不平，人都称他绿林好汉，也喜欢交往一些闹革命的人。他老早就和刘志丹认识，很佩服刘志丹的胆识。许多做革命工作的人，路过太白镇都住过他的烧坊。蒜客见了刘志丹的面，就讲起：黄毓麟（外号黄二子）的官兵常上酒店喝酒不给钱。他向黄二子说了，黄二子还说当兵的喝了你几口酒还要钱？当兵吃粮的人哪里有钱；黄二子也经常派人来取酒不给钱，还要头令酒。因此他对黄二子十分不满。又说，“那个王副营长更坏，听说是上边国民党派来的，整天想法刮老百姓的钱。前天还抓了一个过路人，硬说人家是共产党，给杀了。这人你们可要小心。”刘志丹笑着说：“你老人家放心吧，我们会小心的。”当天晚上，在黄二子营当兵的赵连璧

（我们派到这个营工作的同志），托喝酒为名来找刘志丹，他报告了关于黄二子部队内部的具体情况。

从九月二十九日的早晨，到三十日晚上，除刘志丹、老杨与黄二子、王营副自然要有些来往应酬外，其余的人员分别进行了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工作。在和他们接触中，一面虚张声势，扬言后面还有许多部队要来，一面侦察对方的动静。

三十日晚上，在蒜客的烧坊里，几个负责同志详细研究了黄二子营的具体情况。提出：敌众我寡，宜斗智，不宜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因此，决定：刘志丹和老杨把黄二子和王副营长找在一起，以商量军队住宿和粮草供应问题为名，设法把他们活捉起来，要他们下令部队缴枪；如果活捉不成，就先打死这两个坏蛋；同时由卢连长负责带十几个同志与敌第一连的官兵联欢，伺机收他们的枪；蒜客负责准备酒菜。刘连长和魏佑民在河边警戒，观察二连的动态。

十月一日早上，太阳刚出山，浓雾还没有消散，刘志丹、老杨、赵副官（他化装成传令兵）来到王营副住的房子里。刘志丹和王营副拉了几句闲话以后，接着很认真地说：

“王营副，我们马上又要来一百多人，怎么住法？……还需要些粮草，想和黄营长商量一下。”

因为两天来彼此已经很熟了，王营副想了一会就写了个条儿，派护兵去请黄营长。这时，刘志丹给赵副官使了个眼色。赵副领会官了刘志丹的意思，立刻跑到烧坊里，告诉卢连长作准备。过了一会，黄营长来了。他走进房子，与刘志丹打了个招呼，然后坐了下来。

刘志丹的护兵路四，别人称他为神枪手，这几天，他已

是和黄二子、王营副的护兵搞得挺热火。王营副的护兵很狡猾，路四叫他小兔子；黄二子的护兵是个大个子，路四叫他大汉。这时候，路四一面放哨，一面和小兔子、大汉拉呱。忽然，小兔子把大汉叫到房里去。路四便在门外偷听。只听小兔子说：“王副营长要我们注意，不对就先下手……”大个子说：“我听营长说，营副胆子太小，他们都是细腿子（指刘志丹他们都是些学生出身），敢把咱怎样？”小兔子骂大汉太傻。说着，两个人走出房来，站在王营副的门口，动也不动。路四着急了，拿出一包哈德门香烟，向大汉说：“请你和你的伙计来抽烟。”

大汉拉着小兔子的手跑来。路四递给他俩每人一支烟说：

“吃吧！这是营长给我的。”

三个人在外边边抽边谈论。

屋里的王营副端着大烟盘子，让刘志丹和黄营长上炕抽烟，刘志丹再三说不会抽，只有黄营长爬上炕去。刘志丹正盘算怎样下手。突然外边“叭”的响了一枪，紧跟着赵副官慌慌张张跑进来说：

“黄营长，你的兵变了！”

王营副听说兵变，正要掏手枪，刘志丹抽出枪对准他的脑袋“叭”一下子，结束了他的性命。黄营长正忙着爬起，又被老杨一枪打死了。

原来刚才那枪是路四打的。路四正在外边和两个护兵谈着，小兔子一溜烟跑到马棚里拉出两匹马。路四问他：

“拉马干什么？”

小兔子胡乱支吾。路四见势头不对，心想不能让他跑

掉，正在着急，刚好赵副官走进院子，他忙向赵副官使了个眼色。赵副官点头示意后，路回一枪打倒了小兔子。把大汉吓得把枪一扔，跪下哀求饶命。

这时候，在蒜客的烧坊里、院子里，摆着好几桌酒菜。卢连长和几个同志都提着酒壶给黄营的官兵灌酒，有些人已被灌得醺醺大醉，东倒西歪；没醉的还在一心一意地红着脸划拳喊叫。

卢连长听见枪声，把酒壶一丢，用枪口对准敌人大喊一声：“缴枪！”所有的人都把枪口对准了敌人。

这时，赵连长举起枪大声说：

“弟兄们！刘志丹的军队是咱们穷人的军队，咱们都是受苦人，还是跟他们走吧！”

敌人的连长愣了一下，准备抵抗，被卢连长一枪打倒。其他敌人乱成一团，有的钻在桌子底下，有的把枪甩下跑了，有的还在顽强抵抗，双方对打一阵，才把敌人消灭。

刘志丹他们几个人完成任务后，急忙往烧坊里走去。刚出大门，迎面跑来四个敌人。刘志丹喊声：“缴枪！”四个敌人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当刘志丹赶到烧坊时，这里的敌人基本上已消灭，少数敌人钻到了老百姓的草堆和炕洞里，也被搜出来了。缴了四十多支枪，十五匹强马，三十头毛驴。黄家砭的敌人第二连，听到街上枪响，都冲出来向山上跑。这时，卢连长带着人马从烧坊赶来，和刘连长、魏佑民一块，带了二十多个骑兵追上去打了一阵，缴获十多匹马、八支枪，其余的敌人跑散了。

（兴）中午，太白战斗胜利地结束了，太白人民的祸害消除

了。部队准备出发，镇子上的男女老幼喜气洋洋地挤在街上欢送革命军。刘志丹给群众讲了几句话，就带上队伍向林锦庙急进。走到距太白镇三十里路的枣刺砭，恰巧碰上敌人第三连连长马建有的两个随从兵在道旁逼马，刘连长缴了他们的枪。问道：

“你们连长呢？”

“在这里逛‘破鞋’。”

刘连长带着人跑到一个“破鞋”家里，捉住了马建有，把他捆在马上。当晚二更时分赶到林锦庙，马建有被迫缴出了自己的全部枪支和马匹，然后把他释放了。

这次行动共缴获长短枪六、七十支，骡马几十匹。有十几名俘虏也自愿地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这天晚上，战士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吹号的吹号，打鼓的打鼓，庆祝胜利，互相比较着缴来的枪。他们说：

“这下我们可有了枪了！”

以后，刘志丹领导着这支武装，在合水、保安、安塞一带开展了游击战争。队伍也迅速地壮大起来。

作者附记：

一九二八年刘志丹领导著名的渭华起义失败后，陕西及西北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的精神，制定了开展军事运动的决定，派刘志丹回陕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领导陕北和陕甘宁的军运工作。刘志丹到陕北特委后反对特委书记杨国栋的右倾思想，根据“六大”决议和省委的指示，提出利用陕甘宁各地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士兵；

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联络工作，争取掌握兵权，准备起义。特委根据他的提议，做出了开展军运工作的决定。

一九二八年秋到一九三〇年秋，刘志丹在担任陕北特委书记期间，在陕北动员了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陕北高志清、杨庚午、甘肃陈珪璋、宁夏苏雨生等部进行军运工作，在陕甘边武装斗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同时，刘志丹利用社会关系，亲自进行上层活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先后取得保安县民团团总和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职务，掌握了一部分武装。一九三〇年夏在庆阳三道川遭张廷芝的袭击，受到很大损失。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刘志丹率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一部，在合水县太白镇起义，打死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等人，收缴了该营大部分武器。太白镇起义后，部队分散在合水、保安、安塞边界地区游击，至一九三一年一月，部队扩大到三百多人。以后虽然在宁县张皮寨和旬邑县职田镇遭受敌人两次袭击和围攻，使部队受到更大的损失，但到一九三二年初成立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时，仍保留四百多人的武装力量。这就为在陕甘边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八年四月

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我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三四年夏天，因组织遭破坏，环境恶劣，不宜继续在原地工作，经组织同意，从北平回到陕西。在西安见到了黄子文同志（当时他是渭北游击队负责人），经黄介绍并由渭北游击队护送，我们一行数人一同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堡。到后不久，谢子长同志从陕北来到陕甘边，他知道我在北平时参加党组织的情况，经谢证明，立即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我初到南梁时跟随部队行动了一些日子，后即做地方党政工作，组织上决定我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特委书记先为张秀山同志，继为惠子俊同志），同时先后兼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政治秘书长兼文化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我在南梁工作只有一年多，时间虽短，但根据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生动事实仍记忆犹新。现就记忆，浅述于后。

我去南梁时正是陕甘边红军和马鸿逵骑兵部队在五原刚刚打过仗，沿途看见当地山梁两边梢林里丢失的一些红绿色标语，油印机等。红军被冲散后都钻了梢林退却。过了几天，

陆续都跑回来，队伍又很快整顿起来了。红军战士都是贫苦工农成份，政治觉悟很高，革命意志坚定。还有少年先锋队队员，他们过去都是地主的放牛娃，缺吃少穿，参加革命后，勇敢活泼，十分可爱。进入苏区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红军名不虚传，真是一支打不烂、压不垮的铁的队伍。

当时，南梁是我第二路游击区的中心。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扩大，是继谢家寨、照金之后，陕甘边苏维埃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九三三年夏天，红二十六军在军政治委员杜衡（后来叛变革命）的错误决定下，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被敌重兵包围，敌众我寡，弹尽粮绝，使红二团（红二十六军主力团）遭受严重挫折。一九三三年七月，陕甘边特委和部队党委在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了第四十二师，下辖红三团和红四团。会议清算了错误路线，使红军又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此后，根据刘志丹同志提议，陕甘特委和四十二师师委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南梁地处第一路和第三路游击区的中间地带，自然地把其余两路连接起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此，陕甘红军游击战争，就以烈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了。

从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由于我军大量消灭敌人，敌人慑于红军威力，恐慌逃跑。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先后占领了延川、延长、靖边、定边、安塞、安定等六个县城，并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大片工农政权，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东至延安，西达庆

阳、曲子、环县，幅员数千平方里，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期间，陕北地区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了。这时陕甘边一带，除正规部队红二十六军之外，仅地方游击队就发展到二十多个。在不断发展武装力量和建立人民政权的基础上，陕甘边和陕北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和陕北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为了统一党和部队的领导，一九三四年底，成立了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皆受西北工委的领导。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为建立巩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奠定了基础。

二

我初到南梁时，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尚未成立，只建立了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主席是习仲勋同志。革命委员会设有下列机构：财政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肃反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各委员会的负责人叫委员长。记得当时的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是杨玉亭，土地委员会委员长是张步清（后换成李生华），粮食委员会委员长是呼志禄，肃反委员会委员长是郝四，文化委员会委员长由我兼任。陕甘边下属的赤安县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策，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是赵玉文，庆北革命委员会主席先是强加珍，后是李培福。记得南区（正宁旬邑一带），当时叫工作委员会，但政权性质与革命委员会相同。当时，革委会和军委会都住在南梁堡附近的寨子湾等

村庄，但经常活动的中心是荔园堡，这是个大村，户数和人口多，位于大川，地处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等几个大川的交界，交通方便。这个村里有个大庙，有戏台，有大块平地，并且每隔几天有一次集市，所以我们开些较大的会，进行宣传群众的工作，大都在此地进行，我几乎是经常住在这里办公的。

那时，苏区的群众团体主要有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等。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苏维埃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与土地革命等均起了很大作用，它们是革命政权的有力支柱，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纽带和桥梁。

一九三四年夏秋之交，在革命斗争蓬勃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武装力量不断加强的基础上，我们开始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政府，记得作了两个月的筹备工作。刘志丹同志、习仲勋同志、马文瑞同志、吴岱峰同志等和我一起在陕甘边豹子川红军干校住了好些天，有时开会商量具体办法，有时分头进行工作。刘志丹同志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政治决议案是将来大会通过并付诸实行的主要文件。我及其他同志起草了财政、土地、粮食等决议案及其他一些文件。整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几乎都是在荔园堡和红军干校进行的。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就在荔园堡的一座庙里大厅召开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它使革命委员会临时政权正式转变为苏维埃政权，它是这个地区由不十分固定的游击区域转变为巩固的根据地的主要标志。

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是：按照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界均有代表，照顾到各个方面。这个办法完全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会议期间，完全由代表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的委员，它和过去由群众团体推举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的办法有所区别。

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十一月七日那天，在荔园堡庙前广场的戏台前，举行了群众庆祝大会，晚上还演了戏。

大戏台下面是一片宽敞的平地，能容纳几千人。出席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都赶来参加了。这样的盛会，在当地说来，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老百姓们奔走相告说：“我们几辈子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事情。”整个荔园堡洋溢着一片节日的气氛。大戏台上，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条巨幅红色标语，上面写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大戏台下，几千人云集在场地，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场地四周，镰刀铁锤红旗和各式各样的彩旗交相辉映。人如海，旗似浪，锣鼓震九霄，口号若雷响。此情此景，生动地说明革命前是劳苦大众的最盛大的节日！

代表大会开始了，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志丹同志首先讲话，接着习仲勋同志讲话，郭四同志和工农兵等各界代表都发了言，会场一片欢腾。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以及其他决议案，接着选举习仲勋同志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边金山为副主席。原来革命委员会下属各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被选举为苏维埃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长。

代表大会最后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边区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通过主席台前，无比壮观。

大会号召：各地代表要把会议的精神迅速传达下去，要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取得更大胜利。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

代表大会以后，赤安县革命委员会和庆北县革命委员会先后转为苏维埃政府。接着下列各地也成立苏维埃政府并选出了主席，如华池（白焕章）、安塞（王聚德）、甘泉（田凤年）、淳耀（冯正宝）、旬邑（王进西），还有宁县、正宁等县革命委员会也先后转为苏维埃政府。另有一些新开辟地区成立了临时政权，仍叫革命委员会，其中有定边、靖边（阴云山）、中宜（边德荣）、红宜（赵建国）、肤施（刘秉温）等。

三

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推动了政权建设，同时推动了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而经济建设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崭新局面又给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以雄厚的基础。

分配土地。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亲自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我们党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闽梁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就是根据中央土地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特点进行的。当时，我们拟定了一些具体条例，大体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在一些人口少荒地多的地区，给地主分子些坏地，使其生活有出路），给富农留少量的土地，以够其吃用为限，团结中

农进行土地分配，没收的土地按人口分给贫雇农及缺地少地农民。先分川地，后分山地。

在分配土地问题上，曾发生过一点儿曲折。原任土地委员长张步清，是横山县人，本来家庭出身贫困。但在分配土地时，他的经济地位已起了变化，贪图个人发家致富，自己开了许多荒地，并开始进行雇工剥削。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不积极，工作疲疲沓沓，当我们批评他为什么迟迟不抓运动的时候，他却说什么：“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们（指其他地主富农）和我一样，有什么可以分的。”志丹同志听了非常生气，对我们说：“关键在于这张老头了，他变了，怎能把运动搞下去呢！”后来经研究决定，撤销了张步清的土地委员长职务，以示处分和教育。任命李生华同志为土地委员长。这一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成。李生华同志原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来他开小差跑出来，参加了革命，年纪轻，工作热情很高，经常和我一起出去检查和安排分配土地的工作。有时天黑了，我们就在老百姓家留宿，或者住在破烂的窑洞里。到了吃饭时间就在老百姓家吃。就这样，走东村，串西堡，工作有了较大开展。

分地时，我们紧紧依靠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由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分配土地的运动进行得相当顺利，象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村子，分配土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在分配土地的同时，划了阶级成份。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成份很重视，以做贫雇农为荣耀。我们也有个别错订成份的现象，经群众提出，很快就纠正了。

土地革命，使南梁地区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热情。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如梁占奎、贾德功等惯匪在当地盘踞几十年，把群众害苦了，他们甚至把老百姓炕上的条毡都卷走，那时每当夜晚狗一叫，老百姓就惊慌四逃，不得过安宁日子。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

粮食政策。那时没有什么征粮任务。没收地富的粮食和羊，除了分配给群众外，给红军游击队留一部分做为公粮、公羊，保存在村里，以备红军吃用，因此红军走到哪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的负担，军民关系犹如鱼水。

恢复集市贸易。过去这一带历来有集市贸易的传统，但自清朝同治年间就停止了集市，老百姓就找不到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场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活跃经济，我们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集市贸易。首先在荔园堡恢复了集市，每隔三天一次，逢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和荞麦面饅饅的，卖其他小吃的，还有卖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客争相购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同志和我们几个都去转一转，群众每每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印制发行边区政府货币。为了保障人民生活 and 边区经济建设、市场稳定，我们废除了伪币，印制发行了陕甘边区自

己的货币，苏区内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的票币，严禁使用国民党的伪币。当时边区政府的票币印制很简单，在白洋布上盖上边区政府财经委员会之印，然后用桐油一油即成。印鉴是蓝色的，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发行数量不大，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商品和货币价格十分稳定，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拥护。

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办公所需笔墨纸张等一切用品都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如衣服，冬来发棉，夏来发单。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形成一种艰苦为荣的风尚。在物质待遇面前，大家互相谦让，相互帮助，同志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记得有一次我害了病，又值换季时节，天气寒冷，马锡五同志及时地给我送来了一套内装羊毛的新棉衣。同志间这种情同手足的感情，十分感人。

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不断胜利，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不仅从军事上对我们实行“围剿”，还千方百计从经济上封锁我们。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针锋相对，采取有效办法对付他们，从而不仅打破了敌人的阴谋，而且活跃了边区经济，保证了物质供给，支持了革命战争。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办法是拉豪绅。我们经常组织小股精干力量，瞅机会打入白区，神出鬼没，抓住地主豪绅等便拉回根据地来，拉来后向他要钱，由他们的亲戚出面“议价”，或者是要物，特别是根据地奇缺的物资，如油印机等。他们出了钱或出了物之后，小一点的豪绅便放回去，民愤极大的有的杀

掉，有的要实行劳动改造，叫他们背柴、挖窑洞。记得有一次杨森同志带领骑兵曾在白区韩城、长武一带拉了许多豪绅，弄到不少钱财，解决了根据地当时经济方面许多迫切需要，这次行动很成功，在政治上也引起强烈反响，曾一时轰动了西安，震惊了敌人，城里立刻大哗：“红军真厉害，人多得很哪！”

第二种办法是和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以物换物。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白区较开明进步的商人取得合作。我们把边区的羊子等廉价卖给他们，他们赚了钱很高兴，便愿意跟我们做买卖。我们就叫他们给搞布匹，或者弄些其他急需的物品，偷偷用驮子给我们送来。这样久而久之，有一些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表现进步了，有时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我们送货。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地骂这些人是“通共”。那些进步的商人也很会想办法，设法把钱塞进国民党有关当局和人员的腰包里，便打通了与边区相互来往的通路。

此外，我们通过在西安的地下党购买物资，给根据地秘密送来。

第三种办法是发展边区生产，壮大经济力量。

四

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办了军政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创办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

一九三四年，在陕甘宁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和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的形势下，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又称随营学校）光荣诞生了。这所干校的规模虽不算大，但在陕甘红军

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贵在是我们党自己创办的一所军政学校。干校设在南梁地区的豹子川。这里森林茂密，时常能见到狼和狐狸等野兽，各种鸟类争鸣不已。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学员们自己动手挖成的。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柴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炕。当时，召开了成立大会，搞了个很简单的成立大会仪式。红军干校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志丹同志任校长，习仲勋同志任政委，吴岱峰同志兼任副校长并主持全校的日常工作，马文瑞同志和我都是教员。不论校长、政委以及教员都是兼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训练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军事素养和游击战争常识等。军事课由刘志丹同志担任。因为学员文化较低，文化课以扫盲为主。马文瑞同志、吴岱峰同志和我也不断在这里讲课。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没有什么正规的教室和教材，给每人发根铅笔和一点麻纸，教员在台上讲或在黑板上写，学员们做笔记。干校的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得很愉快。干校每期学员百余人，我的印象中，大约共办了三期。

在文化工作方面，边区曾创办了列宁小学。第一个列宁小学是在何家沟门办起来的，课堂是没收地主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教员只有两个，一个是张景文同志（女，后来在“左”倾路线的“肃反”中牺牲了），另一个是贺××（男，记不清名字了）。教材通俗易懂，都是我们自己编写的。多采取诗歌的形式，朗朗上口，孩子们学习兴趣很高。因为我是文化委员会的委员长，审编教材是义不容辞的责

任，曾采用诗歌的语言，编写过一些政治教材，记得有一首开头两句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后不久，很多村庄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此外，为了消灭文盲，我们还在一些村子里办起了成年人的识字班。

另外，陕甘边特委还办了党内刊物，叫《布尔塞维克的生活》，是特委的机关报。报纸的主要负责人是龚逢春同志。政府的公开刊物叫《红色西北》，是一个不定期刊物。发表的文章消息以红军战报和经济建设等最多，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的某些决议和其他号召性文件均在本刊发表。这个刊物版面不大，相当现在的八开纸，用的是质地较好的有光纸，因为条件所限，印刷是油印的，印油分为红、蓝、黑三色。刻蜡板的主要是席德仁同志，字迹工整漂亮。

五

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精细，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刚到陕甘边苏区的时候，刘志丹、习仲勋、杨森等几位负责同志正在阎家洼子老百姓的土炕上开会，志丹同志一见到我，马上亲热地说：欢迎，欢迎。他中等个子，眼睛机警有神，脸庞有个大黑痣，下巴上长了几根胡须。他身着坎肩，打着绑腿，腰里挎着盒子枪。志丹同志住过黄埔军校，参加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继而在陕甘边界搞武装斗争，带刘景范同志来到桥山山区。

志丹同志很会利用各种关系为我们开展白区秘密工作。通过志丹同志的关系，安塞、保安县伪县政府的不少人经常

给我们送来关于敌人方面的情报。

对于土匪，我们采取了分化利用和改造的方针。能够争取改造的尽可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则下决心消灭之。当时，梁占奎和史老么是黄龙山区最大的土匪头子。梁占奎作恶多端，不可争取，把他打死了；史老么投靠了国民党，后又拉了出来，在路过二将川时，我们打算争取他，但史诡诈得很，怕红军力量大，会吃掉他，跑掉了。郭宝珊部，在我们反复说明利害和讲明政策的情况下，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参加了革命。为了改造这支土匪队伍，我们派任朗华同志到郭部任政委，加强政治工作。对郭部那些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人，发给路费遣送回家，留下来的后来都成了真正革命的同志。

团结改造哥老会，是我们进行统战工作的又一方面。陕甘边一带哥老会极多。哥老会的成员，大都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这种封建团体内盛行一种作风，即内部等级森严。龙头大爷是哥老会的头目，他的话别人不敢不听。因此，只要把他们的头目争取团结过来，其整个组织便很容易投靠革命，正如毛主席在论述游民无产者的阶级特征时所说的：“如引导得法，可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鉴于南梁地区哥老会极多，团结他们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不少哥老会成员大都为我掩护过伤员，或帮助做过其他革命工作。南梁堡有一个哥老会的郑大爷，由于我们不断教育和帮助，他逐步脱离了封建迷信团体，成了我赤卫队的总指挥。

此外，对国民党的杂牌军，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尤其是刘志丹同志在这方面作

了大量的工作。他有时甚至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正确主张，做对方的工作。

写到此，有必要多说几句刘志丹同志的事迹。志丹同志有着非常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比如行军打仗，他简直是一份活地图。按一般规律，部队向某一目标行进之前，他事先胸有成竹地总要考虑行军路线、路程远近、到达时间、计划怎样走才更合适些等等。对村与村相距的里程，每个村多少户人家，这村子共有多少口锅，多少条可睡觉休息的土炕等一系列涉及到普遍军事常识的问题，他都考虑到了。他的很多指示，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他常说的：“两山之间一条川，两川之间一条山”，就正确地反映了山区的特点。有时半夜行军迷了路，志丹同志能够从观察地形的特征，进而断定这是什么地方，应该向着那个方向前进。结果证明，他的判断一点也不错。

志丹同志不仅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他的思想品德也是很高尚的，这一点在他平常的举止言谈就得到充分的反映，特别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他那超人的共产主义者的优秀品格表现得更为突出。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疯狂一时，“肃反”斗争无情地打击和迫害革命同志的时候，志丹同志曾亲手接到了要逮捕他自己的信，但他毫不惧怕，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不惜个人的一切，以坦荡无私的宽广胸怀对待这一政治事件。凡知此事的人，谁不钦佩志丹同志这真正的亮节高风啊！

当党中央和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纠正“肃反”错误时，志丹同志更是宽大为怀，不计个人恩怨，尽可能教育和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他不仅自己这

样做，而且还教育引导其他受过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也这样做。总之，在南梁一年多的时间里，志丹同志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秀品德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夜战山城堡

魏 洪 亮

十一月初，我军在陇东固原附近的何家堡，一举歼灭了马鸿逵两个骑兵团后，刚刚撤离战场，胡宗南三个整师，从南向北又直压过来。

敌人向北压，我们向北走。它压得紧，我们走得紧，从固原一带直奔长城方向。敌人得寸进尺，以为我们是溃逃，更是一步压着一步穷追。黄颜色双翅膀的飞机，每天多次出动，贴着我们头顶转。看架势，胡宗南硬是下了决心要撵上我们。我们红一师十三团，是何家堡战斗的主攻部队之一，刚打了胜仗，部队情绪很高。现在胡宗南压着脚板追，同志们心里自然不舒服。行军路上，议论纷纷，不外乎是一句话：“敌人跟着屁股，为啥不打？”

一天行军路上休息，陈赓师长从后面赶上来了。他跳下牲口，坐在地上，跟我们团部的一些通信员、司号员、饲养员谈起来。他们都是些老同志，和陈赓师长都很熟悉。再加上师长在下级面前没有架子，爱开玩笑。他一来，大家就围了上去，直率地问师长：“敌人天天跟着屁股，啥时候揍它？”

陈赓师长诙谐地说：“我看，你们刚打了一次胜仗，就又翘尾巴了！啥时候打，我怎么知道？”

饲养员老单，一旁慢吞吞地插了一句：“我看，要不几天啦，准给它个回马枪。”这个同志打从在中央根据地就当饲养员。长征到陕北后，陈赓师长每逢遇到他，第一句话总是说：“老单，叫你去当管理员怎么样？”他一听就摇头说：“不，我没能耐，我要为革命永远当马夫。”现在师长听他这么说，拍拍他的肩头笑道：“我看，你倒有两手哩！怎么样？不要再当马夫吧！”

“我没能耐，我当马夫。”老单脸红了。

陈赓师长接下去又亲热地和大家谈起来，讲形势，讲革命故事。

当前面传下行军口令时，陈师长跨上牲口回头向我嘱咐说：“你们到目的地，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战士们喝上水！发现没有？战士的嘴唇都裂了。”说着催动牲口向前走去。

望着师长的背影，我心里感到一阵阵温暖。我们的师长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战士！一路上，他不止一次地向我们交代，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同志们喝上水。水，水，陇东高原，吃水比吃油还困难。山沟里流出的水，又苦又涩，有一股子硝磺味，根本不能上口。硬闭着眼喝下去，不是身上发肿，就是拉肚子。当地老百姓，完全靠接雨水生活。这一路上，为了维护群众利益，我们从来没痛痛快快喝一碗水。但愿今天宿营的地方，能多找到些水！……

部队忍受着干渴，战士舐着干裂的嘴唇，向北，向北。连着又走了两天，十一月十九日，来到了环县山城堡附近。

两天之后，胡宗南的三个师又跟上来了。当遭到我军正面阻击以后，见势不妙，便凭借着山城堡一线山地，顽强固守起来。

二十一日黄昏，我军开始反击了。参加这次作战的，除了我们红一军团以外，红十五军团、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均有部队参加。按照军团的部署，我们红一师从东向西，攻击敌人防守的一座山。我们十三团，担负师的主攻任务。在我们团的左翼，是红二师；右翼是红四师。攻击发起之前，陈赓师长亲自带领我们到山下去看地形。

敌人十分嚣张。天已经快黑了，五架双翅膀的飞机还在空中转。我们隐蔽地接近到山下，从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敌人扼守的山头上，修满了野战工事，摆着对空联络的布板，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山头上走来晃去。他们眼里，似乎根本没有我们似的。陈赓师长拿望远镜向山头上搜索了一阵，又气愤又高兴地向我们说：“看清没有？狗东西很骄横。看来，他们还不晓得骄兵必败的道理。”然后指着我们团的突击方向，向我说：“你们突击方向，一共九个碉堡，看清楚没有？”

我说：“看清了。是九个！”

师长又说：“那个大堡上，竖着一个竿竿，准是电台的天线，那儿可能是敌人的指挥部，估计大约一个团。你看对不对？”

我说：“师长分析的对。”并立即表示，我们团一定把口子撕开，保证完成任务。师长点点头，又嘱咐说：“敌人骄傲，要失败。你们万不能骄傲。刚打过胜仗，不能轻敌。告诉部队，敌人是胡宗南的精锐，准备啃骨头，动刺刀、马刀。今天是夜战。夜战是我们红军的拿手戏，要猛，要机动，要灵活……”

当我们看完地形，返回部队的时候，天已大黑了。这一

晚，特别暗，没有月亮，没有星光，把手伸到自己眼前，也分不清五个指头。部队在运动中，每个战士全凭自己的感觉，全凭夜间行动的经验，向前摸索。

令人焦急的是，我们分两个突破点连扑两次，均没奏效。全团象被突然闸住的洪水，在山下聚集住了。师指挥所的方向，一次接一次发号，要我们回答攻击的情况。我身旁的司号员，一次又一次问我：“政委，怎么回答？”

怎么回答？我用什么话来回答呢？团长不在，全部重担都落在我一个人肩上。已经快深夜了，西北风怒吼，黄沙扑面，山顶上敌人疯狂地向我们射击。我焦急得直握拳头。一面组织第三次攻击，一面想着打响之前师长的话，“这一仗，关系重大，有关全局。这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仗！这一仗打不好，敌人将会直插定边、盐池，然后威逼保安……”

保安，这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啊！

突然，黑暗中传来个声音：“魏洪亮在哪里？”从这熟悉的声音，我立刻听出了是陈赓师长来了。

师长拄着根棍子，迈着残伤的腿，走到了我近前。他大概从我说话的声音里，听出了我的焦躁不安，便沉静而温和地说：“不要急嘛，研究一下，原因在哪里？”

我略微平静了一下，把两次突击的情形，向师长作了报告。师长立刻指出：“天太黑，地形不利，这是原因。你们从两处一齐突，也是可以的，只是忽略了加强主要的突击方向。马上把预备队调上去，加强第三连，全团的火力，集中支援第三连。”

正在重新部署的时候，三连连长王茂全同志跑来了，报告说：第二次突击中，他们连的司号员摸上去了，并且一直

摸到了敌人碉堡底下。他没有了手榴弹，又不见后续部队，只好摸了下来。

陈庚师长一听，说：“这个司号员很勇敢，很有办法，这次要他带领突击班。”

三连的司号员来到师长跟前，听说要他领路，把铜号往身上一背，说：“行！我保证把突击班带到碉堡跟前。”

师长摸黑抓住他的手问：“我听你象江西人，是吗？”

“是！”

“好，走过金沙江大渡河，跨过雪山草地的英雄，你是会把突击班带上去的。”

任何一次突击的成功，因素总是多方面的。我们正调动火力的时候，四师十二团团长邓克明同志，带着三挺重机枪，路经我们这里。他听说我们两次失利，正组织第三次攻击，立刻向机枪手命令：“把机枪统统架上，配合攻击！”

这时，虽然第三次突击还没开始，但是我已确信不会组织第四次了。师长亲临指挥，兄弟团主动支援，又有英雄的司号员同志带路，使我充满了信心。

一切准备妥当，二十几挺机枪一叫，三连连长王茂全喊了一声：“冲！”一挥马刀，带领部队飞上山去。

我也随着突击连的后边，跟向前去。

几分钟后，胜利的号音在山头响起，成功了！这几分钟之内的激烈战斗，是任何人看不见的。我们全团每人有一把马刀，突击队上去后，敌人也从工事里跳出来。混战激烈的时候，战士们一只手提刀，一只手往前摸，只要摸到人头上有个“圆巴巴”（反动派的帽徽），顺手就给一刀。一刀下去，不管他死活，又去摸另一个。

敌人开始拚命顽抗，几分钟后，变成拚命逃跑了。我登上山顶，敌人已经溃退到山腰了。就在这时，陈赓师长派警卫员跑上来，口传他的命令：追！追！追！

陈赓师长在战场上下达命令明确、简洁，这三个“追”字，此时此刻，比任何字句，任何语言都有力，我立刻照样传下去：追！追！追！

战士们如出山的夜老虎，挥着雪亮的马刀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猛追，紧追。我们这个团，班、排长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是老红军战士，他们熟悉夜战，更善于追击，毛主席“敌退我追”这句话，是人人领会贯通的。班长带一个班，排长带一个排（有的只带一个班），横冲直撞，插到敌人当中去，跑到敌人前头去。

胡宗南的所谓“精锐”，白天打阵地战还有一套，可是，夜战碰上红军这些夜老虎，他们就绵羊也不如了。特别是被冲垮以后，兵离了官，官没了兵，完全变成了散沙一把，乱石一堆。有的士兵知道红军的俘虏政策，跑一阵，跑不动了，干脆找个坑坑蹲起来；有的夹在人群中，呼呼奔跑，不知天南地北。天亮，一看前后全是红军，把枪一丢，一屁股坐下去，不跑了。战斗结束后，我们回头搜索，拾到重机枪九挺，俘虏三百多名。所有的俘虏兵，个个脸发白，嘴唇出血，他们除了惊吓以外，据说已经是两天多没喝一滴水了。

山城堡一战，歼灭胡宗南一个旅又两个团。从此，这个内战健将象一只破皮球，不跳不动了。我们正待命再战，“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于是，山城堡一战，也就成了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奇袭合水城

王世泰

一九三三年七、八月，在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左”倾错误指示下，我率领红二团跟刘志丹同志离开照金苏区，南下去开辟所谓“渭华根据地”。不久，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终于在陕西蓝田县终南山遭到失败，部队被打散了。

部队打散以后，我和刘志丹、曹士荣、黄子文四人历尽千辛万苦，经过蒲城、白水、洛川、郃县（即今富县）、甘泉、保安（即今志丹县）、合水，沿子午岭经过马栏川，脱险回到了照金薛家寨（属陕西耀县）。留守在照金苏区的同志听到刘志丹和我等同志平安回来的消息，高兴极了，隔山呼喊，传递这个喜讯。月光下同志们激动地抱在一起，说呀，跳呀，整整闹了一夜，度过了一个欢乐的中秋节。志丹同志平安返回部队，并担任当时部队领导者和指挥者，使大家对革命斗争胜利充满了信心。

当时，照金苏区成立了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下面的部队不多，有红二团陆续回到照金的一些干部、战士，新成立的黄子祥领导的红四团一百多人，王泰吉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一百多人，强世清领导的陕北红军一支队和张仲良、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领导的耀县游击队共约四百人。我到红四团二连当连长。

我们返回照金之前，临时总指挥部曾经组织了一部分红军部队，打下了旬邑县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消灭了旬邑县保安队和该县党、政反动机构，震惊了敌人，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已经调兵遣将，开始准备向照金苏区进行围剿。为了打乱敌人的如意算盘，粉碎敌人的围剿阴谋，我们决定避实就虚，主动出击，奇袭合水城。

当时，合水城防十分空虚，驻守合水城的敌人只有敌赵文智团的一个正规连和一百多人的保安队，总共不到三百人，战斗力不强。这一情况，是我跟志丹同志从南山返回照金途中在合水县包家寨子，通过哥老会马大爷的关系搞清的。同时，由于从照金到合水，沿途山路崎岖，梢林遍布，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行军，不易被敌人发觉，这就给长途奔袭，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临时总指挥部根据志丹和我的建议，决定奔袭合水。

参加这次战斗的部队，由志丹和其他几个同志指挥。除留一部分游击队执行保卫照金苏区、牵制敌人进剿的任务外，主力部队的红四团、抗日义勇军、陕北红军一支队和耀县游击队全部出动了。

农历八月末的一天，我们从照金苏区出发，横穿马栏川，直插正宁县，沿子午岭山麓，经过宁县东部，兼程北上。一路上，子午岭林区秋高气爽，霜叶泛红，山色格外壮观。可是我们哪有心思欣赏这些景色，都恨不得一步跨到合水城，一举歼灭城内的敌人。第四天下午，部队顺利地到达合水县黑木塬，行程三百多华里。

我们部队到达黑木塬以后，立即封锁消息，开始紧张的战斗准备。通过侦察，查明敌情没有变化。同时，通过向

群众调查，搞清了合水城复杂的地形。

合水县城位于子午岭山区的城关川，是一个跨山城池，形如葫芦，又叫葫芦城。葫芦头部临川，葫芦尾部依山，最高点的山头叫葫芦把，筑有坚固的碉堡，城外左右两条沟渠，形成自然的陡壁，东西两个城门楼高耸坚固，是敌人的城防重点。城廓要害部分有里外双层城墙，城墙是用大块砖砌起来的。里城墙和外城墙之间，每隔几丈远还筑有横的隔墙。要想从隔墙这边到那边去，只能通过里墙仅能容一个人出入的小门洞过去。即使爬上城墙，要占领全部城墙，还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总之，合水城池坚固，易守难攻。

当时，红军缺乏攻坚武器，合水城地形又不利于部队展开，所以，打合水不能硬攻，只能采取偷袭的办法。根据合水县城地形、环境的特点，和我军的装备等条件，我们的具体部署是：挑选二十一名动作麻利的战士组成攻城突击队，以一个连为主攻接应连，其余部队隐蔽在城东门外斜对面的半山坡上，相机入城。志丹同志命令我直接指挥攻城。我把突击队分成三个小组，分别由三名排长担任组长，并且准备了云梯、绳子等，做好了战斗准备。

次日天黑之后，利用夜幕的掩护，部队悄悄地从黑木塬出发了。我带着突击队走在最前面，后面紧接着接应连。经过三十多里的急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合水城东门北侧预定的爬城地点。

夜色象锅底一样漆黑，合水城影影绰绰地矗立在黑暗中，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城门楼上的敌人哨兵对我军的到来毫无察觉，不时还哼着小调。在我的口令下，突击队迅速地把云梯搭在了城墙上，但由于城墙太高，

云梯短了一丈多。怎么办？正在这时，专门跟我来打合水城的柴正样自告奋勇，要求他先登城。柴正样不是正式的红军战士，他过去曾经跟着我打过仗，打仗非常勇敢，后来因故离队回家了。这次听说部队要打合水，在黑木塬临时跟我来打仗。他要求给他一把驳壳枪、几颗手榴弹和三把刺刀。拿到这些东西后，他迅速登上云梯，麻利地攀到云梯顶端，把三把刺刀，依次用劲插入城墙的砖缝里面，脚登着最下面的一把，双手紧握稍高一些的两把刺刀，靠臂力把身子凌空悬起来，腾出一只手，弯下腰去拔出脚下的那把刺刀，再往稍高一点的地方插去。就这样，柴正样不住地倒换着刺刀，一点一点地朝着光溜溜的城墙顶端爬去。下面的同志们都为他紧张着一把汗，每个人的心都象被悬了起来。

“上去了！”不多一会，传来了人们轻轻的欢呼和赞叹声。只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立在城头上一挥手，把一盘绳子朝城墙下甩了下来。突击队员们在我命令下，一个个争先恐后，来到梯子跟前，手握绳子，足登城墙，迅速地登上了城墙。第一组上城后，我也登上城具体指挥。突击队三个组全部爬上城以后，按原定计划分头行动，一个组由柴正样带领，健步如飞地沿城墙摸到葫芦把敌人的碉堡跟前。碉堡里住的一个班，敌人还在梦乡之中，万万没有想到，“飞将军”会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敌人顿时魂飞魄散，一个个束手就缚。我们未放一枪，就全部把他们抓了起来，占领了葫芦把。拿下葫芦把，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葫芦把是全城的制高点，占领了它，就可以居高临下，用火力控制全城。

巧取葫芦把成功之后，这个小组立即用手电筒光在夜色

中划了三个圈，向我们发出了占领葫芦把已经成功的信号。在此之前，我和另外两个小组已经接近了东城门楼，看到信号后，迅速向城门楼的敌人摸去。敌人哨兵在黑暗中看见几个人影一闪，急忙一拉枪栓，推上子弹，大声喝问：

“谁？口令？”

“查哨的！”

话音未落，我们的几个战士已经猛扑上去，卡住了敌哨兵的喉咙。敌哨兵还未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早已当了我们的俘虏。随后，两个组的战士立即扑到敌人睡觉的屋门口，炸雷般地大吼一声：

“不许动！缴枪不杀！”

一排敌人从酣睡中惊醒，一个个吓呆了，在惊慌万状中光着身子，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有几个顽固的家伙慌里慌张地抓起枪，企图顽抗，我们的战士眼明手快，手起弹落，结果了他们的性命。不大一会儿，东城门楼也很快被我们控制了。

奇取东城门楼的枪声惊动了城内的敌人。他们惊慌失措地从被窝里爬了出来，慌里慌张地向东城门楼增援。我急忙命令几个战士迎上前去，从正面阻击敌人。

攻城突击队的两个组，也乘此机会，迅速通过南城墙，向西城门楼子冲去。这时候，接应连的同志也全部上了城墙，立即投入战斗，向敌人连部和伪县政府发起了进攻。

经过激烈的战斗，城里的敌人大部分被消灭了。但是西城门楼子那边仍然响着激烈的枪声，还没有攻下来。这时天色微明，东边天空出现了一抹亮光。刘志丹同志率领后续部队及时赶到了东城门外，急着要入城。但是城门紧闭，上

面吊着一只大黑铁锁。情急之中，我们既找不到掌管钥匙的敌守门人，也寻不见钥匙。部队的行动受到了阻拦，整个战斗不能很快结束，急得他们在城门外直呼喊。在这个十分紧迫的时刻，我忽然急中生智，举起驳壳枪，对准铁锁，“叭”的一枪，把门锁打个粉碎。城门打开了。大队人马一涌而入，向敌人冲去。不到一小时，就全歼了城内的敌人，占领了全城。

这一仗，除十几个敌人见势不妙，乘乱逃跑外，其余敌人全部被歼被俘。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伪县长和全县逃进城里的十几个大地主也全部被抓住了。我们还没收了敌人上万块银元、许多大烟土和其他财物，县城敌监狱里关押的我们二十多名同志，以及六十余名无辜被抓来的群众，也全部被营救了出来。

奇袭合水县城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和周围革命群众的对敌斗争热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这次战斗是一次避实就虚，长途奔袭，利用夜间智取城寨，出奇制胜的典型战斗。战斗的胜利，对于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第二路游击总队，开展庆阳、合水等地区的游击战争，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以后，红军和党的威望与影响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深入人心。紧接着，我们又打了几次大胜仗，革命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西华池歼灭战

王世泰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下属红三团、骑兵团。我当时任红三团团长。主力红军成立以后，以南梁根据地为中心，进一步划分了一、二、三路游击总队的活动范围，加强了领导，使游击战争蓬勃开展了起来。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成立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对敌人的威胁越来越大，引起了敌人的惊慌。敌人多次纠集兵力，对陕甘苏区不断进行“清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进一步扩大苏区，发展革命力量，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我军主动出击，首先在二路游击区的姚渠、五里镇等地消灭了反动的地方武装，然后回师北上，向保安方向行动，佯作声势地要打保安县城。但行至保安和吴旗之间，却突然挥师西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三道川一举消灭了地主武装张廷芝的一个连，并摧毁了其修械所等后方机关。紧接着，我军又翻山袭击了谭世麟的老巢元城子，在城外李家梁歼灭了敌人一个骑兵连，然后插过悦乐进至合水城附近的赵家堰，摆出了攻打合水县城的架势。愚蠢的敌人哪里能摸清我们的意图，只见我军大队人马兵临城下，一时恐慌万状，立即向庆阳敌人报急求援。庆阳敌军王子义闻讯后，连夜出

动大批人马，杀气腾腾地向合水增援。

就在敌军气急败坏地向合水扑来的时候，我军却在第二天一大早主动离开赵家塬，并于当天中午赶到了西华池。敌人赶了九十里路来到合水后扑了空，恼羞成怒，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气势汹汹地掉头又向西华池追赶而来。

庆阳敌军，是上一年秋天我军打垮敌赵文智部之后，来换防的另一个正规步兵团。他们没有同红军交过战，不知道红军的厉害，只凭他们正规军的牌子而骄横自负。他们接到合水敌人的报急消息后，出动了两个步兵营和一个机炮连，由一位副团长指挥，直扑我军，恨不得一口吞掉我们。敌人的三十多个骑兵，每匹马鞍后还拴着一束绳子，说是准备捆绑红军用的。可见敌人是多么骄傲自大啊！

我们原来估计，庆阳敌人主力部队被我军在赵家塬的行动调出庆阳城之后，长途跋涉九十华里，等赶到合水县城时，大约已是精疲力尽了，当天不可能再追赶我军；而我军却可以乘庆阳守敌外出救援合水，庆阳城防空虚之机，一鼓作气，拿下庆阳城。

当天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在西华池稍事休息后，立即为当晚夜袭庆阳城作紧张的准备。部队的负责干部正在开会讨论打庆阳的具体部署，忽然驻在城东的二路游击队指挥部来人报告说：“远处发现了敌人！但搞不清是地方武装还是正规军。”刘志丹同志随即命令继续侦察。过了不大一会，二路游击队指挥部又来报告说：“是敌人的正规部队，不是地方武装。”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刘志丹同志和我立即登上北城墙，拿起望远镜一看，只见敌人在五百米以外，排成两路纵队，

杀气腾腾地向我们扑来。

敌人就在眼前，我马上命令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当时刘志丹和我分了工，他催促下沟饮马的骑兵团立即上来参加战斗；我指挥红三团在北门外和城墙上部署兵力，准备迎击敌人。我将红三团的两个连隐蔽在北门外一条横沟渠旁坎下面待命，并规定敌人不到五十米处不准开枪，先锋连布置在北城墙上，掩护主力部队冲锋。

敌人越来越近，距离我军二百米的时候，散开向我军全面进攻，迫击炮、重机枪一齐开了火。这时，正在沟底饮马的骑兵团战士大部分还未上来，我军还一枪未放。已经上来的一排骑兵，由于看到敌人就在眼前，心急如火，在排长的带领下冲入敌群。但由于敌人火力很强，我军冲锋没有成功，那位排长和另外几名战士先后牺牲了，其余的也退了下去。

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凶狠的嘴脸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子弹呼啸着从我们耳边飞过。这时，骑兵团已经集合了起来。刘志丹同志发布了作战命令：骑兵团飞速迂回到敌人背后，切断敌人的退路，向敌人指挥所和机炮连阵地发起猛攻。红三团在正面抗击敌人，阻止敌人前进。第二路游击队包抄过来，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骑兵团的战马嘶叫着腾空而起，伴随着飞扬的黄土，风驰电掣，以摧枯拉朽之势冲进敌群，直捣敌指挥机关和重火力阵地。敌人被这突然而来的打击吓得神魂颠倒，乱作一团，在我军的枪弹和马刀下，死的死，伤的伤；敌人的迫击炮、重机枪也顿时变成了哑巴。

从正面向我军阵地冲锋的敌人此时已经冲到了离红三团

阵地只有五十来米的地方。我见骑兵团、二路游击队都已动了手，便下了开始射击的命令。红三团的战士早已等得心里冒火，一听到命令，一齐扣动了枪机。子弹象雨点般地射向敌人。顷刻间敌人倒下了一大片。

打了一阵排子枪，紧接着我命令司号员吹号，指挥三团的战士冲锋。嘹亮的号声中，战士们“哗”的一下跃出塆坎，一个个象下山的猛虎一般，呼喊着重向敌人扑了过去。这时候，二路游击队也从东沟畔上冲了过来。敌人被我红三团、骑兵团、二路游击队三面包围了。

战士们和惊魂未定的敌人短兵相接，打成一团，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阵地上不时传来战士们的吼声和敌人的惨叫声。

这时，部署在城墙上的先锋连战士见兄弟连队的战友们都在奋勇杀敌，也着了急，齐声请求下城参加战斗。我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不等我话音落地，有些性急的队员索性从城墙上跳了下去，向敌人冲杀过去。

敌人在我军的包围合击下，失掉了指挥，乱作一团，无力抵抗，大部分当即向我缴械投降，少数敌人逃到西沟畔，跳下沟企图脱逃。但是，他们哪里能够逃得脱呢？我骑兵一部迅速绕过西沟畔堵住了敌人逃跑的沟口。紧追敌人的我步兵战士，也跟着敌人跳下沟去，紧追不放。沟里的敌人走投无路，只好缴械投降，乖乖地当了俘虏。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天黑之前，敌人全部被我歼灭了。这一仗，我们缴获敌人步枪六百余支、八二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俘敌七百多名。这是陕甘红军第一次骑步兵配合，全歼两个多营敌人、获得全胜的一个歼灭战，也是

陕甘红军第一次缴获敌人重武器的一次战斗。战士们高兴地抱着还微微发烫的八二迫击炮筒，抬起崭新的重机枪，又蹦又跳，欢喜地不肯撒手。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西华池歼灭战，是继我军奇袭合水县城和打垮敌赵文智团之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的胜利。这次战斗锻炼了部队，提高了部队运动战的水平，对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开辟第二路游击区，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回忆陕甘红军三路指挥部一支队

王德荣 样木德 原任正宁县政协副主席，一个干象子山的革命老前辈。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等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正宁县三嘉堡细嘴子，将“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整编，并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打出了红旗。从此以后，子午岭西麓的正宁、宁县、合水的山区，逐渐发展成为陕甘根据地游击区。在这一带，活跃着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部队——陕甘红军三路指挥部一支队。我作为这支部队的参加者、幸存者，四十多年来，总想把这支队伍的斗争历史书写出来，借以寄托对众多革命先烈的怀念和敬意。

星 星 之 火

陕甘工农红军三路指挥部一支队是一九三四年底成立的。成立初期，一支队只有十几个队员，枪少，装备差，加上环境严酷，确实走过了一段艰苦的斗争过程。一支队成立之后的两年多时间内，经过了大大小小多次战斗，先后有三位队长牺牲，一位队长负重伤，许多优秀的战士，为革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一九三五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根据地实行战略包围，并在局部地区开始“清剿”。一次，一支队一班班长樊登魁带着五个同志到盘克南仓村执行任务，突然与东北军骑

兵遭遇。敌我力量悬殊，樊登魁与五位同志全部牺牲。

当时的队长张占荣同志调任县大队副以后，由樊登甲同志继任队长。一九三六年正月十五日，一支队派李含章、张得功等三人深入敌据点侦察，配合县独立营、红三团一连，在宁县莲花池消灭东北军一个骑兵排，缴枪三十多支、战马三十多匹。三月，一支队又配合县独立营在金村庙牙村同敌激战，郭鲁木、崔兆春、陈彦彪、马得清等十多位同志英勇牺牲。樊登甲同志不久因患病离开了部队，由一个叫张占胜（绰号张瓜子）的战士照料，在全村庙垭王家大岭养病。这儿只有一户贫苦农民刘峙志，樊登甲同志就住在他家。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由王家大岭到木瓜潭同游击到此的新宁县县政府接洽。张瓜子早已有叛变投敌的想法，半路上用木棍在樊登甲同志头上猛击几棍，把他打昏了，又打断了他的腿，抢了他身上的几块钱投敌去了。樊登甲当时并没有死，后来被王家大岭那户老百姓发现后救回，经过群众的精心护理，死里逃生，慢慢又能活动了，只是腿成了残废。一九三六年六月间，一支队到正宁三嘉堡阳坡头作战。宁县敌保安队鹿明胜部乘虚连夜到木瓜潭偷袭县政府。政府几名工作人员全部被俘，樊登甲也在县政府，一并被捉。后来，县委书记杨伯伦同志乘敌不备脱逃，樊登甲因残腿行动不便未逃脱，被敌人杀害在当地。

樊登甲同志因病离开部队后，由胡六同志任队长。在一次伏击敌人的战斗中，胡六同志脚部受重伤，又由王得胜同志任一支队队长。王得胜同志也是正宁瓦沟圈人，与樊登甲同志是隔山弟兄，没有改编之前就已经在这个部队了。

一九三六年春，蒋介石调集了西北、河南的一些部队进

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抗击红军主力东征抗日，同时命令东北军重点进攻陕甘苏区。为了抵抗国民党的猖狂进攻，保卫陕甘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在原地开展斗争，抗击、牵制和消灭进犯的敌人。我们在新宁县县委领导下，发展游击队，组建武工队，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击敌人，保卫革命根据地。

清剿一开始，敌人便向苏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他们采取“碉堡政策”，步步为营，逐堡推进，先占了盘克堡，然后由北向南，依次占领了金村庙堡、九峁堡、杨家堡。新宁县苏区全部失陷了。合水、新宁县、新正三县根据地与陕北的联系也完全隔断，新宁县委、县政府的机关干部由县委书记杨伯伦同志带领转入游击活动。

这时，活动在这一带的基于武装三支队、四支队已经改编为红军第一独立营开赴陕北，留在当地的是一支队、二十支队（县警卫队改编的）和新建的十八、二十一支队共四支武装，在合水、新宁县、新正三县东部山区坚持斗争。敌人虽然表面上占领了全部苏区，其实他们仅仅盘踞在一些村镇、据点里，广大山区、农村仍控制在我们手里，敌人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牵制。红色政权依然存在，领导着当地的革命斗争。

可是，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环境越来越艰苦，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人动摇了，甚至叛变投敌。新宁县军事部长老谭同志在金村庙堡牙村与东北军的战斗中牺牲了，其工作由王德宽接任。王慑于敌人的淫威，竟带着二十一支队和十八支队的一部分人叛变投敌。十八支队剩下的一部分人又被支队长邹辅才带着投敌。与此同时，二十支队在康家

与庞明胜的保安大队作战，指导员王占义又不幸英勇牺牲。此时，宁县四个游击队只剩下了一支队一个，而且与其它根据地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一支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孤军奋战。形势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斗争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为了打通关中根据地和陕北的联系通道，红军南路军一个营由曹力如同志带领来到新宁县。有这么多主力红军战士来到子午岭山区，给艰苦奋战的一支队干部和战士以及当地群众很大的鼓舞。一支队积极配合南路军作战，头一仗是打驻九岷南嘴子的庞明胜保安队。根据预先商定的作战方案，南路军埋伏在九岷桥子东面，一支队埋伏在桥子以西一个山坡上，等庞明胜的保安队到桥子上时两面夹击。不料庞明胜觉察了红军的意图，只派小部分兵力倚桥子之险阻击南路军，切断了南路军与一支队的联系，然后以绝大多数兵力主动向一支队埋伏的山坡进攻。

战斗提前打响了。支队长王得胜同志看到敌人扑了上来，就带领全体战士发起冲锋，想把敌人压到桥子上，实现合击的意图。可是南路军被阻不能过桥配合，反而导致一支队孤军深入，陷入重围。王得胜同志见状立即指挥撤退，自己担任掩护任务。部队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且战且退，伤亡很大。王得胜同志（第四任支队长）为掩护同志们壮烈牺牲了。这次一起牺牲的还有张金才等同志。

一支队虽然遭受了挫折，士气却越战越高，积极配合南路军奋勇作战。王得胜牺牲后，上级决定由一中队队长崔瑞山同志代理队长。部队连夜急行军，到合水县店子渠去攻打吕家寨。

吕家寨是大土豪吕连喜的寨子，不但地势险要，还有武装把守。当夜一支队围了寨子，派人上前叫门，想骗开寨门，可是里面毫无反应。过了一阵又去叫门，哨兵一声不响地开了门。原来吕连喜已把国民党部队调进了寨内。我们一时搞不清情况，不敢贸然进去，就撤了下来。部队走了十几华里，就在野外宿营。拂晓时分，大地主吕连喜调来的国民党正规军追了上来。战斗打响了。崔瑞山队长以为有南路军做后盾，立即指挥部队应战，一直打到天亮，才发现与南路军失去了联系，又成了以寡敌众的局面。崔队长即刻组织部队撤退。敌人集中火力射击，一班长薛德耀腰部被敌人机枪击中。他知道自己负了重伤，仍沉住气问身后的副班长小郭：“你看我哪里挂花了？”小郭一看，惊呼道：“哎呀！你满身都是血！”话音未落，薛德耀同志已经倒下了。薛德耀同志是全队有名的战斗英雄，作战勇敢，在队员中威信很高，这样一位战士牺牲了，大家都很悲愤。

崔瑞山同志带着同志们边打边撤，终于摆脱了敌人。太阳刚露头的时候部队撤到了安吉寨，不料又遭到安吉寨的敌人截击。部队此时已精疲力尽，很多人受了伤，很难再进行战斗，崔瑞山立即指挥部队向寨子南面沟里撤退。寨子里的敌人不断打冷枪。撤到半山坡上，崔瑞山同志不幸被敌弹击中，翻身倒在荒草中，英勇地牺牲了。

崔瑞山同志是宁县金村店堡崔家碾子人，曾被马鸿宾部抓去当过兵，以后参加了革命，时间虽然短，但他同敌人顽强战斗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坚持革命

一支队经过这样两次艰苦的战斗，伤亡较重，全支队仅剩下十三人，而且继樊登魁、樊登甲、王得胜为党为革命英勇捐躯之后，第五任队长崔瑞山又为革命洒尽了鲜血。这么多的好同志不在了，同志们心情很沉重。但是指导员乔占才同志和一支队的战士们并没有动摇，仍然顽强地坚持斗争。只是由于当时所处环境的险恶，对往后工作怎么搞，仗怎么打，一时没了主意。

这时，新宁县境内除一支队这支武装力量外，还有我们一支只有几个人的武工队，山后还有五、六个专门看管犯人的武装人员。对这点仅有的革命力量，群众抱着很大希望。但敌人却视为眼中钉，派了正规军和保安队，企图一口吞掉他们。

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一天，县军事部长唐致祥同志来了。一见面就对我说：“县委决定让你到一支队担任队长。”我当即接受了任务。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离开武工队到了一支队。这时一支队驻在金村庙堰黄柏掌。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指导员乔占才。对他，我早就听说过，一见果然是位精明能干、年轻有为的好同志。当时部队弹药很缺，有的枪只有两、三发子弹，有的枪连一发也没有。全队只有从武工队带去的三十发步枪子弹，还有县委发给的六双布鞋，全部家当仅此而已。

当时关中特委给一支队的任务是：打击敌人，保卫苏区，支持群众斗争，积极负责打通关中苏区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通路。

根据任务和部队情况，我们决定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一方面要积极捕捉战机，主动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打击地主阶级和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首先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弹药太少，尽管大家绞尽脑汁，还是一筹莫展。正着急时，碰巧有个叫宋柏芳的老乡，跑了十多里路特地来报信。他说看见三个东北军士兵，带着三支步枪进九里沟去了。我们闻讯大喜，即集合队伍，追了几十里路，追上了那三个士兵。盘问之下，他们说正想把枪支弹药交给红军，换些路费回老家。我们按路程需要付了全部路费，打发了那三个东北军士兵，得到了三支步枪，七带子弹和十几个手榴弹。这真可谓雪中送炭。

一支队开始了新的转折。第一仗是打于村庙堰的地儿庄。地儿庄在宁县东北的于村庙堰稍上。我们战前进行了详细的侦察，了解到由根据地到那里要走两个夜晚，便急行军一夜，在天亮前赶到了湘乐附近的张家沟。这里十分偏僻，仅有一户人家，主人是我党发展的“老交通”。离他家二里多路，有一孔多年未住人的破窑洞，窑洞口被长年溜下来的虚土堵得只剩下不大一个窟窿。我们几十个人就挤在这个破窑里。里面又闷又热，还不住地往下掉土，但大家都不在乎。接着我们又找了一个当地的共产党员崔兆选同志去侦察情况。

老交通一家父子几个人，有的在村边锄地放哨，有的以放牛为掩护给我们送饭。在地下党和群众的支持保护下，我们安全地在这里隐蔽休息了一整天。

天刚黑，派去侦察的老崔同志回来了。报告说情况没什么变化。部队立即出发连夜行军，后半夜到达目的地，包围

了地儿庄。

这里有家大地主，叫苏生高，民愤很大。他家高围墙大门楼，一大排窑洞。窑洞顶上半崖里还有一孔高窑，有暗道与各窑连通。这种高窑枪打不进，炸弹落不住，里面准备着柴、米、水、草，一旦有事，各窑里的人很快从暗道爬梯子直登高窑，然后把梯子抽去，堵住通道口，就可以在高窑里死守。这家还有两支步枪。周围驻着联保队，听到枪声也会赶来增援。所以这个庄院很难攻打。

游击队包围这个庄院以后，派两个人去叫门，谁料地主非常狡猾，一听叫门，立即招呼几窑人上了高窑，跟着开了枪。两方相持了半夜。他虽然只有两支枪，但居高临下，凭险固守。一支队没别的武器，难以攻破。

后来上到窑顶，看见有麦草垛，就用皮绳把点着火的麦草捆吊下去，对着高窑口熏，不一会儿，高窑里传出咳嗽、打喷嚏的声音，乱作一团。连着烧了十来捆麦草后，高窑里没了动静。后来，连高窑门也烧着了。这时，周围枪声四起，保安队来了。但他们在黑暗中情况不明，喊得凶，走得慢，在村外遇上了我们打援的同志，枪一响，他们就趴下了，只一个劲放枪，不敢往前挪。

我们很快上了高窑，只见地主家的人横七竖八地躺着，都已昏迷不醒。我们缴了两支步枪，几十发子弹，又把地主一家抬到院子里，用凉水浇醒，在四周贴了些红绿纸写的革命标语，然后在麦场上集合，准备向根据地转移。

这时，天亮了，保安团突然猛扑过来。我们立即进行反击，把敌人赶入一道沟里。敌联保主任于陀源跪倒在半坡上投降了。我们一个班长名叫雷占荣的，冲下去就收枪。不料

于陀源突然把枪一斜，顺势就是一枪。子弹穿过雷班长的胳膊和胸膛。雷占荣不顾重伤，扑上去死死压住于陀源，把枪口堵在他脑门上，正要扣扳机，指导员乔占才赶过来拦住说：“他已经是俘虏了。”

太阳刚出来，战斗胜利结束。这一仗活捉了联保主任于陀源，还缴了一批枪支子弹。大家把雷班长扶上马，兴高采烈地开回根据地。

地儿庄一仗，士气大振。不久，我们又在九幌桥子打了庞明胜。

驻宁县苏区一共有三个敌保安队：庞明胜部驻九幌北庄子，刘铁山部驻盘克渠；甘肃地方团队杨于丞一个中队洪朝庆部驻金村庙渠牌楼村。其中庞明胜最反动，实力也比较雄厚，曾两次抄了我们县政府，杀害了不少党员干部。

桥子在九幌东面，在南北走向的险峻深沟里筑有一条土桥，约百十米长。桥面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过。庞明胜早就在桥子西面山坡上构筑了工事。前不久庞明胜就是在这里与一支队和南路军进行激战的，因而更加看重这个地方，他常对部下说：“桥子是一个最险要的军事要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只要把桥子死死抓住，就可以控制九幌渠。”一支队很想狠狠地打击庞明胜一下，一方面打了他，对其他两股敌人势必产生很大震动，可以改变宁县的敌我形势，另一方面也可为上次桥子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

有一天，我们队伍从九龙川上山，快到九幌渠时，忽然有个放牛的老乡跑来了，走近一看，是贫苦农民刘力学。他压低声音对我们说：“你们来得正好，庞明胜的保安队在西洼里哩。”我问有多少人。他说是庞明胜的一个分队长带着

一些人，跑到西洼糟蹋百姓，庞明胜在九坝南嘴子，离这儿一、二里路远。

我们问明了情况，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在桥子西边埋伏，打伏击，狠狠教训一下庞明胜。

于是，先派一中队绕道翻过沟，从桥西山头摸上去，抢先占据敌人修的工事，悄悄隐蔽下来。

太阳偏西，一切已准备妥当，西洼里的敌人还蒙在鼓里。这时，我们打出红旗，大张旗鼓地从桥东沟畔往上冲，故意惊动敌人。有些百姓以为我们不了解情况，赶紧凑过来说：“敌人在那边庄子上！”我们摇摇头说不要紧。

敌人老远发觉了我们，拔腿就朝西跑，企图抢占桥子西边工事。我们顺势追，把敌人全部赶进了伏击圈。埋伏的同志迎面一阵排子枪，不少敌人当场被打死；有的跪在地上，举手缴枪；剩下的连滚带爬窜下山沟，跑得慢的几个就当俘虏。

夕阳西下，战斗胜利结束了，就在我们打扫战场，遣散俘虏的工夫，闻讯赶来不少群众。他们热情慰问我们，把各样吃的往战士手里塞。

接连打了两个胜仗，一支队扩大到近百人，还补充了一批枪支弹药。庞明胜的元气大伤，士气一落千丈，缩进九坝北庄子碉堡里轻易不敢出来。群众中到处流传着赞扬一支队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增加了不少传奇色彩。有时群众在集市上遇到敌人的探子，故意吓唬他们：“一支队了不起呀！神出鬼没，来去无踪。”“游击队员个个都是神枪手，黑夜听声音就能打中，打香火头子百发百中。”有的群众甚至乘夜跑到敌人碉堡附近大喊：“快投降吧！你们的目

子没几天了！”碉堡上的敌人既不敢开枪，也不敢吭气。

群众一起来，敌人更加胆战心惊。我们经常大白天打着红旗，浩浩荡荡地从庞明胜的碉堡下边过，他们也不敢开枪。驻在金村庙牌楼村甘肃地方部队杨干丞的一个中队队长洪朝庆，也被红军威力所震慑，不敢继续与红军为敌，经乔占才同志出面，双方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洪朝庆保证今后不打红军，不抓共产党干部，不骚扰苏区百姓，有什么行动及时向红军报告。并约定暗号：一接触时他们在枪口上拴条白毛巾，一支队就别打。后来这个中队干脆放弃了金村庙，准备撤回春荣镇大队部。但洪朝庆部事先未与一支队联系，撤退途中被一支队追到石鼓一举歼灭，全部缴了械。这才发现是洪朝庆中队，又把枪支全部发还放行。洪部回到春荣，向杨干丞报告了一支队的情况，杨干丞又暗中派一名副官来与我们接头，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这样，一支队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不但没有退缩，而且连战连捷，队伍从十三人壮大到上百人，重新打开了局面，稳定了苏区形势。

一九三六年八、九月，一支队在盘克堰观音庙打了一仗。这时，红军主力已经回师陕北，东北军的重点进攻也草草收场，开始从关中苏区撤退了。根据地形势大为好转，一支队也有了新的发展。关中分区又派了四大队上来，由张占英（后叛变）、赵铁娃带队，配合一支队作战。两军会合后，我们决定打到白区去，扩大红军影响，扩大苏区根据地。恰好观音庙逢集，遂拟定了在观音庙作战的方案。

观音庙是盘克塆上的一个镇子。每逢集日，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都来上庙烧香，赶集做买卖。敌保安团队也到集上来活动。前一天夜里一支队和四大队从山区拉到湘乐川，隐蔽在湘乐附近的傅家山。从这里一上塆就是观音庙。

第二天早上部队分两批出发：一批由赵铁娃、倪荣兴、李汉章、一个战士和我组成，穿便衣先走；第二批是一支队和四大队的一部分，隔半小时后再出发。

路上赶集的人渐渐多了。我们五个人稍微拉开距离，混在赶集的人群里朝集上走。赵铁娃和我各带一支驳壳枪，藏在衣服底下还不怎么显眼，另外三个同志各背一支马步枪，外面披件棉袄，还是能看出是带着枪的。一般群众都知道我们是红军便衣队。虽然是在敌占区，但群众还是向着我们的，掩护着我们一起走。

赶到观音庙时，集已经上闹了，满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街两旁一溜儿摆满了各种小摊和小吃点。我们在集上走了一圈，发现在离观音庙不远的一个卖羊肉泡馍的铺里，敌保安队长窦光耀领着一群保安队员，正围着一张桌子吃喝。窦光耀，人称“窦瓜子”。他们的枪都靠在桌子四周，根本没想到红军已到了他们身边。

我们又四处观察了一下，看再没有敌人，便站在街南面的一条土埂上，距窦瓜子一伙不过二十米，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过了一会，估计我们的队伍快到了，大家互相一示意，倪荣兴同志便端起枪，照准窦瓜子就是一枪。这一枪没打中，但吓得窦瓜子一下子跳起身来，把手里的羊肉碗一扔，撒腿就朝北沟畔跑。我们紧跟着就追。追到北沟里，窦瓜子慌不择路，掉进了水冲的窟窿里，被我们瓮中捉鳖，抓

了俘虏。

我们把窝瓜子和另外几个俘虏一起押回街上。大部队也正好赶到了。随即召集群众开会。先宣传了抗日的道理，然后公审窝瓜子。窝瓜子被五花大绑着押进会场。他自知罪大恶极，难逃活命，也就豁出来了。他见我们的一个班长正在吃梨，叫喊着要给他一个。那班长边骂边往他嘴里塞了半个梨。他使劲嚼着还直瞪眼睛。

愤怒的群众见窝瓜子被押进会场，一拥而上，照准窝瓜子拳打脚踢，拦都拦不住。

正在这时，了望哨跑来报告说盘克的敌人来了。我们一面派部队迎击敌人，一面继续开会。宣判窝瓜子死刑，立即执行的话音未落，只见一支队二中队房队长手起刀落，窝瓜子的脑袋就滚到了一旁，被群众踢来踢去。

会一开完，部队立即拉出去，一举击溃了从盘克来的敌人。

也就在这一天里，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捣毁了观音庙周围的所有敌人据点。

扩大根据地

观音庙战斗获胜后，一支队的声势更大了。这时，国民党东北军已经撤离苏区。我们决定彻底扫除苏区内的敌保安团据点，收复失地，巩固苏区。

首先决定拔掉九幌的庞明胜据点。庞明胜很反动，把守着子午岭苏区西边的门户，对一支队威胁很大。经过几场激战，庞明胜兵败撤到了九幌西面的北庄子，在那里修了几个碉堡，继续凭险与我们对抗。一支队先后几次攻碉堡，都未能

攻破，只好在碉堡周围相机行动。

有一天，一支队从平道川上去，绕到了北庄子碉堡北面的沟里，等到十点钟左右悄悄来到碉堡底下。原先我们估计庞明胜在这个时候可能下碉堡活动，想堵在外面消灭他们。但这次情况没摸准，庞明胜这天没出碉堡，等来等去没打上，我们就撤走了。

庞明胜看到一支队决心要收拾他，想来想去，只好自己放弃九峡据点，滚回老家米桥去了。至此，九峡堡全部被我们收复。

当时，盘克堡上还有两股敌人：一是驻峴头的刘铁山，二是驻盘克镇的赵让贤。刘铁山曾经参加过革命，后来叛变投敌。他部下有四个中队，为了保存实力，不随便出据点。我们硬攻了几次，刘铁山看到势难持久，在未破寨之前，主动放弃峴头据点，撤到早胜去了。

刘铁山一退，只剩下了固守孤镇盘克的赵让贤。联保大队一支队包围了盘克，积极准备攻打。赵让贤一看抵抗无力，逃走无路，只好开门投降。乔占才和我进寨谈判，商定赵让贤部改编，给一个抗日义勇军的番号。红军部队第一次开进了国民党长期盘踞的盘克镇。

到这时，子午岭苏区新宁县境内三条线上的反革命武装已逐个被我驱逐肃清。新宁县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区境内一个反革命据点也不存在了。

新宁县境内的敌保安团据点全部被肃清，对 newPos、宁县和北面的合水县也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在这种形势下，一支队又开始向北活动。

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合水古城川。才下山，看见沟里有

火光人影，估计是合水县太塬保安团中队长翟老五的部队。翟老五是个大地主，经常带着人出去收租。一支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悄悄摸上去，发现果然是这伙匪徒。双方刚一接触，翟老五部落荒而逃，只抓到一个俘虏。他牵着一匹马，说是翟老五的马。

这一下，翟老五的部下军心动摇，很快就有他的一个分队长佟得才率部投诚。佟部投诚后，由佟得才任一中队队长，原一中队队长任二中队队长。佟带来的队伍编到了二中队。与此同时，合水县黄炳星保安大队的一个分队长，记得好象姓徐，也带队投诚。一支队因此扩大为三个中队，人数达到了二、三百人之多。

一支队在子午岭山麓南起新正宁三嘉塬，北到合水太塬、店子塬，东起子午岭，西止早胜、春荣，方圆二百余里的广大地区，保卫和扩大了苏区，打击了反革命武装，历经艰险，坚持斗争了二年多时间，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了。我党中央在积极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之后，与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红军主力开始南下。在抗战如火如荼、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一支队奉命改编为主力红军独立一团，随主力部队南下。我奉调留地方工作，未能随部队南下。改编后，乔占才同志调独立一团工作，他后来又调回地方工作，任赤水县保安大队队副，后来在打赤水县梁庄郭相堂敌保安队时光荣牺牲。

乔占才同志是陕西省旬邑县职田镇墙下人，优秀共产党员，一九三四年由五支队二中队队长调任一支队指导员时，才十七岁。他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勇敢。在残酷的斗争中，虽

然一支队先后牺牲了三任队长和很多优秀战士，最困难时部队只剩下了十三个人，但他毫不动摇，坚定地团结和领导着一支队，历尽艰辛，顽强战斗，从一支队一成立到改编为独立一团，始终都和同志们在一起，是一支队主要的领导人。一支队的干部战士，以及一支队战斗过地区的广大群众，都十分敬佩他。至今深深地怀念着他。

在党的领导下，在子午岭广大群众关怀支持下，一支队从小到大，成长为红军主力部队。这个成果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为了缅怀已经长眠于地下的乔占才等革命先烈，我决心以先烈为榜样，努力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争取把甘肃的事情办好，把老区的事情办好。

马踏环江岸 智袭曲子城

高 峰 述

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宜君成立时只有一个第二团，番号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一九三三年五月由于杜衡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二团从照金南下建立渭华新苏区，结果全军覆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陕西省委在合水县莲花寺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四十二师，下辖第三团、骑兵团。

骑兵团的前身是红四团。红四团是一九三三年六月由原活动于三原县的渭北游击队改编后组建的，当时团长为黄子祥，政委刘映照。改编成骑兵团时赵国清任团长，张秀山为政委。初组建时有二百多人，辖三个连，一九三五年五月延长一战一下子增加了一百多匹马，扩为四个连建制。

红二十六军后来又组建了一、二团，发展到四个团。中央到达陕北后，骑兵团成为中央军委直属骑兵团。

骑兵团活动范围大，常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外线几百里的范围游击运动。骑兵速度快，打起仗来，每人一把大刀，一枝钢枪，举刀催马，杀声震天，最利奔袭突击，打了不少突袭敌军的漂亮仗。

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刘志丹师长指挥下，骑兵团同红三团从耀县向北九战九捷，最后在西华池打了个大胜仗；十月，在

吴堡川伏击敌人，刀劈敌军，敌军震慑；十一月二十八日，奇袭环县城曲子镇，大胜。

一九三四年，南梁陕甘根据地不断扩大，十月以后逐渐发展到庆阳北一带，华池县、庆北县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十一月初，根据地又召开了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红军不断对侵扰边区的反动民团武装进行打击，当时紧靠根据地的环县还为白军所占。环县伪民团武装，乘我庆北根据地初建，气焰嚣张，不断扰我苏区，欺压百姓，群众痛恨至极。那时环县县城在环江边的曲子镇。曲子外有城垣，内有街市，商贸繁盛，豪门聚集，历来是反动当局在庆阳北的主要据点。当时敌人正把环县五个区的民团集中在曲子整训，企图不明。为了摸清情况，庆北游击队派出侦察员，乔装成做小买卖的，卖梦的、补锅的小手艺人，吆三喝四地进城到处活动，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城里驻有敌人一个正规军骑兵团，人马近百，连长曲子鹏；各区民团二百多人，团总李恒泰，团副王占英；另有县保安大队，队长是龚棉宜，再加伪县政府人员共约有近千敌人。

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等知悉这一情况后，认为出战曲子是消灭环县各区民团的好机会，正可汤浇蚁窝，一举摧垮环县民团组织，遂决计突袭曲子。刘志丹同志命令我们骑兵团参战，指示说，骑兵团应不顾一切疲劳，奔袭曲子之敌。此举意义是很大的。

当时我们骑兵团正在二道川活动，接到命令后赶奔南梁荔园堡陕甘边军委所在地。刘志丹让我们到茅野川与庆北游击队会合，在庆北游击队配合下攻打曲子镇。接着，我们

全国又星夜出发去茅野川。

一九三四年三月以后，我一直担任骑兵团政委，还担任军队内党组织团军政委员会书记。

来到茅野川，我立即召开军政委员会议，骑兵团长赵国卿、参谋长刘约三及庆北游击队张自孝队长、王宝珊政委等参加会议，作出战斗部署。

为保证全歼敌人，只能出敌不意，以迅猛制胜，又想到循河而进，骑兵马快，步兵要过河涉水，跟不上，决定先派精干小股急进，骑兵团主力居中，庆北游击队作后卫接应。为了奔袭成功，兵不厌诈，又确定让先头部队临近城下以后，将马压下，换上便衣，乔装入城，乱中歼敌。

庆北游击队是一支参加过多次战斗的地方武装，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当时有七、八十人，但武器多是大刀长矛，装备差。队员们恨透了环县这股常与游击队作对的反动武装，也都想乘此机会狠揍顽敌，同时换换枪，武装一下自己，因此士气很高。

部署之后，部队乘夜出发了，要赶在拂晓到达城下。

顶着初冬的寒气，骑兵踏踏而行。路过孙家湾子时还顺便缴了敌人盐局的几条枪。庆北游击队仗着路熟紧紧跟随，一路小跑。初冬河还没有结冰，河水刺骨寒冷。游击队员们几次踏河，满身湿漉漉的，夜风一吹难受极了。但同志们全然不顾，只心急火燎地朝前赶，没有一个叫苦，没一个掉队的，一鼓作气，也于拂晓前来到了曲子城下。

天快明了，曲子城头隐隐可辨。先前来到的骑兵团一连蔡子祥排长已经按计划带着二十多个换上便衣的战士和几个

庆北游击队员，扮成上早市的商贩挤挤嚷嚷拥进城去了。约定得手后鸣手枪为号，城外的骑兵团再发起攻击，里应外合。

我和赵国卿带着团主力埋伏在城外，焦急地等待着城里的信号。当时也做了万一智取不成，就展开强攻的准备。

不一会，城内传来了枪声。埋伏着的队伍一听枪响，象猛虎下山一般朝南城门扑去。天色还有点朦胧，城门上站岗的敌兵听见枪响，又见马队飞奔而来，一时摸不着头脑，开始还向红军打招呼。我们顺势攻入城里，挥举大刀，杀声连天地朝敌军各驻地进攻。顿时，城中大乱。当时民团刚刚起床，敌军骑兵连的兵士正在北门环江边上步操，都毫无戒备，见我军突然出现，丢盔弃甲，各自仓惶逃命，已无法组织抵抗。敌人纷纷在街上乱跑，或是拚命往城外山坡上爬。我军四处追击，搜捉跑乱的敌兵。

约经过一小时，战斗胜利结束。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光俘虏就捉了五百多人。象一连三排长周羊娃看见敌人朝城东北的梁上跑，急忙带一个班的骑兵飞速迂回上梁，堵住敌人退路，举枪打翻几个敌人，又大喊“缴枪不杀”。敌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见红军寒光闪亮的大刀和手中的钢枪，早就不寒而栗；再一看四蹄飞扬的昂头大马，自知跑不脱，只得投降。周羊娃他们一下子就抓了一片俘虏。排长朱秉才、通讯员巩存良也抓了不少的俘虏。身穿黑制服，头戴羊皮火车头帽子的民团兵丁尽当了俘虏，狼狈不堪，爬满了一坡。后来把所有的俘虏都关进老爷庙里。清点以后，这才知道，敌伪县长郑致中漏网了。伪县长住在曲子城西的山寨上，听见枪响，骑马跑了，我们也不认识，让他拣了一条命。其他的敌首领除个别逃脱外，不是击毙就

是被生擒。

这一回缴了二、三百支枪、一百余匹战马，还缴了一家店铺，获得一批物资。

战斗结束后，我们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布判决了四个罪恶累累的民团头子和恶霸。会后，当场枪决了环县民团团总李恒泰、民团队长崇景富和一个姓刘的，另有一个盐局的局长。群众振奋，无不欢欣。接着就把缴获的一部分粮食、衣物分给群众，有不敢要的，就秘密送给，扩大了政治影响。抓到的俘虏大多是本地人，经过教育，要求回家的，吃罢午饭就给放了。

缴获的马匹多给了庆北游击队，枪也由游击队挑选，其余的枪和一些物资送回根据地。骑兵团的战士每人发一顶羊皮火车头帽子，都十分高兴。庆北游击队更神气了，装备一新，威风的了不得，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三十一傍晚，我们出了城，群众夹道送别，部队很快消失在丛中。新的战斗又在前头。

此一役，又加先前在三十里铺击败谭世麟老贼，对敌震撼很大。从此，不仅庆北根据地大大巩固，而且合水、正宁、宁县的民团除坚守碉堡外，很长一段时间连出来要粮、要款也不敢了。

当年在曲子

李培福

一九三六年五月至一九三七年九月间，我在曲子县工作，现将这段时间的斗争情况回忆如下，供研究陇东革命斗争史的同志们参考。

进军八珠原

一九三六年五月，随着红军东征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党所领导的游击活动也逐步向西推进。当时，我担任庆北（庆阳东北部）游击总指挥，带领八十多人的游击队开进八珠原，开展游击活动。这里过去没有革命活动，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听说游击队来了，老百姓都跑光了。我们在这一带活动了半个多月，偶而只能见到几位老大爷、老婆婆。但我们还是抓住一切机会宣传，“我们是穷人的队伍，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到这里来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等。游击队所到之处，对老百姓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用老百姓的东西，都如数给钱；找不到人，就把钱扣在碗底下，并写条子说明情况；宿营之处，走的时候都打扫干净，并派专人检查。对地主、豪绅则毫不客气。在乾塬山话捉了土豪任三麻子。这家伙很狡猾，住的地方不固定。有一天晚

上，我们探好消息，一下把他堵住了。任三麻子还摸不着头脑，以为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吓得面如土色，只好束手就擒。在连家集，我们捉了一个姓黄的土豪。后来这二人都被他们家里人用钱赎回去了，得到的钱做了游击队的经费。收获最大的一次是在贺家砭。那里有个民团头子叫贺庭炎，有钱有势。当我们到贺家砭时，他跑得不知去向，只有一个老婆子在家。我们事先了解到贺庭炎家庭财很多，还有武器弹药，但去了之后找来找去，打开好几个窖，只发现一个小元宝。后来注意到那个老婆子总是坐在炕上不动，眼睛老盯着墙。我过去说：“银子就在墙洼里藏着吧！”老婆子一把抓住我手里的矛杆子不让动。我把老婆子拉开，用矛杆在墙上一捣，银子果然从墙里淌了下来，有一百多两。老婆子坐在地上撒起泼来，死活不让我们把银子拿走。我发现老婆子的动作极不自然，便说：“这个老婆子身上还有银子。”她一下子蹦起来跑了。追上去抓住一搜，果然从她的身上又搜出一百多块白洋。后来又在一個破窑洞里搜出一百多排“连珠枪”子弹。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

八珠塬上当时驻有杜成章的民团约二、三十人，专门与我们作对，曾抓过我们的两个人。我们这一次来就准备消灭他们。没料到这些天天喊消灭游击队的民团才是些草包，没等我们近前，他们个个象受惊的兔子一样拔腿就跑。我们骑兵都没追上。于是，我在他们住的地方提笔写了一条标语，贴在树上。当时游击队中没人识字，只有我勉强能写几个字。记得是这样写的：“团匪小儿你们听着，我们红军是救国救民真正的人民军队。你们红不红，白不白，你们才是真正的土匪。”这是贴在八珠塬上的第一幅革命标语，在当时影响很

大，有些见过标语的人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我们游击队便返回元城子一带休整。

配合西征

五月下旬的一天，一支骑兵队伍突然开进了元城子街。老百姓不知道是什么队伍，都惊慌地跑开了。我们游击队也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队伍，作好了应急的战斗准备。等到队伍走近，只听得骑在马上的一位士兵喊：“不要跑！不要跑！我们是红军！”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红军？我们盼望的红军真的来了吗？”一年多来我们和上级很少联系，真象没娘的孩子，我们早就盼着红军的到来。中央红军到陕北虽说已经半年多了，可我从来还没有见到正规的红军，听这位士兵这么说，我将信将疑地连忙赶上前去问：“你们是啥人？”他们回答道：“我们是红军。”我仔细打量了一番，从他们和善的态度、说话的口音，以及整齐的队形上看出，他们真的是红军。他们的服装虽然不太整齐，各色各式的都有，脚上穿着麻鞋，腿上打着绑腿，但一个个精神抖擞，情绪高昂，特别是他们戴的八角帽和红得耀眼的五角星，同我以前听说过的红军形象一模一样。他们打着红旗，一张张陌生，但又可亲的笑脸正对着我。我忙说：“我们是游击队，咱们是一家人。”于是他们把我领到红军负责人面前。负责人是位骑兵团长。我向他说明我是庆北游击队总指挥的身分后，我们交谈得更亲热了。他对我讲：“红军要进行西征。请你们游击队配合部队行动，先派几个向导给我们带路。”我听后立即派我四叔父李淮、伙伙张德贵骑马给红军带路。红军当即开拔，向西挺进了。由于红军的到来，这

一带驻的马家队伍纷纷西逃，一夜之间就跑光了。我带上游击队全部人马二百多人也向西进发。

游击队走到景子堰，见前面驻有队伍，还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后来发现山岭上插有红旗，经喊话才知道是红一方面军，也是西征的队伍，于是游击队随红军一起向西进发。在倪家园子我见到了红军二师师长，当时不知道名字，后来听说是刘亚楼。他们刚消灭了马鸿宾部的九团。他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说：“如果有枪的话，给我们弄一些。”他说：“可以，要多少可以拿多少。”于是，他拨给我们三十几条枪和一些子弹。其中有一支“司登式”，我们叫它“花机关枪”。这下可把我们游击队好好地武装了一下。战士们拿着中央红军老大哥送给的枪，爱不释手，高兴极了。这个时候，陕甘宁省委来了通知，把我调离游击队，到曲子担任县苏维埃主席。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后来在花旗编成陕甘独立师的一个团），带领六个游击队员，骑马向曲子镇进发。

西征红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迅速解放了赤安、华池、环县、曲子等地后，继续西进，迎接二、四方面军，并派大批的干部组织地方政权。习仲勋同志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那次走到八珠堰时，见前面有一个年轻人（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穿一身黑色裤褂，背上背了个包袱，走近一看，原来是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同志原来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时候，曾来庆北检查工作，我们认识。我问他干啥去，他说上环县当县委书记去。我见他单身一人，连枪都没有，有些不放心的。因为这一带是新区，土匪又多，所以我从我们一行人中拨出一匹马，拿出一支盒子枪交给习仲勋同

志，并派我的通讯员李×有同志护送习仲勋同志前往环县。目送习仲勋同志跃马如飞地北上之后，我们便经木钵到了曲子镇。

开创新政权

我到曲子镇时，城头红旗飘扬，曲子镇刚解放。原来驻曲子的马匪军已被消灭了，敌旅长“野骡子”（冶成章）被打伤后，也当了俘虏。当时曲子街头马匪遗弃的物资很多，“野骡子”的汽车被打坏倒在路旁，还常见到押过来的一队队俘虏。地方事务由红军宣传队负责。街上贴了布告，宣告曲子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由我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我记得当时曲子县苏维埃政府的全称是曲子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但我们习惯上还是叫曲子县苏维埃政府。我住在一个旧商号里，主人王得仁不知逃到哪里去了。我们就在那儿砌灶安锅，收拾地方，县政府就算开始办公了。当时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个方型大印，是我们新政权的象征。县政府的其他负责人是陆续来的。当时干部来源主要有三方面：有红军派来的，有随红军西征一起来的地方干部，有当地选拔的积极分子，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先后换过三个，头一个是李升华，原来是卖豆腐的；以后是徐孝达、温月喜。苏维埃政府各部门也相继成立了，有军事部、财政部、司法部、保卫局、粮食局等部门。县政府有个总务科，还有一个合作社。后来又成立了工会、青救会、妇女代表会等群众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大部分记不清了，只记得军事部长先是朱志秀，后是贾之弟；保卫局长先是一个姓金的，以后是高兆俊；总务科长是胡立新。各部门人员不多，但很精干，如军事部只有

一个部长、两个干事。

曲子县委也成立了。我在曲子期间，先后换过几任县委书记，先是刘昌汉，不长时间就调环县接替习仲勋，以后是朱文华（后叛变）、高伯祥、苏耀亮等。

县政府成立之后，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基层政权，派出干部去组织区、乡政权。经过一个阶段的工作，区、乡政权都成立起来了，当时有曲子、合道、土桥、天池、八珠、木钵、马岭、元城等八个区（元城区不久划归赤庆县）。各级政权建立之后，曲子的群众从上到下纷纷组织起来，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东北军进攻曲子，还有飞机配合作战。当时曲子没有主力红军，我们便有计划地撤退。县政府搬到八珠墩。一起搬到八珠墩的还有省委统战部和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浩）。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了，当天晚上，省委通过电台得知蒋介石被活捉的消息。消息传开，到处一片欢腾，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地庆祝。没几天，进攻曲子的东北军撤退了，我们便回到了曲子。当时住在曲子的红军干部很多，项英、袁国平、肖劲光等同志都在曲子。以后红军向陕西开拔了。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很多人身着单衣，脚穿麻鞋，但他们斗志昂扬，高歌东进。因为当时曲子住的单位很多，我们县政府便搬到了五里桥。

难忘的教诲

县政府在曲子期间，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也搬到了曲子镇。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和统战部长蔡畅同志就住在我们隔壁。我们在富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富春同志平易近人，

常来我们这里谈工作，了解情况，对工作的指示很具体。富春同志非常注意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他做书面指示，字写得很大，十分清楚，为的是让我们照着练字。他空闲时间还和我们一起打羽毛球。富春同志关心群众，办事认真，效率很高。记得红军刚到曲子的时候，人多房子少，借用曲子的一所小学住。后来这个能容纳一百多学生的学校要开学了，但教室还没有腾出来。我们交涉了几次，都没有效果，我就向富春同志汇报。他说：“这不对，我去给他们讲一下，让他们下午就搬。”事后，他亲自找部队同志谈了。果然，下午学校就腾出来了，很快恢复上课。

富春同志对干部要求很严格。记得曲子解放后，我们给一个姓李的商人安排了商会会长的职务，后因他表现不好，被保卫局押起来了。有人来活动说准备出一千白洋把他赎回去。我同意了。他们把钱交来后，我把李会长放了，钱也上交了。此人被释放后，准备设宴请我和保卫局长等十几个人，也请了李富春同志。李富春同志知道后，立即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态度很严肃。他批评我这件事处理得欠妥，一是没有向省委汇报，二是没有经过讨论。在富春同志的帮助下，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说：“我错了。我改正。”富春同志见我认识了错误，又给我讲了许多道理。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解放后，我去北京开会，富春同志请我去他家做客，还谈起过这些往事。现在富春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我的这些教诲，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巩固新政权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开始了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阶段。在此形势下，我们首先对各级政权进行了整顿，审查了各级干部。一般来说，只要是没有变节行为的，重新任用；对有变节行为的干部也进行了组织处理。战争锻炼和考验了干部，曲子县的干部队伍更纯洁了。但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土匪太多。他们不仅危害群众的生命财产，还经常袭击区乡政府，杀害了我们几十个干部。造成土匪多的原因，一是过去残留的土匪没有肃清；二是民团、散兵演变为匪。有些土匪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为解决这一问题，曲子县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由县政府主要干部负责，兵分三路，边开展工作，边剿匪。由县军事部长贾之第率土桥游击队在土桥区一带剿匪；由县保卫局长高兆俊率保卫队与天池游击队在天池区一带剿匪；我率十几个干部和合道游击队在合道区一带剿匪。很快，各路游击队剿匪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随着剿匪工作的逐步深入，混入革命队伍的一些与土匪有联系的反革命分子日益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暗中策划叛乱，以求一逞，气焰很嚣张。这儿原有个哥老会大爷叫李芸，与土匪有联系，被我们捉住了，经省委批准要处决，但在一天晚上被人放跑了。活生生的事实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和情况的复杂。有一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听见两个游击队员悄声议论我说：“这个家伙真坏，把他收拾掉算了。”这话引起了我的警惕。这支游击队是刚刚成立的，成份比较复杂，我本来就对他们不够放心，因此

才把他们集中起来驻在陶家洼子以防叛变。当时我带来的干部都住在三十里外的合道区政府所在地唐台子，我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游击队一起行动，人少力单。为了压住他们的气焰，我便吓唬他们说：“我是带游击队出身的，能打仗，二、三十个人不够我一个人打，一梭子起码放倒七、八个。”我的这一番话果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他们讨论叛变的时候就有人说：“再不要胡闹，那人凶着哩！你们脖子里血涨得很了？打不过咋弄哩？”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阴历腊月三十）晚上，我见游击队中有些人行动鬼鬼祟祟，围在一起开会。我立即对警卫员说：“情况不对，赶紧准备好，死活就这一下子。”这天晚上，我和警卫员枪不离手，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我就命令游击队立即向唐台子出发。游击队顺沟走，我骑马上了一棵，直奔唐台子。那些阴谋叛变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我扬鞭而去，也无可奈何。到唐台子后，我立即把干部们召集起来说：“情况有变，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并且派了双岗，任何人不得进入唐台子，包括游击队在内。一切布置就绪后，我又派合道区委书记魏国祥同志马上出发到县上报告。县委书记高伯祥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保卫局长高兆俊率领保卫队连夜向唐台子进发。后半夜，当保卫队赶到唐台子时，游击队有个班长气喘吁吁地赶来报告说：“快！游击队叛变了，正准备下手哩！还来了些土匪。”我对高兆俊招呼了一声，便带着警卫员向游击队的驻地沙锅跑去。来到游击队住的院子时，门口一个哨兵气势汹汹地拦住我们不让进。我把枪口顶在他的胸膛上，厉声说：“不许动！”哨兵见状，吓得魂飞魄散，乖乖地缴了枪。当我们冲进院子后，从窗里一下

冲出七、八个叛匪，异口同声地问：“谁？”我说：“放咱的。”说话间，我已冲到他们跟前，扬起两把盒子枪大声喊道：“不准动！谁动就把谁毙在这里！”这七、八个叛匪一下子愣住了，纷纷把枪扔在地上，一个个象木鸡一样站着不敢动。这时，高兆俊带着保卫队也赶到了，枪口对准窑门，窑里的叛匪只得把枪扔了出来。赶来接应叛匪的土匪们见势不妙，胡乱打了一阵枪就跑了。所有的叛乱分子都被我们俘虏了，四十几个人被绑成串，押到了唐台子。我们连夜进行了审讯。叛匪供认：他们头晚开会策动叛变，并要绞死我，但由于意见不一致，所以当晚没来得及下手。还供出叛匪头子是随我一起来的军事干部唐克仁。原来，唐克仁早就暗中活动，把游击队中的四个班拉过去了三个。只有四个人没有叛变。于是，我们立即逮捕了唐克仁。叛变阴谋被粉碎了。

第二天，我们在唐台子召开群众大会，有二千多群众参加。会上，先把没收地主豪绅的牛羊一千五百多头全部分给群众，还招待群众吃了一顿饭。接着，表扬了革命意志坚定的游击队班长，奖励了一头大牛，审判了叛变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处决了以唐克仁为首的四个叛变头目。我在会上讲了话，号召群众起来捉土匪。大会以后，群众踊跃报告土匪行踪，短时期内就捉了几十个反革命，收缴了民团苏结巴的二十几条枪。有一次，这里窜来七、八个土匪。老百姓议论说：“县长已经说了话了，土匪来了不能留。”于是老百姓一个跟着一个，共一百多人，把这几个土匪抓住打死了。在斗争中，群众觉悟迅速提高，土匪很快肃清，这一带的群众再也不“跑土匪”了。各级政权相继健全起来，这个地区很

快就安定了。

后来，组织上派我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到延安后，我在桥儿沟住了一个月，但因患砂眼不能参加学习。边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邦英跟我谈了一下，我便又返回了曲子。一九三七年九月，庆环分区党委书记刘景范同志跟我谈了一次话，决定调我去华池县工作，于是我把手续交给逯月喜，便去华池工作，结束了在曲子的战斗生活。

（白維忠 整理）

“环县事件”的回忆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之后，我党以民族大局为重，不计宿怨，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反动派慑于全国抗日民众强烈的抗战要求和中外舆论的压力，一方面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另一方面，却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在各地制造事端，挑起摩擦冲突。一九三九年六月和同年十二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在陇东制造了“镇（镇原）宁（宁县）事件”、“宁县事件”和“合水事件。”一九四〇年元月一日至三月七日，发生在陇东环县的政治土匪赵老五袭击该县县城和策动农民自卫队叛乱的事件，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罪行的一部分。现就我的回忆，将“环县事件”记叙于后，请有关同志补充、指正。

赵老五是为国民党所支持、专门骚扰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土匪，活动在环县、镇原、固原一带；他带领的股匪充其量不超过百人，掌握着几十条枪。但是由于赵老五是哥老会头目，每次在制造事端之前，都要欺骗和胁迫一大批老百姓，来掩护他们的罪行，所以在当地危害很大。

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西征解放曲子县时，赵老五在我军大兵压境，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军队望风败逃的情况下，迫

于形势，曾经主动同我军和我地方政府接洽，表示愿意改邪归正，向我方投降。但是，当我方代表前去协商谈判的时候，赵老五却突然变脸，在谈判桌前，将我陇东保安司令部代表朱子修、吴士芳和警卫战士等四人全部扣押，解送宁夏马鸿逵部请赏。后来，赵老五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委为环县保安大队大队长。自此以后，官匪一家，赵老五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环县事件”发生之前，赵老五匪徒就在一九三九年四、五月份，向我环县毛井区政府发动过侵扰，使我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对国民党顽固派匪军和赵老五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一九三九年年底，为了防备国民党顽军和赵老五匪徒的进犯，我环县县政府从县属各区抽调了一百多名赤卫军战士，以来县城参加冬季军事训练为名，构筑工事，防守在县城北面、离县城三华里远的三里湾，扼守山下去县城的一条必经之路。

那时候，中共陇东地委、陇东专署和陇东保安司令部都驻守在离环县县城一百华里远的曲子县（今环县曲子公社）。我当时在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任参谋长。年底之前，地委马文瑞书记、分区吴岱峰司令员等同志奉召前去延安开会，临行之前，曾专门召开过会议，再三叮嘱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和赵老五政治土匪的行动，严防坏人破坏捣乱。领导同志走后，我们曾做了相应的安排和部署，调赤卫军防守县城，便是防变措施之一。

一九四〇年元旦早上，太阳刚从东面山岭上露脸，那时我和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刘主任正在司令部警卫连吃早饭，就见哨兵跑进来报告说，上川里有枪声和爆炸声。我

当即命令警卫连加强警戒，继续观察，有情况及时报告。中午饭过后，司令部通讯员忽然前来找我，说专署马锡五专员刚回到曲子，让我赶快到地委去，参加紧急会议。我听到这话吃了一惊。我知道，马锡五同志是今天清早才从曲子出发去环县检查工作的，怎么这么快就返回来了呢？我忽然又联想起今天早上上川里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这件事，莫非有敌情？便急忙朝地委赶去。

我到地委后才知道，原来马专员上午走到离环县五十华里的木钵，迎面碰上了一个赶路人。这人神色慌张、气喘吁吁、汗流满面，急急忙忙朝曲子赶。马专员心里生疑，便叫住那人问他是干什么的。那人说他是环县的干部，要赶到曲子去给马专员送信。马专员要过信一看，认出是环县政府保安科科长李正廷同志的笔迹。信里说，土匪赵老五率领二、三百人偷袭县城。马专员看完信，立即打转马头，返身朝曲子赶来。

再说我赶到地委之后，见马锡五专员、警备二团周保团团长、甘渭汉政委、分区保安处长、还有地委的几位部长都在开会。会议开了一阵，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尽快派部队去增援环县。正在这个时候，环县的同志又打发人送来了第二封信。信里告诉我们，赵老五的土匪部队已经退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赵老五匪徒早就预谋袭击、洗劫我环县县政府。他们原先准备半夜里集结启程，赶在天亮之前突然向我县政府和县保安大队发起进攻。为了不暴露目标，引起我方戒备，他们混杂在驮盐和驮布匹的骆驼队里，偷偷摸摸地向我环县县城进发，因此行动很迟缓，到达三里湾时天已大亮，

没有来得及按原计划赶到。

天亮后，驻守在三里湾的赤卫军哨兵就发现了敌情，立即鸣枪示警。枪一响，驻守在县城南关的环县保安大队闻声赶了过来。环县保安大队有一百多人，枪响的时候，他们正在营房对面的大操场上操练。枪声就是命令。保安大队大队长王世选同志立即集合队伍，带领保安大队跑步进南门，向城北增援而来。县保安队进了城门之后，顺着城墙朝前走了一段路，就见赵老五匪徒从北城门里扑了进来。双方接火打了一阵，王世选同志见地形对我不利，便率领保安大队向南退回到驻地。县保安队的营房是两处大院子，中间夹着公路，营房的土围墙上事先掏好的射击孔，便于隐蔽和发挥火力。保安大队固守营房，使赵老五匪徒的行动受阻。在保安大队战士密集火力的打击下，赵老五匪徒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战斗进行到下午两、三点钟左右，赵老五匪徒人饥马乏，加上赵老五的坐骑也被流弹击毙，我保安大队和赤卫军的火力又越来越猛，赵老五匪徒见偷袭的阴谋已经破灭，初来时那种气势汹汹的劲头早已消失了。这时，我环县保安科的十来名警卫战士集合了一百多名赤卫军战士，也从城北山梁上朝下冲来。他们清晨听到枪声，押解着监狱里的犯人朝山上撤退，到达安全地带之后，才回过身来增援县保安大队。赵老五预感到再继续纠缠下去对自己不利，便带领匪徒朝原路向后撤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保安大队奋起追击，一路上连追带打，一直追到了离环县县城四十华里的洪德城。

王世选同志见天色渐暗，担心前面有赵老五匪徒的伏兵，便带领部队返回了县城。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大家便开始研究讨论解决的办法。我第一个发言，建议警二团派一个营，切断赵老五匪徒的退路，再调集保安大队，对土匪进行围歼。按着，李甫山、陈仁麒等同志也发了言。但是会上警二团的同志提出，警二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专署、分区和地委机关，培养、训练干部，不能拉出去剿匪，做无谓的牺牲。其他同志也考虑到地委马文瑞书记、分区吴岱峰司令员等主要负责同志都不在曲子，就决定等这些同志回来之后再定这件事。

赵老五匪徒偷袭环县县城，被我保安大队击退之后，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又窜到了环县各区各乡，在烧杀抢掠的同时，利用封建迷信和宗族关系，造谣惑众，策动农民自卫队反叛。不长时间之内，环县就有三十五个区、乡自卫队哗变。赵老五匪徒气焰更为嚣张，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恶霸地主劣绅勾结在一起，疯狂地实行反攻倒算，到处袭击我区、乡、村抗日民主政府，残无人性地捕杀我各级党、政、军干部、抗日积极分子和开明士绅，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惨痛的流血事件，做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三百多名优秀的党员和干部，进步人士都惨遭杀戮。

一九四〇年元月八、九日，陇东分区司令员吴岱峰同志从延安开完会返回曲子，并且带来了边区保安司令部调我去延安工作的命令。我在陇东卸任之后，由白守康同志接任分区副司令员兼任参谋长。但是吴岱峰和白守康同志都不愿意我走，加上那时离过春节没有几天了，遂决定让我过罢年再去延安。又过了几天，马文瑞同志也从延安开会回来了。地委、分区和专署的负责同志经过研究，决定立即着手解决“环县事件”这个问题，让我和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刘主

任、警二团政治处主任三个人一块到环县去一趟，详细了解一下“环县事件”和其前后的具体情况。我们到环县的第二天，警二团甘渭汉政委忽然带领二团一个营、一个炮兵连来到环县，对我说明了准备进剿赵老五土匪的事。后来我们才知道，自从赵老五匪徒袭击环县县城等地和策动农民自卫队反叛的事件发生之后，边区政府和党中央十分关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同志曾把三八五旅（警备二团属该旅）王维舟旅长找去，详细了解并研究制订了歼灭赵老五土匪的作战计划，并且指令警备二团一定要协助地方保安部队尽快剿灭这股政治土匪，平息叛乱。同时敦促国民党政府执行国共两党协议，按我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原则办事。甘渭汉同志这次来环县，就是具体执行中央负责同志这一指示的。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立即协同环县的同志，向部队提供了大量的线索，为部队准备了足够的粮秣和其他军需品。

不多日子，赵老五匪徒的行踪终于被我们探听了出来，他的豺狼尾巴已被我们牢牢地抓住了。我警备二团一个营、警备二团炮兵连，在环县山城堡一带将赵老五匪徒截住，狠狠予以打击。经过激烈的战斗，赵老五匪徒溃不成军。作恶多端的匪徒们死的死，伤的伤，不死不伤的只好乖乖放下武器，举起双手投降了。但是赵老五这个悍匪，竟乘着混乱，带领小部分死硬的匪徒逃跑了。

赵老五逃遁之后，我警二团奋力追击。这时，分区保安司令部也调集独立五营（刘懋功同志任营长）和部分保安大队，赤卫军前来助战。几支队伍汇合一起，布下了天罗地

网。赵老五匪徒左奔右突，无处躲藏，只好逃到自己的老巢——环县甜水堡窑儿井沟，躲进了事先准备好的窖子（修筑在悬崖半中腰的暗窖）里。这种窖子是在高处石崖上挖的大洞，离地面几丈高，口小肚大，里面能容纳几十，乃至上百人。窖子里有粮有水，有柴有草。赵老五匪徒事先在这个窖子里储备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在窖子口上构筑了工事，毁坏了所有通往窖子的道路，加上窖子地处半山腰陡壁上，根本无法登攀，这一切给我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进攻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军战士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怀着强烈的革命义愤，在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中，将赵老五匪徒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团团包围了起来，接连发起了进攻。围了两个来月时间，赵老五匪徒的人数一天天地减少，给养和弹药越来越少，军心日益涣散，加上我军又发动和组织民工在窖子所在的崖顶上挖土，浮土顺着崖面不断地滴下来，一点一点地填满了窖子下的沟，又慢慢地埋没了窖子的洞口。赵老五匪徒坐卧不宁，人心大乱。赵老五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但又不肯束手就擒，便把希望寄托在突围上面。有一天半夜，夜色很浓，赵老五率领二十来名凶悍的顽匪，乘我独立五营一连防守的战士一时疏忽之机，破围外逃了。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赵老五匪徒只能得到暂时喘息的机会，岂能逃脱应得的惩罚！在我军部队和地方保安大队、赤卫军的追击之下，赵老五急急如漏网之鱼，带领几名残兵败将，向邱家滩一带逃跑而去。

赵老五在我们的追捕声中无处安身，就又装扮成叫化子，又流窜了一段时间，留下了孤身一人，无奈何之间，又跑到下马关一带，躲进了一个常年被雨水和山洪冲刷，自然形成

的洞穴之中。他白天到处讨要，夜间潜伏在洞里。赵老五走投无路，加上洞穴潮湿，一年四季不见阳光，被当地群众发现的时候，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不几天就结束了他的罪恶的一生。

赵老五土匪被彻底打垮之后，我军即在上级指示下，分赴各区各乡，帮助恢复、建立各级党、政机构和政府，肃清赵老五土匪的残余分子，使环县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好了起来。

（李果整理）

夜攻马掌子山

邓克明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然后经静宁向北转移至宁夏海原打拉池一带。此后，我军继续向东转移，准备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地区消灭胡宗南的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

十一月十九日，红军三大主力迅速在山城堡以东、东北、东南地区三面埋伏。当日深夜，敌七十八师二三二旅的先头部队以急行军速度进入山城堡地区。二十日上午，该旅全部到达。敌人进入山区后，一时摸不着我军去向，便一面占据高地，构筑工事，一面派出小部队沿八里铺河谷向南搜索。

我军根据敌情，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完成战斗部署。我们红四师（师长李天佑）当时驻在山城堡东南二十里的城隍堰一带，协同红一师（师长陈赓）作战。

主动请战

二十一日上午，我奉命带领红四师十二团向山城堡方向运动。离开城隍堰不大一会，西面便传来枪声，而且有敌机在空中盘旋侦察。我们从东塬头下山时，隔沟望见西面山上的敌人在紧张地构筑工事。红一师正和敌人交锋。下山后，我们

团集结在山城堡南七、八里地的韩山堡待命。整个下午，红一师连续向山城堡前沿的马掌子山发起数次进攻。但敌人凭借有利地形，仍然顽抗着。

从会宁到海原，从海原到古西安州（在海原境内），然后又到甘肃的环县，敌人以为红军在溃逃，疯狂地尾追。我军战士早就很不耐烦，与敌人决战的心情十分迫切。所以，当我们知道红一师在马掌子山屡攻不克的战情后，战士们都嚷着：“团长，我们上去吧！我们上去吧！”我打电话给李天佑师长，请求尽早增援红一师。李师长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要我带一个连（那时没有营的建制）赶黄昏进入阵地，增援红一师。根据红一师的战斗情况，我们估计到这次战斗的困难，所以我命令司务长给战士们买了一头猪、几只鸡，让大家吃得饱饱的，好在黑夜与敌人拼杀。饭前，我向全体指战员作了动员报告，鼓励大家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让胡宗南知道我们红军的厉害。王永录连长带领战士们齐声回答：“一定完成任务！”黄昏时，我带领王永录同志的二连出发了。这个二连，在江西苏区时曾获“以少胜众，英勇杀敌，模范红五连”的称号，具有英勇顽强，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为我们团的主力连。

夜攻马掌子山

山城堡位于山城堡南端坡头。山城堡东有武家沟，西有大西沟，西南有小西沟。马掌子山屹立在大西沟、小西沟之间，宛若山城堡伸出的一只右臂。敌人四六八团的一个加强营固守的灰子疙瘩，活象这只右臂上的拳头。东面武家沟，地势异常开阔，双方都经常在此用兵。所以，敌人能否守住

疯子疙瘩，保住马掌子山阵地，关系着战争的全局胜负。马掌子山前段是疯子疙瘩，西为塌山绝壁，正前方陡峻狭窄，只有东侧坡地可供攀登。但是这里正迎山城堡，地势比较开阔，几乎全在敌人的视线之内。这一切，我和二连的同志白天都观察到了。

我们顺着河谷，往小西沟红一师指挥所前进。到了小西沟，天已十分黑了，只见红一师阵地上的战士正在来往调动，大概是在组织新的进攻。我正嚷着要找师指挥所，一步宽的小溪南边传来了陈赓师长的声音。

“你是哪个部队的？”

“红四师十二团的。”

“你是谁？”

“我是团长邓克明。”

“你就是邓克明？”

陈师长没有过河，在那里继续大声说：“来得正好。情况由独立十三团魏洪亮给你介绍。这一回你们拿不下敌人的阵地，我要彭总杀你的头！”

我从声音里知道陈师长十分焦急，我又深知这位老上级不论在什么时候都爱说几句俏皮话。于是，我顶撞着：“拿不下来，先杀魏洪亮的头，再杀我的头吧！”陈师长没等我说完，大声喝道：“快去！”我回答一声“是！”便去找魏洪亮。

魏洪亮是红一师独立十三团的政委，由一位连长叫到小溪边，我们在黑地里互相介绍了职务姓名，却谁也看不清对方的面孔。难怪事后多年，我们还是互相知名不识人。魏政委向我介绍了战斗情况后，我们便商量再攻。我当时考虑到

十三团长时间轮番进攻，指战员已十分辛苦，又根据我白天对敌人东侧阵地的观察，提出这样的想法：第一，把十三团的轻重机枪组织到一块；第二，把所有的司号员集中起来；第三，十三团组织几个得力的佯攻小组，从西面向敌人发起“猛攻”，把敌人的火力引过去。十二团于十三团发起“猛攻”时，由东侧向敌人阵地迂回。魏政委同意了我的想法，开始组织机枪手、司号员，准备佯攻。我即刻带领二连沿山坡绕道向山顶运动。半个多小时以后，西面号声齐鸣，枪声大作，喊杀连天，整个山谷都被震撼了。敌人把所有的火力都用上去对付十三团的“猛攻”。这时，我团二连飞速越过开阔坡地，迂回到敌人阵地后面的半山坡上。敌人最前沿的一个排没等得摸清头脑，就被我二连战士缴了械。顽抗在疯子疙瘩土堡的敌人听不见前沿阵地上的枪声，也不胡乱鸣枪壮胆了；及至他们在闪闪的火光中发现红军已经上了山顶，就急忙把火力转向东侧，猛烈地扫射。王永录带领二连，冒着火舌，奋勇冲杀，敌人的枪声又一次稀落下来。随之而来的是闷声闷气的黑夜里的白刃拼杀。王永录同志冲到敌人指挥所，击毙了正在嘶喊着指挥的敌营长。十三团的佯攻，早就变成了真攻，冲上山头。紧接着，又是一阵搏斗拼杀。敌人失去了指挥，伤亡惨重，纷纷举枪投降。有的乘黑夜沿东北山坡没命地溃逃。十二团、十三团战士一鼓作气，一直沿马掌子山背冲杀。至此，敌人在马掌子山的防线全被打破了。

追击搜山

在夺取敌人马掌子山阵地后，我团按原作战计划，发出

三颗信号弹，全线发起攻击。这时陈赓师长也上了马掌子山，称赞十二团打得好，并命令我带领全团向山城堡方向追击敌人。

我将二连一个排留在马掌子山清理战场，带领另两个排向山城堡方向追击敌人。当时，敌人丢在山坡上、道路旁的枪支、弹药、物资等数不胜数，却不见一个敌人。战士们摸黑搜索着。我带着几个通讯员下了山坡，过了大西沟，沿一条很深的胡同路走上山坡梁南端坡头。突然，胡同畔伸出个人头，问道：“喂！前面情况怎么样？”我一时搞不清问话的是什么人，便笼统地回答他：“蛮好啊。”那人咕嘟着：“他妈的，那为啥没有枪声了？”我反问道：“你是哪一部分的？”畔上人回答：“炮兵连的。”我断定是敌人，装做满不在乎地说：“共军被我们打下去了。你们好好注意前面的情况，我再去看看。”那个敌人缩回了脑袋。我们也立即退下河沟。这时我才明白，马掌子山溃逃下来的敌人，一定是沿着大西沟底跑掉了。所以，胡同畔上的敌人炮兵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我同时明白了在我们前面不会再有我们的部队了。返回的路上，我碰上从河谷开来的一、三连，立即命令由通讯员带一连去收拾胡同路畔的敌人炮兵，我带三连协同二连搜山。不大一会，一连回来了，原来狡猾的敌人炮兵已经得知消息，向北逃跑了。

由于与一、四师师部失去联系，我决定部队就近搜山抓俘虏。后半夜，我们把抓到的几百名俘虏集中起来，顺着河谷大道向南进发。

我们在韩山堡附近的路旁小平房前见到了我师政委黄克诚同志。黄政委见我们胜利归来，十分高兴地招呼着：“同

志们辛苦了。”并问我们“前面情况怎么样？”我说：“敌人向山城堡以北逃跑了。我和你、一师没有联系，就折回来了。”黄政委笑着说：“抓了多少俘虏？”我回答：“好几百哩。那里还有许多敌人的散兵和丢在山上的武器、弹药。”黄政委说：“那你就再辛苦一趟，把那些散兵、武器弹药都搞回来。”他还让警卫连和通讯排把所有的干粮都交给我们十二团。我们把押来的俘虏交给黄政委，吃着干粮，又折回到山城堡脚下。

这时，天已大亮，我们全团出动，在大西沟、小西沟、马掌子山一带继续搜山。大约快到上午十时许，我们把在各个山坡里抓到的几百名俘虏集中在大西沟口的一块平地上，我先向这些俘虏讲了话，然后指着一名拒不投降、继续向我军开枪射击的敌军官，向俘虏们大声问道：“我们红军的政策是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可是这家伙拒不投降，耍滑头，向红军开枪，你们说该不该‘法西斯’？”俘虏们不说话。我就向他们解释道：“就是说，该不该杀？”俘虏们齐声说：“该杀！”于是，这家伙被我们当场枪毙了。说来也有趣，我那时把“法西斯”只理解为杀人，所以在这里才问那个敌军官该不该“法西斯”。杀了这个坏蛋，俘虏兵用枪杆挑着子弹、刺刀等武器、物资，由红军战士押着再折回原路，向南进发。二十二日下午，我们到达了宿营地。

(李银峰 整理)

回忆庆环分区

高伯祥

在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革命斗争的烈火燃烧到了甘肃陇东地区。一九三七年五月，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正式成立。在这期间，我曾在庆环分区所属的几个县工作过，现就回忆所及，把庆环分区产生、变化的过程记叙于后，作为党史和革命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于次年二月十七日，组织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部队打到山西同蒲铁路沿线，因蒋介石、阎锡山军队的拦击，红军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山西转战三个多月，于一九三六年五月间先后回师，返回陕北根据地。

东征回师之后，为了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迎接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红军又开始西征。西征部队分兵两路，一路解放了定边、盐池等地；一路从保安出发，经甘肃华池，向西挺进。一九三六年六月，红军打下了曲子镇，消灭了蒋马匪军一个旅，活捉了敌旅长“野骡子”（冶成章），解放了曲子、环县等地。后来，红军部队一直打到固原县所属的豫望川、三营子、七营子一

带，由于敌人的阻击，我军转回环县一带驻防。

红军西征的伟大胜利，特别是解放了陕西的吴旗镇，成立了赤安、赤庆等县之后，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组织成立陕甘宁省。陕甘宁省由李富春同志任省委书记，马锡五同志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开铨同志任副主席，肖劲光同志任军事部长，赖传珠同志任军事部副部长。省委机关设在吴旗镇附近。

陕甘宁省委成立后，上级派我任新成立的赤安县县委书记，委派罗忠信任华池县县委书记，朱文华任曲子县县委书记，陈德正任固北县县委书记，习仲勋任环县县委书记，慕纯农任赤庆县县委书记。

一九三六年九月份，陕甘宁省委召开了一次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后有些县委书记调动了。我被调到曲子县接替朱文华，刘昌汉调到环县接替习仲勋。一九三七年四月份，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党的代表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二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我们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要做的两件事，即：一件是把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名为边区政府，另一件是把原来的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三是选举边区党的委员会。

这次会议结束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依照会议形成的决议，陕甘宁省委宣布正式撤销。原陕甘宁省所属各县，另行组建成立了三边分区、关中分区、庆环分区和警备区。至此，庆环分区便于一九三七年五月正式宣告成立。

庆环分区管辖五个县，即固北、赤庆、曲子、环县、华

他。分区书记由马文瑞同志担任，军事部长是王世事同志。苏维埃政府改为专员公署，专员是马锡五，副专员是朱开铨。赤庆环分区成立之后，我又按照分区党委的指示，回到曲子县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之后，把工作手续交给了苏耀亮，又到赤庆县接替慕纯农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份，分区决定撤销赤庆县，通知我马上回分区，赤庆县的手续由县长李志明全部交给华池县（因赤庆大部分地方属华池管）。我到分区第二天，马文瑞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固北县接替陈德正的手续。第三天我就到固北县去了。固北县是由环县的车道、毛井两个区和固原县所属的二龙山、草苗子、庙儿掌三个区组成的，前两个区是解放区，简称苏区，后三个区为统战区。虽然这个县的地方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在政策上、工作方法上却是两套，一套是老区的，一套是统战区的。草苗子驻国民党的一个营，营长姓卢，庙儿掌驻国民党一个民团，团长叫王胜志，都是很顽固的，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我到固北县后，原县委书记陈德正因犯错误已被逮捕，县长张敏珍也调走了，当时的代理县长是康雄世。十月间，分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决定各县实行选举县长的的工作。固北县派阎志尊去当县长，阎来找我了解情况。我向他介绍了当地的详细情况，于是他就和我一同到了固北县，后来阎志尊同志当选为县长。大约到十一月间，上级调我回分区做巡视员工作，我在固北县的工作交给了高锡堂。固北县后来到一九三八年撤销了，从此以后庆环分区只留下了曲子县、环县、华池县，简称曲、环、华三县。一九三八年三月份，我调华池县当县委书记，接替了徐锡龄的手续。

一九三八年这一年是比较好的一年，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将正式形成，国民党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对我们的干扰比较少。但到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就开始公开地向陕甘宁边区搞摩擦了。由于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致使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得以包围陕甘宁边区，并一步一步地向边区进攻，到一九三九年后半年摩擦就越来越厉害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果断地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确指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原来国民党驻庆阳的部队是东北军，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进逼到曲子，我县政府搬到了八珠堡。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撤走了，我军的三八五旅、抗大三分校进驻庆阳城。根据国共双方的协议，庆阳、合水两县的政府由国民党设立，国民党党部也在。驻军是我们的，我们设立抗敌后援会，实际上代替政府工作，并设立了陇东特委，段德璋同志任特委副书记，书记由军队某政委兼任。同时，我们还在镇原县城设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吴铁鸣同志，赵崇德、孙久德等同志都在。西峰镇也设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孙君一、刘文山等同志也在那里工作。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加紧反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把各地办事处撤回来了，把边区各县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全部护送出境，这时候我们就正式成立了庆阳、合水县政府和县委会。一九四〇年元月份又正式成立了镇原县政府。镇原县原有八大镇，我们只占了马渠、孟坝两个镇，所以我们的镇原县当时只管两个镇，县政府先驻马渠，后迁到孟坝。一九四〇年上半年中央决定把庆环分区和陇东特委合并

驻庆阳，定名为陇东地委、陇东专员公署。辖庆阳县、合水县、镇原县、曲子县、环县、华池县六个县和敌占区的工委。当时，陇东地委书记是马文瑞，副书记是段德彰，专员是马锡五。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同志曾兼任过一段时间的专员职务。

以上这些，就是庆环分区的来历和变化情况，这仅是红军时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情况，帮助各位同志在了解当时陕甘宁的一部分——庆环分区时作参考。

铜墙铁壁

武海潮

一九三四年阴历三月二十六日晚上，我们阎洼子村接到南梁苏维埃政府的一个紧急通知：明日国民党军队要对南梁地区进行军事“围剿”，希各村火速搞好坚壁清野工作。

村里我伯父武生荣当时是南梁政府的财政委员，接到这个通知后，急忙带领群众把在各地存放的红军物资收拢起来，连夜埋藏。东西有：十大响、八拉丝、老毛丝、黑明灯、十三太保等各式各样的枪支六十条，子弹两毛口袋（约五、六千发），枪拴两毛口袋，马鞍、马镫四十套，当地群众捐献给红军的鸡蛋两千颗，大板铜元一大筐（约五、六千个），还有粮食若干石，以及群众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那时候，红军的家底很薄，别看这点东西，它可是红军的宝贝啊！

这天晚上，伯父组织阎洼子村的群众把这些东西抬到本村一个大场上。月底的月亮早已隐去了。大场上秩序井然有条。人心齐极了，连小孩们也提着各种纸糊的灯笼为大人照明。大家绕场边挖一条长坑。除了劳动的喘息声和偶尔工具的碰撞声，谁也不愿多说一句话。人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挖快埋！这些东西都是革命的宝物，来之不易，绝不能让反动派抢走！

鸡叫头遍的时候，东西终于埋好了，最后还在上面铺了

一层厚厚的糜草、麦秸，伪装成晒柴草的样子。人们这才各自散去。

埋藏完毕后，伯父又急忙赶往其它村去了。临走时他突然记起一件事，叮咛我说：“赶快把那三十头大黄牛藏起来！”这些黄牛是红军打土豪时没收的，没来得及处理。天哪！这么一大群活东西可怎么藏？我想来想去没地方藏，最后领着几个人把它们赶到村子对面一个深沟掌里。那里是一个很深的沟壑，长满了梢林，人轻易不到那里去，倒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为了防备牛乱跑被敌人发现，我们把通往沟掌所有的路都挖断，一时不能挖断的，就砍了些乱树枝堵住。还给牛预备了水，以免它们渴了吼叫。这样以来，我心里才稍踏实一些了。

乡亲们埋藏完东西回去只打了个盹，天就大亮了。全村的人被这些军用物资所牵心，谁也没有想到远处去躲躲，各自在自己的庄前屋后干着活。大家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那场斗争的到来。

上午十点钟左右，严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时候，只见村南面的路上扬起了滚滚尘烟，人喧马嘶，一股饿狼似的队伍朝村里扑来。这就是国民党杨子恒部队的一个团。团长仇良民亲自策马驱兵。

仇良民率匪徒进村后，立即下令将全村来了个大包围，把村前村后所有的道路都封锁了起来，这里一岗，那里一哨。几面山头上都架起了机枪，戒备森严，杀气腾腾。

接着，抢劫开始了。霎时，南梁的天地象翻了个儿一样，匪兵们象寻食的饿狗，闯进了各家各户，缚猪牵羊，捉鸡逮鸭。狗咬声、打骂声、哭叫声、各种家具的破碎声，以

及妇女的挣扎呼叫声，响遍了全村。敌人什么都抢，见啥糟踏啥。做饭的案板抬去当了床铺，木器家具砸烂当柴禾烧，被子抢去当马鞍垫子。粮食、衣物、铁锅、水桶、绳子等都被一扫而光。阎洼子村啊，正经受着一场空前的大浩劫！

中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敌人在埋藏军用物资的大场上发现了翻起的新土块，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一个敌营长正带领匪兵在那里挖呢！听到这个消息，人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情象压了一块铅一样沉重起来，顾不得家里的事情，纷纷向大场上赶去。

我赶到场上的时候，只见那个敌营长腰持盒子枪，一手拿着马刀，一手提着铜条鞭子，象凶神一般，恶狠狠地站在场心里。场面上盖的柴草已被揭去了。群众看到这种情况，急中生智，不约而同“忽”地一下涌上前去，站在埋藏枪支弹药的地方，占住了位置。但是场面大，人又少，地方占不完，十来个士兵还是没命地挖着。大家面面相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谁也想不出法子，只是直愣愣地望着挖掘的敌人。敌人每挖一锹，我们的心就随着颤抖一下，感到绞心般的痛苦。

情况严重了！首先是埋藏在最外面的群众的七八袋玉米和碗豆被敌人从土里拖了出来；继而盛在几口大黑锅里的两千颗鸡蛋也被抬了出来；接着，红军的几副马镫也暴露出来了。这时，我心里不禁打起了寒战：“完了！再往前挖一点，枪支弹药一出土，全村老百姓就没命了！这都怨我们第一次埋藏东西没经验，偏偏埋在敌人容易找的大场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大场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只能听见敌人“咚咚”的刨土声。眼下，乡亲们都有这样一个愿望：

我们的粮食、包袱，都可以让敌人拿去，可千万别把红军的枪支弹药挖出来啊！但是，谁也阻止不了敌人的行动。挖掘在继续进行着。

眼看一场大祸将要临头。在这千钧一发之间，我父亲武万有为了保护红军的物资，挽救全村人的生命，突然分开众人挺身而出，朝着匪兵们大喊一声：“你们是不是国军？”

敌营长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以为有了红军，但仔细看时，面前站着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于是恶声恶气地说：“是国军，怎么的？”

“既是国军，就要爱民，为什么要挖老百姓的东西？”

我父亲紧追一句。

有了领头的，大家的胆子似乎壮了一些，立刻附和着去，和敌人说起理来：

“这算什么国军？”

“挖去了粮食，叫我们怎么过活？”

“不准挖老百姓的东西！”

挖掘的士兵正累得满头大汗，群众这么一打岔，借长官没空催促，便停下来偷懒，拄着工具喘粗气。大家见敌人停下来，紧张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一点。

敌营长象一头触怒了的野兽一样，吼叫起来：“奶奶个屁！是老百姓，为什么埋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庄子大，怕过队伍抢了去，集中起来埋在这里的。”我父亲不卑不亢地说。群众也跟着你一言我一语地大声吵了起来。

“我的几十个鸡蛋还要照顾病人哩！”

“有我两副马镫，是准备接新媳妇借下外村的！”

“老总，我们全家的口粮都在这里，拿走了我们只得等着饿死！”土财主、中农、贫农人是一个一个哭哭啼啼，有些人甚至嚎啕大哭起来，此起彼伏的哭泣声、吵闹声、求情声，使敌人插不上嘴。

匪营长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妈的，再吵老子砍了你们！”说着将雪亮的马刀朝空中一挥，又喝斥匪兵道：“挖！”

敌人又开始挖了。群众急了，干脆坐在地上，任凭敌人拳打脚踢，用铁把乱打，用枪托墩，虽然疼得额上冒冷汗，就是死活不起来。此时，谁心里都清楚：保住了脚下的东西就是保住了全村人的生命；反之，后果不堪设想。敌人打一阵群众，挖一阵，刚拉起这个，那个又来坐下，弄得疲惫不堪，无法顺利挖下去。但我心里却象油煎一样，眼看许多乡亲都被打伤了，敌人还是不停地挖掘，这可怎么办啊？这时候，不知谁急中生智，悄声说：“红军回来了！”我立刻明白了用意，于是故意和身边几个群众交头接耳地说起来，故意让匪营长听见。匪营长立刻神色慌张起来，只见他一把将我父亲从人堆里拉出来，“啪！啪！”挥起铜条鞭子猛抽起来：“这家伙一定是个共产党，带走！”

群众一看敌人要带人，一拥上前，但被一把把雪亮的刺刀逼了回去。敌人临走时，还把刨出来的粮食等东西也抬走了。

敌人离开了大场。枪支弹药终于保住了。吊在人们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但谁也不放心，担心敌人又来挖，一直守在场里，直到晚间掌灯时分才陆续散去。

至于我父亲，自那天被敌人拉去后，被敌人打得皮飞肉

绽，没了人样，以后又被灌了辣椒水，上了老虎凳。但他忍着剧痛，始终未吐一个敌人有用的字。一天晚上，敌人又给我父亲上烙铁刑，我父亲坚不吐实，当场昏死过去。敌人误以为他死了，便把他扔到了野外，乡亲们发现后才抬了回来。以后，我父亲终因摧残致疾，不久就离世了。

敌人一直在南梁闹腾了五天，才撤走了。后来，刘志丹同志率领红军返回南梁。当我们把枪支弹药挖出来送给红军，并将敌人“围剿”的情况讲给亲人听时，刘志丹同志激动地说：“你们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你们不愧是南梁苏区的人民，我们红军可离不开你们哪！”

刘志丹在南梁的几件事

王西林 高有时 张怀仁

亲 密 无 间

在南梁斗争时期，刘志丹就是红二十六军首长，但却没有一点官架子，时时处处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战士看待。那时，由于畜力缺乏，部队吃的小米要战士自己推着碾子碾。刘志丹只要一看到战士们推碾子碾米，就跳下马和战士一块推。战士们也不见外，就给他让出一截碾棍，大家一齐推。这种事谁也不感到稀奇。

休息的时候，刘志丹经常和战士一块搞游戏。有一次，刘志丹和十几个战士捉迷藏。刘志丹不小心把一个叫刘二娃的小战士绊倒了。刘二娃额头擦破了一块皮。晚上，在士兵会上刘志丹做了自我批评，还提出要给自己处分。大家都过意不去。刘二娃更是坚决反对，还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又没伤筋动骨，只不过擦破了一点皮，刘志丹还亲手给他包扎了伤口，这个事根本就不需要再处理了。可是刘志丹说什么也不行，非要给自己处分不可。最后，在他的坚持下，士兵会决定让刘志丹到炊事班去做三天饭，担两天水，以示惩戒。刘志丹认真地执行了士兵会的决定。战士们都为

刘志丹的崇高品德所感动。

刘志丹闲时骑马出去游玩，不管哪个战士都可以“抢”他的马骑。战士悄悄溜到马跟前，猛推一把，刘志丹乘势一个鹞子翻身就跳了下去（他的马术很好，摔不着），战士再飞身上马，一溜烟似地跑了。刘志丹站在地上憨厚地笑着，一边说：“好小子，动作还麻利！”战士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化 装 脱 险

一九三三年八月，刘志丹和司务长王西林，到南梁北面一个叫秋林子的地方，找地下联络员侯得才了解情况。那里是国民党民团高其宝的防地。两个人进庄以后被敌人发现了，立即有几个团丁赶来围了庄。侯得才家的庄子座东面西，半明半暗，三面靠崖，庄子很大，庄前面是一条沟，沟里就是梢林。团丁们在崖头和庄子南北两个侧面持枪监视着，要冲出去是有很危险。从迹象上看，大批民团可能马上就会赶来，所以必须立即突围。刘志丹当机立断，叫侯得才把他老婆和女儿的花衣服拿出来，两个人各换了一套女人服装。刘志丹头上顶着黑包头，上身穿件大襟蓝布衫，腰系花围裙，手里端着猪食盆。王西林上身红布衫，下身印花裤，头上包块白布巾。一切准备停当，然后把侯得才“绑”在桌子腿上，嘴里糊上手巾，刘志丹这才和王西林一前一后出了窑门，装作喂猪的，抱柴禾的，做出女人的走路姿势，很快就到了院边。愚蠢的敌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两个大脚女人是假扮的，等民团发觉是假女人时，两个人已经跳下沟，钻进了梢林，跑得无影无踪了。敌人却在那里叮叮咣咣地放他的枪哩。

脱险后，两个人互相看着各人的装束，都不禁哧哧地笑了起来。

制 造 子 弹

一九三三年，红军的枪支弹药都十分缺乏，尤其缺少子弹，一杆枪最多配备五发子弹，一般只有两三发。就这几发还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为了解决长远问题，刘志丹决定部队自己研究制造子弹。他亲自登门请来铁匠李青山，还召集了一些有经验的战士，大家共同想办法，办法终于想出来了：把打过的废弹壳捡回来，敲下旧底火，打整平，再装上炸药，重新安上底火就成了新子弹。弹壳里装的无烟火药弄不到，他们就自己熬硝、烧炭，用自己配制的黑火药代替（硫磺和炸药用量少，是从敌占区买来的）。弹头的制造也很简单：在土坯上掏一个尖窝，把烧熔的铜液倒下去，冷却以后稍加修整就成了弹头。这样，子弹就造出来了。只是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打两枪就要擦枪筒，不然，黑火药燃烧时产生的大量烟尘就会把枪筒锈死。不过，这种子弹还是挺管用的，杀伤力一点也不差。

建 立 集 市

集市贸易起着繁荣乡村经济的巨大作用。可谁知道南梁的集市还是刘志丹亲自建立起来的？

一九三四年，华池县很少有集市。农村经济十分萧条。南梁政府成立以后，刘志丹就在荔园堡立起了集市。为了把集市贸易巩固下来，刘志丹曾组织秧歌队、社火班子、皮影戏剧团，在街头演出，宣传群众，扩大影响，结果，收到了

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一段时间，南梁的集市非常热闹，集上人来客往，熙熙攘攘，牛羊骡马，山货农具，日用百货，样样齐全，吸引了周围几个县的客商。可是，过了一些时间却出现了低潮。有时候，集上人来得倒不少，就是不见有做生意的。刘志丹亲自访问群众，摸清了底细，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候，我们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元和实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为了把财权彻底夺回到人民手里，稳定市场，繁荣边区经济，刘志丹决定我们自己印制钞票，建立边区政府自己的金融系统。但是，我们当时条件很差，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机器，刘志丹就和同志们一起琢磨，想办法，没有机器就刻木板印，没有纸张就用粗老布代替；怕掉色就用热油处理。刻字的师爷还是刘志丹费了很大周折，从敌占区“请”上“梁山”的。就这样，第一批边区布币终于诞生了。可是，当时有些人对我们的布币持怀疑态度，上集市只观光，不做买卖。刘志丹又决定在集市上设立四个货币兑换办事处，客商可以用布币直接兑换银元。时间长了，携带方便的布币终究使用开了，集市贸易也逐渐活跃了起来。

边区布币的发行，大大方便了流通，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尽管敌人曾多次扫荡，给南梁人民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集市贸易也受到很大破坏，但政权一旦回到人民手中，南梁的经济总是繁荣的。今天，我们看到南梁地区欣欣向荣的农村集市贸易，不觉就想起了刘志丹当年印布币，立集市的情景。

（乔孝堂 整理）

活捉三匪首

毛羽畴

一九三七年春上，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惯匪武文璋、武文英兄弟和地痞毛有万，纠集一伙亡命之徒，裹胁了二道川千余名群众，提上长矛、斧头，背上麦草，深更半夜包围了我陕甘宁边区亦安县政府，用放火烧庄的歹毒手段，攻入县政府驻地，残杀了一批革命干部，使工农民主政权惨遭洗劫。

这个事变发生后，我红二十九军立即开进二道川，很快平息了叛乱。但是血债累累的匪首武文璋、武文英、毛有万，却畏罪潜逃了。

这里，讲的就是活捉三匪首的故事。

接受任务

二道川叛乱以后，这一带就划归陇东分区华池县管辖，分设为水泛、白豹、吴旗三个区。这样，捉拿武氏弟兄和毛有万三个匪首的任务，自然也就落到了华池县军民的肩上了。

那时，我在华池县担任抗日青年救国会议主任。一九三七年秋，有一天，县委书记王德民和县长李培福找我谈话。王书记说：“二道川平叛以后，武文璋、武文英、毛有万三个匪首至今没有抓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由你和王福林

等七名同志组成一个工作团，到水泛、白豹、吴旗三个区，处理平叛的遗留问题，发动群众，捉拿匪首。”李培福接着说：“那里情况复杂，平叛以后群众情绪还不安定，所以，再从县保安大队抽出三十名战士，由刘宗礼带领，配合你们行动。你想还有啥困难吗？”

自从二道川叛乱以来，每当同志们凑到一块，谈论起漏网匪首久未抓获，不能为死难烈士报仇，心里都感到很内疚，谁都想亲手抓住这三个家伙，亲手宰了才解恨。如今，组织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这还有啥话可说呢？我当即说：“请领导上放心，困难再大再多，我们也能想法克服。一定抓来匪首祭奠烈士就是了！”

第二天，李培福同志又召集我们工作团开会，详细研究了开展工作的方法、步骤，选定武氏弟兄的家乡——武家水口所在的水泛区作为斗争的重点目标。临毕，李县长再三叮咛我们：“如今国共合作抗日，那里接近白区，武氏弟兄和国民党勾结很紧。你们既要抓住匪首，又要注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凡事要多动脑子，依靠群众，讲究斗争策略。”

农历十月初，我们肩负着党交给的光荣任务，来到了水泛区。区委书记徐成海和区长齐应凯热情地欢迎和招待了我们。大家紧密配合，齐心协力，开始了捕捉匪首的战斗。

诱蛇出洞

我们进驻水泛区后，一边处理平叛的遗留问题，积极进行安定人心的工作，一边侦察匪首的行踪，发动群众捉拿。

据群众反映，匪首武文英跑到驻安边的国民党部队去了，这笔血债只好暂时记在帐上。但匪首武文璋，确实还在

本地躲藏着。可眼看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抓住这个家伙。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武家水口的百十户姓武的人家，在宗族观念的统治和反动分子的欺骗下，包藏着这个家伙。这里的杨、齐、王三大姓，又和武家沾亲带故。所以，我们一行动，就有人给武文璋通风报信，帮他东藏西躲地和我们“捉迷藏”。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同区委商量，召集了一个全区绅士、地主、富农等头面人物参加的会议，还请来了武氏宗族的族长。工作团和区上的同志，让我给这些人训话，我也没推辞。

我先给他们讲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治理边区的政策，然后问这些人：“你们愿意不愿意帮助民主政府整治好边区？”

他们只好点头哈腰地说：“愿意，愿意。”

我说：“好！大家既然愿意，那就应该把武文璋交给民主政府依法处理。”

这一下，他们的嘴上就象贴了封条，谁也不肯说了。好！你们不说，我说。我正色道：“我们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你们里头有人包藏着武文璋。明天不把他交到区上来，拿你们是问！”说着，我不由得列了个开刀的架势。

这可把他们吓慌了，乱嚷嚷地要求我宽限十天时间，我说不行，要求宽限五天，我也说不行。这时，我猛然想到，逼得太紧了，恐怕会把事情弄僵，就又说：“只要你们把人交出来，就与你们百事无干。”

第三天下午，我和齐应凯等同志正在商谈工作，一个老乡忽然跑来报告：“武文璋来了！”

我们整天东寻西找的捉这个家伙，可是他真的来了，大

家又都有些紧张。听说，这家伙身高力大，还会两下武艺，拼起命来十个、八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赶紧商量了捉拿他的办法：齐应凯是当地人，由他出面把武文璋引进窑里，我和区工会主任张德万等同志预先隐蔽在另外一间房里，等武匪进窑上炕以后，以老齐放下门帘子为号，一齐动手，来个“瓮中捉鳖”。

我们刚布置好，武文璋就由几个乡绅引着走进区政府的院子来了。这家伙是一条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黑皮脸上满面杀气。他手里提着两包“礼品”，嘴里嚷着：“听说县上来了位毛主任，来看望看望！”故意装着大咧咧的样子，两只眼睛却贼溜溜的四处张望着察看动静。

齐应凯赶快迎了上去，一面说：“不巧得很，今天老毛他们回县上去了。”一面把他让进了窑里。

这时，随着窑门帘子放下，我猛扑进窑里，枪口直指武匪，大喊一声：“不准动！”张德万等同志也立即冲进窑里动手。说来也是人忙无智，老张为了腾出手来绑这个家伙，顺手把他拿的“鬼头刀”放在炕边。武文璋一见有机可乘，猛扑向这把刀，妄想夺刀行凶。

好险哪！我一急，“砰”地开了一枪，打得满窑土星乱溅，烟尘腾腾。武文璋一下子瘫倒在炕上。大家七手八脚，把他五花大绑了起来。

为了防止出意外，我们派人连夜将武文璋押送到了华池县政府驻地大沟门，交给民主政府依法处理。

智擒武二

武文璋被民主政府捉拿归案的消息，很快就被在安边国

民党邓宝珊部胡奎生团当连长的武文英知道了。一九三八年春上的一天，武文英拿着团长胡奎生写的“护照”，来到水汪区政府，要我们释放他哥武文璋。

这天，恰巧区上和工作团的同志都下了乡，保安队也在前两天出去执行任务，机关只留下我和炊事员老齐两个人。武文英自投法网来了，可我们还不能马上把他逮起来。因为一逮起来，就得立即往县上送，我们没人手；先押在区上，又怕出意外。怎么办呢？我招呼这位“友军连长”坐定以后，瞅空子脱身出去，向保安队写了封“火速回区”的急信，插上鸡毛，放在火上一燎，交给了炊事员老齐。我站在院子里故意高声说道：“老齐，快出去买只羊回来招待友军连长啊！”老齐趁机就把这封信送了出去。

天快黑的时候，老齐回来了，不用说连根羊毛也没买回来。我说：“那就明天买鸡吧，杀鸡招待武连长！”喜得那家伙眉开眼笑。

第二天，为了缠住武文英，我和他在具保释放武文璋的问题上故意纠缠，还强装热情地和他说古道今，整整周旋了一天。杀鸡招待的空头人情，又让老齐用“买不下”的话推辞过去了。武文英这家伙不仅对我们的意图没有丝毫察觉，反而和我越拉越热乎，晚上睡觉时，连他的盒子枪也交给我收藏了起来。

第三天吃罢早饭，我正和武文英闲拉呱着，保安队回来了。随着一声“报告！”保安队长刘宗礼英姿勃勃地走进了窑门。

刘队长的父亲，是一位革命的老同志，就是在二道川叛乱时被武文英亲手杀害的。现在，他们仇人相见不相识，我

免不了要介绍一番。刘队长一听，马上明白了训保安队回来的意图，响亮地报告说：“保安队已全部奉命回到区上，等待命令！”说完，他转身就走。我撇下惊恐不安的武文英，退出窑门，向刘队长命令道：“立即逮捕武匪！”

霎时，只见保安队员弹上膛，刀出鞘，呼喊着手，堵住了武文英呆的窑门。刘队长手提着大张机头的盒子枪，只身走进窑里，威严地命令武文英：“举起手来！不准动！”武文英只得乖乖束手就擒，立即被五花大绑了起来。

武文英平日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他在区上住了两夜，天天清早起来，我们在区政府大门口都要抬到许多当地群众投放的状子和匿名信，要求将这个恶棍就地正法，为民报仇雪恨。刘宗礼同志也很激动，坚持要把武文英就地处决，为他父亲报仇，为群众伸冤。这时，恰巧县委组织部长马占荣来水泛区工作。我们耐心地说服了刘宗礼和群众。决定将武文英送县政府依法处理。可是，这家伙却自己找死，押送途中，他妄图逃跑，被押送的保安队员击毙了。

这件事发生后，我们马上向群众广泛宣传事情的真相及武匪的罪恶，取得了当地群众的普遍拥护。同时，我亲自回到县上汇报情况。李培福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很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完全对呀！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嘛！”末了，他说：“武文璋也已被判处死刑，你这回就把他带回水泛区立即执行！”

我返回水泛区后，同区委和区政府商量，立即召开了水泛、白豹、吴旗三个区的群众大会，公判、处决了血债累累的匪首武文璋，为赤安县死难烈士报了仇。

在此之后，听说驻安边的国民党部队，还派人到水泛区

一带，对我们逮捕、击毙武文英的情况进行过所谓“调查”。可是，他们走到哪里，群众都异口同声地说：“打死武文英，是民主政府为民除了一害。你们既然是国军，为甚弄个无恶不作的土匪当连长？”他们一根稻草也没捞到，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夜 拘 贼 窝

毛有万这个匪首，又是怎样被抓获的呢？这个家伙，比起武氏弟兄来，还要狡猾得多。在捉拿武氏弟兄的时候，我们也组织力量到处追捕他，几个月来却连他的影儿也没见到过。有几回，老乡报告说，看见毛有万钻了水洞，但当我们赶去时，他烤火的灰还温着，人早逃得没踪影了。武氏弟兄被镇压以后，他象受了惊的狐狸，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捕捉就越发困难了。

除恶不尽，祸害无穷。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情况，我们研究制定了捉拿这个匪首的新方案：这家伙幼年丧父，全靠他的寡妇娘抓养成人。他虽然无恶不做，可是供养他的寡母还有一点孝心。估计他在过春节时，要回家来。为此，我们决定等毛有万回家过年时捉拿他，来个“守株待兔”。

果然不出所料，这一年的除夕夜，毛有万偷偷摸摸回了家。他前脚进屋，后脚就有老乡向我们报告。水泛区自卫军营长戴同孝等同志，立即带领一个班自卫军战士，连夜赶到毛家，神不知鬼不觉地围了庄。

毛有万的家，是个座落在半山坡的单庄独户，同一般的山里人家一样，庄子没有院墙。这家伙大概以为他回来无人知晓，所以连窑门也没有上好，娘儿俩睡得很死。自卫军摸

到了毛有万的炕头，把他压在枕头底下的一把杀猪刀子抽出来，对准了他的心窝，他还不知晓呢！

“不准动！动就捅死你！”毛有万被喊声惊醒，见寒森森、明晃晃的杀猪刀对准自己的心口，只得乖乖地躺着不敢动，被自卫军战士捆了个结实。

说起来，我们也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我们押着毛有万临离开时，他向我们提出要喝了酒再走。他娘也苦苦哀求。我想，要喝就让他喝吧，贼娃子喝了酒也变不成英雄好汉嘛！谁料这家伙自知罪大恶极，终究一死，在喝酒时把手上戴的一个金戒指，趁机吞到了肚里。我们押着他刚走出庄院，他突然嚎叫一声，倒在地上，口鼻流血，坠金自毙了。这虽然省得我们浪费一颗子弹，但没来得及公开处决他，大家都觉得有点不解恨。

至此，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曲折斗争，我们终于依靠群众除了“三害”。工作结束后，我们回到县上，县委书记王德民和县长李培福同志很满意地说：“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啊！要好好总结这次斗争的经验，尤其要总结依靠群众的经验。”

（高博文整理）

一斗麦剧团

范 雨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由党在庆阳西峰镇办事处的负责人刘文山、魏无益同志介绍参加了革命。不几天，熊正华同志就领着我们几个十二、三岁的娃娃，来到曲子（特委所在地）。组织上把我们安排在刚刚成立的“一斗麦剧团”——庆环农村剧校工作。为什么叫“一斗麦剧团”呢？说起来很有意思，原来这个剧团是由西府艺人张云领着赵三、韩老五、张红娃几个人，由专署出面把几个散了摊子的戏班子重新组合成立的。成立时没有经费，由工商界资助，你一升，他一碗，好不容易凑了一斗麦子，戏班子就这样开张了。从此，“一斗麦剧团”的名字就传开了。

庆环农村剧校成立后，虽然条件很差，生活很苦，没有戏箱，没有住的地方，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我们是党领导、培养的文艺工作者，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演出。我们宣传抗日，宣传统一战线，宣传剪辮子反封建、放裹脚解放妇女。当时演的戏，有马健翎同志编的《中国魂》、《插路条》、《那台刘》，有赵守一同志编的《血战平凉》、《血训团》、《新教子》，有墨遯萍同志编的《苛岚县》、《张风桥》、《满天飞》，彭飞（陈泽）同志编的《新打鱼杀家》等。当然，那时候的演出，今天说起来是很可笑的。比如

我们演日本鬼子，穿的是传统戏服装，脸上画豆腐块或画成花脸，无论是丑扮还是凶扮，额头上都要画一面太阳旗，代表他们是日本侵略者。上场有四句引子，然后报名：吾乃日本皇军某某……。演八路军和群众是武生打扮，代表正面人物。双方交战的武器有时用木枪，有时也用长矛大刀。又比如：我们配合消灭政治土匪赵老五，演出《保卫边区》时，服装是临时凑的，有传统的，有现代的，有临演出前在观众中借的。戏里的老头，白胡子用棉花粘，黑胡子用墨汁画。但这样的演出四十年前在陇东山区影响很大，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消灭敌人的作用。一斗麦剧团经过一年多的发展，人员增加了，变成了文工团，直属陇东分区领导。高玉秀、王玉等同志先后担任过团长。

一九四〇年秋季，我们去延安鲁艺学习。我们陇东剧团和抗战剧团在一个文艺干部训练班。在延安，我们听了博古、周扬、张庚等同志的报告，学习了政治、哲学、文艺理论及表演等课程，还排演了《群众日报》总编辑赵守一同志编的《大转变》这出戏。通过听报告、劳动、参观学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我们的演出水平。后来演出再也不用老戏里的丑角和花脸去演日本人了。

在延安有一次演出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次，我们陇东剧团和抗战剧团的几个娃娃在中央党校礼堂协助延安平剧院演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来观看。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亲切接见了我们。主席把我抱在怀里问寒问暖，还在我那马莲纸本子上题了“向前进！”几个字，给慕崇科同志题了：“勇往直前！”这是多么令人高兴、令人鼓舞、令人难忘的事啊！

一九四一年秋末，我们回到庆阳。这时候，由于敌人的层层封锁，我们生活更艰苦，环境更险恶了。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我们自己种粮食，自己砍柴烧炭，经常在敌人的追赶下行军，在敌人的包围间隙演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战争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这支文艺队伍。有一次，敌人把我们剧团几十个人围困在一条小山沟里，当时天又下着特大暴雨，无处躲藏，我们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情况非常危急。一直等到河水退了，敌人走了，我们才出了山沟，脱离了险境。事后很多同志生病了，王兴和同志就在这里得了重病，不几天就和我们永别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有少数艺人害怕了，动摇了，想偷偷地离开剧团。当我们去部队演出路过敌占区唐家堡子的时候，有几个艺人商量好了准备偷跑。当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即告诉了王仲才同志。组织上及时采取了措施，并通过思想工作，挽留了这几个艺人，团结了这部分力量。

革命形势在迅速发展，群众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那种“旧瓶子装新酒”的演出不能适应革命和群众的要求。正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了我们极大的力量。同时上级先后又派来了曲子贞、黄俊耀、张力、田益荣、范景玉、程士荣等同志，鲁艺派来了周国瑾、朱云辉等同志，抗大七分校也给我们分配了一些同志，从而加强了剧团的领导和业务力量。为了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配合部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士气，宣传大生产。每到一地，首先搜集当地的模范事迹和英雄人物的材料，随时编写，随时演出。当时我们演出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大家

喜欢》等剧，还创作演出了大型眉户剧《丑家川》、《城壕村》、《牛家堡子》等。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我们还利用环县一带的民间艺术形式——陇东道情（即陇剧的前身），在街头向群众宣传。这些演出至今还在陇东群众中留有亲切而深刻的记忆。

在那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伟大的党象一颗明星一样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革命紧紧地把我们连结在一起。那时候，谁也不愿离开党，不愿离开革命，不愿离开集体。记得在一次演出中，敌人的骑兵突然包围了我们，我们演员从台上跳下来，在群众的掩护下，把大件行李坚壁起来，戏装分给大家每人背几件，人往外撤。这时候，敌人扑了上来，一下子冲散了剧团。大家四零五散，谁也找不到谁。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心想这下子完了，不知道还能活几个人，不知道大伙还能不能再回到一起。几天后，敌人退了，失散的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纷纷赶到预定地点。同志们一见面，一个个高兴得叫了起来。剧团的同志一个不少，大家都到齐了，戏装也都背来了！

那时候，大伙一条心，一股劲，互相爱护，互相关心。年纪大的同志象父兄一样关心着年纪小的，大姐姐妹们象爱护亲兄弟一样爱护我们。最使我难忘的是樊惠兰大姐。她看到我穿的那件灰军装长得超过了膝盖，脚上是人家女同志穿过的花鞋（因男鞋大不能穿），就把我叫到家里，给我改衣服，补袜子，做新鞋，给我洗脸，洗脖子，洗衣服，让我讲卫生。还经常给我做好吃的，鼓励我努力学习，好好演出。因为我姓范，她姓樊，叫起来音差不多，因此他把我认作兄弟，对我象亲兄弟一样看待。还有赵大姐也是这样，她经常把我们几

个娃娃叫到家里，拿出好东西给我们吃，非常关心体贴我们。我们的老首长马文瑞书记、马锡五专员，虽然工作很忙，但在百忙中也抽空给我们教文化，把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识字。马专员的爱人李春林同志、马文瑞同志的爱人孙明同志，象妈妈一样爱护我们，有时还背着我到外面去玩，象一家人一样，非常亲热。多少年来，每当我想起樊大姐、赵大姐、李妈妈和孙妈妈时，一种亲切而尊重的心情油然而生。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缝纫工人，在我参加革命之后，一九四三年也参加了贺老总的一二〇师，后来不幸病故了。我虽然没有亲人，可是同志们就是我的亲人，革命的战斗的集体就是我的家。

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权，也没有什么特殊化，谁也不想搞特殊。干部和演员一样的待遇，大家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年轻力壮的要拿起武器当前锋和后卫保卫剧团，女同志自己背着孩子行军，年老体弱的给一条驴尾巴，就算是很照顾了。在粮食发生困难的时候，大家一样地挨饿。有一回，炊事员王得胜同志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山上吃酸枣，连核带皮都吃了。由于吃得过多，得了肠梗阻。王得胜同志宁愿上山吃酸枣也不肯吃一口饭，这样的好同志谁能忘记了！

在战争年代，我们练功、排戏、演出不讲什么条件、设备，更没有什么大剧院、排练场。不管是土坑里，硬地上，雪地里，庙台上，什么地方都可以练，都可以演。当时鲁明、王庚、李寿亭、武玉笑、扈启贤等同志和我在一起，无论是寒冷冬天，烈焰夏日，我们一直坚持练功，坚持演出。这个艰苦的我马岁月过去了。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我这个老兵，还要再鼓干劲，争取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记陇东青年学生参观团的延安之行

侯宗儒

一九四二年六七月间，我作为陇东青年学生参观团的成员，到当时的红色首府延安进行了历时二十多天的参观学习。这是我踏上革命征途后经历的第一件大事。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激动人心。

陇东青年学生参观团是由陇东分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发起组织的，目的在于宣传党的主张，向青年进行革命形势教育，吸引、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成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陇东中学首届毕业生三十多人，二是陇东分区所属庆阳、合水、镇原、环县、曲子、华池六个县，每县推选的两名品学兼优的高小学生，三是分区青救会的干部，共五十多人组成。团长由分区青救会一位姓董的干部担任，副团长是陇东中学教导主任余新野同志。我当时是陇东中学师范第一班毕业生。

出发那天，队伍集中在分区青救会的大院里，站成整整齐齐的两排。团员们年龄大都是十八九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多岁。每人背一个小行李卷，一只小挎包，挎包带子上挽一条毛巾和一个喝水用的小搪瓷缸。大家一个个昂着头，挺着胸，脸色红扑扑的，谁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团长小董同志作了简短的动员后，大家就唱着歌儿上路了。队伍的最

前面是一面鲜艳的红旗，上面绣着“陇东青年学生参观团”九个大字。同学们排成一路纵队，阔步前进。队尾是四匹骡子，驮着吃的干粮和一部分行李。我们的队伍行进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虽然算不得庞大，倒也显得威武，每过一处村庄，都有许多群众，特别是小孩赶来看热闹。每逢这种时候，我们的歌儿也唱得更加嘹亮。

从庆阳县城出发到延安，抄小路走有四百八十华里。我们晓行夜宿，每站走六十里，计划八天到达。第五天到了富县，大伙扳指头一算，离延安只剩一百八十华里路了，很快就要到我们日夜向往的延安城了，说不定还可以见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哩！那股高兴劲别提有多大，真是离延安近一步，心跳就加快一次。第二天，大伙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步伐，连续两天，每站行程九十里，第七天晚上就到了延安。

到延安后，边区政府交际处的同志接待了我们，趁学校放假，安排我们住在延安小学的教室里。除了自带的行李外，交际处还为我们准备了被褥、脸盆等生活用品。

参观学习的活动是激动人心的。第一天去的地方是边区政府。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接见了我们。林伯渠主席讲了话，使我们了解了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了解边区政府为支援民族解放战争所进行的艰巨工作。晚上举办电影晚会招待我们。以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我们先后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国际和平医院、边区师范等十多个单位。

一天上午，在八路军总部，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朱总虽然忙于军务，还是抽出时间给我们讲了话。不一

会，贺龙同志也来了。他那风趣的话语、爽朗的笑声，使交谈气氛更加热烈、活跃。看到朱总、贺总这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同学们刚来时那种拘束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谈话结束时，贺龙同志提议，当天下午由他组织一个球队和我们参观团来一场篮球友谊赛。大伙一听都高兴得鼓起了掌。吃过中午饭本该好好睡一觉，可是谁还能躺得住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下午的球该怎么打，特别是准备上场的几位运动员，更是兴奋得满院子蹦跶。下午三时许，球赛在西北局篮球场开始了。贺老总领着几位年轻的八路军战士生龙活虎般地上场了。我们参观团球队虽然从阵容上远不如贺老总他们，但仍不失初生之犊的气概。一接触，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我们代表团的成员被安排坐在临场的一排小凳子上观战。大家的眼睛都不约而同地盯着贺老总的一举一动。原先大家只知道贺老总率领大军驰骋湘鄂西，长征到陕北的英雄事迹，今天又亲眼看到他在篮球场上和普通战士一起打球，不禁为贺老总伟大、平凡的品格和八路军亲密无间的官兵关系所深深感动。只顾看，早把谁胜谁负的事丢到脑后了。

幸福的时刻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在延安已经度过了二十五天。这天没有安排参观活动，团长“命令”我们彻底梳洗，好好休息。一些机灵的同学开始叽叽咕咕地咬耳朵，大家心里估摸着，准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这可是大伙早就盼望着的事啊。一上午，同学们都从头到脚地梳洗整修了一番，每个人的衣服都洗刷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下午两点，交际处邱科长带着我们过了延河，来到杨家岭。啊！杨家岭，这不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吗！要不是排着队列，

我们准会激动地跳起来。大家按捺着极度兴奋的心情，被带进院中一个宽敞的会议室，围成半圆形落坐。工作人员端来许多延安的红枣和梨，招待我们。不一会，听见汽车行驶的声音，我们立即站起来，向窗外引颈眺望。只见毛主席穿着朴素的灰色中山装，在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陪同下走进会议室。这时，我们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挥了挥手，待掌声平息后开始询问我们代表团的情况，并要陇东中学学生和六个县的青年代表分别站起来，一个一个地端详了一遍。还问到陇东中学的师生人数、教学情况等。随后，他点燃了一支烟，亲切地说：“讲点啥呢？还是你们提问题吧，出了题目我再讲。”同学们立即把自己想好的问题写成纸条，送到主席手里。一时间，送上去的纸条就有十多张。毛主席笑眯眯地把全部纸条看了一遍，开始讲话。他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和我党的政治主张。讲到抗日必胜这个问题时，毛主席寓意深刻地说：“别小看延安的小山沟沟，土窑洞洞。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这里有马列主义。”毛主席勉励我们，要团结和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英勇奋斗。他又针对我们师范班少数同学不愿当小学教师的思想，幽默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人民教师很光荣。几乎每个人都有从师学习的过程。没有教师谁给他教？到了共产主义，国家消亡，没有了军队，我们的朱老总都得失业，但教师还是有用的。”讲完话，主席还为我们代表团挥笔题词。

那次赴延安参观学习，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每当我们遇到艰难险阻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在延安度过的幸福日子，眼前仿佛

浮出了毛主席、朱总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亲切慈祥的面容。毛主席的亲切教诲，鼓舞着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张国杰 李 富 张金形 整理)

我给毛主席演过戏

黄 润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文艺工作者一到农村，就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广泛发动群众，利用当地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如扭秧歌、耍社火等，宣传抗日救国和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当时，来到我们庆阳县的是木可夫同志。他一来就发动群众，利用春节前后农闲的机会，组织群众扭秧歌、耍社火。他给社火、秧歌曲子配上新歌词，亲自组织排练、演出。一时间，各区、各村都动了起来，尤其是延安三十里铺区，最为红火。春节一到，村里整天锣鼓喧天，歌声不断。那时，我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由于从小就喜欢唱戏唱山歌、耍社火，因此，木可夫同志一来到我们村，就根据群众意见，让我担任了社火头，很快就把全区的社火秧歌组织起来了。

秧歌社火队组织起来后，群众很支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正月间，我们到各村去演出，有时还到陇东特委所在地——庆阳县城去演出；演出需要的服装、道具都是借老百姓的。我们三十里铺秧歌社火队办起不长时间，就很快出了名。陇东特委和专署还奖给我们一面锦旗，对我们鼓舞很大。

一九四四年十月，陕甘宁边区抗日政府在延安召开文教代表大会。我被评为陇东地区的代表，代表陇东秧歌队出席这个会议。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很高兴，翻山越岭跑到了延安。当时，我们代表住在鲁迅艺术学院（当时在桥儿沟）。贺敬之、王家乙、田家芬、丁玲等同志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开会的前几天，我们抓紧时间赶排了我编的小戏《二五减租》。主要剧情是这样的：政府号召减租减息。一个村庄有个叫张老好的人，他被减租后，地主董黑霸跑到他家里来威胁说：“张老好，我哪点对你不好？你种老子的地，把你家大的吃老，小的吃大，还要减租！如果你给老子还不交租就滚蛋！”张老好左右为难，明里答应减租，暗里不减，仍然给董黑霸交租。张老好的儿子知道后，就跑去告诉了乡长。乡长跑来当场揭露了董黑霸的阴谋，教育了张老好。这出戏后来在延安的《群众日报》上发表。当时，贺敬之同志扮演张老好，我扮乡长，王家乙同志扮地主董黑霸。我是从农村来的，怕演不好，贺敬之同王家乙同志就给我教。十月三日早晨吃过早饭，我正准备去开会，突然电话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全体代表。我一听非常高兴，顾不上一切，就和榆林地区的一位代表小跑着从桥儿沟去边区政府办公厅。十几里路，一会儿就到了。当我们俩来到办公厅时，毛主席已来了，正和代表们谈话。胡乔木同志把我们迎进去。一进门，就见办公桌旁的椅子上全坐满了人。我俩只好坐在门背后的椅子上。毛主席看见后，就让胡乔木招呼我们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坐定后，毛主席就问我：“你是哪个地区的？”我站起来回答说：“陇东分区的。”毛主席又问：“你是哪个县的？”我说：“庆阳县的”。毛主席还

问：“你是什么代表？”我说：“秧歌队代表。”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听说你们的秧歌演得很好，我们要看。以后还要好好干，要多演、多唱、多宣传，把你们周围的群众都发动起来。”听了毛主席的话，我心情非常激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不大一会儿，大会开始了。会上，毛主席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话；朱德总司令讲了军队扩充的情况；周副主席讲了国共谈判的情况；叶剑英总参谋长介绍了全国十九个解放区的状况。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气氛很好。

十一月五日晚，我们在中央政府礼堂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演出了我编写的《减租》。毛主席坐在第二排，不时地向我们鼓掌。当我们唱到“高山上点灯四处明，共产党是我们的领路人。减租法令实在好，为了我们穷人来翻身。政府的法令真响真公平，交得交来减得减，佃户主户都呀么都高兴……”时，毛主席站起来向我们鼓掌，戏演完后回到住处，我激动得一夜都没有睡着，暗暗下了决心，要当一个好的宣传员。

(张金彤、李一富 整理)

抗大七分校大生产侧记

张 应 宽

一九四二年春，蒋介石匪帮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妄想把我们党和军队困死、饿死。边区军民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那时候，我在华池县白马区二乡（今华池县林镇公社东华池大队一带）当乡长，抗大七分校的学员们在生产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冲天的革命干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艰 苦 创 业

东华池一带的豹子川、大风川、平定川，山岭连绵，坡缓地肥，因此一开始就被延安派出的开荒选点勘察队选中了。不久，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带领三个大队和一个校部约三千多人，浩浩荡荡开到这里开荒生产。当时，这一带只住着我们从陕北等地逃荒来的十五户人家。同志们开来的那天，我们都好奇地去看，只见身背背包、穿戴朴素的学员们精神抖擞地列队走来，不一时就站了黑压压一片。一个被称做陶科长的人站在高处给学员们讲话说：“同志们，我们响应毛主席大生产的号召，来这个地方开荒种庄稼。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全靠艰苦奋斗了！大家先搞地方住下，能盖房的

盖房，能挖窑的挖窑……。”跟着话音，同志们满是尘土的脸上都显得激动起来，不自觉地握紧了锄把。

动员会开罢，校部经过详细认真的讨论，对各大队的驻地又进行了具体布置：一大队开赴大风川，二大队开进豹子川，三大队到平定川；校部直属的三百名女学生组成常备队，开上另一座山。老乡们后来把那座山叫“女子山”、“女生队山”。校部、供给部、休养连、卫生所、管理科、文工队和一百八十人的干训队，都按照指定地点各就各位，安营扎寨。那时是二月天，河里冰还没消，对面山里雪渣子白花花的。当晚，同志们砍来梢杆，割来蒿子，搭成窝棚，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挤在窝棚里取暖。就这样开始了创业生活的第一天。

沉睡千年的荒山苏醒了。连日来，我从自家住的这面川里，远远望见学员们住的对面山上黄尘遮天蔽日，挖窑的人换人，密密麻麻地布满山坡，直干到后晌天黑吹号了才收工。夜里，同志们又加起班来，推土车的吱吟声通夜隔川传来。一天傍晚，我捺不住，跑去看热闹，正碰上刚收工的学员们来到河边洗脸。嗨！一个个全成了土人，满是黄土的脸上只剩两个滴溜溜转着的眼珠是黑的。二十多天过去了，座座山上出现了排排整齐的窑洞。孔孔新窑又齐整又畅亮。刷窑面、漫窑墙、做门窗，全都是学员们自己干的。荒山一下子被装点成了新模样。

要开荒，工具是头道难题。开始，学员们到老乡家借镢头，可惜人多工具少，供不过来。区、乡政府动员乡亲们拿出所有的镢头支援分校开荒。校部又出面从驻在庆阳的三八五旅联系来了一大批镢头，总算应了急。开荒战斗打响那

天，分校各大队的学员们一齐上阵，连机关、区、乡干部和老乡们也掂着镢头上山了。烧荒的野火冲天而起，劳动号子震荡山川，沉睡千年的东华池沸腾了！

有一天，在上山的路上，我碰见在战争中负重伤失去一只胳膊的彭绍辉校长，也扛把镢头朝上走，便笑着问他：“你一只手，还掂个镢头做啥？”他朗朗地笑着说：“干不成活儿，就是看看这景象心里也痛快呀！”开荒开始后校部规定每个人开荒的任务是五亩。干训队里有个田有才，自个儿打了把尺把宽的镢头刃子，一天就挖了五亩地。这件事汇报到校部，彭校长听了不信。第二天，他让田有才带了一个通讯班再去试试。田有才到了山上，号一响闷下头就挖，不出几小时就开出了黑油油的一大片地，跟去丈量的人用绳一拉，果然不错，五亩刚出头！这下，文工队可有宣传材料了，黑板报上、地头小节目里，一个劲地表扬起田有才，同志们还送给他一个“气死牛”的绰号。几天下来，全校几乎人人都超额完成了开荒任务，几面荒山坡上都按时节种上了糜谷等粮食和蔬菜。老乡们粗算过一笔帐，分校三千多名同志那阵子少说也开了两万亩荒地！

丰衣足食

汗水换来了丰收果实。开荒那年秋后，东华池几条大川里，庄稼满山满坡。玉米棒子结得黄灿灿的，糜子厚得用镰一把接不拢。分校各大队打下的粮食多极了，装满了几十孔窑。河滩里种的葱、蒜、辣子、西红柿等菜，红红绿绿，一车车、一担担地运往各大队的食堂、饭馆。校部和三个大队养了几百口猪，光校部的猪圈里就有三十多口大猪，猪圈就

更多了。我去校部转游时，校部后院里喂猪的杨老汉自豪地喜眯着眼，硬拉我去看他喂的猪。我到圈门前一看，好大哟！几十口猪肥得连眼都挤成了一条缝。只见老杨把煮熟的糜子倒进槽里，叫不动弹猪，便用和食板拍打着猪屁股笑着吆喝说：“开饭了！咋请不动？”

那阵子，这里还办起油坊、粉坊、酒坊、醋坊。二、三大队和校部还在人来人往的各大路岔开起了四个饭馆，做有群众爱吃的锅盔、蒸馍、猪羊肉、炒面筋等，还备了酒。几个饭馆常常是忙乎到深夜，碗碟的磕击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开荒种粮的空闲时间，分校学员们还整修扩建了校部，盖起能容纳两千七百人的大礼堂和一排排坚固整齐的石窖窖。学员们在窖地下修了烧火道，打后墙外通到炕里，填进大股本柴一烧，满窖都是热烘烘的；三九天，人进来都要脱棉衣哩！同志们打趣说：“这是咱们的土暖气”。

军富民也富。东华池现任大队支书龙福财的爷爷龙国海，分校来的那年才从陕西拖儿带女逃荒要饭到这儿。那光景好不凄惨，全家四口人只推着一辆破独轮车，背着一个背斗，穷得精打光。分校学员们带着牛帮他家开荒种土地，乡政府给他家救济了两斗米。全家人安家头一年打的粮食，还了借的还吃不完。我家原来住在台水张嘴堡，后来租债逼得人活不下去，听说华池的白马区是边区，不交租子，弟兄三个就挑着铺盖到这里挖窖安家。分校警卫连的同志们见我家人手少，来了一百多人帮我开了二十亩地。秋后我家收了二十二石糜子（一石合四百斤），头一次不愁吃了。

鱼 水 情 深

逢年过节，分校总要请群众一块热闹热闹。开荒第二年的春节前夕，学员们组成贺年小分队，敲锣打鼓，分头去给群众家拜年，给一家送一包红纸包的炸油爆，上面压张请帖。这样一来，我这个当乡长的慌了神，忙和乡亲们商量怎样酬谢同志们，最后决定一家摘一吊子猪肉送往校部。彭校长见了，老远笑着对我喊道：“你这个乡长咋发动群众给我们送起肉来啦？是怕我们的肉不够吃还是咋的？”一边忙着招呼：“管理员、赶快抬搬酒菜，请乡亲们吃饭！”军民同度佳节，一家伙闹到天黑。

分校有个一百二十多人的文工队，文艺活动很活跃，经常在大礼堂演戏。戏目有揭露国民党拉伕要款的，还有《三打祝家庄》、《岳飞》等古戏。每演一次都要请我们去看，还总让我们坐在前面，学员们坐在后头。每次见老年人进礼堂，学员们总是亲热地迎上去，把老人搀扶到前头坐下，给倒上开水。头几次演出，唱的是京剧，老乡们听不懂，看的人渐渐少了。文工队员们见这情况，就停下演出问老乡：“是不是听不懂？”被问的人不好意思说不懂，都点头说：“懂哩！”队员们又演了一段，然后让老乡们辨辨唱的是啥，结果没人说得上。队员们便和老乡们商量：“看怎么样！我们看得出大伙儿听不懂嘛。改演秦腔怎么样？”一听说演秦腔，人们不走了。从此，文工队员们常排演秦腔戏。每次演出，大礼堂里人都挤得满满当当，甚至几十里外的老汉、老太太也赶来看。

那时候，我们这一带地方病很盛行。有一年二乡流行吐

黄水病（克山病），不出一月就死了一百来人。仅有的一个药铺远在六七十里外。老乡们得了病很难及时治疗，不少人就抬来香炉，请来巫神，敲起羊皮鼓“赶鬼”。学员们见了，反映给彭校长。彭校长决断地说：“咱们学校的医生，要帮助老乡们解除病苦，下到村上巡回治疗。”打这以后，校部的韩医生和各大队的军医都下到村里，沿川挨户地给老乡看病。碰到有长期病号的家，就住下治疗，直到病人好了才挪地方。医生和卫生员边看病，边向乡亲们宣传卫生常识，教大家养成剪指甲、刷牙、盖剩饭等习惯，空闲了还动手扫院、压粪，把屋里院外拾掇得整整齐齐。不多久，几条川里的卫生面貌变了，病也少了。以后，老乡们每碰到学校的医生，都争着拉去吃饭，亲热的很。

一天，彭校长打坡上转到我家院里，四处看了一会儿，皱眉说：“老张，你这院里埋汰得很哪！”说着，和随身来的四个同志拿起家什就帮我扫院、垫圈。干了一阵，临走还说：“我明天派几个人，把你这乡长的院里先拾掇出个样子来。”第二天我从山上干活回来，听邻居嚷：“分校的同志帮你拾掇院子了！”我连忙回家一看，哟！屋里屋外大变样儿！粪垫上了，院扫净了，连盆盆罐罐都刷洗了。老伴说，是彭校长引几个同志来干的，走时还让咱们常保持这样哩！后来，彭校长见了我问：“这条川象你家过去那样子还有多少？我们打算都让讲卫生哩！”经我介绍，第二天，彭校长带着科长、校医和勤杂人员等二三十人，分三路到杨兰沟、唐家沟等地方帮老乡们打扫卫生、宣传卫生常识去了。

分校待群众象一家人，每当部队发新衣裳，校部就把手员们的旧衣裳收集起来，无偿地分送乡亲们。象这样的爱民

事儿，真象半坡的羊群，一时数说不完。（陈山京）

校本黄人《一九四五年旧历九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抗大七分校接到指示要撤回延安。动身前，学校在校部大院里召开大会向群众告别。彭校长讲：“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啦！形势好转了！中央通知我们分校回延安。在这儿驻了好久，麻烦大家了。乡亲们还有啥意见和要求，趁这机会顺便给我们说说吧！”话音没落，台下群众连声说了起来：“还有啥意见呢？你们给我们办了那么多好事，不知咋感谢哩！”“军民一家嘛，还谢个啥？”彭校长说，“以后大家最好建个卫生院，免得看病再作难。如果还有什么困难，我们回去后代表乡亲们向毛主席说说……。”军民难分难舍，说不完的知心话，许多人都落了泪。

抗大七分校的同志们走了，但他们留下的革命种子永远扎根在我们心中，开花，结果。

（卢燕平 整理）

三打双柳堡

胡宗彦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我陕甘宁边区时，合水县反动地方武装也猖獗了起来。小小的合水县，保安队、自卫队就有十来股。其中最凶恶、实力最强的，要算双柳堡自卫队。这个自卫队有一百三十多人，经常搜捕我游击队，残害革命者家属，敲榨勒索老百姓财物，群众恨之入骨。为了消灭这群恶魔，摧毁当地伪政权，我合水游击队曾三次攻打双柳堡。

引狼出窝

一九四八年开镰收麦季节，合水游击队在陇东分区回民骑兵团一个连的配合下，第一次准备攻打双柳堡。

双柳堡筑有两丈多高的城墙，三面临沟崖，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只有正面有路，但敌人却插了三道一人多高的干枣刺，成了接近堡子的障碍。堡子里的敌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多年的惯匪，枪法好，装备武器也是我们游击队当时不能比拟的。

为了减少伤亡，消灭敌人，游击队和骑兵团经过讨论，作出了引狼出窝，以伏兵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相机打城的战斗方案。同时决定借郭家堡敌人和双柳堡敌人头一天发生

过误会的事，引诱双柳堡敌人出窝。

原来头一天，双柳堡和郭家堡敌人奉上司命令，在塔儿堡、黑木一带搜索我游击队时，发生了误会，郭家堡敌人当场被打死了三、四个，双柳堡也有几人重伤，两家的恼气还没有消呢！

第二天黎明，游击队偷偷运动到朱家井坳一带的麦地里，回民骑兵连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伏在陈家堰的一条胡同里。圈套布好了，单等敌人来钻。

吃早饭时分，双柳堡附近的村庄里，出现了十来个气势汹汹的“自卫队员”，声称是郭家堡的人。他们逢人就骂：“狗养的双柳堡人欺人太甚！昨天把我们几个弟兄打死了，难道就这样罢了不成？今天我们非找他们报仇不可！”

不用说，这十几个人是游击队员扮装的。但狡猾的双柳堡敌人象识破了我们的机关似的，怎么也不上钩。于是游击队一下子显了“真身”，将伪乡公所发给各家各户的保甲门牌砸得粉碎。这一招，可真灵验，当即就有坏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两个堡子的敌人。他们一听有游击队，想捉几个去领赏。先是郭家堡出来十几个人，东张西望地搜索着。我方十几个游击队员，突然从坳坎后面跳出来，一下就活捉了六、七个敌人，连外号叫“三狼”的敌侦察排长也被捉住了。剩下的几个没命地逃了回去。

不一会儿，大鱼终于上钩了！双柳堡敌人听见枪声，倾巢而出，一窝蜂似地跟着游击队屁股追赶。十几个游击队员押着俘虏，边打边退。退了四、五里，离我埋伏圈还有二里地，敌人突然意识到他们上了当，返身就想溜。突然，激昂的冲锋号响了起来，回民骑兵连一百多匹马从胡同里冲了出

来。战士们跃马挥刀，来了个猛杀猛砍。敌人没料到我们还有正规骑兵部队配合，一下就被冲得四零五散，各自逃命。这时，埋伏在朱家井场的合水游击队也从麦地里一跃而起，追击歼灭敌人。霎时，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战马的嘶叫声，响彻了整个原野。

约半小时后，战斗胜利结束。一百三十多名敌人，被我打死、活捉了六十多名；光轻机枪，被我连缴带拾，就得了八挺。而我方只一人牺牲，三人带伤。

一打双柳堡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黑夜偷袭

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古历四月初，合水游击队一个中队在店子区区委配合下，第二次攻打双柳堡。

这天夜里，一百多名游击队员靠着夜色的掩护，携带炸药包，抬着梯子，悄悄接近了双柳堡；然后按照预定计划，立刻兵分三路：两路分别防西华池张胜维的自卫队和郭家堡的自卫队前来增援，剩下六、七十人担负攻城歼敌的任务。

夜，静悄悄的，只有北风刮着插在面前的干枣刺，沙沙作响。攻城的战士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单等着爆破手摸到城门跟前，炸开通路，然后就冲进城去，把酣睡的敌人打个措手不及。

参加过战斗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因一个细节的突然变化，而影响到战斗的全盘。甚至一个脚印、一声咳嗽也会使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正当高怀哲、雷长有、谢正义等人摸到城门洞里安放炸药时，突然，城壕里不知谁家的一只狗窜过来，“汪汪”地咬了起来，接着城周围的狗一齐跟着咬

了起来。城墙上的哨兵立刻意识到城下有人，喝问道：“下面干啥的？”

高怀哲一见敌人发觉了，急随口答道：“打狗的！”紧接着城墙上又转过来一个哨兵：“下面狗咬谁呢？”那个哨兵答道：“咬撵着打狗的。”不料这家伙机灵得很，骂前一个哨兵道：“打你妈的屁，是敌人来了！”

接着两个哨兵立刻向城下开起枪来。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城内的敌人纷纷登城。子弹象雨点般地射来。游击队一看计划落空，于是急急撤退。但中队长雷长有同志不幸中弹，光荣地牺牲了。这是我们游击队一个严重的损失。

连 锅 端

二打双柳堡，不但没有成功，反而牺牲了一个中队长。雷长有同志是多年的老游击队员，作战勇敢，很有功绩。他的牺牲使同志们非常痛心。大家纷纷叫嚷道：“不捣掉双柳堡这个‘鳖盖’，誓不罢休！”“早日给雷中队长报仇！”领导上对战士们的急躁复仇思想做了耐心的说服解释。游击队当时撤退到大山门山区，总结了经验教训。怎样才能彻底摧毁双柳堡这个顽固堡垒呢？在“诸葛亮”会上，多数同志认为：由于双柳堡的敌人兵力又得到了增补，地形对敌又很有利，同时，城墙上白天黑夜又多加了岗哨，所以硬攻是要花本钱的，偷袭也是没有把握的。后来有几个同志提出：如果能做好敌人家属的工作，争取几个人反正作为内线，攻城时来个里应外合，不愁这群王八蛋见不了阎王爷！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于是，在一个时期内，游击队暂时集中在大山门搞整训，由地下区委张秀文、沈满德、高怀哲回去先做发展内线的工作。他们经过研究分析，物色了一个可能争取的人叫张家兴。张家兴是本地人，到自卫队只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当了个班长，但没干什么坏事。几个同志先后几次到他家和他父亲张镇宽促膝谈心，讲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就要完蛋的形势。张镇宽早就不想叫儿子在那里鬼混了，只是害怕儿子回来无处落脚。地下区委针对这种思想顾虑，给他讲明了政策，并保证只要他儿子回来，游击队一定既往不咎；如果愿意参加游击队的话，一定欢迎。这样一来，张镇宽才放心了。

一天晚上，张镇宽去双柳堡借故把儿子叫了回来，和地下区委几个同志接上了头。张家兴把敌人内部的全部情况告诉了我们，还表示再打双柳堡时，自己愿意献力，作为内应。

张家兴回堡子后，常常通过家里人巧妙地同我们取得联系，还在同班发展了一个可靠的朋友叫武兴春。

这时，敌人内部有个叫马德江的自卫队员，通过他母亲给游击队捎话说：“我回来啦，不知游击队要不要？”马德江原来也是我游击队员，一九四七年敌人向陕甘宁边区进攻时跑到那边去的。这是个特殊情况。游击队把情况汇报给我。我说：“回来欢迎。但一定要立个什么功，才能证明是实心。”他母亲便把我的答复设法转告了本人。

我们把马德江也想投诚的心意又暗暗告诉张家兴，并指示他一定要把此人串通起来，三人步调要一致，不要各自行动，注意避免走漏风声。恰巧这时，敌人内部对各班进行人

数平衡调整，张家兴乘机活动，将马德江调到了自己的班里。从此，这三颗钉子就秘密地插在敌人的营垒里了。

古历四月下旬，王用功同志率陇东分区十四团的一个营来合水一带活动。正规军和游击队联合行动，决定再打双柳堡。一天，我们得到张家兴送来的情报说：三十晚上轮到他和武兴春、马德江三人在城墙上站第二班岗，叫游击队务必前来攻打，并约定了联络暗号。

古历四月三十晚上，一点月光也没有。夜，黑得象一口黑锅，伸手难见五指。游击队和正规军悄悄出发了。按预先商定的计划，由十四团一个连在胡家庄防西华池的敌人，另一个连在吕家峁子防郭家堡的敌人，剩下一个连配合游击队打主攻。指挥所设在店子街上。

主攻部队到城下后，静静地伏在那里观察城墙上的动静。一会儿，头一班哨下去了，第二班哨换上来了。联络尖兵按预先约好的暗号擦了根火柴。奇怪，上面一点反应也没有。莫非有诈？大家不禁起了疑心。尖兵又大着胆子划了第二根火柴。这时，城墙上终于有一个点着的香头扔了下来。虽然只那么一点儿火星，但多少双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暗号对上啦！爆破队员立刻去城门上安放炸药。其他人员也刀出鞘，弹上膛，做好战斗准备。紧接着城墙上放下两条绳子，只听张家兴压着声音说：“快上！”谢正义等三、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攀着绳子，腰一弓，爬上了城墙。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城门炸塌了。顶城门的碌碡也被掀出了几丈远。激昂的号声响了。大批战士不顾飞落的土块和木片，象猛虎一样冲进城去。霎时，枪声大作，到处都响起了“缴枪不杀”的口号声。敌人从梦中惊醒，操起枪就向外

跑。城墙上张家兴、武兴春、马德江三杆枪一齐开火，封住了营房门。这时，敌人乱成了一锅粥，冲出来的到处乱窜，没冲出来的被包围在营房里面，纷纷放下了武器，乖乖地停止了抵抗。

至此，战斗胜利结束。遗憾的是自卫队头子吕三义这只老狐狸没有落网。原来他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急忙跑到后院一间秘密的小房子里。房子里有一条通往城外的暗沟，他就从这里逃跑了。当战士们冲进他的住房时，发现只剩下几个文件包，一箱子弹和五条“七九”步枪。

这次战斗，打得干净利落，我方无一伤亡。除了打死的，活捉敌人五、六十名，缴获步枪六十多支，机枪五挺，手榴弹几百颗，子弹若干箱。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活捉了伪合水县派来的一个收款委员，获得了一批现成的钱粮衣物。就这样，合水最凶恶的一股敌人，最顽固的一个堡垒，终于被连锅端了。

（白新文 整理）

英雄团长马福吉

张应芳 马占彪

只要一提起“马团长”，南梁一带群众没有不知晓的。他的英名——马福吉三个字，象金子一样雕刻在华池县悦乐的烈士纪念碑上，闪闪发光。他的事迹也深深地铭刻在南梁人民心中，永远传颂。

马福吉生于一九一三年，原籍陕西省甘泉县，后迁居到华池县山庄车家砭。因家境贫寒，他的父亲经常外出给人做活，一次在山上被土匪拉住用烙铁烙了一顿，抬回家来不几天就死了。马福吉从小就给地主拉长工，受尽了折磨。有一次他去放牛，丢了一头牛，他怕地主毒打不敢回去，实在走投无路，就去找刘志丹参加了革命。刘志丹听说马福吉小时候就很勇敢，和孩子们玩石头仗时谁也打不过他，在孩子中很有威望，就让他带领少年先锋队。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可打起仗来挺厉害。马福吉带领他们打土豪、搞训练，以后这些人都成了陕甘游击队的骨干分子。

一九三三年，马福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游击队队长。一次，他带了八九个队员到一个老乡家去。大家正坐在炕上聊天，突然一伙敌人闯进了门，大声吆喝：“你们这些穷小子跟上共产党胡闹啥？快把枪缴了回家种地去！”一边喊叫一边把炕上的人拉扯下来往门外推。马福吉一看敌人太

多拼不过，冲又冲不出去，就在敌人和游击队员拉拉扯扯的当儿，趁敌人不注意装做下炕取鞋，腰一弯，头一勾，顺势把枪从炕洞里塞了进去。当他把鞋穿上站起来后，一个敌人拉住问他：“枪呢？”他回答：“我是刚来的，还没有发下枪。”敌人一看他年纪轻，就相信了，放他走了。

一九三五年，安塞、志丹、庆阳三个县的游击队合编为独立营，马福吉被任命为营长。七月份，他率领的游击队在陕西吴旗一带活动时，侦察到敌人高其宝、姚广堂的部队驻扎在一个山峁峁里，大约有八、九十人。马福吉命令游击队秘密向敌人驻地靠近。等到侦察员探得晌午敌人正在睡大觉时，马福吉带领游击队四面包围了庄子。开枪一打，敌人昏头昏脑地爬起来提着枪就往外跑，一场激烈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敌人死的死，逃的逃，投降的投降，光这一次，就缴获了四十多条枪。

当时，有个名叫宗文耀的人，原来是我游击队员，后来逃跑投靠了保安的敌人，还当了敌连长。我游击队员把这个叛徒恨得咬牙根，早就想打保安城了。一九三五年阴历大年三十那天，马福吉对大家说：“今天，敌人杀猪过年，我们也准备好，马上行军去保安杀坏狗过年。”游击队员一听要去打保安，个个精神振奋，摩拳擦掌。从顺宁走保安有一百多里路，可他们一夜就赶到了。走乏了，坐下歇一会，走饿了，战士们从口袋里掏出冰渣馍馍啃一啃。大家都说：“等把敌人收拾掉了再过年才有意思哩！”天麻麻亮，游击队包围了保安县，激战开始了。叛徒宗文耀一看游击队来了，知道是来找他算老账的，佯装打了一阵枪，就悄悄地溜掉了。敌人发现连长不见了，顿时乱了套。等到吃早饭时，保安县

就被游击队打开了。这一仗虽然没抓住叛徒宗文耀，但也打了一个大胜仗。战斗结束后，大家兴高彩烈地过了个年。

一九三六年七月，马福吉带着游击队来到环县境内，听群众诉苦说，庆阳三十里铺驻扎着六十多个敌人，为首的两个坏头目，一个姓陶，一个姓杜。他们经常带人到附近的群众家抢粮，抢物，赶猪捉鸡，骚扰得老百姓不得安宁。马福吉和游击队员们一听怒火冲天，当即就要到三十里铺收拾这伙坏蛋。老百姓告诉他们，敌人今天早起到华池五蛟抢人去了，马福吉当即决定抄小路去追敌人。快到晌午时，游击队终于追上了这股为非作歹的敌人。这时敌人已经跑到烂泥腰峁的一个山岭上，发现游击队上来了，架起机枪就扫。马福吉一看火力太猛，就思忖：“敌人全靠这挺机枪，如果把它搞哑，他们就不神气了。”就带着大家往上冲，又提醒大家集中打敌机枪手。刚冲到半山腰，敌机枪手就被我游击队员干掉了。山岭上的敌人一听机枪不响了，又见游击队象猛虎一样冲了上来，吓得乖乖投降了。

一九三九年，马福吉到延安抗大学习，学习期满后，回到陇东分区，任陇东分区独立团团长。

一九四七年三月，马福吉带领部队在华池县红土腰峁与国民党部队作战。战斗开始后马福吉亲临前线察看地形，不幸中了敌人的暗枪，壮烈牺牲。战士们高呼着“为马团长报仇”的口号，象突然爆发的山洪一样扑向敌人，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将马福吉抬埋在柔远城边的一个山坡上。埋葬的那一天，全团战士和附近群众都来参加追悼会。一整天哭声不绝，感天动地。

（秦梅整理）

孤胆英雄王玉成

杨子勤

一九四六年冬天，庆阳游击队出了一位叫王玉成的孤胆英雄，他的事迹轰动了整个边区。王玉成，当时三十二岁，中等身材，黑红脸膛，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闪烁着机智的光芒，显得英姿勃勃，气宇轩昂。他干侦察工作已有十三个年头了。

一天晚上，王玉成到敌占区什社侦察敌情，走到董家川时遇上了一股民团。敌人是到我边区进行骚扰的，有一百多人，还配有两挺轻机枪。那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双方在一个急转弯处一下子碰了面。王玉成凭着多年的侦察经验和高度的警觉性，立刻判断出对方是敌人。他清楚地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犹豫或迟疑，都会铸成无法弥补的大错，于是立即拔出手枪，朝敌人打出一梭子，转身跑了。敌人倒下了七、八个，其余的却在后面紧追不放。山路坎坷不平，七沟八岔，曲曲弯弯，即使在大白天也不好走，何况是在漆黑的夜晚呢？可王玉成有一套夜间侦察的特殊本领，三两下就摆脱了敌人。王玉成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路，回到解放区的田家胡同，在我联络人员汪天福家住下了。田家胡同距离赤城只有六里路，赤城有我们的区政府，周围还有民兵组织。王玉成以为到了解放区，已经把敌人甩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放心地喝了点水，吃了些干粮，就在汪天福家的牛窝里

歇息了。为了防备万一，他把枪套挂在墙上，把手枪抱在怀里睡觉了。

时间不大，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田家胡同也有敌人的密探。由于坏人的告密，一百多敌人摸黑赶来，很快把庄子包围了。汪天福家在沟边，三面临崖，一面靠沟，是个半明半暗的地坑院。临沟边有一道半人多高的护院墙，正好适合敌人架枪。

敌人包围了庄子以后，就朝牛窑打了几排枪，然后喊叫让王玉成缴枪。王玉成说：“枪在对面墙上挂着，你们打枪，我不敢过去，你们自己进来取。”几个敌人一步一颠，轻手轻脚地试探着往窑里走。走到门边，借着火光看见了挂在墙上的枪套子。敌人放心了，大着胆往窑里闯。第一个前脚刚迈进门槛，“啪”的一枪，就栽倒了。后面的一个拉着扑倒的同伙的脚把骨往后拽。“啪！”又是一枪，第二个敌人也倒下了。其他敌人全部退出了院子，躲在暗处乱放枪。转眼间，机枪、步枪，爆豆似地响成了一片，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往窑里扔。窑掌上拴的两头老黄牛早已炸成了牛肉丸子，窑门口的两具敌尸炸成了人肉臊子，窑帮炸了好些大窟窿，炕栏杆炸飞了，炕沿炸垮了。硝烟弥漫处，王玉成紧紧贴着山墙爬在炕上，紧握手枪，注视着窑外。

敌人折腾了大半夜，耗费了无数弹药，光退在墙外的弹壳就密密麻麻地铺了一层，手榴弹拉火线扔了一堆，以为炸得差不多了，又开始喊话，但窑里一直没有应声。一个敌人放大胆进了窑。“啪！”又是一枪，第三个敌人栽倒了。进院的敌人又一次退了出去，而且撤上了崖头。

这时，天色已经微明，东方隐隐约约出现了鱼肚白，西

峰顶上，冬雪罩地，露出云层的星星闪着寒光。

敌人气得发狂了。可也是的，敌人一百多人，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备，对付我们一个人，一支手枪，我们没受多大损失，敌人倒先死伤十多个，怎么能不恼羞成怒？

敌人疯狂了。他们停止了打枪，使出了非常恶毒的一招：从崖头打麦场上搬来了麦草，扔在院里，扔在窑门口，准备点火把王玉成烧死，即或烧不上，也要熏死。麦草已经堆得差不多了，正要点火的时候，我赤城区政府工作人员听到枪声，带着十三个民兵赶来了。他们半路上得到情报，知道敌人有一百多人，但重新调集兵力已经来不及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我们侦察员的生命危在旦夕，形势非常紧迫。同志们心急如火，焦灼万分。怎么办呢？！——也真是情急智生，大家立即合计出了一个疑兵之计。田家胡同是一条很深很长的胡同，十几个人分成三路，互相隔开一定距离，打起三面红旗，举得高高的，在深深的胡同里迅速奔跑。敌人只看到三面相隔很远的红旗飞快地移动着，虽看不到人马，却以为至少有三个连的兵力赶来增援，一时慌了手脚，连火也没有来得及点，丢下了十几具自己同伙的尸体，夹着尾巴狼狈逃窜了。

同志们扑进牛窑里，看见王玉成棉衣背部的棉花全部打飞了，浑身衣服成了烂絮絮，布条条，帽子也被穿了几个洞，奇怪的是王玉成的身上才仅仅擦破了几处皮。

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从此，孤胆英雄王玉成的名字，一下子就在边区传开了。他的英雄事迹鼓舞着边区军民英勇杀敌。

（乔金全整理）

我在电字战场见到了彭总

李 春 显

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我所在的西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突然接到了总部的紧急命令，要求我们火速赶到电字接应六纵队突围。我们从泾川县的玉都出发，星夜急驰，赶到电字参战。这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陇东地区的一次较大战役——电字战役。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在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遭受失败以后，调集二十三万人的兵力，由胡宗南指挥，对我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当时敌人的兵力十倍于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指示我们转入外线作战，主动放弃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毛主席曾用一句十分生动形象的话概括了我军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你胡宗南占领延安，等于啃了我们一块瘦骨头；我打你西安，就是吃你一条大肥牛。根据这一战略部署，我们四纵队和二纵队分兵南下，在短时间内打下了敌占区的军事重镇宝鸡，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同时还攻占了耀州、乾县等地，卡断了敌人自西安到陕甘宁边区的一条重要交通线。胡宗南在损兵失地之后才发觉了我军的战略意图，立即从秦岭、西安一线调集大批兵力尾追我们，又命马鸿逵、马步芳的骑兵从宁夏、平凉分两路向我军进逼。五月五日这天，奉命接应二、

四纵队回师的六纵队在屯字和马鸿逵的骑兵团突然遭遇，由于众寡悬殊，我六纵队被包围。二纵队赶到后又把敌人的骑兵团团团围住。不料从平凉扑上来的马步芳的几个骑兵团又在我六纵队外围设防。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敌我交叉互相牵制的混战局面。

经过一夜急行军，五月七日凌晨，我们四纵队投入了战斗，从侧背猛攻敌外围的骑兵团，激战一天，到天黑时终于把外围的敌骑兵打散了。二纵队和六纵队的同志们趁着夜色奋力突围，经过极其惨烈的白刃厮杀，二纵队夺路唐家塬，六纵队抽身捷池沟。我们四纵队也迅速经肖金向东撤走。当我们走出二十多里后，还听见原来的阵地上枪炮轰鸣，杀声不断。原来，我军的突然抽身，惹得胡宗南的一部分步兵和马步芳的骑兵团在屯字街南的张家沟打了起来。战士们庆幸地说：“黑灯瞎火的，正好让他们自相残杀。”

八日上午，我们行军到宁县九龙川的南面坡头上。忽听九龙川里枪声四起，原来敌人的一个骑兵团又尾追了上来，距离我们不到二十华里。在那里抵抗敌人追兵的正是总部警卫团。这些经过长征锻炼的老战士，以英勇顽强的战斗保卫着总部，保卫着彭德怀司令员。这时，我们团也接到了命令：就地构筑工事，阻击尾追的敌人。当战士们得知总部和彭德怀司令员还在后面时，既愧疚又激动，立即一字儿排开，挖战壕，筑掩体，临战前的紧张气氛又笼罩了全团战士。不一会，从坡下走上来一小队人马，共有二十多骑。虽然个个都是身披征尘，但阵容整齐，步伍不乱。其中就有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同志。彭总骑着一匹高大的骡子，帽沿略微掀起一点，脸色十分威严。踏上阵前，他轻轻勒了一下

骡子的嚼口，骡子站定了。随从的二十多骑人马也都站在彭总周围。总部的一位作战参谋和我们的团政委王学礼同志汇报了阻击敌人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彭总环视了一下荷枪实弹的指战员和正在构筑的工事，轻轻点了点头。彭总虽然没有说话，但他那临危不惧、从容镇定的神态，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大家顿时感到力量倍增，坚定了战胜强敌的信念。

在敌人还未扑到阵地前的短暂时间里，团政委王学礼同志抓紧时机向战士们作政治鼓动，他说：“目前，我们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形势确实是重兵压境。党中央、毛主席以无比的大智大勇坚守陕北，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彭总带领我们出兵陇东，也正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卫延安。现在，敌人对我们穷追不舍，总部的处境十分危险。我们一定要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战斗精神，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确保总部的安全！”团长郭永春同志接着说：“这场战斗明摆着是个敌强我弱的形势，要求全团拧成一股劲，奋勇拼杀，坚决把敌人顶回去！”

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敌人的骑兵横冲直撞。我们为了不被敌人拖住，只好边打边走。一路上，团长指挥着我们，一不走空旷地，二不进村庄（为的是不被敌人冲散，不为敌人包围），专拣胡同走。全团分成两个战斗队，列成整齐的方阵，替换着阻击敌人，替换着向后撤退。我们的战斗队每向前走出一二里，就立即在胡同沿上架设机枪，设置炮筒，摆开阵势阻击敌人，好让刚刚把敌人打散的另一个战斗队后撤。战士们伏在胡同里，敌人的枪弹打不着，马刀伸不进。等到他们摆开扇面形的队列冲到跟前时，我们就狠狠地射击

一通。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弹象火焰似地喷射出去。敌人的战马象受惊的兔子一样四散逃窜。就这样，敌人每冲锋一次，都要留下十几具人和马的尸体。敌人虽有数百匹“铁骑”，却只能在胡同两边的原野上撒野，始终不能接近我们。其中也有几次，由于路面平坦，没有胡同可以利用，敌人发疯似地扑过来，情况十分危急。指战员们立即就地卧倒，枪口盯着四面八方的目标射击，迫击炮的射手找不到依托，就跪在地上把炮端在手里打。不管敌人怎样冲杀，我们的方阵始终不乱。就这样边打边走，和敌人鏖战一整天，天黑时才到了良平。七团的指战员已经奉命在那里修好工事，替换我们。我们撤出战斗后一打听，总部和彭德怀司令员已经安全地到达旬邑县境。大家的心情才轻松了下来。

七团的同志们早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准备了充足的弹药，在那里以逸待劳。马匪军一踏进火力圈，就被我猛烈的攻势打得四散溃逃。七团的同志们立即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出十多里。跟在我们后面的“尾巴”终于被割掉了。

(张国焘整理)

一次难忘的会议

马得邦

一九四八年初冬的一天深夜，空旷寂静的毛井山区（位于甘、宁两省并红、白地区交界处）更显得安谧。星星点点座落在沟洼边的庄稼户早已沉浸在甜梦之中。偶尔传来的犬吠声，单调而烦人地回荡在山谷之间。

鸡叫三遍后，我住的窑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和呼唤声：

“马书记，快开门！我是车道区的交通员，送通知来了。”

我急忙披上衣服，翻身下炕，打开窑门。交通员不等我擦亮火柴，便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找了大半夜，总算找到了！我还得早点赶回去！”说完，转身走了。

我连忙点着油灯看通知。通知上写着：

“马得邦同志：

速率你区全体武工队员赶赴工委开会……。

艾青山”

在微弱闪动的灯光下，我认出这是工委负责人艾青山同志的笔迹。随后，我习惯地把它烧掉。

“马书记，有什么情况？”与我同睡的五名武工队员早

已醒来，急促地问道：“工委要我们立即去开会！”大家一听，听说要去工委开会，大家兴奋地迅速穿上衣服，带好枪支，并把住在别处的其他队员都叫来。十多个人挤满了我住的窑洞，一个个眨着朦胧而兴奋的眼睛望着我。

“我们要马上赶到工委去开会！”我对队员们说，“但是，因为对敌斗争复杂，情况多变，工委不能常呆一地。到底在什么地方，通知上没写，要我们去找！同志们，我们要做好吃苦和随时战斗的准备。”

经过紧张短暂的准备，天破晓时，我带着十多名武工队员，迎着冰冷的寒风，踏着陡峭而曲折的山路，奔赴工委常活动的地带。

我们时而爬上山岭，时而翻越深沟，时而又蹚过结了薄冰的小河。不多时，每个人身上都冒出了热汗。但是大家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尽快找到工委，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我们边走边探听工委的下落。可是从早到晚，我们在山里转来转去，整整一天也没有找到工委。天黑时，我们只好选定在一个名叫孙家峁峁的北山凹里露宿。

第二天拂晓，同志们起身后，活动活动冻麻的胳膊腿，抖抖身上的寒霜，又上路了。我们东沟进，西沟出，北梁上，南坡下，到处寻找，直到下午，终于在车道区郑峁峁找到了工委。

当联络员把我们带进工委住的院门时，正在小窑里看文件的工委负责人艾青山同志（回族）也看见了我们。他急步流星地赶出来，面带笑容地向我们问道：

“大家都来了吗？”

我紧走几步到他跟前，握着他的手回答说：“都来了！”

这时，工委的其他同志和队员们都相互握手，问长问短，彼此亲热地交谈起来了。战争年代，几个区的人在一起开个会，很不容易啊！一旦相会在一起，真如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亲热。

艾青山同志向工委游击队的一位同志交待了警戒任务，转身指着小窑洞，对各区的负责人说：“咱们进屋去，现在就开会！”

这是一孔又窄、又低、光线不足的小窑洞。土炕中间摆着一张小饭桌，我们十多个人围着小饭桌盘腿坐下。艾青山同志坐在炕中间，他望着大家说：“我们很长时间没在一起开会了。这次把同志们召集来，主要想听听半年来各区武工队开展活动的情况，分析和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然后讨论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还要传达上级给我们提出的新的战斗任务。”

艾青山同志刚一讲完，几个区的负责人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了汇报。大约有两小时，负责警戒的同志冲进屋报告说：

“山上哨兵发现几里路外，有十多个人朝这里走来。肩上扛着东西，闪着亮光。我们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群众扛着铁、镢头到地里劳动去，一种是扛枪的敌人。”

艾青山同志听后，立即命令说：

“挑选几名精壮队员，到近距离侦察清楚！开会的同志抓紧时间继续开会。”凑巧，房东大娘端来了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我们各区的同志都是兼程赶来的，路上哪里能吃一顿象样饭，肚子早已饿得不知饿了。这时，看到白白的面条，肚子里才咕噜咕噜“草起命了”。艾青山同志招呼大

家快吃，谁也不客气，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不一会儿，对面山后传来“叭、叭、叭”的清脆枪声。开会的同志霍地一声下了炕，提着枪冲出窑洞。

艾青山同志站在院子里冷静地观察着对面山上的动静。突然，一个队员喊道：“看！那边有人跑过来了，肯定是我们的侦察员！”大家朝那个队员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山腰拐弯处有三个人飞一般朝我们跑来。

来人是负责侦察的游击队员马占库等人。马占库满身血迹。艾青山同志抢上前扶着他。马占库右手提着枪，左手捂着流血的胸脯，面色苍白，很吃力地说：

“敌人来了，大约……有……一个骑兵团，……还有步……”话没说完，就昏倒在地。

“同志们，向后山转移，要快！”艾青山同志果断地下了命令，“马占库同志由其他人轮流背着，迅速撤退！”

这时，敌人也发现了我们，枪声象炒豆般直响，子弹“嗖、嗖”地在我们身旁落下。队员马占廷又中弹负伤。

艾青山同志看到敌人来势凶猛，情况危急，便当机立断，命令身体弱和受伤的同志先撤，其余同志利用山上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掩护撤退。

来敌据说是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还有环县的伪自卫队，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而我们只有一百二三十人，一挺轻机枪，其余都是“七九”、“三八”式步枪。兵力武器悬殊太大。但由于我们居高临下，同志们打得英勇顽强，特别是工委的老机枪手，他的点射打得敌人东躲西藏，象野猪般地在山底下嚎叫。加之山路崎岖，敌人地理情况不熟，因此，他们不敢盲目冒进。

当然，我们也没恋战，打了一阵，就迅速撤到另一个山头，边打边撤，直到夜幕罩住大地时，才把敌人甩到几架山、几道沟以外，到达窝城子。我们立即清查了人数，除前面伤的二人外，再无伤亡散失。马占库、马占廷二同志（堂兄弟）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光荣牺牲。听此噩耗，队员们个个悲痛地落了泪。尤其是工委和车道区的队员们，他们为失去朝夕相处的好战友放声痛哭。艾青山同志组织大家向牺牲的战友致哀。大家情绪激昂，决心要多消灭敌人，为战友报仇。

接着，我们各区负责同志又抓紧时间，继续召开因敌人袭扰而未结束的工作会议。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艾青山同志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发动群众，恢复和巩固我们的政权；消灭流窜匪徒，保护群众利益；待机集结，准备牵制敌人，配合我正规部队和敌决战。

“放手大胆干，敌人就要完蛋了！”艾青山同志鼓励大家说，“为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为了很快贯彻上级的指示，各区的同志要立即赶回本区开展工作！”

很快，各区的队员们都归队集中了，大家肩负着新的战斗任务，握手告别，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

为了开这次会，我们赶了两天路，牺牲了两位同志，多少年来，这件事一直在脑海里回旋，促使我更加珍惜今天和平、安定的工作条件，努力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负 伤 之 后

万 青 山

一九四七年九月初，中共宁县工委书记刘永培同志传达了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同志的指示，要地下党组织加紧活动，发展党员，壮大力量，宣传人民，瓦解敌人，和国民党反动派作顽强的斗争，推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

我当时是宁县工委副书记。工委召开了会议，结合宁县地下党的实际情况，对上级指示，做了详细的研究、具体的分工和布置。我带着工委直属武工队长王俊喜、战士刘振民、刘占荣、杨青山、组织部干部韩学静、郭联芳、工委通讯员刘平安等，一共十来个人，向武舍（即今宁县春荣）出发。因为当时一方面发现我们在武舍组建的一个地下武工队吸收的两个人尚未审查清楚，必须尽快审查处理，另一方面去向地下党组织布置工作。

当天下午吃完晚饭，我们到李十三家里，准备第二天行动。这里离盘克只有几里路，再往西南走，就是“扯锯”地区了。

李十三排行十三，家里有老母、妻儿、小女，因为平生好扶危济贫，补路修桥，故被周围群众誉为“善人”。这天，“李善人”不在家，只有李大娘及儿媳在家。李大娘五十多岁，大个儿，宽额头，满脸皱纹，一头银发，见人总是

笑咪咪的。她见我们来了，高兴地烧水做饭，问寒问暖，十分亲热。

谁知第二天天刚亮，哨兵就发现来了敌人。我们立即组织撤退。敌人向我们发起冲锋。敌众我寡，我们的十来支步枪和几支手枪压不住敌人，情势非常危急。但同志们面对顽敌，面无私色，拼死搏斗，终于突出了重围。

敌人并不甘心，紧接着又追了上来。刘占荣、杨青山接连被敌打伤。我恨不能一下子把敌人生吞活剥，一甩手，一梭子弹射了出去。扑来的敌人立时趴了下来。就在这时，我觉得腿一软，身子一歪，倒了下去。原来，我也被打伤了。三颗机枪子弹从我右膝盖和大腿上穿了过去，鲜血咕嘟咕嘟往外冒。我觉得一阵眩晕，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朦胧中，我听到几个敌人来到我面前。就在这时，一个敌人突然喊起来，“赶快走，前面打得正激烈哩！”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敌人远去了。

敌人还会来的，不能等死，只要还有一丝生还的希望，就要顽强地活下来，为死难烈士报仇。我脑海里浮起了这样一种念头，觉得浑身似乎有了力量，就用两只手和胳膊支撑着往前爬。每爬一步，伤口就象刀割一般的疼痛。爬着、爬着，来到了一个很陡的坡前，我用尽力气扒着光溜溜的坡面向上爬，连着爬了两次，都没成功。

“就这么等死吗？就这么永远离开培养我、教育我的党，离开同我风雨同舟、并肩战斗过的同志、战友们么？”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难过，几滴眼泪滚了下来。

突然，我想起了我的皮文件包，心中不由得登一沉，急忙四处乱瞅。瞅来瞅去，还是不见，我急得头上渗出了冷

汗。要知道，那里面装着宁县地下党的全部组织情况和三百多名地下党员的名单啊！

我狠命扒着坡边的小草，用左膝托着右腿，顶着地面，拼命挣扎了几下，终于爬上坡去。

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使我充满了必须生还的决心。我恨不能立即飞回到党的怀抱，把这一切报告给党，避免一场血腥的灾难。就这样，我爬爬停停，停停爬爬，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爬去……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看见一个赶着牲口的老汉扛着犁走来了。他见我血肉模糊，吓得愣怔怔的，半天也没说出话来。我的心里一阵激动，又昏了过去。

昏昏沉沉中，我听见有人呼唤，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烂窑里，面前放着三个蒸馍和一瓦罐米汤。送饭的乡亲见我醒过来，赶忙扶起我，递过来一个馍馍，笑咪咪地催我赶快吃，又捧着瓦罐给我米汤喝，同时还把我昏迷后的事简单向我说了一遍。

原来，战斗结束后，敌人向村里群众要人。群众说：“我们来时，就没有见到任何人，可能跑掉了。”敌人明知有诈，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抓了几个群众走了。

晚上十点钟左右，来了四个群众，把我放到门板上，抬起就走。不大一会儿，就来到了李大娘家。这时，我的大腿肿得罐子似的，撑得连裤子也脱不下来了。李大娘见了，心痛地几乎掉下泪来，连忙用剪子剪开裤子，用温水冲洗了我的伤口，又用土布把伤口裹了起来。接着又做了白面馍馍和米汤，切了些咸菜，让我吃。过了一会，她又用花椒、艾叶、葱胡子等，熬了一些药水，给我冲洗了伤口。

由于子弹打碎了膝盖骨，无法走动，因而大小便都得让人接。每当这时，我总觉得不好意思。然而，李大娘婆媳俩从不嫌弃。

第二天下午，刘占荣来了。一见面我就告诉他文件丢了，让他立即回去，叫“家”里马上通知地下党员提高警惕，迅速离开家，防止敌人搜捕，万一不行，要组织起来打游击，或者拉到解放区去。刘占荣见我伤势严重，不忍把我丢下。我说：“占荣，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你不能顾我一个，要顾几百名党员同志，你立即回去，把情况报告给地下党组织，要他们立即行动。这里有群众，不会出啥问题的。”刘占荣这才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第二天，我的伤势恶化了，肿得十分厉害，味道特别难闻。解开绑的土布，只见烂肉里生了很多蛆，白花花、乱撞撞的。李大娘急了，急忙用筷子一个个拨弄着往外夹。每一拨弄，我都疼得一阵哆嗦，豆大的汗珠渗了出来。正好这时李大娘的儿子“李善人”回来了，他连忙上山采来了羊哆罗草，晒干、碾细，撒到伤口上，灭菌杀虫。

在此期间，周围几家群众都争着给我送饭送菜。我从李大娘口里知道，他们都是革命军、烈属，把我当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看待。

第四天，组织上派人接我来了，决定让我转移到后方去。雄鸡刚刚报晓，李大娘就起来了，忙着给我拾掇衣服，准备干粮。天刚蒙蒙亮，同志们便抬着我上路了。李大娘和媳妇含泪送到村口，还不忍离去。李大娘撩起盖在我身上的被子，拉着我的手说：“娃娃，放心养伤去吧！等好了以后，一定来家里啊！”说着，已老泪纵横了。我心里一

热，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哽咽着说：“大娘，你放心，我好了以后，一定来看你老人家！”就这样，我和可亲、可敬、给了第二次生命的群众及李大娘一家告别了。不久，就来到华池县刘坪，见到了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和陇东分区司令员、陇东地委书记张仲良同志，终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的伤势很快好转了，又重新战斗在新的岗位上。

(杨志明 整理)

奇袭荔园堡

巩世铎 武敬东

说起咱南梁的革命斗争故事，那可真象那满山满洼的山丹花，数不清，说不完啊！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游击队员张生华满怀激情地说：咱远的不说，就说发生在荔园堡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儿吧。

那是一九三三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地上铺了一层寒霜，山风吹来，冷飕飕的。我正在家里吃饭，忽然听见有人叫我，出门一看，只见三个农民打扮的人迎面走来。

“张大哥，你好！”走在前面的青年人向我打招呼。

我仔细一看，觉得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

“怎么，不认识了？咱们在太白见过面。”说着，这个青年人机警地向四周看了看。

“在太白见过面？”经他这么一说，我猛然想起来了。

“认得，认得，快进窑里坐。”我招呼他们三个人进到窑里。原来，这个青年人不是别人，正是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段班长。我俩是在太白相识的。一次，我去太白镇赶集，在和别人闲唠的时候，他听到我是荔园堡人，就主动和我打招呼。他详细地了解了驻在荔园堡的陕北军阀张廷芝所属梁邦彦营的一些情况，又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说的

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我把段班长他们招呼到窑里炕上坐定以后，段班长给我讲明了他们的来意。原来，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准备收拾掉盘踞在荔园堡的梁邦栋这股敌人。荔园堡座落在白马庙川和玉皇庙川的川口上，是南梁一带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拔掉梁邦栋这个钉子，红军游击队就在这里站不稳脚跟。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南梁根据地的顺利开创和发展。听说红军游击队要打梁邦栋，我心里十分高兴。提起梁邦栋这个家伙，我们荔园堡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梁邦栋是陕北军阀张廷芝手下的一个头目，他在南梁一带的主要任务是给张匪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专和红军游击队作对。这家伙经常催粮要草，拉伕抓丁，还暗地里勾结土匪、流氓、强盗趁火打劫捞外快，祸害穷苦老百姓。我向段班长他们详细地讲述了梁邦栋一伙的活动规律和驻防情况，段班长听了很高兴。临走的时候，他一再叮咛，要我严守秘密。又说，“过几天后还有人来找你。”

段班长他们走后的第五天早上，突然有两个匪兵跑到我家里来了。我吃了一惊，还以为露了马脚，但随即就弄明白这两个敌人是在兵营里蹲无聊了，跑到我家里来闲聊。虽然，我很讨厌，但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便强打起精神和他们闲聊起牙来。闲谈中，敌兵示意我外面有了人。我转过身来向外一看，只见三个庄稼人蹲在门前树底下叭达叭达地抽烟。“是不是段班长他们来了？”我心里揣摩着，回头说了声“我出去看看”，便向外面走去。那三个人见我出来，一齐站了起来。高个子的叫道：

“张大哥，还认识小弟吧？那天晚上我们在转嘴子拈香

结拜兄弟，你告诉小弟，大哥家住在这里。今天，小弟跟这两个兄弟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大哥，见大哥家里有人，不便进来，小弟在这里等候多时了。”说到这里，那人压低声音说：“有这回事吧？”三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心里已经猜出了八九分，便有意提高嗓子说：

“哎呀，老弟，我只顾跟窑里那两个兄弟说话，没有看到你们来，快进窑里坐。”

那人道：“大哥家里有人，不进去了，改日再来拜访吧！”说完就要走。

我急忙拦住说：“老弟，你这么老远地赶来，不进去坐坐，我怎么能过意得去呢？那四个兄弟无事，他们就要走了，你们还是进去坐坐吧！”敌兵见我这么说，就灰溜溜地走了。

敌人一走，我们一起进到窑里。果然没错，这三个人正是我们红军游击队的侦察员，那个跟我称兄道弟的人是我们红军的连长，一个是红军排长，一个是游击队长。他们这次来的任务是侦察地形，确定作战方案。连长问我，怎样才能不被敌人发现，把敌人包围起来，全部消灭掉。我谈了自己的想法。连长听了以后，想了想说：“我们打算亲自看看，晚上就住在你家里，遇到敌人时，你怎么说？”我说：“就说咱们是姑香弟兄，你们是来看我的。”

下午，我从地里做活回来，连长他们侦察地形还没有回来，一直等到点灯时辰，才算把他们盼回来了。连长一进门就告诉我，他们要走了，我怎么也挽留不住，只好把他们送出庄外。

第二天，天刚一亮，我到对面山上去割糜子，快到吃早

饭的时候了，我捆了一捆糜子背下山来，刚走到半山腰间，忽然听到对面川台上有人大声喊：

“站住！站住！干什么的？”我一看，喊话的是敌人陆排长。只见这个家伙一手提着枪，一手拿着棍，饿狼似地向川道里三个背着背篓、拿着饭头的人扑去。我心里想，这三个挖药材的人又要倒霉了。无意中我又发现对面河畔上、川跟底下和山顶上出现了许多人马。准是红军来了，我索性把背上的糜子捆放下来，蹲在河畔上看起来。这时，敌排长已扑到那三个挖药材人跟前，大声问道：

“什么地方来的？”

“远处来的。”

“到什么地方去？”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敌排长一听这话，举起柳棍就想打。只见三个挖药材的人“刷”地一下从腰里拔出手枪来，喊了一声：

“不许动！”枪口对准了敌排长。

刚才还神气十足的敌排长，一下子就象放了气的皮球，柳棍和枪同时从手中掉落下来。这时，枪声大作，狡猾的敌排长大概看见了我们红军战士已将他们包围，没命地朝老洼沟逃跑了。

我一看嘉园堡，只见被包围起来的敌人象一群被围歼的野兽东奔西突，最后朝山上爬去，刚爬到半山腰，就被我们埋伏在山顶上的红军打了回来。这时，冲锋号响了。“冲啊！”“杀啊！”红军战士向敌人猛扑过去，在“缴枪不杀！”的呼喊声中，敌人一个个举起手来，乖乖地做了俘虏。整个战斗只打了吃两锅旱烟的工夫。三十多个敌人，除

那个排长外，没有一个漏网的。恶贯满盈的敌营长梁邦栋也被活捉了。荔园堡附近的老百姓听说消灭了这股匪徒，抓住了梁邦栋，都高兴地放下饭碗，跑出来看热闹。第二天，红军游击队在荔园堡的大场上召开了公审大会，一贯作恶多端的梁邦栋被五花大绑，押在大场中央。愤怒的群众想起这个家伙往日的累累罪恶，都恨不得上去咬他几口才痛快。大伙儿高喊着“枪毙梁邦栋！”“打死梁邦栋！”红军游击队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就地处决了梁邦栋，释放了愿意回家的俘虏，并向群众宣传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打富济贫、帮助穷人闹翻身的队伍，号召穷苦老百姓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从此，革命红旗插上了荔园堡，远近的土匪、民团、地主、豪绅，闻风丧胆。南梁一带出现了革命的新局面。

记徐治贵烈士

徐殿文

子午岭下，葫芦河畔，有一个普通的坟墓。它没有墓碑，也没有什么纪念物，只有绚丽的山花和绿茵茵的小草，把它装扮成了庄严肃穆的天然陵园。然而，每当寒食清明，人们却络绎不绝地去悼念。这位长眠者就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屈于反动派的淫威，不受敌人高官厚禄引诱，以满腔的热忱、精湛的医术，为陕甘工农红军伤病员治病疗伤，而被反动派活埋的太白人民医生徐治贵。

一八七三年隆冬腊月，徐治贵出生在四川开县一个三代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苦农民家庭。官府衙门的横征暴敛，土豪劣绅的巧取豪夺，封建军阀间狗咬狗的混战，弄得巴山蜀水满目疮痍、天府之国饿殍遍野，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八九九年初春，四川大旱，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给一家药店当伙计的徐治贵被无理辞退，无法养家糊口，只好带着弱妻幼子，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沿门乞讨来到合水太白。实指望跳出火坑，能吃饱肚皮，谁知大路小路千万条，却没有穷人走的一条道。来到太白，有山不能开，有地不能种，他只得给一家姓周的富户放牛。有一年，太白川闹猩红热病，群众无医无药，没钱请大夫，只能眼睁睁地等死。这一切，被徐治贵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决心用祖

传的土验方为群众治病。他在子午岭上放牛，看到满山遍野都是药材，便采集回来，熬成汤剂，送给几家邻居。不多天，病人都慢慢脱离危险。“徐治贵能看病，他的医术高明”的赞语，传遍了葫芦河两岸，徐治贵的名气也一天天大起来，四村五乡的百姓都纷纷找他看病。许多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也寄住在他家治病。他一时成了誉满山乡的名医。

一九三四年初春，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甘红军打了耀县，有十三名重伤员急需治疗。当时陕北红军里医生很少，药物缺乏，加之伤员的伤势一天比一天加重，必须尽快就医。三月初，习仲勋打听到徐治贵能接骨、能治刀枪伤，立即派王昌龄到葫芦河川寻找他，但没有找到。不多日，习仲勋打听到了徐治贵的下落，便亲自来到徐家，一进门就诚恳地说：“徐医生，我叫习仲勋，是共产党的干部。眼下部队上几个同志打仗挂了彩，请您到南梁为伤病员治疗。”徐治贵早已知道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刘志丹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他看来人说话和气，有礼貌，深为感动，收拾好了东西，就随着习仲勋上路了。

一到伤员住地，徐治贵饭也顾不上吃，就忙着给伤员治起伤来，三天三夜没眨眼。缺药品，他就上山去采。他用木瓜树皮、枸杞根皮、白鸡稍皮、椿树皮、五加皮、陈皮、喇叭杆皮、接骨草等当地产的中草药按土法制成接骨丹，再用鸡蛋青浸湿麻纸，涂上接骨丹药粉，包扎伤员的伤口。在他的精心治疗和热情护理下，一月过后，十名伤员伤愈返回了部队。

四月中旬，一个阴云沉沉的日子里，合水城的国民党匪军，由一个姓仇的团长带领，在伪保安大队大队长李鸿轩的

保驾下，化装成我游击队，打着红旗，戴着红袖章，沿着葫芦河，向我南梁根据地进犯。到了金寨沟附近，敌先头部队捉住了当地姓刘的一个口袋匠。李鸿轩花言巧语地问：“咱们的伤病员在哪里？敌人来了，伤员要赶紧转移！”刘口袋匠没有识破敌人的阴谋，把敌人带到了金寨沟。敌人一到金寨沟，就撕下了伪装，露出了狰狞面目，从病床上拖下尚未伤愈的两名伤员，绑架了徐医生和几名地方工作者。伪保安大队长李鸿轩歪戴着帽子，一把拽住徐治贵的衣襟，发疯似地嚎叫道：“你这个老不死的東西！去年腊月，老子派八抬大轿抬你你不来，你倒给共匪治起病来了！”徐治贵愤怒地骂道：“阎王不要命，小鬼不勾魂。你龟儿子能把老子生吞了不成！”仇团长这时皮笑肉不笑地说：“徐大夫，你给红匪治了多少伤兵？”

“两名！”徐治贵斩钉截铁地回答。

仇团长又问伤员：“你们有多少军队？”

“两名！”

敌团长又问地方工作者：“你们给红军干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干。”

敌团长见问不出口供，恼羞成怒，喝令匪徒严刑拷打，轮番审讯。被捆的同志和徐医生，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但是在毒刑拷打面前，徐医生和同志们正气凛然，威武不屈，异口同声地骂道：“要杀要剐由你们，想要口供办不到。”敌人无可奈何，就用黑毛绳把他们绑起来，押到了距南梁二十多里的阎孤子山岭上一个挖好的深坑前。敌团长亲手先把两名伤员推下坑，威吓徐治贵。

“最后给你三分钟。只要你愿意跟我们走，每月赏大洋

“旋风队”的故事

高文

高寒

“旋风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在陕甘红军和各路游击队中创建的少年先锋队。它的队员，全是十五、六岁的贫苦人家子弟。他们苦大仇深，爱憎分明，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行动机敏，犹如一阵“旋风”。因此，苏区人民把“先锋队”叫“旋风队”。

“旋风队”的故事，真象漫山遍野怒放的山丹丹花，数不清，讲不完。这里只说说庆阳游击队的“旋风队”在陇东的几个故事。

胆大包天

这是一九三四年深秋。

这天，金风送爽，云淡天高。庆阳游击队在队长张志孝率领下，来到陕甘根据地边沿的五蛟川。他们打算在五蛟休整几天。为了形成相互策应之势，决定游击队主力驻扎赵嘴子，旋风队到赵嘴子南面五里多路的城壕宿营。

“向前进，向前进，仇要报来冤要伸。我们是红色少年先锋队，扛枪为人民……”。旋风队队长刘占魁，带领三十几个小伙伴，一路欢唱着沿川而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城壕开去。

半路上，他们碰见一个慌慌张张向北跑来的老乡。

“站住！你跑啥呀？”

“你们是旋风队吧？”老乡端详着这伙脖子上系着红布条，掂着步枪、红缨枪、大片刀的娃娃兵，气喘吁吁地说：“城壕刚来了白军的三十几个骑兵，一色的大白马，新崭崭的马拐枪。老百姓都跑光了，你们快不敢下去了，也快跑吧！”

噢，这可是个意外的情况呀！小刘沉思了片刻，只见他拳头一挥说：“同志们，敌人刚来，脚跟还没有站稳，趁他还摸不清底细，咱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打吧！打吧！”

“队长，快下命令呀！”

旋风队员齐声呐喊着，一个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小刘象个老练的指挥员，命令分兵三路，自己和拴魁各领一个战斗小组东、西包抄，德魁带一个战斗小组正面出击，三面围攻敌人。

且说小刘和拴魁各领一个战斗小组，迅速爬上了城壕东边的旧城墙和西边的崖畔，居高临下望见敌人正忙着宰抢来的羊，杀抢来的鸡，乱成了一窝蜂。

这时，德魁带领的战斗小组也已摸近敌人，待命冲锋。只听小刘大喊一声：“打！”三路旋风队员一齐向敌人开枪射击，“机枪手”也点燃了洋快盒子里的鞭炮。

噼噼噼……嘟嘟嘟……，一阵激烈的枪声、鞭炮声，夹杂着“一营冲啊！”“二营杀啊！”的呐喊声，在城壕回荡，惊天动地。一时摸不清虚实的敌人，吓得象受惊的野狗一样，丢下到口的羊肉、鸡肉，抢着上马奔逃，窜进了西南

的一条山沟里。

小刘指挥旋风队员追歼逃窜之敌，恨不得把敌人那些好枪、好马一齐夺到手。可是，娃娃家的两条小腿，说啥也难撵上飞马奔逃的敌人。那十几条破枪也不争气，难以杀伤逃跑之敌。

旋风队员正在又气又恨的时候，只见逃敌中间一匹马挣断了肚带，马上的敌兵滚落在地。只顾自个逃命的敌人，哪还顾得管别人的死活。旋风队猛扑上去，活捉了这个敌兵，缴获了一匹好马，一支新崭崭的马拐枪。

这时候，张志孝带领游击队，闻声从赵嘴子赶来增援。他看着这伙胜利归来的“红小鬼”，真是又生气又疼爱啊！本来想狠狠批评他们一顿，却说了一句赞扬的话：“你们呀，真是胆大包天！”

追 叔

华池县西川，有个魏家圪瘩堡子，驻扎着陇东军阀谭世麟的祺风高民团。这伙坏蛋，祸害百姓，无恶不作，还常常骚扰苏区，和红军作对。刘志丹同志决定拔掉这个钉子。

一九三四年腊月间，红二十六军三团、抗日义勇军，还有庆阳游击队和数百名赤卫军，把魏家圪瘩堡子团团围困了起来。

一天拂晓，敌人施展“假投降”的诡计，冲出了我军的包围圈，向王桥沟里逃去。我军紧追猛打，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满山撵了馋羊。

祺风高有个传令兵路四，是本地人。他凭着地形熟悉，左拐右转，几下子就甩开了追击的红军战士。可是，有个小

红军一直盯着他紧追，怎么也甩不脱。干掉他吧，子弹早已打光了呀！

这个红小鬼，就是旋风队队员路魁。他是路四的亲侄儿。

一个前头跑，要逃性命；一个紧紧追，要捉俘虏。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路魁看得清清楚楚：逃敌是自己的亲叔叔。路四回头认得分分明明：追赶自己的是亲侄儿路魁。

跑了一阵，路四站住不跑了。他摆出长者的架势，喝骂道：“路魁，你瞎了么？他妈的，你撵得咋哩？”

路魁正色说：“这不明摆着么？追敌人，抓俘虏！”

“你放了四大吧！这搭没有旁人，咱爷儿俩各走各的路！”路四看硬的吃不开，又说软话来求饶。

路魁坚决地说：“你不缴枪投降，就是亲老子也不能要私情。”

路四一听，心想，要叫这娃顺顺当当放了自己没指望，就转身撒腿又跑开了。

这时，只听“噼哩啪啦”一声枪栓响，路魁把剩下的一颗子弹推上了膛，喝令道：“站住！再跑就开枪了！缴枪不杀！”

路四只得站住，乖乖地缴了枪，被路魁押回了俘虏群里。

路魁追赶、俘虏亲叔父的故事，一时在苏区传扬了开来。那些民歌手、社火头，还把它编成曲儿来演唱哩！你听——

红、白开火线，
侄儿把叔撵，

要把哪世事颠倒颠，这日子到底也不过得安稳。
哎哟哟，在这一条路走上一条路，是条路就往前走。
一心闹共产……。

捉 敌 探

这个故事发生在红军拔掉魏家圪瘩堡子民团据点的前夕。上元节，雪花纷纷扬扬。庆阳游击队奉命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围攻魏家圪瘩堡子，急行军来到了白草湾。这里一个没来得及逃跑的土豪，被旋风队顺手牵羊捉了起来。在这个土豪家里，他们发现一个奇怪的“叫花子”，穿得破烂肮脏，却被掌柜的视为贵客，同床而卧；讨饭吃，还引着一只黑狗娃。机警的旋风队员们，就把这个“叫花子”带回驻地审问。这时，夜深人静，一盏麻油灯若明若暗，旋风队员们板着面孔都不说话，窑洞里寂静得怕人。旋风队长刘占魁坐在炕沿上，盯着地下跼蹴着的“叫花子”和卧在讨饭婆子旁边的黑狗娃，凝神沉思——

前几天，刘占魁奉命带领继魁、申魁几个旋风队员，到华池县西川侦察敌情。他们从当地老乡口中得知，有个引着一只黑狗娃、背着竹篓子、自称姓张的宁州“叫花子”，是个伪装的敌探。这家伙以乞讨为掩护，常进入苏区，刺探情报，很受魏家圪瘩民团头子崔凤高的赏识。眼前这个“叫花子”，莫非就是他吗？

想到这里，小刘单刀直入地问：“你就是那个张讨吃子吧？”

“啊！不……就是！”这个“叫花子”先是一惊，很快又镇静地说，“是，是，小人姓张，小人姓张。”

“哪里人？”

“宁州。”

“噢，你和崔风高还是乡党哩么？”

只见那“叫花子”又是一惊，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

小刘紧接着又问：“你经常到我们苏区来吧？”

“是，长官！你们红军爱的是咱这号穷光蛋，去讨过几遭饭哩！”这家伙顺竿子就往上爬。

“崔风高给了你多少赏钱呀？”小刘依然平静地问道。

当下，这个“叫花子”慌了手脚，“扑通”跪在地上，连声喊：“长官，冤枉啊！你们可不能冤枉穷人啊！”他一边喊冤，眼睛却贼溜溜地盯着那个竹篓子。

这时，小刘走过去，抓起竹篓子底朝天一倒，“扑通”、“哗啦”响，里头的烟灯、烟枪、油纸包着的鸦片烟，还有小布口袋里的银元，全都落在地上。“叫花子”的面目被揭穿了。小刘威严地命令道：“把这个敌探推出去！”

旋风队员一拥而上，把这个“叫花子”抓起来就往外推，吓得这家伙连声喊叫：“红军爷爷，饶命！我说，我都说呀！”

这个家伙供认，他正是那个伪装成“叫花子”的敌探。头年秋天，他被崔风高从宁县收买来充当探子，曾多次到南梁一带刺探我根据地党政军情报。这次，他已经探得红军要围攻魏家圪塔堡子的情报，正要赶回去报告，不料却被神速而来的旋风队员抓获了。

第二天，旋风队员押着这个敌探来到寺儿岷。在围攻

魏家圪塔堡子的战斗打响后，他们接到上级立即处决敌探的命令。旋风队员们你扎一枪，我砍一大刀，霎时就结束了敌探的性命。

夜 哨

夜风卷着黄土、残叶一阵阵扑打过来。站在赴嘴子崖畔哨位上的银芳，揉揉眼睛，呵了呵冻得有些麻木的手，继续警惕地向四下瞭望着。

参加旋风队有一年了，可他还是头一回在夜间单独放哨。抬眼望去，那些黑黑的山岗、土墩、树桩，好象越看越大。有时，啊呀，好象还在动弹呢！还有，那黑古隆冬的草堆后边，圪坎底下，或是大路的拐弯处，仿佛随时都可能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人来……

看到这些，银芳的心猛地一缩，头皮一阵发紧，不由得攥紧了手中的马拐枪。别看他是参军一年的游击队战士了，可要是在爹妈身边，他银芳不过才是一个虚岁十四的毛头小子呢。

对面山嘴上的土寨子里，住着一营反动民团，两天前，被我红军、游击队团团包围了起来，成了瓮中之鳖。天黑前，红军首长命令各路部队加强警戒，严防敌人在夜间突围逃跑。对喽，夜黑乎乎的，部队都睡了，哨兵一不注意，敌人不就跑了？

银芳想起了队长送他上哨时的叮咛和自己做的保证。他紧了紧武装带，检查了子弹包里的子弹，心里说，一有啥动静，咱就鸣枪报警。哦，不对，银芳懊悔地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儿。发现情况，应该先问口令，连问两声对不上号儿，

那就“哗啦——啪——！”他默默地复述了一遍今晚的口令。

头顶的三星移至中天，半夜了。银芳禁不住打了个哈欠。他抖抖了精神，换了个瞭望姿势。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人声。紧接着，大路上出现了两条黑影，由远而近。

“谁？口令？”银芳鼓足勇气大喝了一声。

“站住！口令！”当银芳问了第一遍口令后，那两个人似乎朝这边望了一下，没有回答，照样往前走。银芳以为对方没听见，抬高嗓门喊了第二声，捺住心跳，等待着回音。

啊呀，不好！对方还是没有回答，照直往前走！哨兵的职责使银芳再也不能犹豫了。说时迟，那时快，“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

“啊！不要开枪，是我……”听见枪栓响，对面那两人同时惊呼起来。

就在这一刹那间，银芳听出：是李中队长和吴指导员！可是，晚了！几乎是在同一时刻，银芳的食指扣动了扳机。

“啪——！”枪口喷出一股火。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天哟！”银芳失声大叫一声，朝中队长和指导员奔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银芳脸色苍白，身上烧得烫人，好象是害了场大病，身子软得支不起架儿。

昨天夜里，他在哨位上开的那一枪，险乎儿伤着自己的战友。子弹从李中队长的肩膀上擦过，把棉衣冲了个窟窿。当时听到枪响，全队紧急集合，做好了战斗准备。银芳却吓懵了。他流着眼泪，等待中队长的处置。中队长呢，摸了摸那个弹洞，又摸了摸银芳的脑袋，说：“啊呀，小冒失鬼，我们还当你认出了呢。真玄乎！”接着，他叫人换下银芳的岗，命令他回去好好睡一觉。

可是，银芳咋能睡得安稳呢？

他头一回单独站夜哨就闯下了祸，在旋风队里掀起了一阵风波。队员们议论纷纷。卢来宝埋怨银芳太毛躁，就不会看清楚点儿？要是伤着了李中队长和吴指导员，看咋能得了！卢魁却说，银芳没错，是按哨兵职责做的。谁让李中队长他们不回口令呢！双方相持不下，各说各有理。总之，埋怨的多。嫌银芳毛手毛脚的，给旋风队丢了脸儿。

银芳闯了祸，心里乱得麻团儿一般，到这阵儿也不晓得哪对哪错了。他低着头抠指甲，一声也没喘。他是等着挨处分哩！

早饭后，只派了一个班监视敌人，全支队在赵嘴子的院里集合。队员们心里明白，准是为昨夜里那一枪的事。

果不然哩，你看游击队张支队长往队前一站，严肃地命令道：“第二中队队长李青山、指导员吴旺才，旋风队战士张银芳，出列！”

被叫到的三个人应声站到了队前。

银芳心里害怕极了。

再看看旋风队的战士们，一个个铁青着脸。这帮娃娃兵，别看他们背地里常打小内战，可到这时，一个心眼全向

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眼巴巴地盯着支队长，看他的嘴唇怎么动弹。支队长习惯地拉了拉帽沿，开始讲话了：“同志们，今天，支队首先对旋风队员张银芳同志，提出正式——表扬！”支队长把“正式”两个字拖得特别长，把“表扬”两字说得特别响。

队伍里一阵小小的骚动。银芳的脑子里嗡地一声，血直往脸上涌。支队长似乎没看到这些反应。他简要讲了昨夜事情的经过，然后有点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都是革命军人，大家都知道一个哨兵的责任是什么。站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一个中队，一个大队，几百号人的性命都在这一个人的裤带上拴着哩！更不用说，现在我们面前就是武装的敌人！些微的麻痹大意都会给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所以，我们说，张银芳同志虽然人小，却是一个可以放心的好哨兵。昨天夜晚，他那一枪打出去了，打得对，打得好！两位干部同志应当受到批评。现在，我再次郑重宣布：今后夜里站哨，一律认口令不认人，不管小队长、中队长，就是我这个支队长，如果答不上口令，你就当反革命的打，打死无憾！我们每个人都要向革命负责……”

听着支队长的讲话，全队的气氛一下活跃起来。旋风队员们中间，不知谁起了个头，竟噼哩啪啦地拍起手来了。这些红小鬼，他们是给支队长拍手呢，还是给银芳拍手，谁也说不清了。银芳只觉得胸中有一股热流在滚动。听到支队长讲到全队都要向小哨兵张银芳学习时，银芳的眼里滚出了

激动的泪珠儿。他怕别人看见，连忙埋下了头。

打那以后，从游击队到主力红军，部队转战南北，银芳站过不知多少次夜哨，也遇到过许多惊险的事儿。但是，他始终难以忘记这第一个夜哨。

撵不走的一块银元

柔远城西十里，有个名叫新堡子的小山村。村里住着一个姓高的贫苦老大娘。

高大娘为人厚道，贤惠热心，加上她的儿子路魁是旋风队队员，所以她家就成了旋风队员们常来常往的地方。大家叫他“红军妈妈”。

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夕阳西下时，刘占魁带领几个旋风队员执行任务路过新堡子，又来到了高大娘家。他们象回家看望亲娘一样高兴，人还没进院，就亲热地喊叫着：“干妈，我们回来看你老人家来了！”

高大娘笑呵呵地迎出门来，亲昵地叫着这个魁儿呀、那个魁儿呀的名字，指着这个说长高了，抚着那个说累瘦了，把个农家小院闹腾得喜气盈盈。

旋风队员们象往常一样，放下武装，就帮高大娘干活儿：占魁捞起扫帚扫院，拴魁、德魁挑起水桶下沟担水，振魁、明魁破柴，继魁抱柴，申魁烧炕，路魁只好帮娘拉风箱、烧火做饭……。高大娘又欢喜又心疼，边忙着做饭边不住声地说：“魁儿呀，跑乏了，快缓缓吧！”可他们谁也不吭声地干着，好象没听见。

月上树梢，吃罢晚饭，跑乏熬累的旋风队员都呼呼入睡了。高大娘心想，这些娃娃远离亲娘老子，头提在手里为穷

人闹翻身，光景再艰难，也得给娃们做点好的吃呀！她悄悄把家里两只大公鸡捉住杀了，满满的熬了一锅鸡肉汤。这才坐在小油灯下，给旋风队员们缝补烂鞋、破衣裳……

清晨，旋风队员一觉睡醒，高大娘就把香喷喷的鸡肉、鸡汤端到了他们面前，亲亲热热地叫他们吃喝了好上路。他们知道推辞也不顶事，端起碗唏哩呼噜吃喝了个干净。

临离开高大娘家时，刘占魁掏出一块银元，请大娘收下鸡钱。这下，可惹恼了高大娘。她生气地说：“我是做给我路魁吃的，亲妈给儿杀个鸡，还兴开钱吗？”

小刘说：“干妈，我们也都是你的亲儿呀！可这是红军的纪律，亲妈可不能叫儿子犯纪律！”

可是，高大娘就是不认这个理，说上九九八十一，就是不收钱。三推两让，惹得她真动了气，顺手捞起烧火棍，要撵旋风队员们快走。

小刘一看，计上心来。她给拴魁几个递了个眼色。他们几个就笑着跳着跑出窑门，嚷着逗大娘道：“干妈，你撵不走，就是撵不走！”

“你看我撵不了还怪哩！”高大娘说着就追出了窑门。小刘趁机把这块银元压在了枕头底下。

旋风队员叫高大娘“撵走了”。可是，晚间她一拉枕头，那块银元却滚落眼前。唉，撵都撵不走哇！

几年过去了，高大娘尽管家道贫寒，日月艰难，她却舍不得花这块银元。她说：“这是我亲儿们的心啊，留着是个纪念。”

——完——

李 炮 匠

武敬东 巩世伟

在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开创初期，有一个人们熟悉的红军联络员李炮匠。李炮匠的真名叫李青山，铁匠出身，原籍河南人，一九二〇年逃荒来到陇东子午岭山区。李炮匠刚来南梁时独身一人，他终年肩挑铁匠担，出没在方圆几百里的深山老林中，为庄户人家打铁锅、铁头，为猎户们修理土枪土炮。他的铁匠手艺很好，尤其善于修造枪械，当时南梁一带群众把枪称为“炮”，什么“盒子炮”、“十大响炮”等等，因而，人们都称李青山为“李炮匠”。

李青山生得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性情耿直，为人很讲义气。有时穷人请他打制铁器农具或修理打猎的土枪，如果手头不便，工钱可以分文不取。他常常为群众打抱不平，是一个铁铮的硬汉子。在南梁一带穷人中间很有威信。后来，李青山慢慢攒了一点钱，在年近四十岁的时候，才在南梁附近的九眼泉娶了一个姓史的穷人女儿成家落了脚。一九三一年前后刘志丹游击队在南梁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看准了李青山，发展他为红军的秘密联络员。他开始为党做地下工作。他一面暗暗为红军和游击队修理枪械，一面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鼓动穷人参加红军与地主豪绅斗争，还常常利用挑担串乡修造农具的机会，为红军游击队传送情报。

一九三二年，李青山接受了党的指示，以给阎家子赵富奎民团修理枪支为名，随时探听敌人内部情况，并乘敌人不注意的时候，把一些修制出的好枪送给红军游击队。赵富奎民团驻扎在阎家圪的一个旧堡子里，共有七十多个人，六十多支枪。这个旧堡子建在一个突出的山顶上，扼守着白马庙、玉皇庙两道川。堡子墙高沟深，里面备足了粮草，易守难攻。这支民团又是南梁一带人枪最多的一支惯匪，所以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疯狂地声言就是要和红军游击队做个对头。红军游击队早就要拔掉这个钉子，但若强攻，损失太大，一时不好下手。李青山在深入匪巢修理枪械的过程中，慢慢摸清了赵匪活动规律和他家里的一切情况，并把这些情况详细地向红军游击队做了报告。红军游击队经过周密研究部署，在一天深夜里突然袭击了赵富奎的家，抓住了赵匪全家十五口人，并派小股游击队流动射击，切断了赵匪和外面的往来以及堡子内的水源，迫使赵富奎先后交出了五十四支枪。赵匪乘一个雨夜狼狈逃窜到陕西保安县去了。

这年秋天，红军打下嘉园堡以后，南梁一带方圆近百里的土匪、民团被彻底肃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这时候，李青山便公开为红军修理枪械，同时继续兼做联络员工作。在这期间，李青山经常早出晚归，给红军修枪造炮，有时把白天未修好的枪拿回家里晚上修理。当他看到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迅速发展，极大地震动了陕甘两省的反动军阀。一九三四年三月，盘踞在陕甘边界的井岳秀、张廷芝、谭世麟等反动军阀纠集在一起，分九路发动了对南梁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我红军主力采取避强击弱

的战术，主动从南梁地区撤离，转移到陕北洛河川一带，在运动中打击敌人，只留下少数游击队原地坚持，牵制骚扰敌人。李青山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主力红军转移以后，李青山积极组织群众坚壁红军物资，四处打探敌人的情况，给红军游击队传递消息。

过了十多天，风声渐渐平静下来，原来离开村子的人也陆续回来了，人们猜想敌人大概不会来了。农历三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李青山头一个孩子满月的那一天早上，李青山的婆姨史春秀高高兴兴地蒸了一锅白馍，准备了一点酒菜，等青山干完公事回来，邀几个亲友邻居吃顿饭。她想，丈夫四十岁的人了，才得了这个孩子，也应当热闹一番。可是，一直等到半晌午李青山才回来，又没有请下人来，婆姨正在埋怨他，忽然，听见崖畔上有人喊道：

“李青山，红军回来了。”

青山一听红军回来了，顾不得吃饭就跑出去迎接红军，他的婆姨也随后跟了出来。李青山过了河，一走上大路，就发现三个骑马的人，衣冠不整，面带凶相，恶狠狠地扑了过来。青山一怔：“是敌人，不是红军。”他立即转身向路边地里的头牛娃子走去。

“站住！”青山正走着，三个骑马的人吼叫起来。他们跳下马背扑上前去，把青山围在中间，搜起身来。青山装在衣袋里跟红军联络的信条被搜出来了。敌人嚎叫着，把李青山捆了起来。这时，只见前川里烟山土雾，一大队人马涌了上来。原来，军阀仇良明带领国民党地方军一个团，突然向荔园堡扑来。饿着肚子的李青山，就这样被敌人卷在中间，连推带打地向上川拉走了。

仇良明这股匪徒来到南梁以后，很快下令把葛园堡、阎家坨、九眼泉一些村前村后的路都封锁起来。这里一岗，那里一哨，几面山头上都架起了机枪，戒备十分森严。接着，抢劫开始了。霎时，南梁天地象翻了个个儿。匪兵们象寻食的饿狗一样，闯进各家各户缚猪牵羊，捉鸡逮鸭。狗咬声、打骂声、哭叫声，各种家具碰撞粉碎声以及妇女的挣扎呼救声，响遍了周围几个村子。疯狂的敌人先后从南梁周围几个村拉了三十多人，集中到阎家坨村来。李青山也被敌人拉来了，关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窑洞里，整整一天一夜没有给饭吃。到二十九日，敌人对李青山开始审讯，要他说出红军游击队哪里去了，枪支零件放在什么地方。李青山面对这些吃人的豺狼，毫不畏惧，什么也不讲。恼羞成怒的敌人把李青山打得死去活来，没了人样。以后，又用烧红的烙铁烙，压杠子，灌辣椒水，什么刑都在李青山的身上用过了，几十次使他昏迷过去，但他对红军游击队的去向和枪支零件藏在什么地方一字未吐。李青山愤怒地骂着敌人：“枪炮我修过，我交给红军了，将来红军拿这些家伙要你们的狗命！”敌人一看见李青山身上得不到什么东西，又把主意打在李青山的婆姨史春秀的身上。李青山的婆姨史春秀看到丈夫被敌人拉走了，顿时感到天昏地暗，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一头栽倒在炕上，心里象刀割似地难受。她忽然想起，得赶快把家里机枪零件埋掉，免得被敌人搜出来知道了丈夫的身份。史春秀抱起机枪零件刚要往外走，就听见敌人吼叫道：“村民们注意！仇司令命令，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得离开自己的家……”史春秀知道出不去了，就赶忙把机枪零件埋到了锅台底下。这一夜，

史春秀没有合一眼。天刚亮，她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叫门。

“这是李炮匠的家吗？”门一打开，出现在面前的是三个敌人。敌人怎么知道丈夫是炮匠呢？史春秀预感凶多吉少，便横了一条心，站在炕栏坎跟前。

“李炮匠是你的什么人？”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

“他是我的丈夫，”史春秀冷冷地回答。

“你丈夫向我们说了，他是给红军游击队修制枪炮的，枪支零件都放在家里，叫我们来取，你把这些东西快拿出来吧！”那个军官模样的人说。

史春秀先是一怔，后来又想，青山一定不会给敌人说这些话的。她接着说：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丈夫说有，就叫他回来取吧。”敌人军官见这个婆姨没有上他的当，把脸一变，喝令那两个士兵说：“搜！”于是，箱柜被打开了，粮囤被翻倒了，被褥被摔出门外，屋里所有东西都被翻了个儿。敌人什么也没有找到，最后空着手走了。但是，李青山那个刚出世才一月的孩子，由于受惊受凉得了病。

中午过后，那三个敌人又到李青山家里来了。敌人军官恶声恶气地对史春秀说：“你丈夫是红军游击队的联络员，案情很重，如果你能说出村里谁是干部，谁是红军游击队的人，就可以保全你丈夫的命。要是不说，你丈夫就要上西天去了。”听敌人这样一说，史春秀气得直发抖。敌人还以为她怕了，接着说：

“害怕了吗？年轻轻的，死了丈夫，孤儿寡母怎么过活？我们仇司令说了，只要你谈出谁是村干部，谁是游击队，他就给你房屋、土地、牛羊……。”敌军官唠唠明明说

个没完。史春秀再也抑制不住了，她气愤地说：

“你们不要多费心了，我也没有这福分去领你们司令的情，谁是村干部，谁是游击队，你们自己去找，我一个也不知道。”敌军官听史春秀说完，忽地站起来，叫人把人带进来！只见四个彪形大汉，手里提着铁棍和钢丝鞭，架着一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老人走进来。史春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那老人是给红军游击队跑后勤的张老汉。敌人指着史春秀喝问道：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老人慈祥地看了史春秀一眼，摇了摇头。

“压杠！”随着一声嚎叫，张老汉被打倒在地，腿肚子上被压上一根铁棍，四条恶棍站在两头，使劲地压起来。只见两道血柱从老人腿肚上直往外溅。史春秀不忍看到自己人被敌人这样摧残，便低下了头。敌人军官一把抓住史春秀的头发，指着已经昏过去的老人说道：

“你是老实交待，还是学他的样子？”史春秀一声不吭。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地用钢丝鞭抽打她，接着用烧红的烙铁烫，最后威胁说：“如果你再不说实话，就把你拉出去枪毙掉。”史春秀被敌人折磨得几次昏过去。敌军官眼看捞不到什么了，才带着那群豺狼离开了李青山的家。敌人走后不久，李青山的孩子也因为病越来越重死掉了。

当天晚上，敌人把李青山和牛望合的侯福、靳家岔的杨二、冯连、白扬珍、二将川的梁老大、曹思聪等十六人，全都活埋了。据陪杀场的人回来说，这些先烈们在就义前还和敌人作着最后的搏斗。敌人用铁钎将他们砍下土坑里，他们爬上来，再砍下去，再爬上来，虽然他们的双手被绑着，但

是他们用牙咬，用脚踢，用头撞敌人……李青山连续扑上来几次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撕打，残暴的敌人把李青山用铁锹砍得昏了过去，才把他们活活地埋了。李青山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了红军游击队的秘密和枪支零件，对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头。

张景文在南梁

巩世伟 秦梅

一九三三年十月，刘志丹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从照金根据地出发，北上正宁、宁县、合水，一路上横扫陕甘边界的反动武装，顺利到达华池南梁一带（当时属庆阳县），第二次开辟了南梁革命根据地。从此，以南梁为中心，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就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红军回到南梁以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师委决定，实行军事斗争与地方工作同时进行的方针，建立和扩大陕甘苏区。随着陕甘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许许多多的革命青年纷纷奔赴南梁，参加革命斗争。

一九三四年初春的一天，从古都西安西城门里急匆匆地走出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他们都是中等身材，年龄大约二十六、七岁。男的黑黑的脸膛，手提一个沉甸甸的包袱；女的梳着短发，显得特别精神。他们肩并着肩，兴冲冲地一直往西北方向走去。这一对青年就是怀抱革命理想、准备奔赴南梁根据地去干一番轰轰烈烈革命事业的徐国连、张景文夫妇。徐国连、张景文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毅然离开了繁华的都市，撇下自己年幼的孩子，迎着初春的寒冷，翻了数不尽的山沟，穿过茂密的森林，越过冰冷的河水，历尽艰险，长途跋涉十多天，终于来

到了陕甘边苏区——南梁。当时，边区有文化的人奇缺。刘志丹、习仲勋等苏区领导看到张景文夫妇，如获至宝，立即分配他们搞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徐国连同志写一手好字，张景文更是女中魁元。她左右两手能同时挥毫，两手同写两行字，同起笔同落笔，所写文字的意思刚好能接上，博得了人们的赞扬。当时正值南梁第一个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张景文整天忙着写标语、搞宣传。她带领的宣传队唱革命歌曲，演剧，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宣传穷人受苦挨冻的根由，宣传穷人要想翻身、吃饱穿暖做主人，只有参加红军、起来革命的道理。许多原先被家务事拖累住的妇女，在张景文的影响下，也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出席大会的一百多名代表怀着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和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一起，民主选举出了以习仲勋为首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简称南梁政府）。在这次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张景文同志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职务。南梁政府成立以后，张景文同志更是以满腔的热忱，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大力宣传婚姻自由，宣传妇女放脚，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和工作。至今，南梁人们还记得张景文同志唱过的一首陇东“信天游”：“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头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

为了发展陕甘边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当时担任南梁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同志亲自发动群众在荔园堡的转咀子，办起了陕甘边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并派张景文和另一

名叫贺建德的同志担任列宁小学教师。

南梁办起了穷人自己的学校，这在南梁是破天荒的一件喜事。翻了身的南梁群众，用红布给孩子们缝书包，把孩子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高高兴兴地送他们到学校去上学。当他们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走进学校，听到张景文老师领着孩子们朗读“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的课文时，不禁热泪滚滚，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苏维埃政府。

列宁小学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只有两幢房子和一孔窑洞做教室。张景文同志带领六十多个学生，自己动手先垒土台，然后再支块木板，解决了没有桌凳的困难。为了使教材通俗易懂，张景文和贺建德除自己亲自编写外，还请南梁政府的一些领导人编写。比如政治教材有一段的开头两句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就是蔡子伟编的。课本不足，张景文同志就替学生抄。纸张、笔墨困难，她组织学生把大地当纸，用一根削尖了的柳木棍在地上写字。当张景文老师看到学生们有的在念“我爸爸是农民，在地里耕种；我哥哥比我大，拿刀杀敌人”，有的伏在地上用木棍一笔一划地写着“拿刀杀土豪，拿枪打白军”，有的拿着红缨枪、木刀操练的时候，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有一回，张景文老师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取出里面夹着的一张小孩的照片让学生们看。张景文给学生亲切地说，“这是我的孩子。再过几年，他就象你们这样大了，也可以上学了。做父母的心都一样，都想把下一代教育成对革命有用的人。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啊！”学生们齐声说：“老师，我们一定要好好用功念书，将来成为对革命有

用的人。景文，以甘肅及湘鄂兩省為一國，此，八平五三式

张景文上课时精神饱满，嗓门宏亮，对同学态度和蔼，讲课通俗易懂，深深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效果相当好。那时候，列宁小学里还有红二十六军三团的十二名先锋队员，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孤儿。张景文对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很关心，衣裳破了，她亲手一针一线给补好，手脸脏了她给洗净，甚至娃娃身上有了虱子，她晚上坐在油灯下一个一个给抓掉。孩子们都很喜欢她、敬重她。

一九三五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陕甘宁晋绥数十万兵力，发动了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与进犯的马鸿逵匪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战斗，于四月上旬主动撤离了南梁地区。南梁政府也随之迁到了洛河川的下寺湾。这时，列宁小学也停课解散了。张景文和在学校上学的红三团的先锋队员都跟着红军走了。她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对同学们说：“大家把仇恨记在心里，把课本藏起来，扛起红缨枪，和乡亲们一起同敌人作斗争。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学校也一定还会再办起来。”

张景文同志随南梁政府来到洛河川下寺湾后，仍然负责妇女工作。由于她性格活泼开朗，逢人爱说爱笑，平时光着脚丫穿着一双黑方口偏带鞋，到群众家里把鞋一脱，光着脚丫就坐在炕上同大家谈家常、讲革命，群众和游击队员都亲热地叫她“张放心。”

一九三五年三月，党组织派张景文的爱人徐国连回西安搞枪支。徐国连走到小石崖时，不幸遇到敌人，壮烈牺牲。张景文同志得到爱人牺牲的消息后，十分悲痛，她把仇恨记在心里，在艰苦的斗争中仍然夜以继日地积极工作。一

九三五年八、九月间，左倾路线波及陕甘边，张景文同志也因受诬被捕。错误路线还没有来得及纠正，张景文同志就含冤死去。几十年来，同志们对张景文同志痛悼不已。尤其是当年在列宁小学上过学的孩子，后来有的参加了红军，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参加了地方工作，其中不少人现在成为我党的优秀干部，他们对张景文同志的音容笑貌至今还记忆犹新，深深怀念。

机智勇敢的游击队长黄克秀

马振原 杜叶月

龙万福 王占彪

黄克秀，又名黄锁，合水太白人。他身材魁梧，聪明机智，打仗勇敢，一九三四年南梁政府任命他为游击大队队长，一九三七年游击队改编为红军后，黄克秀任红四团团长。同年，带领部队在东华池一带与敌张廷芝部队交战，不幸阵亡，黄克秀牺牲距今已四十多年了，但关于黄克秀为革命英勇奋战的事迹至今还流传在群众中。

巧 夺 机 枪

故事发生在现在的华池县元城公社。黄克秀游击队刚成立那时，枪弹十分缺乏。战士们爱枪如爱命，都想得到一支枪。但枪怎么来呢？最好的办法是从敌人手中夺取。

一次，黄克秀和几个同志下山执行任务，发现敌人在操场上练兵，各种枪一排一排地架在那里，真是爱枪！“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不夺他几支呢？”黄克秀心里暗暗拿定了主意。完成任务返回的路上，黄克秀向同志们讲了自己的计划，大家一听都非常高兴，决定按他说的那样下手。

黄克秀让几个同志在山腰上隐蔽埋伏下来，自己换了便衣，游游荡荡地走下山来，慢慢地接近架着枪的操场。这

时，敌人正在操场另一边嘻皮笑脸地哄闹，见来了一个老百姓，谁也没在意。黄克秀装出看他们做操的样子，不慌不忙地走近了架枪的地方。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黄克秀猛地抱起一架机枪转身就跑。敌人发觉有人抢走了机枪，急忙大喊，气急败坏地追了上来。黄克秀在前面跑，敌人在后面追，一直追到山底下，敌人怕中我军埋伏，乱七八糟地打了一阵枪，垂头丧气地回去了。从此后，游击队有了第一挺机关枪。他们用这支枪消灭了不少敌人。

包 围 战

一九三五年七月，黄克秀游击队行军走到陕甘边界的白宝净整坪一带时，突然发现从山坡上走下来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敌人。游击队回避到隐蔽的地方商量，觉得自己虽然武器差，子弹少，但有五、六十人却占优势，一定能把这股敌兵收拾掉。黄克秀命令一排悄悄地从山后绕过去，他带着二排埋伏在山脚下。那伙敌人东摇西摆地快要走下山时，黄克秀把上衣脱掉，向上一甩，光着膀子举枪大喊一声“缴枪不杀！”迎着敌人冲了上去。平时，远近的敌人都被黄克秀游击队打怕了，今天这员猛将出其不意地闯到他们面前，把敌人吓得筋骨松软，浑身哆嗦，一面回枪一面连滚带爬地往山上退去。刚退到山顶上，山后的游击队员也冲上来了，迅速将敌人包围起来。黄克秀向敌人喊：“看你们还往哪里逃！”敌人一看无路可走，乖乖地缴枪投降了，一个没漏掉。这一仗，游击队缴获了二十几支马步枪、三把手枪、还有一挺机枪呢！

“咬掉敌人的尾巴”

还有一次，游击队在黑城岔、天边城一带活动时，发现敌人的大部队在行军。游击队隐蔽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密切注视着敌人，见先过去了一个骑兵团；过了一会儿，又过去了一千多步兵，又等了好大一会儿，游击队正要起身走时，突然发现远处又开来了大约一百左右的敌人。游击队员早就忍耐不住了，嚷着要冲上去干一仗。黄克秀对大家说：“不要急，我们虽然也有百十个人，可是子弹有限，等敌人走近了，咱一步冲到敌人面前，一枪就能打死他一个。你们看见了吗，对面有个山沟，我们把敌人赶下山沟去，把敌人这个尾巴咬掉！”大家一听是好主意，就耐心地等待着。不大一会儿，敌人耀武扬威地走过来了。他们以为前面的大部队离他们不远，不会有游击队找他们的麻烦，谁料到游击队恰在这时冲到了面前。敌人吓慌了，连忙拼命抵抗。可是游击队员在黄克秀的带领下，一个个象下山的猛虎一样勇猛，敌人招架不住，终于钻进对面的山沟里。敌人死的死，逃的逃，来不及逃跑的连忙缴枪投降。游击队员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四十来条枪，心里又高兴，又佩服黄克秀指挥有方。

截 粮

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一个上午，游击队得到可靠情报，敌人从合水蒿咀铺押送十三马车粮食送往太白。黄克秀想，粮食是人民的血汗，绝不能让敌人吞掉，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粮食截回来。黄克秀立即带着六、七十名游击队员赶到路旁埋伏下来。当敌人的第一辆马车驶过来时，游击队员突然从路旁

闪出来活捉了赶车和押运的敌兵，然后分出几个人来将马车拉到山后，把粮食卸下来驮在骡马背上，驮不完的人扛，迅速转移了。第二辆马车过来又是如法炮制。三辆、四辆……，游击队就这样顺利地截取了粮食。敌人的第十三辆马车远远驶来时，车上押运的敌人察觉到有点不对头，但是想跑已来不及了。游击队从路边冲了上来，活捉了敌人，卸掉了最后一车粮食。敌人总部得到十三辆马车粮食一粒不剩地都落到了我游击队手里的消息后，气急败坏，连夜出动大批人追赶，可是我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了。

巧收敌枪

一九三七年四月的一个漆黑夜晚，子午岭下，曹家寺一家大院的中间窑洞里，灯火通明，人声喧闹，“高升”、“五魁”的狂呼乱叫声不时划破寂静的夜空。坐在一张八仙桌边喝酒的这四个人，是前不久由东北军逃兵组合的一股土匪中的留守人员。其中一个叫王丑娃，是专给土匪供粮草的，一个叫夏老七，是土匪中的大管家，另外两名是叛变革命投入土匪怀抱的孬生。这当儿，大批土匪外出抢劫未归，他们四人坐镇大本营，寻欢作乐。正当酒过三巡，人醉七分之时，只听窑门“嘭”一声被推开，猛地闪进五个人。为首的一个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左手插在腰间，右手举着一支乌黑发亮的驳壳枪。

“不许动！”这一声似晴天霹雳，四个匪徒吓得一个个索索打颤，活象散了架的泥胎。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红四团团长黄克秀。

前一天，黄克秀就得到了这三百多名匪徒在西华池打家

劫舍，抓走五名商人的情报，于是，他亲自带领一个连，从店子安吉来到了曹家寺。

“老实说，你们打劫的财物，抓走的商人都在啥地方？”黄克秀大声喝道。

“在，在……在陈家庄。”王丑娃上牙打着下牙，结结巴巴地说。

“多少人看守？有多少支枪？”

“二十五人看守，二十五条长枪，一把手枪。”

黄克秀稍加思索后，转脸问夏老七，“你们说的都是实话？”

“有半点虚假，你枪毙了我！”夏老七竭力表白着。

黄克秀唰地一下掏出手枪，把王丑娃和夏老七推出门，“走，给我们带路！”

黄克秀带着一连战士，押着王丑娃等四人，不一会儿就到了陈家庄。夏老七对黄克秀说，人和枪都在中间窑里。黄克秀观察了一下土匪住的那孔窑洞和四周的地形，立即命令二排占领崖背制高点，一三排把窑洞团团围住。战士们刚登上崖背，就被敌哨发现了，窑里的土匪听见哨兵的呼喊声，立即熄灭了灯，乱七八糟地朝外打起枪来。战士们相继开了火。激战十多分钟，土匪们主动停火，向外喊话：“哪一部分的？”

黄克秀说：“红四团的！”

土匪们早就知道红四团的厉害，知道顽抗是没有出路的，便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武器。

窑洞里的灯亮了，姓孙的土匪头目把枪收起来，绑好后叫两名士兵抬到了院子里。黄克秀上前一查看，缺一支手枪，

就大步流星地进入窑里，对姓孙的说：“枪数我们都知道，还缺一支手枪，不交不好嘛！”

孙头目哭丧着脸说：“我该死！我该死！”边说边从炕洞里刨出那支手枪，交给了黄克秀。

黄克秀对土匪们说：“你们交了枪，再不能打家劫舍，愿回家的，给足路费；愿参加红军，我们欢迎！”土匪们连连点头，表示愿意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随后，黄克秀枪毙了王丑娃和两名叛徒，救出了那五个商人。

激战豹子川

一九三七年端午节前一天，红四团奉命前往豹子川消灭一股土匪。战士们冒着倾盆大雨，从合水店子堰出发，经过四昼夜急行军，来到了豹子川一个叫雷窑子的小山村。看样子，这里好像刚遭土匪抢劫，村子里空无一人，十分冷清。不一会儿，侦察战士发现水洞里藏着一个三十开外的男人，叫来一问，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哭。黄克秀见这人背上的皮被烧伤了，满脸血迹，估摸一定是受了别人的毒打，就和蔼地说：“老乡，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专来打土匪的。”那人用怀疑的眼光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黄克秀，当他看到黄克秀帽子上闪闪的红星之后，猛一下跪倒在地，放声大哭了起来。原来，这个伤痕累累的人，是雷窑子村的王老大。昨晚土匪抢劫时，杀了他娘，他也被土匪抓住用酷刑拷打，后来乘土匪做饭时逃了出来。红军战士看了王老大的伤痕，人人摩拳擦掌，个个怒火满腔，表示要坚决消灭土匪，为穷苦人报仇。

部队在这个老乡的带领下，来到一个山岭，发现沟底石崖下冒烟，再一侦察，发现敌人正躲在石崖下面。黄克秀当机立断，命令二连从两侧迂回包围，一连正面出击，自己带领侦察队从山顶攻击。刚到半山腰，匪哨发现有情况，十多名土匪持枪冲了上来。黄克秀举枪击毙了两名带头的。石崖下的匪徒听见枪声，一齐开了火。双方激战半个小时，三百多名土匪招架不住，向密林中逃去了。黄克秀命令追击。敌人爬到半山腰，发现追击他们的人不多，立即反扑下山，企图包围黄克秀带领的侦察队。恰在这时，二连的战士冲了过来。土匪们一看大势不妙，纷纷丢下武器，向丛林中逃去。

这次战斗打死敌人三十多名，活捉三名，缴获各种枪四十多支，十多匹布，还救回了三个被土匪抢走的妇女。

逃走的土匪被红四团这么一打，如惊弓之鸟，无处敢停留，加上缺粮，日子无法过，只好悄悄埋了枪，散伙了。这一带从此才算安定了下来。

血染老爷岭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红四团奉命开赴东华池，阻击土匪张廷芝部队向陕北流窜。战士们冒着滂沱大雨，从葫芦城出发，急行军两天两夜，到达了东华池的玉皇庙。张廷芝部素知红四团的威名，双方一接火，敌人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特别是敌团长李向银被击毙后，敌人便丢下了十多具尸体，狼狈地逃跑了。

七月二十二日凌晨，红四团在老爷岭追上了敌人。黄克秀亲自带领几名连长，冒雨查看地形，安排部署兵力。

十时许，战斗打响了。黄克秀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亲

自率领先锋连，向盘踞冬耳梁的敌司令部发起冲锋。战斗一阵比一阵激烈，两个多小时后，红军战士舍生忘死，一连攻下了四个碉堡，摧毁了敌人的防线。张廷芝的指挥部设在最高处的第五个碉堡上，距我方的阵地不到一公里。但通往敌司令部的一线之路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了，尤其是敌人暗堡中的一挺机枪，哒哒哒地叫个不停。冲在前面的战士接连倒了下去。黄克秀胸中怒火燃烧，连续三次亲率通讯班和警卫班去拔这颗钉子。在第四次攻击中，黄克秀巧妙地靠近敌堡，终于炸毁了它。在轰隆隆的爆炸声中，部队向敌人指挥部发起了总攻。不幸的是，在距敌指挥部三百米的地方，敌人罪恶的机枪子弹射中了黄克秀。黄克秀英勇地牺牲了，年仅二十六岁。

(秦梅、徐殿武、高仲选整理)

人民重生亲父母

高 文

同志，您读过陈毅同志的《赣南游击词》吗？您听——
“依靠人民，
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这军民鱼水深情凝成的诗句，是多么真实地重现了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和子弟兵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难忘岁月啊！

在陇东老解放区，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可多哩。这里说的只是发生在华池县的几个故事。

李德贵一家舍身救亲人

一九三五年春天，蒋介石调集数万敌军，向陕北和陕甘边苏区发动了疯狂“围剿”。为了主动有力地打击进犯之敌，我红二十六军在迎头痛击进攻陇东根据地的蒋马匪军之后，主动撤离南梁，转战陕北去了。

这时，李培福同志率领的庆北游击队，奉命留在华池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农历四月初的一天早晨，马鸿逵匪军的一个骑兵团，突然直扑李培福游击队所在的夏家沟李嘴嘴。多亏游击队人熟

地熟，依靠群众掩护，迅速转移出庄，朝黄原去了。

“白军进庄，百姓遭殃”。马匪军一进庄，就挨家挨户搜查游击队，霎时把李蹦蹦闹得鸡飞狗叫，哭喊连天。马匪营长马振川，带领几个匪兵，直奔李培福刚离开的李德贵家，把他老俩口和儿子、女婿、女儿都堵在一孔窑里，凶恶地逼问李培福的去向。

看来，敌人是专门为捉老李和游击队来的。李德贵心想，哼！你大早走了，再凶也不顶啥。便不紧不慢地说：“李培福嘛，听说过，可没见过。我个庄稼汉，和他们没粘头！”

可是，游击队坚壁在崖畔烂窑里的红缨枪，这时让四处搜寻的匪兵翻出来了。马匪营长一见，气得满脸横肉乌青，扑上去就打李德贵，喝问：“游击队，李培福哪里去了？”

李德贵见敌人抓住了一点把柄，便不吭声，只盼老李带上游击队快走，一路平安。

忽然，恼羞成怒的匪营长一条毒计闪上心头，指着李德贵的独生子李学中和招赘女婿毛天河吼道：“说，这两个谁是李培福？”

李德贵一惊，可还是一声不吭。和这些畜牲没啥说头呀！

李大娘见这伙匪徒要在亲娃和女婿身上下毒手，慌得连忙求告：“好我的天爷哩，这是我娃我女婿呀，真是我娃和女婿啊！”

马匪营长见揪住了李大娘的心头肉，狞笑一声，问道：“快说实话，李培福在哪里？”可谁也不开口，把匪营长气得象恶狼一样嚎叫：“把两个崽娃子绑起来，连老家伙也绑

起来，都是李培福！”

几个匪兵一拥而上，把李德贵父子和毛天河一齐捆了起来。这时，一直闷头没吭声的李学中、毛天河，却破口大骂起来：“贼娃子，老子就是李培福，要杀要剐都由你，头割了碗大个疤疤！”

马匪营长气得暴跳如雷，连连吼叫：“打，给我往死里打！铁口也要撬开来！”

穷凶极恶的匪徒，把李德贵父子三人拉到三个地方，分头酷刑拷问。敌人把什么“扯长面”、“十指绞”、“老虎凳”、“压杠子”等酷刑全用上了，也没有从李德贵一家人嘴里掏出一个字。

匪徒们折腾了半天，没有捞到一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就把李德贵父子三人一齐抓走，还抢光了李德贵家的牛、驴和财产，窜回驻地柔远城子去了。

第四天头上，李大娘母女俩正在忧伤的时候，女婿毛天河逃回来了。从女婿口中得知，儿子李学中不甘忍受敌人的凌辱，半路上跳崖摔断了腰，敌人还是把他连拖带拉弄进了匪巢。老伴李德贵被拉到柔远城子后，又被马匪多次悬梁吊打。头天夜里，毛天河磨断绳子逃跑时，李德贵、李学中父子俩被敌人折磨得已不能动弹，只好催捉他一人逃出虎口。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李大娘和女儿、女婿，天天望眼欲穿，盼着亲人回家团聚。可是，传来的竟是叫人肝肠欲断的凶音：独生子李学中，被马匪当作“李培福”在环县杀害了；老伴李德贵，也被马匪当作“李培福”，押送到西安去请功领赏，关进了集中营。

西安事变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李德贵才

被我党营救出狱。他一家舍生忘死掩护的李培福等同志，象亲儿子一样经常上门向二位老人问安，照料生活。更使老人欣慰的是，李培福同志处处以人民儿子的身份，为人民群众办了数不清的好事，逐渐成长为党的一位优秀的干部。

张兴政草药杀蛆医伤员

一九三六年，快搭镰割麦的时候，工农红军西征出师告捷，全歼了盘踞陇东曲子城的马鸿逵匪帮的一个旅，活捉了号称“常胜将军”的敌旅长“野骡子”冶成章，打了一个胜仗。

华池县悦乐区六乡，有个叫张兴政的贫苦农民。突袭曲子的一支红军部队，就是他带的路。曲子战役结束后，有一批红军伤员需要送到根据地后方医院去治疗，他又参加了转移伤员的担架队。

五黄六月，酷暑逼人。张兴政和大伙儿，天天起早贪黑，抬着伤员翻山越岭，累得汗水湿透了布衫，压得肩上的肿疙瘩生疼，脚上打满了血泡，可谁也不哼一声，咬着牙一股劲向东赶路，只盼把伤员们早日送到医院治好伤。

这吃苦受累嘛，张兴政自幼儿就苦惯了，咬咬牙还能撑得住。只是有一件揪心的事儿，真叫他受不了。

啥事呀？这就是，大热天，伤员们的伤口都化了脓，讨厌的苍蝇跟着担架嗡嗡乱飞，不少伤员的伤口还生了蛆，乱格攘攘地乱爬乱钻，只疼得有些伤员不住声地呻唤。有些性子硬点的，咬紧牙关不吭声，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伤势重的，疼得昏迷不醒。那时候，红军的药品缺得很呀，跟随的卫生员干着急没方子，只好陪着伤员滴眼泪。

唉，天爷呀，这可咋办哩？张兴政心里好比刀搅一样难受。他猛然想起，羊被狼咬伤了，伤口生了蛆，庄稼汉就用“羊角落蔓”根的皮皮，焙干研成细面面，杀蛆贴伤很见效，这也许在人身上也能成哩！

太阳压山时分，担架队在一个小山村里宿了营。张兴政照管自己抬的伤员吃喝罢，向房东借了一把锺头，一个人悄悄上了山。只见山上满崖畔长的都是“羊角落蔓”。他抡起锺头，一阵阵就挖了十来条“羊角落蔓”根，抱回去剥下皮皮，焙干，研成细面面，先给自己抬的那个伤员的伤口上贴了些，把剩下的都包起来揣在怀里。

这草药贴上后，那个伤员夜里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清早起来，张兴政赶忙去看，那伤员伤口里的蛆不见了。走在路上，伤员也不再喊叫伤口疼了。晌午歇下来，张兴政细看那伤员的伤口，伤势比先前轻得多了。那个伤员高兴得吆喝了起来：“快来看哟，我的伤叫这个老乡治住了！”

这一吆喝，担架队员和伤势稍轻点的伤员，都围过来观看。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这草药还真顶事哩！咱们都贴吧！”张兴政就把头天晚间研好的“羊角落蔓”药面面，分散给担架队员和卫生员，给伤员们都上了药。这下，把蛆才给治住了。伤员们的伤口也开始慢慢往好里长着。

一路上，伤员们都念叨着张兴政的良药。只要见了他，都开口先称呼“张军医”，再和他拉几句亲热话。

几天后，这批伤员被送到了红军后方医院。他们把“张军医”介绍给了部队医院的医生，再三说：“多亏这个张医生，救了俺们的命！”

高春岳拾枪献给子弟兵

一九三八年深秋，八路军的一支剿匪部队，在华池县烂泥峁峁，将流窜于华池、环县交界山区、无恶不作的杜成璋民团，打了个落花流水。没有被击毙的匪徒，溃逃到七、八里路以外的阳砭村赵家湾，又遭到我追击骑兵的迎头截击，也全部被活捉、俘虏了。

几天后，阳砭村的贫苦农民高春岳到赵家湾放羊，在狼牙刺梢子林里拾到了一把盒子枪。他心想，这准是那些土匪藏下的，说不定还有哩！他就又在荒草、梢子林里仔细搜寻了起来，果然又找见了两支七九步枪和一支马拐枪。

这一下，可把高春岳高兴坏了。没等到天黑，他便背着四支枪，吆喝连天地把羊吆进了圈。一进院，他就吆喝道：“娃他娘，快看，我拾下宝贝了！”

高大娘正在忙着做晚饭，听到老汉说拾下宝贝了，就迎出门，一见老汉肩上的枪，忙问：“哟！哪来这么多的枪呀？”她惊得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不知该咋办好。

“赵家湾拾下的。”高春岳笑呵呵地说，“准是杜成璋那些土匪藏下的，他们还想再起窝子哩！”

“快给人家原地放回去，庄稼汉要这干啥，小心惹下麻烦！”高大娘有点胆怯。

“给他放下去？叫他再拿上欺负老百姓？”高春岳说，“咱可不能这么干。这家伙可值钱着哩？快做饭，吃了再说。”

晚饭吃罢，高春岳和老婆商量，这几杆枪嘛，要捣弄出去

卖了，少说也能弄三、四百块银洋。可咱穷人不能干这号事。只有把它交给咱八路军，叫他们掂上为咱穷人打江山，才是个正主意。再说，咱娃万仓又在县上保安队里当兵，敲了枪，自己光荣，儿子也光彩呀！可是，高大娘怕老汉去送枪，路上碰见坏人抢枪还要伤人，坚持要先给儿子捎个话，叫他们部队上来人取枪。

那阵子，咱们八路军的武器缺得很，地方上的保安部队枪支就更缺了。华池县保安大队接到口信，立即由队长高有才带领高万仓等四、五个战士，来到高春岳家取枪。

高春岳马上把枪全部交给了他们。高队长一看，高兴得连眉毛都笑起来了。这几支枪还都新着呢！只是摆在荒山野洼梢子林里风吹雨淋，好久没人擦了，全都生了锈。

这天夜里，高大伯家可热闹了。老俩口忙着杀鸡、烧水、炖鸡肉，一来给擦枪除锈开鸡血，二来给好久没有回家的儿子和子弟兵做顿慰劳饭。高有才、高万仓几个忙着拆枪、擦枪，还把锈得厉害的零件抹上鸡血，放到锅里煮着除锈。只听那风箱“呼——呱嗒，呼——呱嗒”的响了半夜，大锅里煮的枪零件，小锅里炖的鸡肉，散发出机油、鸡肉混合的香味，随着一阵阵亲热的说笑声，飘向了山村的夜空……

赵铁娃的故事

杨宪法 灌 清 曹世民

在甘肃省正宁县一带流传着许多关于赵铁娃和敌人斗争的故事。赵铁娃是赵德荣同志的小名，因为他身体结实，打仗勇敢，大家都习惯地叫他赵铁娃。他一九三二年参加红军，当过班长、排长、连长和副营长。一九四六年以后当武工队长，一直出入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反动派，地方上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进行无情的斗争。

坚 持！坚 持！

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围剿”陕甘宁边区。赵铁娃带领的一部分红军，和敌人在大山门打了一仗，寡不敌众，被敌人包围在五亭子。他们人无粮，马无料，整天钻在梢林里，饿了吃酸杏，渴了喝河里的生水，一连四、五天，大家都没吃一口面食，肚里火辣辣地又胀又烧。赵铁娃鼓励同志们说：“大家吃点苦，坚持坚持，度过困难就是胜利。”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赵铁娃决定把留下的一匹马杀了给同志们吃。可是当 he 去拉那匹马的时候，说来也怪，那马连踢带叫，不肯前进一步。通讯员扑过来，拉住赵铁娃的手说：“队长，人没有饭吃，马同样也在受罪……”赵铁娃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听到这话，不由得也心酸起来。周围的同志也

都说：“我们还是坚持！坚持！”

第六天，游击队转移到另一架山上。山坡上长满了牛奶头花。赵铁娃揪了一朵一尝，很好吃。队员们吃了牛奶头花，浑身有了力气。有的同志打趣说：“有这东西吃，我们就不出去了，和敌人多打几个转转。”第七天，赵铁娃他们转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就这样，凭着坚强的意志，赵铁娃和战友们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存了自己。

拔掉“钉子”

国民党反动派在“围剿”失败以后，贼心不死，到处筑碉设卡，盘查搜索，企图截断我游击队和老百姓的联系。

西坡是游击队经常过往的交通要道。敌人在这里修了两个碉堡，勒索行人，抢劫财物，不但妨碍游击队活动，也是老百姓心上的一块病。上级决定拔掉这个眼中钉，任务交给了赵铁娃游击队。

有天夜里，赵铁娃爬到碉堡附近，侦察了地形等情况。但敌人究竟有多少？武器有多少？还是没弄清。第二天，赵铁娃化装成敌军官，领着几个穿着敌人士兵服装的人，大摇大摆地来到碉堡附近一户居民家。赵铁娃学着敌人的腔调问：“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岗楼上送水？”

那老乡战战兢兢地说：“官长，今天不轮我家送水啊！”

赵铁娃问：“你家送过了没有？”

那人说：“送过了，官长！”

赵铁娃故作怀疑地问：“送过？你知道里面排长是谁？多少人？多少武器？”

那人一一做了回答。赵铁娃掌握了情况，大摇大摆地回来了。

晚上，赵铁娃又带了几个人，爬到交通沟里，量了交通沟的宽窄和深浅。交通沟很宽，搭不上板，只有一个地方栽有木桩，可以搭板过去。但离哨兵很近，同时还有一只警犬，稍有动静就狂吠起来。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调虎离山计引开那条狗。

第四天晚上开始攻打碉堡。赵铁娃领着一部分人先爬到木桩附近，却让一个队员故意晃荡着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警犬立即跟着他狂叫起来，哨兵也寻视了起来。趁这个机会，赵铁娃等人很快在木桩上搭上木板，冲了过去。冲进岗楼，敌排长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上，就被手榴弹炸得从床上栽了下来。西坡碉堡这个眼中钉就这样被拔掉了。

丰集村勇闯敌围

丰集村在永和镇以北不到一里的地方。

一天黄昏，赵铁娃单枪匹马来到丰集村开展工作。那些天，由于敌人四处搜索，游击队常常到处转移。赵铁娃白天黑夜和敌人在深山老林里兜圈子，已经连轴转了几个昼夜。他到丰集村后，到几个老乡家串了串，就在一个群众家里和衣睡着了。

“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赵铁娃从梦中惊醒。他刚跳下炕，老乡就跑了进来，焦急地说：

“快，自卫队把村子包围了！”

“别急，来了多少人？”赵铁娃问。

“多得很，看来是冲着你来的。”老乡说着，就要把赵

铁娃藏起来。

赵铁娃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别在腰间的两支手枪，摇了摇头，说：

“不行，这样会连累你们的。”

说着，就拔出手枪，奔出了老乡家的院子。

上弦月照得丰集村如同白昼。赵铁娃迅速跑到村东一棵大树下隐蔽好，仔细观察敌人动静。

包围村子的是永和镇伪自卫队，有十多名敌人。正迅速向这里逼进。赵铁娃一看无法脱身，便“叭、叭”两枪，手起弹落，走在前面的两个敌人应声倒下了。其余的敌人“哗”地一下朝大树跟前涌了过来。

赵铁娃勇敢沉着，站在阴影处，“叭、叭”又是两枪，前面的两个敌人又倒下了。这时，他趁敌人惊慌之际，飞一般向离树不远的沟边跑去。跑到沟边，纵身一跳，跳下了几丈高的土崖，“骨碌碌”滚下了沟底。

当敌人追到沟边时，赵铁娃早已无踪无影了。伪自卫队长不由地用手抓着头，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赵铁娃难道是插了翅膀？……”

艰苦细致 唤起民众

赵 静 任占功 李淑贤 黄恩恩 陈山

蔡畅同志同红二、四方面军教导师于一九三六年秋末来到庆阳驻防，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随部队离开庆阳，开赴抗日前线。下面记述的，是蔡畅同志在庆阳的几件事。

一九三六年，庆阳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红军教导师来到这儿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庆阳地下县委，蔡畅兼县委书记（是我党在庆阳县的第一任书记），还成立了白区工作委员会，蔡畅任主任并主管妇女工作。

蔡畅同志到职后，组织干部、战士用多种形式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贡献力量。蔡畅同志经常到老百姓家里问寒问暖，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她尤其关心广大妇女的疾苦。由于封建思想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妇女从小就得缠足，一辈子只能呆在家里围着锅台转，侍候男人，根本没有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她们即使在街上随便走走，或者偶然与别的男子说上几句话，就会受到家里人的责骂。

妇女的婚姻没自由，她们被当作商品买卖。针对这种情况，每逢教导员召开军民大会，蔡畅同志讲话时，她总要提到妇女问题。她号召社会各方面都要支持妇女参加抗日救国的民众运动，反对歧视和压迫妇女的行为。蔡畅同志分析了妇女很少参加社会活动的原因，一是她们家里不让来，二是妇女自己不敢来。根据这种情况，她组织红军女战士上门做宣传。女战士到群众家里，一面帮妇女做活儿，一面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但由于当时的女战士多是从南方来的，当地人听不懂她们的话。妇女们听她们讲话，除了感到新鲜、好奇外，对讲话的内容大多无动于衷。有一个长征过来的名叫蒲秀珍的四川籍女战士，虽然热情大方，说话绘声绘色，但当地妇女都听不懂她说的是啥，只是望着她笑。蒲秀珍瞪着两只大眼毫无办法，心里很焦急。一天，她同其他遇到类似情况的女战士一起去找蔡畅同志。蔡畅同志听完后笑了笑，说：“这地方比较偏僻，与外界交往不多，当地人听不懂外地人的话是不奇怪的。我们应因地制宜，想想办法，克服困难。”一个女战士说：“我们把宣传的内容写成字让她们看；如果看不懂，就请当地有文化的人念给她们听，好吗？”蒲秀珍说：“这个办法不如口说活泼自如，何况我们是上门做宣传，谁做解释工作呢？”蔡畅同志说：“对，我们上门做妇女工作，要象拉家常一样，让人家容易接受。”她要女战士们在当地找能听懂她们话的老大娘当翻译。这个主意可把女战士们高兴坏了。

经过打听，庆阳城里有姓樊的老婆婆能听懂四川话。红军女战士找到樊老大娘，请她当翻译。在她的翻译下，许多妇女很快明白了不少革命道理。

由于红军女战士的宣传鼓动，不少妇女都加入了妇女救亡会，特别是青年媳妇和姑娘们尤其积极。他们除了参加大会外，还跟着红军女战士在大街小巷刷标语，宣传抗战。

★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庆阳县举行了第一次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会场设在庆阳县城南街的大操场上。这天，妇女们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前来欢庆自己的节日。会上，蔡畅同志讲了话。她首先讲了“三·八”妇女节的来历，接着讲了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及党对妇女工作的要求，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打碎封建枷锁，争取男女平等，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反对歧视和压迫妇女，反对买卖包办婚姻，号召妇女上夜校，进识字班，学习文化，关心天下大事。最后，她要求妇女们把缠住的脚放开，并要求家长再不要给女孩子缠足了，把她们送到学校去念书。与会的妇女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听完了蔡畅同志的讲话，都说：“蔡大姐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庆阳原来有一所女子完小，学生寥寥无几。红军教导师到庆阳后，接管了这所女子学校。蔡畅同志说，一定要办好这所女子学校，并亲自参加了赵兰香、边兰英、樊惠兰、贺惠英四个女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红军教导师给女校派了黄友群、何桂英等三个女教师，并让赵兰香、边兰英两位高小毕业生留在本校当教师。蔡畅同志还让赵兰香、边兰英带上教导师的黄友群等到群众家里做宣传说服工作，动员群众送自己的女孩上学。她们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上学念书的好处，指出没有文化的害处。当时，不少

家长认为，女孩儿念书无用。有些人说，女孩儿规规矩矩长大了，给人家当个贤惠媳妇就行了，什么识字不识字的，别费心啦！还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女教师。有一家姓张的老乡，听说女教师来了，便上住门，站在家里对走进院里的女教师说：“你们回去吧，我们女孩儿不愿去，说也白搭！”女教师吃了闭门羹，便来对蔡畅同志诉说委屈。蔡畅同志亲切地说：“你们的工作很辛苦。可是，革命工作本身就是艰苦的，不可能一帆风顺。克服困难需要我们的热情和耐心。一次不行，做两次，两次不行，做三次，总会做通的。”蔡畅同志的话，使教师们受到了鼓舞。她们又高高兴兴地去做工作了。经过女教师热情细致和反复地做工作，姓张的那位老乡终于愉快地把女儿张惠琴送到了学校。

蔡畅同志还配合教师们做学生家长的动员、宣传工作。老百姓经过说服、教育，逐渐提高了认识，不断送女孩到学校念书。不久，庆阳女校就有了四十多名女学生。

缠脚，是对妇女的一种残酷的身心摧残。红军教导师和白区工作委员会组织妇救会给妇女们放脚，受到了妇女的欢迎。蔡畅同志还让学校的女学生成立了“剪脚布”小组。“剪脚布”小组的成员每人都给配一把剪子，见到缠足的同学就给放开。由于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毒害，有人认为给妇女放脚是“大逆不道”。有一个名叫田葡萄的女学生，在学校被“剪脚布”小组放开了脚，回到家里被她父亲田汉云打了一顿。田汉云说，给女人缠脚是古来的老规矩，哪能随便就不要了。所以，他又给田葡萄缠了脚。蔡畅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亲自带上赵兰香、边兰英等女教师到田汉云家里做工作。经过她们热情和耐心地说服教育，田汉云提高了认识，

给女儿放开了脚。一直到现在，不少妇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情不自禁地说：“共产党和红军对老百姓实实在在好哇！”

三

妇女走上社会，她们中间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些妇女，特别是年青媳妇参加社会活动，遭到了社会上的非议和家里人的责难。蔡畅同志让女战士深入群众，做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让大家认识到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是件好事。对那些别有用心、故意捣乱的人，则给以必要的批评和斗争。有一个叫刘树南的奸商，对妇女参加民众运动不满，便用粉笔在大街的墙上写毁谤妇女和女教师的秽语。妇女和女教师告到蔡畅同志那儿。蔡畅同志对刘树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让妇女对他进行斗争。从此以后，再无人敢明目张胆地捣乱破坏了。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婆婆虐待媳妇，丈夫打骂妻子。这种现象很普遍，有些地方问题十分严重。如，庆阳城有一户姓杨和一户姓李的人家，不仅在吃穿上虐待克扣媳妇，而且对媳妇随便打骂，任意欺凌，把媳妇关在家里，从不让与外人说话。偶有违犯，婆婆便百般污骂，挑唆儿子毒打。尤其是姓杨的那家，打骂媳妇不择手段，根本不把媳妇当人看。致使媳妇无法生活，含恨自杀了。人们看到她的尸体上伤痕累累，头上被婆婆用剪子戳下的伤疤甚多，实在惨不忍睹，纷纷要求对残害妇女的坏典型给以必要的惩戒，为被压迫的姐妹们伸张正义。蔡畅同志和其他首长同意给以必要的斗争，以教育大家。妇救会便组织妇女们把杨、李两家虐待

媳妇最狠毒的婆婆拉上游街示众，让她俩走一段路，对群众说一遍她们的罪过，让大家引以为戒。这样以来，其他虐待和打骂媳妇的婆婆，以及打骂妻子的丈夫就再也不敢随心所欲了。许多经常挨打受骂的妇女从此扬眉吐气。

那时，买卖婚姻很盛行。许多姑娘从小就被用买卖的手段订了亲，根本没有恋爱的自由。蔡畅同志组织妇教会人员宣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好处，指出买卖婚姻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庆阳女校高小毕业生樊惠兰，从小被父母许给了一户姓贾的人家。贾家的儿子赌钱酗酒，无所不为。惠兰愤不同意去贾家，可是父母却硬要她去。惠兰认识到，如果自己屈从父母，必然要和其他受买卖包办婚姻践踏的妇女一样抱恨终身。于是，她来找蔡畅同志，诉说事情的原委，希望给她作主。蔡畅同志热情地鼓励惠兰坚持正确的态度，并希望她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民众运动，还让妇教会的同志做惠兰父母的工作。惠兰的父母提高了认识，退还了贾家的彩礼。樊惠兰在蔡畅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进步很快，不久，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她毕业后，回到庆阳，在庆城北关小学任教，后来同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恋爱并结了婚。还有一个给一家财主做姨太太的姑娘，听了蔡畅同志的讲话，毅然从家里出走，参加了革命。又如一个叫龙彩绘的姑娘，她自由恋爱，找到了爱人。但家里不同意。她母亲用计把她骗回家里狠打了一顿，要女儿回心转意。但女儿还是冲出了家门，同爱人成了亲。

四

第五同志不愧自己保持着一动人民的本色。而且对每一

红军教导师在庆阳驻防期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

从多方面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蔡畅同志关心妇女，关心群众，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常常走访群众，还给老乡担水、扫院和做其它活。她看到庆城有一个孤独的老头儿行走不便，就让红军战士经常为他挑水、劈柴。老头儿感动地滴下了热泪。有一天，几个乡下男农民背着几大捆柴来到白区工作委员会的驻地，要把柴送给红军。蔡畅同志见他们脸上挂着汗珠，连连说：“老乡辛苦了，辛苦了。”老乡把柴放下后，蔡畅同志让他们坐到窑里歇息，并亲自倒了几碗开水让他们喝。蔡畅同志见老乡们都在头上留一根长辫，便笑着对他们说剪掉辫子的好处。老乡们见蔡畅同志都梳着齐颈短发，便要来剪子，当即把辫子剪掉了。管总务的同志给老乡们付柴钱，老乡们怎么也不收，他们说：“你们来庆阳为老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我们送点柴也是一点心意，咋个还收钱哩！”蔡畅同志说：“为老百姓做好事是我们应尽的职责。你们生活还不宽裕，打柴卖点钱补贴补贴也会好一些。”老乡们见蔡畅同志执意要他们把钱拿上，便感激地收下了。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红军教导师和白区工作委员会还在庆阳办了一所医院和一个民教馆。医院买了几千块钱的西药，免费为穷人治病。有些难产妇女到医院接生，母子均安然无恙。民教馆买了几千册图书，为帮助群众识字学文化，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人民觉悟，起了不少作用。

宝贵的精神财富

——记马锡五同志在曲子

赵 汉 山

“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

一九三七年，马锡五同志从河连湾来到曲子。人们不知道专员是多大官，一听说管几个县，老远望见他就躲开了。慢慢人们觉得奇怪，过去伪县长郑致中上街都坐儿人抬的大轿，这个管县长的人却为啥和老百姓一模一样？

锡五同志为了让群众尽快了解我们党，使党真正扎根群众中，经常到老百姓家里去。他随便坐在炕头上，有说有笑，问乡亲们有粮没粮，套几对牛，有啥困难？时间一长，就把他和群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墙拆掉了。曲子城的大人小孩，谁见了他都愿意跟他打招呼，说几句话。

马锡五同志参加革命前是陕北保安的庄稼汉。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不论在机关还是下乡，还跟过去一样穿着家乡那种又厚又硬的土布鞋。有的同志劝他买一双软和鞋穿上，他却开玩笑说：“哪里有老婆的针线活穿在脚上自在哩！”

锡五同志不但自己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而且对每一个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严格要求。专署迁到曲子不久，机

关生活使一些年青同志滋长了优越感。当时这里的有钱人时兴戴墨镜，穿二毛皮袄，个别同志也去摹仿。锡五同志发现这种情况很气愤，召开专门会议纠正，批评说：“我就讨厌一些人讲穿讲戴讲排场。我们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不是学着当地主。如今戴墨镜、穿二毛皮袄的有哪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庄稼人？有啥值得学的？共产党解放西北，是正大光明一本经，可我们有些歪嘴沙弥往往念走了样。”他严肃而直率的批评，对大家教育很大。同志们心里清楚，他是怕个别同志的错误行为损害我党刚刚在群众中树立起来的威信啊！

“他是个地道的庄稼汉”

专员公署刚搬到曲子没有地方住，借老百姓的房子住，时间长了很不方便；锡五同志怕因此影响党群关系，急得饭吃不进，觉睡不好。后来他听到党中央在延安搞生产自救，受到很大启发，立即召集干部商量自己动手挖窑。会后，他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挖窑。干热了就脱下布衫，汗水都来不及擦。他既是普通的建设者，又是工地总指挥。每天天麻麻亮，他就起来吹口哨督促大家起床，晚上最后离开工地。劳动乏了，大家围在一起听他说笑话。他那诙谐、有趣的谈吐，往往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忘了劳累。他是个多面手，刮崖面，挖窑洞，打土坯，油门窗，什么都会干，什么都干得好。大家笑着说他是个“土匠头”。两个多月时间，各机关同志共挖成窑洞一百多孔，彻底解决了住宿问题。

在打破蒋介石经济封锁、开展生产自救的那些日子里，

马锡五带领机关干部在庆阳席茆沟用锨头挖了几道小山梁，开了几百亩荒地，春种秋收，年终产粮一百多石，做到了粮食自给有余，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由于马锡五同志带头，曲子一带农民过去对积肥不重视，相当一部分羊粪、牛粪被烧掉了。锡五同志决心诱导群众改变这种状况。每天清晨，他一手提筐，一手拿铲，到处拾粪。曲子的街巷都留下了他的脚印。由于锡五同志带头，在干部群众中立即掀起了一个积肥热潮，不仅积了很多肥料，而且每一个院落，每一个巷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有一次专署开会，工作人员李顺云跑遍所有机关也找不见马锡五，后来才发现他正赤着双脚给农民抓粪种洋芋哩。一根毛带挂在他肩上，怀里抱着粪斗，正午的太阳烤得他满面油汗，风把粪土扬起，撒到他脸上，汗水在他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李顺云抱怨他出门不招呼一声。他却笑着说：“看你，生这么大的气？我又没被人杀了。”他不但笑着向小李道歉，还当场为自己立下规矩：以后有事外出一定告诉通讯员。马锡五同志每次下乡，他骑的牲口身上总是挂着鞭呀、锄呀的，群众赞叹说：“马专员，真是地道的庄稼汉。”

“马青天”

马锡五同志到曲子那时，我党政策还不完全为群众所了解。旧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把老百姓压到了最低层，老百姓告状必须跪下喊冤。那时马锡五同志走乡串户，往往会遇到这类事。每当看到这种情景，他心里就很难过。有一次，马锡五到镇原县马渠区去，碰上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奶奶跪在街

上喊冤。锡五同志赶快跑过去扶起老人。他看了状子后，安慰老奶奶不要着急，一定尽快把事情搞清楚。第二天开完乡民会，他找了十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把那个老奶奶的状子念给大家听。最后他说：“这里的风俗，大小事户中长者最明了，这案子请大家来帮着查查。”老人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官，也从来没见过这样查案的，都感到很吃惊。锡五同志见大家踌躇，又耐心解释说：“共产党是给穷人办事的。我们办啥事都要依靠群众。这里的情况我不熟悉，请大家帮这个忙吧。”十个老人的疑虑打消了，积极提供线索，分析案情，案子很快就被查清，得到了妥善处理。

曲子县有一个姓孙的人被暗杀。县司法处经过调查发现：被害人死前曾和一个叫苏发云的农民同路行走，而且苏发云家炕上、地下、斧子上均有血迹，便认定孙某是苏发云图财诱至家中杀的，便将苏发云关押了起来。但苏一直不承认。县司法处也无法定案。马锡五同志知道此事后，不避劳苦，走乡串户，秘密查访，经过多方面了解，终于查出了苏发云与孙某分手时的证人，说明苏并没将孙带回家中。又调查清楚苏家炕上是产妇血、地上是家人患伤寒病流的鼻血、斧头上是羊血。最后终于抓到了真正的杀人凶手拐骗犯杜老五。群众感叹地说：这个案子如果是国民党办，有哪个当官的会象马专员那样走乡串户，私查暗访呢？苏发云早被枪毙了。只有共产党的人才能深入调查，不冤枉好人。马专员真是青天啊！

一九四〇年初，环县土匪赵老五胁迫群众武装叛乱，陇东军分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迅速平息了这次叛乱。平叛后，马锡五同志奉命去做善后工作。他冒着随时可

能被暗杀的危险，走访群众，调查叛乱经过。调查中他认识到反动分子只是少数，大部分是不明真相、被胁迫的群众。他根据当时形势和党的政策，严惩匪首，教育胁从，释放了不明真相的群众。通知当地政府向人民讲明，不许歧视受骗群众，还给一部分生活困难者发放了救济。这样一来，当地群众非常感激，更加信任人民政府，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接见了马锡五同志，并赞扬他善于结合实际，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董必武同志在马锡五逝世后写了这样的挽诗：“昨日惊闻噩耗传，法曹顿失一英贤，民刑案理三千卷，风雨舟同十二年。未即病床谈片语，只瞻遗体痛长眠，边区惠爱人思念，道马青天不置焉。”是啊，锡五同志就是这样—一个“边区惠爱人思念”的“马青天”。

为民除害

寺村城的老百姓都已关门闭户了。唯有保甲队部的门还敞开着，窑内灯火通明。过条小沟，保甲队部的对面，就是保长李世春的住处。这阵儿，李世春头枕大花枕头，脚蹬山墙，侧身斜躺在炕上正品麻哩！炕中央放着个用纸罩罩着的大烟灯，昏黄的火苗一闪一闪地向上窜。大烟盘里放着一大疙瘩黑乎乎的大烟，和几支长短大小不一的烟枪。烟枪有银的，有铜的，还有瓷的。那拨大烟的杆子更是各式各样。除了这些，还有一支黑得发亮的二把盒子，放在枕头跟前。

过了好大一阵，李世春过瘾了瘾，放下烟枪，翻转身子，双手抱着后脑勺，打了个哈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伸了个懒腰仰卧下了。

这时已是小半夜了。李世春的一举一动，全被站在门外的红军游击队长王九九透过门缝，看得清清楚楚。王九九右手提着短枪，伸出左手正要推门往进闯，突然听到崖背上有人叫道：“队长，队长！”

王九九伸出去的手，不得不缩回来。他赶忙往后退了两步，背贴着山墙，直直地站着，手把枪攥得更紧了，准备着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

李世春听见崖背子上有人叫他，翻身起来，打开窗户。

伸出半个脑袋，问道：“谁？”

“我！”墙上回答。

李世春一听是管账的，就问：“有啥事吗？”

“陈家台那圈羊的事咋弄呀？明日去不去？”管账的说。

“这事不要急，过两天再说！你下来不下来？”

王九九一听李世春叫管账的下来，吃了一惊，心想要是管账的下来，自己考虑好的计划就要泡汤。正思忖间，又听管账的说：“那就过两天再说。天不早了，我就不下来了。你睡觉吧！”

管账的说完话，提着灯笼走了。王九九感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提起陈家台那圈羊的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李世春这人三十来岁年纪，表面上看态度和善，其实，他的容貌和他的内心却正相反，真是菩萨一样的面孔，豺狼一样的心肠。李世春从小上学念书，写一手好毛笔字，后来便当了伪正宁县政府的书记员。几年过后，他觉得老呆在县上舞文弄墨，捞不到油水，决心独霸一方，干一番“事业”。就在这时，伪县政府决定在一些地方办保甲。李世春得到消息，连忙加紧活动，不久便当上了本村的保长。

李世春当保长后，发财款一天比一天大，心愈来愈黑，为肥其家私，不择手段，敲诈勒索，搜刮民财。他吃的、穿的、日常用的，没有一样不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李世春搜刮民财，除了按人头硬性摊粮派款外，还有一个拿手绝窍——派壮丁。老百姓有句话：“宁愿倾家荡产顶壮丁，也不愿去当刮民兵。”李世春只要知道谁家家庭厚

实，管你有没有能当兵的，壮丁只管往下派。只要这张牌往出一摊，明晃晃的银元，便手到拿来。如果稍有怠慢，就给你扣上抗兵抗丁、和“政府”作对的罪名。这老百姓哪能受得了啊！陈家台那圈羊，就是一个明证。李世春明明知道羊主家里无人当兵，但为了敛财，偏偏要给人家派壮丁。名义上是抽壮丁，实则是要羊要钱。

李世春和王九九原是一个村子里的，两家相隔不过一畛地。小的时候，两人还在一起玩。长到十岁，由于李家富，李世春上了学；王家穷，王九九给本村财东邹春发家放羊，贫富使他们从此分开了手。长到十八、九岁，李世春从学校毕业参加了国民党；王九九离家投了共产党，跟刘志丹当了红军。这下，两人成了对头。

再说李世春和管账的说完话，正要解衣睡觉，猛地门被推开了。他抬起头来，借着大烟灯昏暗的亮光，看见一个手持短枪的大汉立在炕跟前，顿时惊得三魂荡荡，啊了一声，右手急向放手枪的地方伸去。

“不要动！”来人是王九九。他小声喝道，并抢先抓起李世春的手枪。

李世春见枪被拿走，立刻象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炕上，不住地打颤，头也不敢抬一下。

“不要害怕！”王九九说。

这时，李世春才听出是王九九的声音，抬头仔细一瞧，禁不住长舒了一口气：“啊，是你呀，真把人吓死了！一搭来了多少人？”

“就我一个！”

“那我就越发放心了。快上炕来！”李世春说着跳下炕

来，把王九九往炕上推。

王九九盘腿坐在炕头上，掏出旱烟锅，装了一锅烟，在灯上吸着后，严肃地说：“自你当保长后，这是我第二次到你这里来！”

李世春搔了搔头：“对着哩，是第二次。”

“你知道我来是啥事吗？”王九九又问。

“有啥事尽管吩咐，哪里能用得着我，一定帮忙，又不是外人……”李世春很客气地回答。

“咱就开门见山地说吧！上一次来，我已给你谈过了，给共产党办事不办事你可以再考虑，老百姓可不能坑害。听说你近来毛病大发，又是加粮又是加款，搞得怨声载道。尽干昧良心的事，难道不怕人翻腾八辈子老先人吗？！我再一次正告你，希望你能悬崖勒马，改邪归正！”

这话不说不要紧，一说，李世春就如坐针毡。他双手抱着头直喘粗气，额上的汗不住地往外渗，喃喃地说：“九九兄弟，你说的话我都明白，可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过去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往后就是想重新做人，还不知你们会不会容我呢？”

“这你用不着担心。共产党从来不记前仇。只要你能够悔过自新，改邪归正，我们一百个欢迎。”

这一夜，王九九和李世春谈了好多话，不知不觉，鸡已叫头遍了。王九九说：“就这样了，暂谈到这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我要走了！”

李世春也不挽留，说：“也行，走就走吧，天一亮就不太方便了。”

临走时，王九九把手枪还给了李世春。李世春接过手枪，甚是感激，将王九九一直送上坝好远才回去。

李世春送走王九九，回到窑里，活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夜里，他哪里能睡着觉？他在心里反复掂量着王九九说的话。天快亮时才拿定了主意。他坐起身来，拳头狠狠地捶击了一下炕面：“明天搬到城里头去住！老子有的是人，有的是枪，有的是坚固的城垒，只要严加防守，看你游击队还能把我怎么样？……”

这以后，李世春的反动气焰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嚣张了。他派人把陈家台那圈羊搞到后，又去陈家川把有骡子的四家人的主人叫来，要他们每家抽一名壮丁；否则，就用骡子顶。这四家其中有三家用骡子顶了壮丁，有一家的主人苦苦哀求，希望能开个恩。谁知越是哀求越糟，保丁们不但不听，反而将这家的主人捆绑枪托打，强拉到寺村城内。

这家主人挨了打，气愤不过，索性豁出去，又是说理又是骂，被保丁们围着又打了一顿，直打得鼻青脸肿。

正在打的当儿，李世春的哥哥李生春实在看不下去了，出来劝阻说：“再不敢打了，有事商量着解决不行吗！看把人打成啥样子了！”

李世春看见他哥出来劝阻，无名火一冒三丈，喝斥道：“你给我往远里走！这事用不着你管！……”

李世春说着从保丁手里夺过鞭子，亲手抽打起来。李生春没想到亲兄弟连他这个当哥的一句话也听不进去，直气得浑身发抖，脸涨得通红，转身忿忿地走了，嘴里连说：“你打，你打，我管不着，我管不着……”

李世春打完，把鞭子一扔，说：“限三天之内来一人当壮丁，不来人当壮丁，就把骡子拉来！”

李世春说完回到窑里，点起大烟灯，斜躺在炕上过起瘾来了。

果然没出三天，四个骡子一圈羊，统统到了李世春手中。从此以后，李世春的恶名越传越远。老百姓恨之入骨，接连向游击队诉说，要求除掉这个恶棍，为老百姓出气。

一九四〇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月光透过云层，照射在大地上。游击队四个支队，三百多人，在王九九的带领下，奉命来到寺村，准备打进城去，活捉李世春，为民除害。

这天晚上，李世春和三十多个保丁分别睡在保甲队部的几个窑里。门口不远的地方设着一个岗。城上有一个班，十来个人，分别防守在城门楼子和城墙角的两个碉堡内。

游击队来到离城不远的场心里停下了。几个支队长在一起简单地开了个会，决定由何相贤、梁秉德带领四支队和六支队，去永和镇到寺村城的半路上埋伏，以防止永和镇保安团前来增援；由张占英带领五支队攻城；王九九和刘富奎带领八支队从沟里下去，往城内摸。另外，还从四个支队里挑选了二十几个人，由魏育青带领，隔沟监视和封锁保甲队部的窑门，防枪响后敌人冲出走脱。

布置停当，各支队开始向预定地点移动。王九九和刘富奎带着八支队，绕道庄子湾迅速下到沟里，然后慢慢往上摸。快到沟畔时，队伍停下了，他俩继续摸索前进。暗淡的月光下，敌哨兵的刺刀闪着寒光。他俩爬到离哨兵不远的一堵短墙下，等哨兵刚要转身往回走的时候，猛地跃起，扑了过去。哨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他俩把哨兵拖到短墙跟前。王九九低声说：“不要怕。我们是游击队。你给我们把情况提供一下，我们不杀你。”

哨兵战战兢兢地说：“行行，只要你们不伤我，干啥都行！”

刘富奎问：“一共设着几个岗哨？”

“三个。城门楼子上一个，队部院里一个，再就是这地方一个。”哨兵回答。

“人员分布情况如何？”

“城上一个班，其余都在队部的几个窑里。”

“李世春在啥地方住？”

“前些日子在家里住，最近不知怎的搬到队部来住了。”

问清了情况，他俩带着队伍，直奔城上。其余两个敌哨兵正在打盹，根本没有发觉；待发觉，早被几个游击队员按倒堵上了嘴。碉堡里的保丁们正做着美梦，游击队员们冲进去，没费吹灰之力，三下五除二，把他们一个个拉出被窝，都给收拾起来了。接着，大开城门，张占英带着五支队进了城。

正在这时，叭的响了一枪。原来，魏育青他们被保甲队部门口的岗哨发现了。哨兵边打枪，边向窑里跑，边跑边喊：“快！游击队！游击队！……”

李世春睡梦里听见枪声，惊慌失措，忽地爬起来，提着短枪，督着保丁们往窑门外冲。

魏育青在月光下看见敌人往外涌，指挥着游击队员一阵射击。保丁们也散开拼命乱放枪。一时枪声大作，就象炒豆一般。

打了一阵，李世春抬头见崖背子上也有了人，知道城已失守，跑是不行了，只得指挥着保丁们往窑里搬。游击队攻了一阵，攻不进，正在想办法，一个队员跑到王九九跟前，指着麦草垛子说：“为啥不用火攻！”

王九九恍然大悟：“好，好办法，用火攻！”

刘富奎和张占英指挥游击队员把一个麦草垛子推下了崖背，点了一把火扔下，一时烈焰腾空，映红了半边天。

李世春和保丁们在窑内经不住烟熏火烤，从窑里往外窜。游击队员们等在院里，出来一个捉一个。三十多个人，一个个都当了俘虏。

战斗结束后，王九九简单讲了几句话，接着当场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有几个还要求参加游击队。几个最坏的家伙，被拉上墙镇压了。李世春这个恶贯满盈的害民贼，理所当然地也受到了惩罚，少不了暴尸荒野。

第二天，老百姓得知游击队除了李世春这个害人精，高兴万分，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

赔……

这是一组小故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们的干部、战士，就是这样处理部队和群众关系的。

赔 了 一 毛 钱

马 占 元

这个“赔了一毛钱”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秋天。一次，华池县游击队在环县王家塬袭击敌人保安队，缴获了一批战利品。

这些战利品当中，有一个用许多月牙形皮子缝成的圆溜溜的东西。把这玩意儿轻轻地往地上一扔，“嘣”，蹦起老高。

“啊哈，皮球蛋！皮球蛋！”这可把游击队的青年战士们稀罕坏了。在那战火连天的年月里，游击队天天行军，常常打仗，钻梢林，宿烂窑，哪里有条件搞体育活动！得了空，战士们三五个人围在一处，扳扳手腕，拔拔腰，摔摔跤，就算是最好的体育活动啦。如今，意外地得了这么个宝贝蛋儿，大伙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谁知道，没过一袋烟的功夫，这皮球蛋儿就闯下祸啦。

那天后晌，游击队在王家塬休息。一伙年轻战士，顾不得行军打仗的劳累，给房东把水缸挑满，把院落扫净之后，

就你扔过来，我掬过去，嘻嘻哈哈地要起皮球来啦。

当时，房东老大娘正拣米喂鸡，也在一旁看热闹。

庄里的一伙小娃们，听说游击队送来个皮球蛋，也都叽叽喳喳地奔来凑红火。有几个胆大的，看得手痒痒，试探着也想玩一玩。

一个战士见了，招呼一个光脑袋小家伙说：“来，小老乡，给你一个！”说着抬手把球传了过去。

谁知这娃对皮球蛋是又爱又怕，瞅着皮球飞过来，一时乱了主张，不但没伸手接，倒把身子往旁一躲。

糟糕，他这一躲，不要紧，那皮球不偏不歪、端端地打中了一只正在低头啄米的鸡娃子！

传球的战士慌得脸上颜色都变了，一步抢上去拿起鸡来。唉！那可怜的小动物竟连腿儿都没来得及蹬一下便断气了。

你看看，大人干了娃娃事，这可咋办哩！

当下，活蹦乱跳的战士们，看热闹的娃儿们，全都愣住了。院子里顿时鸦雀无声。

房东大娘接过鸡娃儿，心疼地抚摸着羽毛，嘴里不知是安慰别人还是安慰自己：“不怕，不怕，许是打懵了，能活哩……”

头都打扁了，还能活？唉！那位战士低头从身上掏出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边区布币，递到大娘面前，羞愧地说：

“干妈，真对不住，活活的鸡娃叫我糟蹋了。这是一毛钱……你……”

战士们一个个直往大娘脸上瞅，心里说：“老干妈，快接住吧，怪我们……”

谁料，那大娘一把拨开递过来的钱，说：“你们这些娃娃们也真是的！这叫咋回事？！我要寻你们队长去哩！”说着，抱起死鸡娃气呼呼地就往外走。

大娘前腿还没迈出门坎，恰巧游击队长笑呵呵地迎面进来了。“笑啥哩？”房东大娘跟队长是老熟人了，开口就没客气，“我正寻思找你去哩。你这当队长的，给咱评评这个理！”

队长听大娘这么说，觉着不对劲儿，又见老太太怀里抱着一只死鸡娃，心里明白了七八分，脸上的神色顿时严肃起来：“哦，什么事？你老人家慢慢说。”

“你看这些娃娃气人不气人？”老大娘似乎火气未消。“刚打罢仗，进院又是担水，又是扫地，拿起啥做啥，真象自家的娃娃。皮球蛋碰死一只拳头大的鸡娃子，忙给我赔钱哩。你说，你们把我老婆子看成啥人了？”

“啊呀——”，战士们悬着的心一下子落到了实处。

队长弄清了事由，对大娘说，损坏东西要赔，这是红军的老规程。谁也不能违犯。劝她把钱收下。

老太太开始说什么也不肯收，后来，实在磨不过游击队员们，就跟队长说：“唉，我人老嘴拙，说不过你们。你要是能答应我一件事，这钱我就收下。”

“啥事，干妈你只管说，能答应的我一定答应。”

“你可不许为这件小事难为这娃。这是个好后生，我心疼他！”

多好的老妈妈呀！队长听了心里一热。不过，他还是冲那闯了祸的战士说：“听见没有？干妈为你说情哩，看在咱干妈的脸上，饶了你这一回。以后可不兴这样毛手毛脚的

了。愣站着干啥，还不赶快向大娘道谢，你呀！”

几个战士一齐围上来，拉着大娘的手亲热得不知说啥好。大娘笑着，摸摸这个的肩头，扯扯那个的衣襟，那情景，就象母亲对待亲生儿子一样。

第二天，游击队开走了。房东大娘逢人就说：“啊呀呀，早就听说老刘（刘志丹）的队伍好名声，这回我可亲自碰上了。皮球蛋碰死了一只鸡娃子，也硬是给我赔了钱！”

她身边的一伙小鬼娃娃也七嘴八舌地给老奶奶帮腔：“真个，真个，我们都在跟前哩，赔了一毛钱！”

（高寒 整理）

赔 瓦 盆

王 崇 汉

一九三七年八月的一天后晌，落日的余晖映照得满天云霞红里透金。门前的香椿树上，喜鹊“喳喳”地叫个不停。八路军一二〇师的一个运输排住到了我家。他们一进门放下行李，没喝一口水，没歇一口气，就给我家干活。他们把院子扫得净得能晾面，把水缸挑得满得往外溢。张排长和几个战士还帮我父亲往地里送粪。我父亲见他们赶了路，怕累着他们，劝阻说：“长官，你们跑了一天了，先缓缓吧，明儿还要赶路哩！”

张排长笑着说：“大哥，不要紧，咱们都是庄稼汉出身，在家那阵儿给地主老财扛活，起五更睡半夜，吃尽了苦头，眼下跟着毛主席拿枪杆子打天下，多年不担担了，看见别人干这活，心里直痒痒，你就让我们干会儿吧！咱们根儿上是一家人，往后管咱们叫同志吧！”他们说完仍手脚不停，

一直帮我父亲把粪送完。我父亲兴奋地说：“自古以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

我最羡慕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八路。他们说话和气，做事跟大人一样地有路数。他们前脚到我家，后脚就寻着我活干。后晌，我妈喂猪，一个小八路抢着要端泔水。我妈怕弄脏了他的衣裳，不让他干。可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挽起袖子就夺瓦盆。谁知你夺我抢没留神，“砰”的一声，瓦盆跌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片。那小八路稍一愣怔，连忙向我妈认错道歉，掏钱赔偿瓦盆。我们一家人都不要钱，他急得差些滴下眼泪，还叫来张排长，反复给我们讲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怎么能收子弟兵一个子儿呢？我父亲对张排长说：“你头里不是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吗？还分什么你我？”张排长说：“损坏东西要赔，这是咱们八路军的纪律。”说来说去，谁也没有说服谁。张排长只好笑了笑，把钱收了回去。

第二天，八路军走后，我妈扫炕时，在炕席底下看见一个纸包儿。起先我们还以为是八路军走时遗忘下的东西。但是，打开纸包一看，里面是两个黄灿灿的铜元和一张纸条儿。找了个识字人念给我们听：

“老乡，打坏了你家的瓦盆，原价赔偿两块铜元，请收下吧！”

八路军战士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望着铜元和纸条儿，我们全家人有说不出的感动，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真好啊！”

（王博艺 整理）

赔瓜

高文

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分区华池县县长李培福同志，是全边区闻名的好县长。一九四三年二月，他被树立为边区的模范干部之一，毛泽东同志还为他亲笔书赠了“面向群众”的题词哩！

说起李培福联系群众的事儿，可多了。这里说一个“李县长赔瓜”的故事。

一九四〇年秋天，有一天，李县长叫勤务员赵志银骑马去给柔远区政府送信。临走时，他再三叮咛：“这马毛病多，性子躁得很，路上千万要小心！”

小赵长得瘦小一点，却十分精明，性子也有点犟。他心想，我天天和这马打搅，还用你叮咛？它再躁，不信还能犟过我“老赵”呀！他一上马，便连着抽了几鞭子，马就欢快地跑了起来，三、四十里路一阵阵就到了，很顺当地把信送到了柔远区政府。

可是，在返回来的路上，就出事儿了。

路过孙家川时，小赵放慢了马缓缓而行，骑在马上哼唧唧地唱起了“信天游”：

听见那个下川马蹄响，

急忙扫炕铺毡换衣裳。

白脖子那个狗娃你不要咬，

我当八路军的哥哥回来了……

忽然，路畔庄子里“呼”地扑出了一只大黑狗，马被吓得撒欢子窜进了下台一片西瓜地里。小赵急忙收缰勒转马头

时，已经窜了个来回，连踢带踏，把十几个西瓜都糟蹋了。这下可闯祸了！

西瓜园的主人孙二老汉，见小赵站在地头失颜变色的，赶紧说：“不怕，自个儿种的，糟蹋几个怕啥哩！”

怕啥哩？损坏东西要赔，这是八路军的老规程了，谁还不知道。小赵明知自己身上没有一文钱，还是伸手摸了摸衣袋。那时候，边区实行供给制，边区政府主席一个月五块钱津贴，县长一个月才两块半钱津贴，小赵他们一天只有四分钱的菜金，哪里有钱啊！再摸，也变不出钱来呀！小赵急得差点哭出声来，拉着哭腔说：“二千大，等我攒下钱了一定赔你！”

“看这娃，赔啥哩！就算我送给你和李县长吃了，快走吧！”孙二老汉摸着小赵的头，哄他快走。

“不行，县长知道了要批评的。”

“我给你保守秘密嘛！”

“不行，李县长说，损坏东西要赔，不能违犯群众纪律。”

“我没意见还不行啊？”

“不行，没意见也得赔你的！”

孙二老汉和小赵常见面，知道这娃有股子犟劲儿，就再没言嘴啥。

小赵这才耷拉着脑袋，牵上马走了。唉，真后悔，没听李县长的话，粗心大意惹下这麻烦！

常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孙家川离华池县政府只有十来里路，孙二老汉不说，旁人也传，李培福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把小赵叫来一问，果然是实。这时候，小赵把应该赔

的瓜钱，还没攒够哩！

李培福语重心长地对小赵说：“损坏了群众东西，就是赔钱，也要报告组织，该反省的还要反省哩。你还有难处嘛，不报告组织知道，怎么帮助你解决？这样悄悄拖着，一来误事情，二又难为自己，可不好啊！”

第二天，李培福就领上小赵，到孙二老汉的瓜园，用自己的津贴赔了瓜钱。这可把孙二老汉感动得不知说啥好，非要给李县长杀两个西瓜不行，又被李培福同志硬挡住了。孙二老汉赞叹地说：“老李，你真是个清官呀！我若能见到毛主席，报告他奖赏你！”

这话嘛，孙二老汉只能说说就算了。他没见到毛主席，当然也没报告。可是，李培福同志清廉执政、联系群众的事情，党和毛主席都知道。毛主席还给他亲笔题了词，边区政府树立他当模范干部，登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三日的《解放日报》上表彰他哩！

刘占山智取敌军火

高文 巩世伟

一九四七年二月初，胡宗南匪军向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犯，敌四十八旅占领了陇东解放区的重镇——合水县西华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警三旅、教导旅等部队，在彭德怀司令员、习仲勋政委的指挥下，挥师陇东，将西华池之敌包围起来，于二月十一日发起了著名的西华池战役。宁县武工队也参加了这次战斗。

这次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十一日，我军与敌人反复拼杀、争夺，激战一天一夜。十二日早，我军与敌人展开了白刃血战。

宁县武工队队长刘占山，是个有名的孤胆英雄。这场恶战中，他左手提枪，右手挥刀，连续四次随军冲进西华池街道，同顽抗之敌奋力拼杀，砍翻了一个个敌人，直杀得血污满身，连眼睛都杀红了。

为了避免过大的伤亡，我军同敌人经过几个回合激烈搏斗之后，向城外撤了出来。刘占山因太深入敌阵，撤退时没有跟上部队。在他瞅空子突围时，三个散兵紧追了上来，子弹在他头上“嗖——嗖——”飞过，情况很是紧急。

刘占山一面还击，一面突围，他一纵身翻过一堵土墙，跳在一个大院子里，只见院子里聚集着百十来头牲口，都驮着

军火箱子。那些被胡宗南军队拉来支差的农民，有的抓著被枪声吓得乱踢乱跳的牲口，有的蹑蹑在墙根下抽旱烟。刘占山突然跳进院子，把他们吓得忽地一下站了起来，都用惊慌的眼光看着这个提枪拿刀、浑身是血的人。

“干什么的？”刘占山随口喝问了一声。

“支差送军火的。”老乡们惊慌不安地回答。

顿时，刘占山计上心来。他趁人心慌乱之机，大喊道：“敌人打进来了还不乘机快跑，蹲着等死呀！”话音没落，支差的农民便一轰而起，赶着牲口拥出大门，朝城外跑去。刘占山混在人群中向外突围。

“向北边跑，南边是敌人！”刘占山又高喊几声，指挥着人群向我军集结地点城北跑去。敌人的岗哨怎么吆喝，也阻挡不住潮水般涌来的人群，便开了枪。

刘占山又在人群中喊：“敌人追上来了呀，快跑！”

跑到三里店时，遇上了我们的武工队。一个战士拦头喝问：“干啥的？”

“送子弹的。”支差的农民回答道。

“给哪一部分？”

“给四十八旅。”

“哈哈，把门楼走错了，我们是武工队。”战士们高兴得齐声大笑了起来。

这时，刘占山从人群里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点没错，胡宗南是咱们的运输队长，他给咱们送子弹，那是常事嘛！”

“啊呀，刘队长回来了！”战士们一下子把刘占山围住，问长问短。那些支差的农民听说这些人是武工队，真是

又惊奇又欢喜，齐声说：“礼物送来了，快收下吧！”

武工队员们一边“接收”军火，一边高兴地议论说：“刘队长比那三国的诸葛亮草船借箭还能哩，一下子就从虎穴里给咱们弄了这么多军火。咱们要用它好好回敬一下胡宗南！”

智驱马家军

王博艺

一九四九年夏天，在陕西扶眉战役中，国民党马步芳匪军被我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迎头痛击。农历七月初七，马匪军两个半骑兵团逃窜到了镇原县新城镇。这天是个逢集日。敌人一进镇，就捉鸡拉羊，逮兔捆猪，踢得水果满街乱滚。打骂声和哭叫声响成一片。

一阵骚乱之后，敌人实行了戒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四道城门也把守起来，只许人进镇，不许人出镇。敌人驱赶群众去修作战工事。谁要稍一迟慢，敌人不是用枪托敲，就是用马鞭劈头盖脸抽打。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盼望着解放军快点打过来，消灭这伙作恶多端的马匪军。

敌人的暴行和企图顽抗的行动，没能逃过我打入敌新城镇公所守备队内部、并担任队副的地下共产党员王福汉的眼睛。王福汉仔细分析了形势，赶紧写好情报，立即交给了党的地下交通站。

第二天十点钟左右，新城镇里人们纷纷传说：在城西北面三十里开外的惠家沟有五千多解放军向新城镇开来了，在开边的杨千壕也有很多解放军朝新城镇赶来，要把马家队伍彻底歼灭在新城镇。

王福汉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明白地下党组织接到了情

报，派人来了。党派来的地下交通员老赵同志很快跟他接上了头。

地下交通员老赵对他说：“老王，情报党组织收到了。组织认为你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决定采取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的方法，设法把敌人诱出城，然后由我追击部队歼灭之。”

王福汉和老赵合计好后，便去找敌伪镇长。

王福汉把老赵领到敌伪镇公所，把情况给敌伪镇长说了。敌伪镇长是个胆小鬼，听了老赵有声有色的叙述，心里嘀咕开了，要是把情况报告给马家队伍，解放军一打过来，自己的脑袋就长不住了；不向马家军队报告，他们知道情况后，追究起来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他急得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最后，他苦丧着脸对王福汉说：“王队副，你说这事怎么办？”

王福汉搔了搔头皮，慢条斯理地说：“事关重大，谁也作不了主。走，咱们把情况报告给马家队伍，看他们咋办。”

敌伪镇长说：“王队副，你领上这个人到马家队伍团部去报告。我害怕队伍上的人。”

王福汉轻蔑地一笑，便和老赵出了敌伪镇公所，来到城南敌军团部。

敌军官听了王福汉的报告，绷着满脸横肉，恶狠狠地问道：“你亲眼看见了彭德怀的军队吗？”

“嗯！”老赵向王福汉使了个眼色，王福汉便说：“有十三个人，”

“有多少人马？”

“我是在壕边上看见的，反正说不清，川道里有一里长尽是穿着灰衣裳的队伍，扛着机关枪，骡马拖着大炮，气昂

昂的，一路小跑儿。”

敌军官双手又在腰里，紧锁着眉头，“噎、噎”地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突然，他一把揪住老赵的衣领，鼓着三角眼，咬牙切齿地说：“你谎报军情，煽动人心！你，你是共产党的探子！”

老赵装着害怕的样子，结巴着说：“长官，我听说要在这啗打仗，害怕我舅家遭难，我来告诉他快点躲开。”

敌军官问王福汉：“他舅家是不是在这儿？”

王福汉说：“报告，我们查对过了，就是镇里开杂货铺子的掌柜！”

敌军官稍一沉思，森严地对王福汉说：“命令你们守备队，带上这个人，必须在两小时内搞到真实情报！若拖延一分钟，就把你们的头统统提来！”

王福汉立正道：“是！”

王福汉回到敌伪守备队后，命令守备队队员“榨干油”即刻带老赵去打探情况。

“榨干油”这个家伙往日横行乡里，敲榨民财，无恶不作，就是捡根骨头都恨不得榨出二两油来，因此，老百姓背地里都叫他“榨干油”。近一年来，他听说解放军很快就要打来，心中日夜惶惶不安，现在一听到要他去打探共产党队伍的消息，非常恐惧。心想，要是被共产党的队伍抓住，老帐新帐一起算，自己不会有好结果的。他心里嘀咕了一阵儿，苦着脸说：“队长，我这几天腿脚有些疼痛，来回几十里路，我跑不动，请您饶了我，另派人去吧？”

王福汉脸色一沉，口气生硬地说：“少啰嗦，这是命令！要不，把你的头割下来，我去交差！”

“榨干油”无可奈何，只得跟着老赵出了新城镇。一路上，他骂骂咧咧地尽往老赵身上出气。老赵不理睬他，只顾向前赶路。

大约走了有三里路，突然，从路旁的庄稼地里跳出一个人，手勾手枪扳机喝道：“站住！举起手来！”

“榨干油”“妈呀”一声，跌倒在地，面如土色，浑身发抖，两只鼠眼贼溜溜的。

那人喝令道：“站起来，别装狗熊！”

“榨干油”好不容易才从地上爬起来，两腿直打哆嗦。那人向老赵示了个眼色，老赵跑了。他把“榨干油”押进了玉米地里，威严地问道：“你知道自己犯下的罪吗？”

“榨干油”心惊肉跳地说：“游击队爷爷，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被马家队伍逼着来刺探军情的，不是……”

“少啰嗦！你想死还是想活？”

“榨干油”连忙跪在地上，求饶地说：“想活，饶……饶命。”

那人严厉地盯着“榨干油”，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不再说话。“榨干油”吓破了胆，脸色急剧地变化着，一会儿变黄，一会儿又变得煞白，连裤裆都尿湿了。

过了很大功夫，那人才开了腔：“想活，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榨干油”听了，这才松了口气，连声说：“我愿立功赎罪！我愿立功赎罪！”

“既然想活命，你就马上跑步回到新城镇，向马匪报告：解放军的队伍已经到了塬上，多得简直数不清。你回去不照这样说，我们的队伍打过来，小心你的狗命！”

“榨干油”说：“是！是！”

那人逼着“榨干油”在原地跑了很多圈子。他累得浑身冒汗，才叫他停了下来。那人问他：“我刚才说的话，你记下了没有？你给我说一遍！”

“记住了！记住了！”“榨干油”气喘吁吁地把原话复诵了一遍。

那人命令道：“立正——，向后转，起步走！”

“榨干油”慌忙拔腿就跑。那人在后面“啾啾”着枪栓，大声喝道：“跑！要不，我开枪了！”

“砰！”一声枪响，

“榨干油”没命地奔跑起来。

“榨干油”跑回新城镇公所，向王福汉报告了情况，王福汉把他又带到马匪团部。

“榨干油”浑身上下臭汗直滴，脸色焦黄，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道：“不得了，共产党的队伍多……多得很，离这里只，只有十几里……”，“咣当”一声，他栽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

一阵紧急集合号声响过，马匪队伍顿时乱成了一窝蜂，连做成的饭也没敢吃，乱喊乱叫着，人拥马挤地仓惶西逃了。

马匪军逃奔到三十里外的小峁子，才觉察到他们中了计，急忙调转马头，又向新城镇扑来，企图重新抢占阵地。这时，我西北野战军先头部队早已开进新城镇，迎头把马匪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敌人鬼哭狼嚎，丢下几具尸体，又夹着尾巴奔命了。

马匪军狂奔不息，直抵宁夏固原县境内的黄岭山，妄图再次负隅顽抗。但是，我军很快攻打下了黄岭山，马匪军又望风而逃了。

石秀山革命活动片断

徐殿武 高仲达

抗日战争后期，在合水县肖嘴塬上活跃着一支游击队。这支战火中炼就的地方武装，就是石秀山带领的游击队。

夜袭杨团总

一九四四年间，合水县肖嘴塬上盘踞着一支反动民团。团总名叫杨定藩，此人心毒手辣，敲榨勒索老百姓，贪得无厌，方圆几十里的穷苦农民，早就恨透了这个土霸王。

杨定藩虽然早就吃过石秀山游击队的苦头，表面上慢慢学乖了，但是，糟害老百姓的手段却越来越毒辣。他常常利用深夜，唆使团丁，不是逼要老百姓的粮油，就是搜刮钱财。

穷苦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怀着满腔怒火，多次找到石秀山，请求游击队尽快消灭反动的民团，替乡亲报仇雪恨。

游击队员们也早就想吃掉杨定藩的民团，经穷苦农民一请求，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要求出击。石秀山决定带领游击队，攻克黎洼堡，活捉杨定藩，为民除害。

黎洼堡是明朝洪武年间兴建的一座土堡，三面临沟，一面通塬，墙高城险，易守难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石秀

山决定由石恒荣、石生贵等三人在中秋节前，化装成替杨定藩送礼的群众，深入匪巢，伺机袭击。

农历八月十五的前两天，嗜血成性的杨定藩派出爪牙，逼着四乡百姓为他送礼。送礼的群众中就有石恒荣、石生贵等三名游击队员。他们肩挑大西瓜，手提月饼筐，夹在群众中进入堡内。

石恒荣、石生贵等人送“礼”走后，石秀山挑选了二十几名精壮的游击队员，组成攻城尖刀排，每个尖兵队员除带枪支外，还准备了攻城用的两把矛头，整装出发了。

中秋之夜，应酬了一天客人的杨定藩，正准备带上他的小老婆赏月玩乐，不料狂风骤起，阴雨大作，只好扫兴地回到窑里。团丁们也聚集在另一孔窑洞里喝起酒来。石恒荣等三人忙着跑堂、端饭，有时还站在桌边看热闹，给胜者喝彩，还帮助输拳者饮酒。后半夜，酒场散了。团丁们喝得酩酊大醉，一个个踉踉跄跄，立也立不稳，哪里还有心思去站夜哨？他们觉得石恒荣这三个人很老成，便发了他们每人一支枪，叫他们在外面站岗，自己躺在炕上睡着了。就在这个时候，石秀山带领尖刀排，冒着滂沱大雨，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城下。队员们个个屏声静气，单等城上的信号。不大一会儿，只见城上一点火星绕了三圈。石秀山一声令下，队员们手握两把矛头，直刺城墙的砖缝，然后靠臂力把身子悬起来，露出一只手，拔出矛头，往上再刺，就这样交替换着，不到几分钟，全上了城。石秀山和石生贵接上头后，命令石生贵带领尖刀排去对付团丁，他亲自带领石道发等五名队员，由石恒荣带路，直奔杨定藩的住处。他们刚摸进杨定藩住的院子里，就听见中间窑洞里传出了时高时低的笑闹声。石秀山命

令队员们脱掉鞋，踮起脚尖，轻步前进。走到窗口，石秀山用舌尖舔湿窗纸，用小拇指戳了一个小洞，朝里一看，只见房子里烟雾弥漫，杨定藩和他的小老婆斜躺在炕上抽大烟哩。石秀山咬着牙，不声不响地举起枪，只听“砰”的一声，杨定藩连喊都没喊出声，就一骨碌滚到床下，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在石秀山击毙杨定藩的同时，石生贵带领尖刀排也闯进了团丁们的住处。当匪徒们从酒中惊醒时，全部枪支弹药已掌握在游击队手中。转眼间，二十多个团丁全都当了俘虏。

计退敌兵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春天。

一个寒冷的夜晚，石秀山带领一支四十多人的游击队，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皑皑白雪，直插敌占区梅家寨子，袭击了敌镇公所，活捉了罪大恶极的伪保长陈生昌，一刀劈了敌特情报员徐麻狗。敌镇公所人员逃到距梅家寨子十五里的南义堡，报告了马匪军。马匪军连夜出动一营人马，象一群恶狼，疯狂地向肖咀堡扑来，妄图和游击队血战一场。

马匪军连夜进犯的消息传到游击队后，石秀山立刻召开了支委会，商量对付的办法。石秀山根据实际情况指出，敌人连夜出兵，复仇心切，兵力又多，不可硬拼只宜智退。他决定留一个班打掩护，其他队员全部撤退。

游击队撤到肖咀城后，接到上级指示，要原地坚持阻击，保证土改工作团安全转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石秀山立即派出十多名队员，故意操着南方口音，假装成是解放军

的后勤工作人员，动员群众送粮送草，并放出风去，说来了大批解放军；又找来许多木椽，用白布裹起来，伪装成炮的样子，架设在城上，还在城外挖了些灶坑，生火冒烟，真象有大部队在这儿安营扎寨的样子。

马匪军从西边翻过南义沟，刚上到梅家寨子坡头，就和游击队接了火。双方激战十多分钟，游击队边打边退。马匪部队追到离肖咀二里远的老爷店时，听见肖咀城里歌声起伏彼起，看见城头枪炮林立，四面八方送粮草的百姓闹闹嚷嚷，尘土飞扬，敌营长不由心中犯疑。他刚派走三个密探，又见两个伪兵拉来一个姓石的老头，便立即拷问肖咀城里的情况。石老头先是不说，后来才说是解放军大部队过来了。敌营长忙问有多少人？石老汉瞥了一眼凶神恶煞的敌营长，稍加思索说：“好多好多，多得数也数不清！”敌营长打了个寒颤，把手一挥：“从原路折回！”敌人一个个夹着尾巴，连大气也不敢出，向梅家寨子逃去。

再说敌营长派出的那三个密探，化装成送柴的老百姓，鬼头鬼脑地混进城，发现城里只有二三十个游击队员，城头架的只是一些木椽，便溜出城，飞也似地去报告。敌营长听了，顿时气得头昏眼花，捶胸顿足，方知中了空城计，急忙下令进攻。敌人气势汹汹地来到肖咀，一窝蜂似地冲进了城。可是城里鸦雀无声，只剩下一些冒烟的灶坑和乱七八糟的柴草及伪装成炮的木椽。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了。

逼 敌 互 杀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新一旅一营在五亭子被解放军警三旅五团歼灭后，前去增援的新一旅二营闻讯抱头鼠窜，

逃进郝家湾城龟缩下了。

在郝家胡同参加土改的合水县县长胡宗彦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从青咀调来石秀山游击队，准备袭击敌人。石秀山和唐凤仪一见胡宗彦，就急忙问道：“胡县长，给我们啥任务啊？”胡宗彦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可有大鱼吃哩，先歇会儿喝点水再说吧！”三人说笑着走进了窑洞。

当胡宗彦把情况告诉石秀山后，石秀山说：“根据情况看，敌人已是惊弓之鸟，胆小怯战，企图固守待援。我们如能诱敌出城，在运动中袭击，一定能全歼！”

“对，对！就这样决定吧！”三个人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

早餐后，石秀山命令杨云山，石道智带领二排担负诱敌出城任务；命令杨新胜、石廷龙、张彦雄带领一排坚守城堡东面的吕家峁子，堵敌后路；由他和胡宗彦、唐凤仪带领尖兵排正面进攻。

部署好后，队伍立即出发。杨云山和石道智带领二排，跑步到了郝家湾城下。城上的哨兵发现南城门外有人，立即向城内报告。不大一会儿，一位肥头胖脑的军官拿着望远镜上城观察。他刚举起望远镜，就被神枪手石道智“砰”的一枪，打得应声翻落城下。正在吃早饭的敌人听到枪声，认为是解放军大部队来了，狂呼乱叫着，活象一群受惊的野猪，乱挤着涌出了城门，拼命向北逃去。跑了一阵，才发现前面是悬崖，只得掉头向西。这时，早就埋伏在峁子两侧的游击队员呼喊着重从四处跃出，开枪射击。敌人丢下七八具尸体，狼狈不堪地向南逃去。游击队员们边追边打，迫使敌人从深沟里逃了下去。

沟对面徐家岭驻扎着胡匪兵三营，听到沟里传来了激烈

的枪声，又见沟底里黑压压的人拼命朝上奔来，认为是我正规部队上来了，连忙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不管三七二十一，架起机关枪，朝沟底里扫射了起来。一直打到黄昏，山上的敌人才发现沟底的部队不象是解放军，连忙开始联络，等弄清是中了石秀山游击队计策时，双方死的死伤的伤，只留下一百三十多名残兵败将了。

里外配合捣毁敌巢

一九四八年间，西华池城南楼子里盘踞着国民党的一支自卫队，队长叫张胜雄，外号“张桃桃”。城楼下的西南角是国民党的乡公所，里面还住着一支常备队。这些反动家伙，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与我为敌，搜刮老百姓钱财，无恶不做。游击队和百姓都盼着早日端掉这个贼窝。

西华池城池坚固，反动武装戒备森严，硬打硬拼会造成很大牺牲。游击队长石秀山几经考虑，在和二区武工队队长兼西华池乡乡长唐得禄商量决定，采取政治攻心、瓦解敌军、伺机攻打的方法尽快捣毁敌巢。

石秀山通过唐得禄了解到自己的队员唐风汉、王万荣、许世珠等人和伪自卫队里的孙得贤、王兴海等人既是亲属，又是邻居，因此授计给唐得禄，让他负责通过这几个队员和自卫队中自己的亲属取得联系，争取他们反正，待时机成熟后里应外合，拿下城池。

唐得禄接受任务后，又了解到自卫队一个班长王兴海是游击队员唐风汉的妻兄，副班长孙得贤和王也是亲戚，决定先做王兴海的工作。

一天中午，唐风汉、王万荣按照唐得禄的安排，乘王兴

海回家的机会，专门跑了去。见面后闲谈了几句，唐风汉就把话题转到了正经事上。他先讲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又讲了共产党的政策，劝王兴海看清时务，及早回头，为群众做点好事，将功赎过。

王兴海早就知道唐风汉、王万荣是游击队员，因为是亲戚，也不太害怕，听说要让自己反正，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说一句话，低下头，叭哒叭哒地抽闷烟。

唐风汉见王兴海不说话，知道他思想上还有顾虑，因此又把党的政策重新讲了一遍，直说得王兴海不住地点头，紧拧到一起的眉头也逐渐舒展了。

“好吧，我回去先试试吧！”最后，王兴海的心终于活了。

唐风汉见王兴海已经有些觉悟，这才把自卫队中其他几个人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让他和孙得贤几个人好好谈谈，争取一块反正。

王兴海回去后通过两天的说服动员，先打通了副班长孙得贤的思想；接着，两人又打通了士兵周峰、邵居南、罗天明等七人的思想。一个串一个，最后全班都通了。大伙决定，伺机绑架张桃桃，捣毁乡公所，向游击队投诚。

一天傍晚，王兴海趁回家之便，找见唐风汉，说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唐风汉觉得事关重大，又去找唐得禄汇报，不巧，唐得禄外出，他只好让游击队员唐风成和许世珠去大山门亲自向石秀山汇报。

石秀山听了二人的汇报后说：“假若王兴海那个班明目张胆地把张桃桃弄掉，起义士兵家属的生命难以保全。为了把事情处理得更周全一点，还是采取里外配合的办法好。”他

让唐风成两人连夜返回，转告唐得禄，尽快联系好行动的时间。

唐得禄返回西华池的当天晚上，唐风成及时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汇报中特别提出王兴海那个班一切都准备好了，得抓紧行动，不然风声一漏，就会发生危险。

唐得禄听完汇报，觉得情况十分紧急，连一口水也没顾上喝，就和王万荣一起奔向了大山门，找到了石秀山。

“情况是否真实？别造成不测的恶果！”石秀山慎重地一字一句地问着。

“他们一切准备妥当，单等游击队武装掩护！”唐得禄十分有把握地说。

这时，保安科长张秀文也来了。他向石秀山汇报了保安科侦察的情况。石秀山觉得张秀文、唐得禄、王万荣三人说的情况一致，微笑着点了点头，又在地上踱了几步，转过脸对唐得禄和王万荣说：“好，你们快回去联系，游击队午夜十二点一定赶到关长坡底接应！”接着又做了周密的部署。

夜幕降临以后，唐得禄和王万荣来到了关长坡底。这时，联络员唐风成也从西华池赶来了。唐得禄把夜里行动的计划告诉唐风成，让他马上回西华池转告王兴海。

晚上十二点钟，游击队来到了关长坡底。石秀山听了唐得禄的详细汇报后，将游击队带到了樊家坵，派出一个班在北城角放哨，注意敌人动静；由唐得禄带领一个排，进城配合王兴海，他亲自带领一个班坚守城南，以防敌人逃跑。

午夜过后，王兴海的班换了哨。城下传来“布谷！布谷！”的三声鸟叫，王兴海轻声问：“干啥的？”

城下答道：“住店的！”

“多少人？”

“三个！”王兴海悬着的心落下了。他急忙下了哨楼，打开了城门。游击队员一个接一个进了城。

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上飘着零星雪花，城内鸦雀无声，敌人早入梦乡。游击队员悄悄爬上城门楼子，把楼子里的枪收拾得一干二净。这时其他两个排也相继进了城。石秀山带领大伙一齐闯进了乡公所。

“起来！快起来！”唐得禄洪钟般的声音划破了寂静。敌人从睡梦中惊醒，看见乌黑的枪口直对着自己，立时乱作一团，有的把裤子穿在了胳膊上，有的忙着摸枪。这时，石秀山一个箭步从人群中闪出来，拔出驳壳枪，“咔嚓”一声把子弹推上膛，“叭、叭、叭”，在空中连放三枪，大声警告说：“不许动！谁敢顽抗就要他的脑袋！”一百多名敌人吓得索索打颤，乖乖地当了俘虏。但是找遍了俘虏群也没有找到张桃桃。后来，在地窖里抓住了敌人副官。原来这天晚上十点左右，张桃桃回家和小老婆过夜去了。半夜他听到动静后，夹着尾巴逃跑了。

为了蒙蔽敌人，临走时，石秀山下令打了一阵枪，摔了几颗手榴弹，又放火烧了城门楼子。

东方吐出了朵朵朝霞，喜鹊在枝头啼闹追逐。游击队押着一百多名俘虏，扛着缴获的七十多支枪，三箱子弹，两匹马，直奔子午岭去了。

指 挥 敌 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石秀山奉合水县委命令，带领游击队来到盘克安子头堡一个小村庄开展工作。一天中午，一个放羊的小伙子突然跑来报告说：“保安队来了！”

“多少人？”石秀山问。

“好大一群哩！还有骑马的。”

“从哪儿来？”

“从塬上来的！”

石秀山听罢，立即召开会议部署战斗。

原来，敌保安大队长李鸿轩得知石秀山游击队来这里活动，便带领一个营，分两路向游击队迫来了。

开罢会，石秀山带领游击队刚要冲上塬的时候，保安队已经来到塬畔，双方立即接了火。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游击队虽然打死了不少保安队伪兵，但因敌人人多武器好，游击队处于被动地位。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石秀山命令两名游击队员脱下被打死的保安队一个小头目和一些伪兵的服装，然后率领游击队向沟底撤退了。

李鸿轩看到游击队撤下了沟，便洋洋得意地说：“这一回，石秀山就是长上翅膀，也逃不脱我的手掌！”他认为，沟口有他的人马堵截，后面有他亲自督战，石秀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束手就擒了。想到这里，他点起一根烟，坐在塬头上架起二郎腿，嘴里哼着小调，观起阵来。

游击队冲到沟口时，遇到了堵截的敌人，他们正要开枪，只见石秀山骑着一匹马，从一片丛林中气昂昂地走出来。他头戴保安队长官的帽子，身穿保安队军官的服装，挥

动着手枪，冲到敌人面前，跳下马，脱下手套，“啪啪！”朝那领头的伪兵脸上就是两巴掌：“他妈的！你耳聋啦还是眼睛啦？自己的弟兄都认不出来了？！”伪兵们你看着我，我望着你，一个个灰溜溜地低下了头。石秀山挥着手枪说：“守住阵地别动！游击队要是从后边逃来，你们就地堵截！”说罢，带着游击队员冲过敌阵，向沟口跑去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李鸿轩听不到枪声，心里犯疑，便带领人马，直奔沟底。到沟底一看，只见保安队员一个个没精打采地伏在地上。他立即喝问：“游击队哪儿去了？”

“没过来呀！”一个小头目惊讶地回答。

“胡说！刚才过去的是什么人？”李鸿轩气得七窍生烟。

“是咱们的一些弟兄嘛！”

李鸿轩知道他的蠢兵上了当，气得脸色铁青，把牙咬得“咯咯”响，上前朝小头目“叭叭”就是两耳光，又歇斯底里地嚎叫道：

“他妈的！快！快追游击队！要是放跑了石秀山，老子要你的命！”

保安队乱七八糟地开了枪，慌慌乱乱地向沟口追了去。可是，石秀山和游击队却早已无影无踪了。

天大土山，保安队追到沟口，见沟口有游击队，保安队不敢进沟，只在沟口放枪。石秀山和游击队在山沟里，见保安队不敢进沟，就放心大胆地休息。石秀山和游击队在山沟里，见保安队不敢进沟，就放心大胆地休息。石秀山和游击队在山沟里，见保安队不敢进沟，就放心大胆地休息。

智勇双全 威震敌胆

高士文

陕甘宁边区时期，镇原县马渠堰上，有一个威震敌胆的游击小组。这个游击小组的组长名叫王存仁。

这里就说说他的故事。

一九四〇年那时候，马渠堰地处陕甘宁边区前沿，和国民党统治区黑渠口只隔一条沟。在横亘五十多里的封锁线上，国民党顽军修筑了七个碉堡，驻扎了一营正规军、一个保安中队和一个便衣队。这些家伙，经常窜进边区抓人抢掠，糟蹋妇女，赶走牛羊，无恶不作，骚扰得群众不得安宁。

当时，王存仁是马渠堰自卫军指导员。他看到敌人祸害边区人民，真把肺都要气炸了。可是，每次敌人来窜犯，他刚把自卫军集中起来，这些家伙就闻风逃窜了，追击了好几回也没顶啥。怎么办呢？王存仁思谋来思谋去，想出了一个法子：组织游击小组，敌人不来就地生产，敌人来了打它个措手不及。他去找郭秉儒、陈宗祥、陈俊海等几个有胆有智的小伙子商量，大家都说：“豁出这一百来斤，和他们干！”这样，五个人、一支步枪、四把大刀の游击小组就成立起来了。大家推举王存仁当了小组长。

有一次，敌便衣队的几个家伙，又大模大样地窜到了马

渠堰，妄想搜刮一笔钱财，被王存仁带领游击小组捉住了，吓得这几个坏蛋跪在地上，连磕头，带作揖，连声告饶。王存仁沉着脸说：“给你们当官的捎句话，团结抗战是友军，骚扰边区就是敌人。我们游击小组不好惹，不怕死的就来吧！”这几个家伙连爬带滚地逃回去以后，害怕他们的上司治罪，就加油添醋地报告说，马渠堰上从延安来了个王存仁，打枪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带的游击队有好几百人，厉害得很哩！这一下，敌人就再不敢轻易到马渠堰上来骚扰了。当地群众高兴地夸奖说：“王存仁组织起游击小组，咱们心里宽展的多了！”

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反动派窜犯边区的活动越闹越凶。五月初五这天晌午，王存仁正在家里吃饭，接到情报说：顽军的一个营配合四十个骑兵，在一个绰号叫“黑蝎子”的副营长指挥下，企图趁自卫军和群众过节之机，偷袭我汪家庄一带。王存仁撂下饭碗，带领游击小组和我镇原县政府派到马渠堰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八个同志，一起赶到一个地势险要的峁峁埋伏下来，准备迎头痛击进犯之敌。

“黑蝎子”四十来岁，到黑渠口才一年多，常到老百姓的家里，胡作非为，敲诈勒索，长得漂亮点的小媳妇、大姑娘，一个也逃不脱他的手。他看谁不顺眼，有理无理都是三马鞭，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因此，当地群众给起了个“黑蝎子”的绰号，意思是说这家伙歹毒极了，谁碰上谁招祸。

“黑蝎子”虽说歹毒，其实也怕王存仁的游击小组。他到黑渠口一年多了，从来没敢到马渠堰上去。王存仁早就想收拾掉这个家伙，为民除害，他就是躲着不出来。这回，

“黑蝎子”仗着兵多势重，虽然心虚胆怯，终究还是摇头摆尾地出来了。他骑着一匹大黑马，走在大队敌军中间，指挥着敌军顺一条沟向我边区扑来。这家伙看四周没啥动静，就吹开了牛皮：

“哼！人都说王存仁厉害，我就不信他还长着三头六臂？这回不活捉王……”。

“叭！”“黑蝎子”话没说完，王存仁一枪揭飞了他的大盖帽，吓得他黑皮脸一下子变成了灰白色。

这时，游击队员和工作组的同志，一齐开枪射击，手榴弹也飞向了敌群。“冲啊！”“杀啊！”的呐喊声，在山沟里回响着，好象有千军万马。刚才还得意洋洋的敌骑兵，勒转马头就逃，和步兵搅在一起，乱作一团，狼狈逃窜。“黑蝎子”和几个骑兵从受惊的马背上跌下来，跟在马屁股后头没命地逃跑。王存仁瞄准一枪打断了“黑蝎子”的腿，带领游击队员冲杀下去，活捉了这个坏蛋。

那时候，马渠堰上的群众和对面堰上敌占区的群众，同吃一条沟里的水。一九四四年十月间，一股顽军占据了黑山梁，强迫当地群众挖断了我根据地群众下沟挑水、驮水的道路。我金家堰有几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下沟去修路，被黑山梁的敌军一阵乱枪打了回来。他们便去向王存仁报告。

王存仁这时担任马渠区自卫军副营长，正在区上训练基干自卫军。他听到群众报告，便带着三个游击队员，赶到了金家堰。

这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王存仁隔沟望去，只见敌人已经在黑山梁半山腰修了几个碉堡。碉堡附近的一棵大树下集聚着一大群敌人，有的围成一堆赌博，有的七倒八躺着。枪

都架在大树下，连个放哨的也瞅不见。

王存仁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就思谋好了奇袭黑山梁的战斗方案。他斩钉截铁地说：“打！打他个措手不及！”他派人到区上和自卫军联系，自己和三个游击队员分作四路，凭着地形熟悉，神不知鬼不觉地迂回到了敌人工事附近。他们一跃而起，把绑成捆的手榴弹投进了敌碉堡，接着一齐向大树下的敌人开了火。金家堰畔上观战的群众，这时也一齐呐喊起来，“捉活的啊！”“缴枪不杀啊！”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敌人象受惊的兔子，一口气窜了二里多路才清醒过来。当敌人发现只有几个游击队员时又用机关枪向王存仁他们射击，顽抗了起来。这时，又有六个游击队员赶来，向顽军侧面发起了攻击。他们两面夹击，终于将敌人赶回了老窝，夺回了黑山梁。第二天，我根据地的群众又把通向这条沟的路修好了。金家堰群众杀了两只羊，抬着热腾腾的白蒸馍，热情地慰劳为民争水的游击队员。

一九四四年冬天，一连下了几场大雪。马渠堰上银装素裹，预示着边区的又一个丰年。

这时候，从延安传来了喜讯：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就要召开了！马渠堰、镇原县和陇东分区的党政军民各界，都一致推选王存仁去延安参加群英大会。

如要问王存仁的功劳有多大？延安《解放日报》上曾详细记载着王存仁游击小组的功绩：仅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王存仁游击小组和进犯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三十二次，俘虏顽军副营长和顽军五名，缴获敌人轻机枪一挺、步枪四支、手枪一支、战马五匹、掷弹筒四发、子弹二百六十发、军大衣、军毡十件等。

一九四四年底，王存仁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在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他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聆听了毛主席《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各路英雄云集，会场内外春意盎然，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命名、授奖仪式在热烈的掌声中进行。王存仁被授予陕甘宁边区特等民兵英雄的称号，并发给他特等奖八万元边币、奖状一张。

特等民兵英雄

战斗英雄师学久

勇保重机枪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九三九年。

那时候，我八路军三五八旅警备七团三营驻扎在陇东宁县县城东端，而胡宗南新编一五六师和地方武装的一个保安大队驻扎在县城南、北、西三面。两军对峙，隔街相望。

这一年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突然向八路军三营驻地袭击过来。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军奋起自卫还击。拉锯战打得非常激烈。

战斗到第五天，因敌众我寡，三营奉上级指示，决定暂时后撤。营长罗得胜命令有阻击经验的师学久带一挺轻机枪和八个战士打后卫，掩护全营退上东山。

接受任务后，师学久选择了一座破庙作为堡垒阻击敌人，让战士们都隐蔽好。我军撤退后，敌人攻势更猛，枪弹象雨点般地打了过来，直打得庙顶瓦片乱飞，房土刷刷直淌。师学久和战士们沉着应战，弹不虚发，使冲上来的敌人不得不溃退了下去。敌人从大门里冲不进去，就采取发大

烟，发银元的办法，组织敢死队，企图越墙而入。可是敌人从墙上刚一露头，师学久的机枪就吼叫着点起名来，敌人一个个被打得倒栽下去，连边也沾不上。

阻击任务完成后，师学久当机立断，命令战士们歇空子冲出去。他自己悄悄顺墙根爬到大门口，“轰！轰轰！”接连向门外扔出几颗手榴弹，炸开一条路，乘着烟雾，冲出了庙院，带着战士们向东山方向撤退。

敌人见师学久他们突围了，哇哇叫着追了过来。师学久把机枪交给一个战士，换了他的步枪说：“你们快撤！我在后面挡一阵！”

师学久边打边退，路过部队原来驻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院子里放着一挺部队转移时没来得及带走的重机枪，旁边还有一箱子弹。他想，枪是部队的性命，没有它，部队怎能打胜仗？不能扔！用烈士鲜血换来的宝贝，不能让敌人夺走。他背好步枪，鼓劲把重机枪连枪架带枪身，一齐扛上左肩，右肩架起子弹箱，憋足气，直向山上冲去。

尾追的敌人见一个大个子扛着一挺重机枪上山，料定他跑不了几步，就会压得停下来，便紧追不放，高喊“缴枪不杀！放下枪有赏钱！”师学久想：“你猪吃西瓜皮——想得脆！叫我缴枪？做梦去吧！”敌人见大个子一个劲地跑，不缴枪，便开了枪。子弹在师学久耳边嗖嗖直响，脚下弹丸冲得黄土直冒。师学久毫不在乎。他只有一个心眼，保住机枪就是胜利。

这段山路很陡，足有一里。师学久跑出半截，全身大汗淋漓，眼前金花飞舞，他咬紧牙关，加快了脚步。尽管如此，敌人还是越来越近了。师学久连头都不回，猛地把早已

打开盖、勾上环的一颗手榴弹用夹子弹箱的右手往后一扔。手榴弹朝着敌人飞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前面的敌人不动了，后面的敌人吓得放慢了步子。师学久乘机一鼓作气冲上了山头。

这时，营长罗得胜闻讯带领战士前来接应。他紧紧握住师学久的手，激动地说：“学久同志，累坏了吧？你真不愧是个老共产党员。”周围的战士也都说：“师副排长真厉害。”听着首长和同志们的表扬，师学久憨厚地笑了笑。他感到胸部疼痛，嗓子干燥，心里一阵翻腾，连吐几口鲜血，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不久，警备七团在西华池召开全团军人大会，表彰了师学久不怕牺牲、勇保重机枪的事迹，奖给他军服一身，由副排长提升为机枪排排长。团党委号召全团战士学习师学久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战斗精神。

舍生忘死救战友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月的一天晚上，合水游击队转战来到子午岭边缘地区的生王村宿营。

第二天快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发现敌人的马队向驻地奔袭而来。游击队队长石秀山和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唐凤仪交换了意见，命令队员们迅速撤到不远处的徐阳沟里去，然后再向东南方向的密林深处撤退，同时让师学久带领刘生财和另一名战士留在部队后面，掩护大家突围。

师学久三人闻命迅速占领了一个制高点，刚给轻机枪压上子弹，敌人的马队就冲到了跟前。师学久瞄准了跑在最前面的敌人，只一梭子，就有四、五个敌人落马倒地。后面的

敌人吃了一惊，急忙收住马缰绳，举起枪乱放了起来。过了一会，师学久回头一看，见游击队全下了山沟，钻进了梢林里，便朝刘生财二人一挥手，三个人一溜烟似地下了深沟。

师学久下沟后领着刘生财他们一阵猛跑，正跑得起劲的时候，猛然听到有人喘粗气。他们顺着声音搜寻过去，发现水渠旁躺着一个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副大队长唐风仪。师学久叫了一声：

“唐风仪！你不想活了？睡到这里做啥哩？”

唐风仪睁开眼一看，是师学久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跑不动了，你给我一枪吧，省得叫敌人捉住受欺侮。”

“你说啥？！走！有我在，就有你在。”师学久坚决地说。

副大队长唐风仪，又高又胖，体重一百八十多斤，平时走路一摇一摆，很不方便，是有名的“胖队长”。在今天的紧急撤退中，他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因梢林太密，和同志们跑散了；后来，越跑腿越软，越跑气越短，渐渐力不从心了，腿肚一软，便昏倒在河渠旁。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敌人的枪声更近了。“走，赶快离开危险区。”师学久一手提轻机枪，一手扶起唐风仪，顺沟钻进梢林里。

他们翻一个小山坡时，被敌人发现了，随即子弹扫过来。沟底，敌人的喊叫声，战马嘶叫声乱作一团。大约二十多个敌人跳下马，冲着他们四人追上来。为了摆脱敌人，师

师学久把唐风仪交给刘生财二人护理，接着先走。他隐蔽下来，准备打敌人个冷不防。

马匪军根本没把游击队放在眼里，他们追一阵，放一阵枪，企图抓活的。不料追至半山腰时，被没头没脑的机关枪打得东倒西歪。机灵的师学久左转右拐，绕着梢子堆边打边退，闹得马匪军不知遇上了多少游击队，不敢轻举妄动。

这当儿，刘生财两人架着唐风仪爬坡，已精疲力尽了。唐风仪再三要求：

“放下我！你们快走！不要连累大家。”

这时，师学久正好追上刘生财和唐风仪他们，听唐风仪这么说，不禁有点发火：

“不行！要活，活到一块；要死，死到一搭！”

师学久见刘生财确实也累极了，便冲他喝道：“架过来！我背！”

师学久背起唐风仪，手里提着轻机枪，加快了步伐，朝前奔去。他们在梢林里钻来钻去，和敌人捉迷藏，也不知翻了几条沟，过了多少条溪流，和敌人整整周旋了一个上午，直到太阳当头的时候，枪声才停息了下来，总算摆脱了敌人的尾追。

巧布空城计

一九四九年农历四月初五日，是西华池五天一次的逢集日。一大早，赶集的群众就三三两两地上路了。

太阳冒红时分，在华池河畔孙家寨沟的大路边，有四个庄稼汉模样的人坐在路旁的石头上，一边休息，一边唱着慢头。他们是合水游击队派出的侦察员，正等着和合水县县长

胡宗彦接头，汇报情况，部署今天进西华池城向群众作宣传的事情。其中的大个子，就是游击大队警卫队队长师学久。

太阳一杆子高的时候，胡宗彦带着县委宣传部部长杨兴盛和警卫员高宗贵从城关方向匆匆赶来，一下马，就急切地问：

“学久同志，城里情况怎么样？”

“和往常情况差不多。南义城里的自卫队长陶生元很狡猾，白天怕吃亏，多是晚上搞偷袭，胡乱抢些东西就跑了，根本不敢久留。我看咱们学个诸葛孔明，也给他设个空城计。我们大开城门，装做消闲的样子，蹲在城墙上，你散心大胆在城内给群众宣讲，叫他陶生元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猜不准咱们今天到底来了多少人，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师学久汇报完情况，又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

胡宗彦想了想，拍着师学久的肩膀说：

“好，就照你的方案办。”

这时，一向谨慎小心的杨兴盛有点担心地说：“胡县长，咱们只有七个人，万一有意外，怎么办？”

师学久胸有成竹地说：“怕啥，地形我看了，去了以后，你尽管协助胡县长进行宣传，安全工作我包了。万一有情况，听我的枪声，你们一齐朝北城门外撤，我在南城上掩护，保证他三、五十人别想沾边。胡县长的马不是很快吗？放开跑，一袋烟功夫就是几十里，看他往哪撵。”

师学久一席话鼓起了杨兴盛的勇气。大家又商量了一阵，同意按师学久说的办。

这时候，来赶集的群众络绎不绝，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师学久他们立起身，拍打了几下身上的土，夹在行人群

里，大步向西华池城里走去。当时的西华池城还是由国民党控制着。

进城后，他们在一家小店里换上解放军军装。师学久把胡宗彦那匹黑马拴在店门外显眼处，命令两名战士持枪站在大门口，不许一人出入。自己带上另一名战士，扛上机枪，由北向南，通过街市，径直上了南城门。

进城的老百姓见了师学久，一个个又惊又喜。有的说：“看，那是师学久。保险是解放军的五团回来了。”有的说：“师学久带了解放军，准要好好教训一番陶生元，那个坏种到底把人欺侮够了。”

就在师学久上南城的同时，胡宗彦、杨兴盛和高宗贵也上了北头的戏台子。这里的老百姓多半认得胡宗彦，一个个上前问长问短，拉呱了起来。赶集的群众听说共产党的县长进城了，都跑来看热闹。不一会，集圆了。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胡宗彦看时机到了，便开始向群众讲话。他首先讲了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接着动员群众种好分到的土地，青年人要积极参加民兵或游击队，支援全国解放，最后号召父老兄弟，共同劝说在国民党军队和自卫队当兵的子弟，不要为敌人卖命，尽快选择出路，立功赎罪，求得宽大处理。

胡宗彦和杨兴盛交替宣传，震动了台下的群众，人们议论纷纷。就在他们宣讲快要结束时，师学久派人来报告说，听见南面有枪声，要胡县长马上出城。胡宗彦一想，宣传工作已达到目的，便告别乡亲们，骑马出了城。

走不多远，师学久也扛着机枪赶上来。他笑着对胡宗彦说：“只听见城外枪声响，没见一个敌人敢进城。要是他进

来，我不叫他饱吃一顿‘落花生’才怪哩。”

杨兴盛望着师学久，长长出了一口气，说：“老师，我算服你了。”引得大家一阵大笑。

原来，师学久他们一进城，南义城的敌人便衣侦探就去报告了。自卫队长陶生元领着七、八十名匪徒和二十多名马匪骑兵，准备进城捉拿胡宗彦。到了离城六、七里的师家庄，听说师学久带着一个兵，在城头上守住机枪抽烟，胡宗彦领着两个人在戏台子上讲话，店门口还守着两个警卫，一定是解放军大部队回来了，城里肯定有埋伏，轻举妄动要吃大亏。愚蠢的陶生元越发胆小，生怕上当，于是，打了几枪就溜之大吉了。

新宁县建立前后

罗金财 李什立

新宁县是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建立的一个县，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它所辖区域主要是陇东宁县、正宁县靠近子午岭的一些地方。新宁县是当时关中苏区所辖的四县之一，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粮食基地。新宁县的建立对打通南梁根据地和关中地区的交通，使之联成一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中共新宁县的建立 和革命武装的发展

新宁县的革命斗争开展得比较早。早在一九三一年春季，刘志丹曾率部队经合水到达宁县盘克塬，并在宁县张皮家塬与陇东军阀陈珪璋部激战，后因敌强我弱，转移至正宁、旬邑一带活动。同年五、六月间，志丹又以陈珪璋部十一旅旅长的身份，率部三百余人，驻防宁县早胜镇一带。一九三二年一月，刘志丹率领部队沿二将川，经宁县盘克向关中前进，途中宿营寺沟洼村。两天以后，他们离开了寺沟洼，以后又在北柴桥子正式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在“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影响下，何炳正、王占义、王清殿等人拉起队伍，在宁县平子和正宁县山区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并在一九三二年前季，公开打出了平子游击队的旗号，由何炳正担任队长。十一月左右，李德录离开平子游击队，负责宁县地方工作。次年八月，平子游击队改编成为宁县、正宁两个游击队，即陕甘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宁县第三支队和正宁第四支队。第三支队队长王德宽（一九三六年叛变），指导员李士新。三支队中建立了中共支部，党员有杨万恒、王占义、王清殿、卜付明，卜付明任支部书记。当时，在宁县农村中还未建立党支部。一九三三年十月，罗金财经李德录介绍入党。罗金财入党后，和第三支队的党员在一块过组织生活。到十二月，在宁县月明堡杨家园子成立了党小组，由罗金财、张兴财、张金魁、李清海、刘泽福（一九四七年投敌叛变）五人组成。这个党小组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又发展了四名党员，共九人，成立了党支部，张金魁任支部书记（一九三四年三月，由罗金财接任支部书记）。

党支部建立后，立即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赤卫军，扩大游击队，为建立地方政权打基础。当时，红二十六军在刘志丹等人的领导下，恢复了建制，经常到宁县来活动。这时，杨家园子建立了农民赤卫军大队，参加赤卫军大队的有杨家园子、寺沟洼、南堡子、柴桥子、韩家塄、月牛坡、段舍等六、七个村子二百多户人家的近四十名青年，张金魁任大队长，罗金财任支部书记兼中队长。这个大队只有一个中队。赤卫军组织起来后，白天生产，晚上出去打土豪，所得的粮食、衣物、钱财、牛羊分给雇工和贫民。此外，赤卫军还负责动员雇工参加游击队，帮助建立农会、雇工会（贫农团）、

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在各党支部相继建立的基础上，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九岭桃树庄正式成立了中共新宁县委，由焦怀兴任书记（县委组织未公开）。

县委成立后，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积极建立游击队。一九三四年春天，在月明塚成立了宁县游击队一支队。早在一九三三年腊月，党组织曾派罗金财和贾老九（哥老会成员）去收杨德明的枪（该杨原在马栏镇夏老么民团，他从民团中拉出了七、八条枪，在子午岭山上当土匪，后来，跟随他的陕西人跑回去了，他便把枪压下，跑到了陕西长武）。罗金财通过哥老会的张老九，找到杨德明，给他做思想工作，还给了他牛、驴各一头，杨交出了枪支。接着又收了潘老二、潘老么的七支枪，也给了潘一些钱财、大烟。这样共弄来十几条枪，成立起了宁县游击队一支队。因杨德明愿意同我们一块干，他的枪法准，就让他担任了队长。四、五个月后，经组织同意，他回去成了家，离开了一支队。由樊登魁继任队长。

一支队成立后不久，月明塚上还建立了宁县游击队十八支队，由王德宽任队长，周效堂任指导员（王、周二二人于一九三六年叛变。周投敌后，被敌人杀死。王作恶累累，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在山河镇）。

二、新宁县革命政权的建立

中共新宁县委的建立和革命武装力量的逐步发展，为新宁县革命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根据小石崖南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在杨家园子成立了新宁县革

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由李德录主持，南区革命委员会派李上清参加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宁县游击队第三支队和农民赤卫军及农民群众共三、四百人。大会选举张有鹏任主席（该张于一九三六年叛变，后由李老五任县苏维埃主席，后又由张云德继任），王清殿任副主席，杨万恒任财政部长，王立元任食粮部长。新宁县革命政权成立后，又建立了县保卫队，由王清殿兼任队长。县保卫队由二十多人组成。新宁县革命委员会设在杨家园子（一九三七年后季迁至九龙川上齐家，一九三九年后季迁湘乐，一九四一年再迁梁掌）。

新宁县革命委员会辖有两个区九个乡。一区区委书记张兴财，区政府主席胡金玉（一九三六年叛变）。区革命委员会设有食粮委员、军事委员、建设委员、农会主任等。区政府设在杨家园子（一九三五年后季迁至九岷鸭儿沟），直辖五乡：一乡（西坡），二乡（贾义川），三乡（月明），四乡（九龙川），五乡（九岷）。二区政府设在麻子掌（后迁金村梁掌，再迁排楼村），直辖四乡：一乡（平桃川），二乡（麻子掌），三乡（金村），四乡（洛后任掌、川庄子、北吉坡、杨台、九园子、柏树底、潘村等，不包括盘克）。

三、平分土地和反“围剿”斗争

新宁县革命政权建立后，领导人民开展了平分土地和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关中特委派文志恒到新宁县领导土地分配工作，在月明堡韩家湾开会，成立了新宁县土地委员会，文志恒任主任，胡金玉、罗金财、张金魁、姚发元为委员。土地委员会成立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开始一个乡一

个乡地分配土地。土地分配的办法是：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在分配中，地主按人口分坏田，雇农、贫农每人平均分二十亩左右的好田，其余留作公田。在公田里插上木牌，标明“公田”。除分田地外，还分牛羊和其它财物，如农具等。分配给农民群众的田地，由土地委员会发给土地证。那时土地证的纸质很差，是一片麻纸。土地证的书写格式也很简单，记有姓名、土地数量及起止方向。

分给×××				
土地	南止	北止	东止	西止
荒地××亩，		川地××亩。		
土地委员会				
年 月				

新宁县的土地分配工作还未进行完毕，马鸿逵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围剿”，西坡、梁掌两个乡未能进行分配土地。

虽然土地分配在新宁县所辖的两个区内没有完全进行完毕，但通过分配土地，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从而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土地分配前，有的农民不愿当赤卫军，赤卫军的队员往往为上级组织指派，地方党组织还要多次去做动员工作。分配土地后，农民动员起来了，都不给伪政权交粮款，伪政府也不敢派人去收粮款。还有一些农民主动参加赤卫军、游击队和红军。月牛坡的李树发曾引七、八名青年参加赤卫军，他还向我政府机关报告了咀头村绅士李自来和月牛坡民团马进财的反革命活动情

况，使我游击队顺利地捕捉了他们，保护了群众。农民张树兴、徐德福等八人也主动要求参加了红二十六军，农民群众参军参战、保卫革命政权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同党领导的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三四年前，革命力量较小，敌人的“围剿”力量也是小股的，多是出动地方民团，如鹿明胜、杨光明、康××等的民团。敌人对新宁县实行大规模的“围剿”是在一九三五年夏季。敌冶成章（外号野骡子）旅的一个团进攻新宁县，团部住盘克，宁县其它地方，如梁掌、九坝等地都住有整营的散兵。

敌人到处拉夫，抓丁，筑碉堡，挖战壕，强迫老百姓给他们送粮、送草料，给马饮水等，敌人还拷打群众，屠杀干部，抢掠财物，宰杀牲畜，奸污妇女，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凶残的敌人在宋家庄将我一名村干部的头割下，装进牛笼嘴里，挂在大树上。敌军在麻子掌一次就抢了群众五十多头牛，全部宰杀吃光。群众养的蜜蜂，也被他们用火烧尽。不少地方房屋被毁，田地荒芜。

在敌人进行大规模“围剿”时，虽然我正规部队和大部分游击队开到了陕北，留在地方上的只是一小部分游击队和全部农民赤卫军，但在党政组织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积极地进行了反“围剿”斗争。

反“围剿”斗争一开始，党领导人民进行坚壁清野工作，把粮食藏起来，把水井上的井绳砍断，使敌人来后，吃不到粮，喝不上水。此外，党政领导机关也转移到子午岭山区或敌后，组织革命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为了保护群众，党还有计划地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在反“围剿”中，许多共产党员、游击队指战员和赤卫军战士发扬了不怕苦、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同敌人展开了斗争。就拿一支队说，成立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牺牲了樊登魁、王占财、樊登甲、崔瑞三等四名队长。一九三五年秋季，一支队队长王秉祥调中共新宁县县委工作（中共新宁县县委机关在一九三五年在苏区群众中公开。焦怀兴仍任县委书记，王秉祥调任县委宣传部长）由指导员乔占财兼任队长，率领一支队在金村庙抗击来犯之敌。县军事委员会副主任谭德智和一区三乡主席罗金财率领赤卫军前去配合一支队作战。在这次战斗中，我方一百余人，与敌军激战一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敌人十儿名，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便主动向南撤到九观。在这次战斗中，谭德智又英勇牺牲了。

一九三五年的反“围剿”斗争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直到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到新宁县，敌人的部队才被迫撤走，反“围剿”斗争赢得了胜利。

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新宁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一九三五年成立了新宁县第三区。区苏维埃政府设在石鼓，直辖石鼓、子坊（湘乐小川子）、八堰、南川四个乡。区委书记朱正原，区主席张义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关中特委召开了赤水、淳耀、新正、新宁四县的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在三嘉堰的吴家圪塔举行。新宁县出席会议的有焦怀兴、王秉祥、罗金财、董××、马有才等，住在北沟村。会议研究和讨论了建党、扩红和对敌斗争等问题。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共新宁县县委抽调了米世银等到平子去建立党组织，成立地下区委。同

时，对原有党员加强教育和审查。在这次会后，新宁县的各级党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和巩固，加强了党的战斗力，这就为在一九三六年彻底粉碎东北军对新宁县的“清剿”，作好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在党领导下，新宁县人民反“围剿”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终于建立起了三个区，包括了从原正宁县山河镇以北，到盘克、合水固城川东西一百余华里，南北一百七、八十华里的地方，成了拥有五条塬（西坡、月明、九峁、金村、盘克）、五个川（于家川、九龙川、平桃川、湘乐川、固城川——川北为合水，川南为新宁县）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于一九四〇年前季又先后建立了第四、第五两个区，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庆北县

李仲五 王志堂

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南梁政府。在南梁政府成立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期间，相继“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的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工农兵政权”^①。庆北县便是其中之一。

庆北即庆阳东北部地区（今华池县悦乐、城壕、柔远一带），这一带山大沟深，人口稀少，文化落后。牛羊、土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地主“恒义兴”（李子良）、“裕茂隆”（韩少文）手中。他们每年从悦乐川、柔远川、城壕川的贫苦农民中榨取三、四千石的租子。从民国初年以来，陈珪璋、谭世麟一伙土匪，欲霸陇东，在这一带大办民团，修堡筑寨，欺压群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反抗民团、地主的压榨，这里的群众曾组织天门会进行过自发的斗争。

红二十六军在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于一九三三年七、八月和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春，多次在这一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张秀山、张志孝领导的庆阳游击队亦积极配合，宣传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一九三四年夏季，红二十六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

一次围剿后，重新回到这一带，为开拓庆北苏区，建立庆北
县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一、庆北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庆北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一九三三年十月中旬，刘志丹在合水县莲花寺野鸡台正式恢复了红二十六军的建制（红二十六军建立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后由于杜衡的“左”倾错误，曾指令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致遭失败，杜衡当了可耻的叛徒），在桥山山脉中段开辟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率部攻克合水县城，接着在合水县杨家店子和毛家沟门进行战斗，三战三捷，歼敌数百，军威大振。黄子文、刘约三等同志率部在今华池县荔园堡消灭张廷芝三团的梁邦栋营，解放了荔园堡。十一月份，刘志丹率部返回南梁。接着成立了后方委员会，由吴岱峰同志任主任，张策为后方特派员，进行发展组织、武装群众、建立根据地、支援红军作战等工作，同时组织了三个游击队，即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刘约三同志担任游击队总指挥兼保安游击队支队长。庆阳游击队长由杨培盛担任，习仲勋同志为第一任政委，在庆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一九三四年四月份，马仰西同志从保安游击队来到庆阳游击队，担任宣传队长。当时习仲勋调回南梁筹备建立南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由惠子俊任政委。五、六月份，张秀山到庆阳游击队任政委。张秀山、王宝珊、张志孝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在柔远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鸭儿洼河西的陈家村几十户人中组织了贫农会，选举温满仓任贫农会主席。同

时，张秀山还派马仰西为党代表，负责筹建庆北革命委员会②。马仰西以党代表（未公开）和游击队代表身份积极进行工作。

庆北革命委员会设在龙木庄，由党代表（一人）、游击队代表（马仰西兼）、贫农团代表（二人）、赤卫队代表（二人）、农民联合会代表（二人）组成。革命委员会设有秘书长（马仰西担任，公开身份）、财经委员长（高登州担任）、劳动委员长（党生喜担任）、肃反委员长（朱三担任）、文化委员长（马仰西兼任）。

庆北县苏维埃政权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庆北城壕杜家河的贫苦农民王宗万、王兴成被民团逼迫出走南梁，参加了红军，到一九三三年四月回到杜家河，进行秘密革命串连。这年秋季王宗万在田德润民团中拉出了一些人，成立了游击队。但这支游击队由于叛徒出卖被搞垮了，王宗万又逃至南梁。一九三四年八月，庆阳游击队的马仰西率领宣传队由柔远出发到柳湾沟、杜家河、小川沟一带开展革命宣传，组织农联总会。与此同时，王宝珊在杜家河（今属华池县温台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田家河区苏维埃政府。李培福同志担任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区苏维埃政府设有秘书（白红头担任）、肃反委员（朱丕岗担任）、财政委员（张福担任）、土地委员（赫三担任）、工会委员（亦称雇农委员，席狗娃担任）、赤卫队长（李占义担任）。

杜家河区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保卫革命政权。李占义积极组织赤卫队，配合庆阳游击队打土豪，攻民团，曾两次攻打悦乐

堡子（谭世麟民团驻地）。以后，李占义请求组织游击队，经庆阳游击队政委张秀山同意，并于九月五日，由张秀山政委在大湾沟门亲自发给了李占义两支枪。李占义靠着这两支枪，组织了十人左右的游击队，命名为庆阳游击队四分队。由李占义同志担任了分队长。四分队成立后，主动打击敌人，如在九月下旬，配合红二十六军骑兵团（赵国卿团长）攻打庆阳县三十里铺民团团总朱寿。队伍到达后被民团发现，为保存力量，四分队转到张家湾子，转攻民团团总孙向魁，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战后处死了孙向魁等三人，并没收其财产。接着又配合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的两个连北上曲子镇攻打李恒泰团总（该李拥有骑兵队，约三、四十人，步兵队，约五、六十人，共计一百多人），收缴了民团枪五、六十支、马三十多匹，俘敌十多人，打死民团团总李恒泰及环县县长等五人。这次胜利，使四分队获得了新的装备，一人骑了一匹马，扛了一条枪，战斗力大大加强。曲子镇战斗的胜利，使民团吓破了胆。四分队返回时，谭世麟闻风而逃，悦乐一带得到了解放。柔远、悦乐、城壕等地乡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张生俊为悦乐乡苏维埃主席，李万义为赤卫大队长，张正里为城壕赤卫大队长）^③。同年十月左右，温台、城壕、悦乐、新铺等区苏维埃政府也先后成立，李培福担任温台区苏维埃主席，领导一支游击队在杏义沟、马家山、龙木庄一带活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南梁政府成立后不久，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正式成立。李培福参加了庆北县政府的筹建工作，以后由边金山担任庆北县苏维埃主席。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最早设在田家窑，后至龙木庄，再迁到黄大原，辖有温

台、柔远、悦乐、新铺等地，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敌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时，我红军主力转移，敌人占领了庆北县，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才暂时被撤销。

二、庆北游击支队的诞生

敌人占领了庆北县后，一面建立保甲制度，一面进行并村与搜山。他们把群众集中在一些比较大的山上或村子里，妄图割断群众与游击队、红军的联系。地主豪绅也卷土重来，实行反攻倒算，与反动军队一起，到处捕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红军战士，坑害群众，搜掠财物、粮食、衣服，驱赶牛羊，弄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敌人的屠杀政策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满腔仇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游击战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庆北游击支队就是在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二次围剿中诞生的。当敌人侵占庆北县时，我庆阳游击队的大部分队员被编入红二十六军三团，充实主力部队并进行了转移，剩下的二、三十名游击队员，三月份在元城子进行整编，由王宝珊担任游击队总指挥，采用化整为零，多方出击的方法，继续开展斗争。庆阳游击队下设有：镇原游击队（指导员姚俊，队长马寿民，向曲子方向活动）；环县游击队（指导员李占义，队长王怀岗，向环县发展）；定边游击队（指导员张弟，队长黄泰，以元城子附近半个城川为活动根据地）。一两月后，环县等四个游击队发展到一百余人。当四月份马鸿逵部进占我元城子后，这支游击队又突破了马鸿逵部及民团头武绍文的堵截、尾追及包围，于四月下旬在麻地台川，又一次进行了整编，正式成立了庆北游击支队，队长王怀岗，政委强家珍。

庆北游击支队下设两个大队，一大队指导员李占义，大队长姬彦凯，二大队指导员张弟，大队长贺某某（后叛变）。大队下设分队，一大队有四个分队，二大队有三个分队。庆北游击支队成立后，过白豹、脚扎川，得到赤安县游击队、红二团的帮助，上了陕北，在保安、吴旗、定边、安边、靖边一带游击。

三、庆北游击队为恢复庆北县 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马鸿逵部占领庆北县后，李培福、李树林等被迫转移到合水养伤治病。一九三五年六月，李树林由合水返回温台区，在小川沟取出李培福埋藏下的两支枪，组织了五六个人秘密地进行活动，不久，又从民团团总王华处收回了五支枪，由田生弟负责成立了庆北游击队。接着在三里畔湾打了土豪敌钟营长家，没收其财产，并把驴、羊等变卖成钱，筹集了游击队的活动经费。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由陕南北上。马鸿逵部被迫撤退。李树林等同志负责积极着手恢复庆北苏维埃政府。他们首先成立了庆北办事处，由李树林、陈士根（文书，后由马荣担任）、张恭成、赫三、李二、朱三等组成，李树林同志总负责（在庆北县革命政权未正式建立前，庆北办事处实际上起着革命政权的作用）。他们采取敌人撤出一地就恢复一地的办法，温台区、柔远区、城壕区、白豹区先后相继恢复。庆北办事处设在麻梁梁，后迁至山庄、阴湾湾、谢子腰峁、新宁沟、杜家河等地。这时庆北游击队已有十六、七支枪。同时，白豹区、柔远区也成立了区游击队（白豹区游击队长杨生贵、李秀云；柔远区游击队

长廖连有)。庆北办事处成立后，李培福也由合水返回，参加了领导工作。办事处一方面派李培福、黄德胜到靖边找马仲西联系组织关系；另一方面积极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活动，打了土豪田生孝，没收其财物，送交到吴堡川双庙区（归赤安县管辖），处决了投敌叛变分子李万义等。一九三五年八月底，游击队又在悦乐与东北军打了一仗。这一仗，由于指挥战斗的陕甘省保卫队王德胜错误地把庆北游击队、庆北办事处特务班、陕甘边保卫队及一区赤卫队，共一百七、八十人，都调集起来和敌人硬拼，因而使游击队受到了很大损失。庆北游击队队长田生第及一个班长，英勇牺牲了，保卫队的两个队长霍得旺、郑兴财也受了伤。悦乐战斗之后，由于庆北游击队遭受了重大伤亡，不得不与黄克秀（黄镇）领导的合水游击队又合并为庆阳老游击队。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成立了华池战区，崔凤鸣为书记，高生荣为主席，张志德为团委书记。

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左右，庆北办事处和庆环办事处（设在元城子）以及华池战区合并，成立了华池县。华池县政府设在荔园堡，张建业为华池县县委书记。庆北县至此结束。

①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甘肃日报》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

②习仲勋、张秀山等同志回忆为庆北革命委员会。马仲西同志回忆为庆北办事处。

③张生俊、李万义、张正里等人在一九三五年二月马鸿逵部占领庆北县后，投敌叛变。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①

李 仲 立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堡（今正宁县三甲公社）正式建立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活动的历史虽然只有十个月，但对陕甘地区，特别是对陇东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陕甘和陇东革命斗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 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诞生在陇东是有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

首先，这里的农村阶级分化明显，农民惨遭剥削，阶级矛盾尖锐。正宁、宁县、庆阳等县的土地，分别集中在几家绅士手里。佃农占70%以上。地主、豪绅巧立名目，用各种手段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冯玉祥部在陇东、关中一带到处抓丁、拉夫、征粮、派捐，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陇东小军阀张兆铨、陈连璋先后长期霸占陇东，扩兵夺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孙蔚如（当时任甘肃宣慰使）又令陇东十二县供给新十

三师（陈珪璋部）给养，自此，陈珪璋对陇东人民的抢掠竟成合法化，人民深受其害。在封建军阀、民国、豪绅、地主的压榨下，群众抗捐、抗粮斗争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群众的反抗斗争必将汇合成为巨大的革命洪流。农村中革命形势的存在，决定着游击队诞生的不可避免性。

第二，这里的群众受过党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与影响。一九二八年五月，共产党员许才升、吕佑乾曾领导过旬邑暴动，建立过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共产党员王孝锡在大革命失败后，由兰州回到宁县太昌，建立了中共郃（郃县）宁（宁县）支部，并在一九二八年领导宁县人民开展抗捐税和围攻宁县县城的斗争。正宁与宁县、旬邑地相毗连，正宁县的农民也相继展开过围攻县城的斗争。这一带的群众受到过革命的锻炼和影响，在这里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

第三，这里地处陕甘两省边境，距西安、兰州等大城市较远，反动统治力量薄弱，蒋介石的势力尚未完全深入进来，盘踞在这一带的大小军阀互相残杀，便于游击队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敌人，壮大自己力量，建立革命政权。

第四，这里有山、塬、沟、川，森林茂密，粮食充足，地势复杂，柏山、河流均成天然屏障，游击队依据有利地形，既可屯兵蓄粮，养精蓄锐，又可迂回作战，攻敌不备，使游击战争得以长期进行。

第五，从西峰镇、庆阳城、西华池到曲子一带所驻敌陆军新编十一旅中，建立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有不少共产

党员担任了这些杂牌军的下级军官，游击队可以通过党的地下组织掌握了解敌情，知己知彼，准确地打击敌人。

第六，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建立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的必然产物。刘志丹、唐谢领导的一九二八年渭华起义失败后，为了积蓄革命力量，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刘志丹等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军队中，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一九三〇年十月，刘志丹等收缴了合水太白民团的武器，便开始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装。一九三一年秋季，刘志丹又在平定川籍水湾建立了南梁游击队。同年十月二十日，晋西游击队、商队队和南梁游击队三支武装力量在林镇店胜利会师^②。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发展到近千人。接着通过新堡整编及六寸堰战斗，粉碎了军阀陈珪璋收编和“围剿”的反革命计划。谢子长、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率领队伍向陕西关中移动。

在此前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提出了“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中共陕西省委依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先后于十月十日、三十日接连两次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州告陕西民众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政策。

当谢子长、刘志丹率部向陕西关中移动途中，沿着二将川，经宁县盘克，到达正宁北柴桥子（今正宁西坡公社）时^③，陕甘省委代表李杰夫（后叛变）、中共旬邑县委书记第五伯昌也来到北柴桥子，传达省委指示，根据抗日反帝的需要，将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部队正式命名为“反帝同盟

军”④。这时正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

“反帝同盟军”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成立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在“反帝同盟军”中，党的领导机关是中国共产党反帝同盟军队委会。党的支部建立在支队中。为了加强政治工作，反帝同盟军设有政治处。政治工作人员在群众中挨门逐户进行宣传，到处张贴“打土豪，闹共产”、“打倒军阀、民团”、“打倒土豪劣绅”、“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公买公卖”等标语，并且将山河商务会长张占成在北柴桥子开的一家烧坊（煮酒坊）没收，杀了烧坊里的七、八头肥猪，还将烧酒用的一百多石粮食分给了群众。群众的革命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原先对革命不甚了解或怀有恐惧心理而逃跑的群众也纷纷返回家里，安心生产。不少群众还报名参加了革命部队。

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建立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依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堰细嘴子正式成立了。在广场上召开了大会，举行游击队成立授旗典礼。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陕西省委宣布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正式建立，任命谢子长为游击队总指挥，李杰夫兼任政委，杨仲远为参谋长。旬邑县委书记第五伯昌授给谢子长一面标有镰刀斧头的游击队队旗。参加大会的三百六十多名游击队指战员的脖子上和马的头上都被挂着一条红绸子或红布条（牺牲带）。大会还发表了宣言、通电和指令。三嘉堰的群众代表任生堂向游击队献了爱民旗一面。三嘉、浪头以及旬邑县阳坡头、职田镇等地的农民还吹着唢呐，抬着猪羊，载歌载

舞，前来庆贺。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党的领导机关是由二十多人组成的队委会，各大队成立了党支部，游击队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开展工作。党在游击队中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系统和制度，设立有政治委员会，直接领导政治工作，开展党的组织教育和宣传活动。部队建立有政治委员会领导下的士兵委员会，士兵行使各种民主权利。游击队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是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和警卫大队，大队下辖中队、小队。为了加强对游击队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在三嘉塬开办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军政训练队，设有高级班和普通班。高级班训练对象是排长以上干部；普通班训练对象是班长及部分优秀战士。课程有“游击队活动”、“古田会议决议”等。由于加强了政治工作，抓紧干部的培训，大力开展练兵活动，游击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因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陕甘游击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陇东的主要活动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成立后不久，便离开了三嘉塬。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游击队向旬邑职田镇出击，击溃了白军一个营，缴获手提机枪二十余支，盒子枪七支、长枪一百余支，俘敌四十余人，捣毁敌区公所，惩处了八大豪绅，烧毁其帐簿、契约，组织农民分粮。第二天，又出师阳坡头，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歼敌警卫团三营和部分民团。游击队在取得两战两捷后，谢子长率部又乘胜歼灭了耀县民团，然后挥师宜君地区，粉碎了进剿之敌。这时已是三月份，陇东地

区军阀正在混战。

原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份，蒋介石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派其参谋长兼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部入甘，击溃了雷中田部，成立了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孙蔚如与杨子恒（兰州警备司令）密谋，将陈珪璋杀死于省府后花园内，同时，又歼灭了陈珪璋在兰州的孙志远旅，接着又指使其留守平凉的部队火并陈珪璋部，战火蔓延到了陇东地区。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乘陕军十七师与甘军十三师混战陇东之机，于三月份从宜君回师陇东，进入正宁县山河镇以南的寺村塬（永和塬），组织了秘密的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打击豪强，没收了于家庄大豪绅赵元亨（外号“赵大人”）的土地、粮食，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在苟仁寺处决了“赵大人”^⑤。以后，游击队又进到涇头的新庄，没收了民国团总刘希昆的土地，在这里也成立了秘密的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组织，并在新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农民郭自发担任主席。这是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陇东地区领导建立的最早的一个革命政权。

四月份，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从寺村塬出发，调动了涇头及月明塬等几十村庄的赤卫军和其他农民群众共千余人，再次攻打山河镇（三月初曾攻打过一次）。敌人在山河镇一带驻有一团人的兵力，我游击队、赤卫军等进驻西坡（距山河七八里路），直逼五里铺。敌人在五里铺设置有机炮防守，但在我军的打击下，一弹未发，就偷偷地溜走了。我骑兵一直冲到山河镇城下，将敌人围困在山河镇里。后来，敌

人从西峰镇调集了一个营前来增援，包围了我游击队。游击队在歼敌二百余人后，撤回到了寺村塬。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认为攻打山河失利，撤去了谢子长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将谢派往甘肃搞兵运工作。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正宁县领导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使敌人胆颤心惊。甘肃省府一面成立省清乡总局，将全省划为十区，限期分区完成清乡任务，一面在陇东设立绥靖司令部，以杨子恒为司令，火速收编陈珪璋残部及海原、固原一带的杂牌部队，组织军事“围剿”。

大敌当前，游击队暂时离开陇东，乘旬邑守备空虚之机，突袭旬邑警卫团两个连，俘敌三百余人。可是，中共陕西省委却要游击队北上。由于游击队撤走，在湫头新庄建立的革命政权亦随之停止活动。游击队只留下少数人进行赤卫军、贫农团的秘密组织工作。这是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陇东活动的第一阶段。

游击队在陇东活动的第二阶段是发展壮大阶段。一九三二年五月份，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刘志丹同志领导下，经马栏镇、凤凰山，直驱中部县（今黄陵县）、宜君县、洛川县、韩城等五个县，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和堵截，歼敌一千四百余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来到了宁县麻子掌（今宁县金村公社），在宁县涇乐、九岫、盘克一带游击。

七月九日，敌驻合水县西华池新编十一旅一团特务营在杨林、苏杰儒、高鹏飞等直接领导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胜利地举行了起义。第二天清晨，起义部队到达了盘克塬，游击队梁强龙光、杨琪、杨森率骑兵大队前去迎接。然后，起义军继续向北行军，直到晚上才与游击队会

合。七月十一日，游击队又回到正宁湫头，召开全军大会，欢迎西华池起义军。湫头的赤卫军、贫农会也敲锣打鼓前来欢迎。接着改编了部队，西华池起义部队的一部分补充到骑兵大队，其余全部编入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被任命为第三大队长，阎润平为政委。这个大队辖三个中队，原第三大队编为第一中队，起义部队编为第二、三中队。游击队得到了发展壮大，共达千余人。在这一阶段，游击队在武装群众、建立政权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在五顷原子、两顷原子、洼坡塄、龙咀子和新庄、南邑等地组织了村会和五顷原子、南邑两个分会。在乡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乡的苏维埃政权。在乡苏维埃政权中设有土地、军事、劳动、粮食、文化、青年、妇女等委员会，分别领导各项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

正值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兴旺发展、革命政权得到恢复和重建的时候，中共陕西省委却指示游击队放弃游击战争，“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七月下旬，省委又派李艮任游击队政委。他一到部队就大搞宗派活动，非法成立秘密队委会，斗争了一批干部。在军事上，他要游击队坚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原子，命令游击队去攻打敌人设防坚固的城镇。在土地革命政策上，不发动群众，而是规定任务，限定在二十天内分配完土地。

由于游击队主要负责人执行错误政策和违背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使游击队在五顷原子战斗中遭受了空前未有的重大损失。八月下旬，游击队撤退至马栏镇时，只剩下一百多人。李艮、黄子文等离开了部队，回省委汇报。游击队离开湫头后，原先建立的革命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再一

次停止了活动。

游击队在陇东活动的第三阶段主要是积蓄革命力量。

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谢子长又重新被任命为游击队总指挥。为了摆脱敌人对游击队的进剿，谢子长率部南下耀县、照金，然后又北上保安，把追击的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九月，攻打保安失利之后，游击队在白沙川召开队委会，总结了保安失利的经验教训，讨论了游击队的活动方向。会议接受了刘志丹关于在桥山山脉中段、南梁山子午岭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打通陕甘和陕北路线的建议。会后，游击队派杨林、王兆卿去陕北特委转达刘志丹同志的意见。同时，游击队向子午岭山区转移，于十月份到达瓦子川。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决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三路活动，筹积钱粮，度过困难，发展革命力量。中共陕西省委在十月二十五日也作了相应的决议，即《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根据瓦子川会议精神，游击队派刘志丹率领一个大队到华池、合水一带活动；杨森带六十余人到三原武字区；杨仲远、阎红彦率领骑兵大队到照金、耀县一带；谢子长带领二三十人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守卫六七十名伤病员，并与陕北特委保持联系，同时指挥各路游击队作战。刘志丹在南梁一带进行过多次革命活动，做过实地考察，早就有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打算。他利用人熟、地熟等各种有利条件，首战取得了歼灭南梁荔园堡梁邦栋民团的胜利。接着又转战到合水县黑木（今合水县店子公社）。经过两三个月的艰苦工作，游击队发动了群众，筹集了粮款，壮大了力量。十二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拓八碾胜利会师，准备进一步在陇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可是，中共

陕西省委又指示游击队到三原一带开辟苏区。

当游击队南下至淳化时，陕西省委要求部队到宜君转角镇进行整编，建立红二十六军。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宣布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当时只有一个团）。至此，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四、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成立的历史意义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成立后，虽然受到过“左”倾错误的干扰，几次换总指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击队的发展，但革命斗争的烈火考验和锻炼了游击队的广大指战员，使这支游击队在政治思想、组织纪律、战略战术诸方面都有了提高，从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发展成为一支正规的红军——红二十六军。

这支游击队在短短的十个月里，转战陕甘两省方圆千余里的十数个县，广泛地宣传、动员和组织了群众，打击了军阀、民团和封建地主，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发展了革命形势，播下了革命火种。如宁县平子游击队的初期活动就是在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影响下进行的。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浴血奋战的成果是显著的，它领导建立了陇东地区最早的革命政权，为以后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战斗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执行正确的政策，革命武装力量就会发展壮大，革命政权就可以建立、发展。反之，革命政权就会丧失，革命武装

大风川纪念碑

李含梅

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人民，为了粉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三年四月，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奉命开赴陇东华池县大风川屯垦荒，取得了丰硕成果。次年十一月，七七〇团主力出征离开大风川时，在大风川与小风川的交界处，建立了石刻纪念碑一座，刻纪二年来全团屯兵生产的业绩及英雄模范事迹。纪念碑石正面（南面）刻文如下：

抗战以来，我团即留守后方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电田政策，一面保卫边区，一面生产建设。八年来，由于党政军民的帮助和我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得以突破敌顽封锁，度过抗战难关，为更进一步生产建设，积蓄反攻力量，去年四月，即奉命开抵大风川。

当时，大风川是一荒凉地带，野山僻壤，林木参天，人烟无几，兽群遍行。经过二年之劳动创造，我团已开地三万四千亩，修筑营房四百余间。为了便利军民运输，今年又费工四千五百日修竣风川抵合水之大道五十余里及小风川口木桥一座，并兼有作坊手工业、山货制漆等副业生产数十种。现在，粮食满仓、菜蔬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革命家

务日趋巩固。

对于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我全体同志莫不争先恐后，克己奉公。如开荒中，有的半夜挑火挖地，有的挑水上山；如练兵中，人人昼夜苦练，反复操作，精神更为热烈。生产之劳动英雄，学习模范与工作模范者全团以数百计。连长邓中华，刘全清，教导员王立友，排长张永海、朱炎林，班长王德金，吴开祥，战士高喜才，李发才，李长庚更是群英中的出色人物。

此二年中，我团牺牲有三人：九连杨全成建筑中伤亡，张友成在保卫边疆战斗中流血牺牲，五连李三明操劳成疾，病歿于医院。我全体同志誓死完成三人遗志，直抵胜利之彼岸，完成革命事业。谨此碑文，以资纪念。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三八五旅七七零团

团长 张才干

政委 宋景华

副团长 卜万科

参谋长 李迎春

主任 曹传赞

暨全体指战员敬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立

纪念碑石背面（北面），分十行刻记着全团九十七名劳动英雄、工作模范和学习模范的姓名。纪念碑座石的四周，分别刻有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及当时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段德彰、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等同志的题词。纪念碑正文为无标点竖写。碑石呈长方体，高约二百一十四厘米，宽六十三厘米，厚十二厘米。碑座石高约五十厘米。这座纪念碑在原址一直留存了二十多年，到一九六六年以后，碑石的下部约七

十五厘米长的一小部分及碑座被损坏，残留长一百三十九厘米的碑石上部，现已移至华池县博物馆补全陈列。

王维舟、耿飚同志所领导的三八五旅，原是由长征到达陕甘的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改编为边区留守部队。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初到大风川时，那里人烟稀少，五十余里川道林木盘根错节，野草丛生，十分荒凉。当时粮食极度困难，指战员们挖苦苦菜，打野猪、野鸡，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没有营房，就搭草棚、住旧窑洞；缺少生产工具，团部就组织用废铁打成了许多锄、铁、锄、锯。当年春季，全团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开荒竞赛，每人每天要开荒地一亩多，有的还创造了日开荒地四亩半的最高纪录。荒地开出后，他们种上了糜子、谷子、玉米、荞麦等粮食作物，还种了大片的白菜、萝卜、洋芋等蔬菜。仅头一年，许多连队每人平均开荒二十多亩，产粮三石多。为了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每个连队还养了六到八对牛、几十头猪和一群羊，以及数匹马和毛驴。此外，七七〇团的指战员还利用大风川地处子午岭林区的有利条件，开展做柏香粉、割漆、制柏木桶板、用桦树皮做菜篮、挖药材、酿白酒、编织笼筐等副业生产。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七七〇团的指战员还在“建设我们的家园”的口号下，修建了营房四处，共四百余间。全团还接连分段，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开辟了自小风川口起，经穆瓜岭到合水干湫子的便道五十余里，使大风川与合水川之间有了历史上第一条交通道。在小风川口附近的大风川河上，架起了宽约丈余，长约五、六丈的木桥一座，可过牛车，起

名为“七七桥”，并在桥的南端立有“七七桥”修建纪念碑一座。碑石上刻有“七七桥”、“七七〇团排长宋仁东设计，营长郭应春督导”、“工程二千一百二十五个工”、“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兴工，八月六日告成”等字样。七七〇团当年修建的这四处营房，在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进犯边区时被敌烧毁，现在仅留部分残缺的墙壁。大风川至于湫子的五十里便道，现在已被扩修为车道。“七七桥”在一九四七年被敌烧毁，只有“七七桥”修建纪念碑尚完整无缺，现已移至华池县博物馆陈列。

从七七〇团屯兵大风川起到现在，三十九年过去了，大风川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那里的社员和农场职工们，正在学习和发扬七七〇团指战员当年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决心把大风川建设得更加美好。

二、陇东老解放区的群众文化活动

陇东，是原陕甘宁老解放区的一部分，包括庆阳、环县、华池、合水、正宁、宁县、镇原等县的大部分地区。一九三四年，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华池县南梁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南梁苏维埃政府不但重视搞武装斗争，而且非常重视群众文化工作，把开展红区的群众文化活动和开展红军战士的歌咏活动，作为团结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革命斗志的武器。当时，南梁、东华池、城壕等地的群众文化活动非常活跃，群众中流传着许多歌颂红军的歌谣，如“红军红军，爱咱农民。铲除土豪，打倒劣绅”、“土豪劣绅倒了台，穷人腰杆挺起来”等。当时，陇东群众和红军战士普遍都会唱《三十匹马两杆号》、《一杆红旗空中飘》、《劝当红军》等歌曲。刘志丹同志常说：经常唱革命歌曲，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就是做了革命的宣传工作，就能鼓舞士气。这是陇东老解放区开展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萌芽时期。

一九三五年底，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陇东解放区随着中央红军的到达而得到扩大。之后，庆阳所属的曲子、合水、华池等绝大部分地区都得到了解放。中央红军中富有革命内容和强烈战

斗性的文艺宣传活动，给陇东群众文化活动增添了新的光彩。当时，庆阳城内住着红军的军事部（后改名为教导师）。部里有一个宣传队，又叫新剧团。宣传队的四十多个人都很精干，既能演戏、又能唱歌跳舞，经常为群众和战士演出。演出的节目有《活捉蒋介石》、《打刘湘》、《抓白匪》、《庆祝舞》等。由于这些节目短小精悍、内容新颖，很受群众欢迎。宣传队的同志不但演剧，而且经常派人辅导群众文化活动。不久，这些新剧目就在庆阳、曲子、华池、会水等地的一些学校、单位流传开了。红军的文化活动，带动了陇东解放区的群众文化活动，许多城乡都先后建立了业余剧团。

一九三七年秋，庆阳、环县一带有一个名叫张云的民间艺人，组织了一个皮影班子，常在陇东各地演出。一开始，他们仅仅用陇东道情和民间小调配曲，演唱一些小戏，后来，他们又从陕西关中请来了几位秦腔演员，就唱起了秦腔。新来的这几位演员中有两个是秦腔界的科班出身，受过严格的正规训练，在唱、白、做、打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功夫，因此决定收几个青年做他们的徒弟。这一年，庆环专署马锡五专员和赵守一、墨迪律同志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张云的皮影班接收了过来。不久，又在这个皮影班的基础上扩充发展，办起了陇东第一所艺术学校——庆环农村剧校。剧校设在环县曲子镇。庆环农村剧校办起来之后，除了培养专业人材，还为陇东各地农村业余剧团培训了不少的骨干演员和乐师。这中间，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的民众剧团曾到陇东演出过很长一段时期，著名艺术家柯仲平、马健翎等同志都亲自给剧校讲课、排戏，为培养陇东解放区文化艺术人材付出

了心血。下苦功夫，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了一名文艺骨干。

由于陇东老解放区有一大批业余文艺骨干，又经常能看到一些专业剧团的演出，因此，群众文艺活动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原来只能演一些简单的折子戏、小节目，后来，就可以成本地演大戏了。记得演出的新编现代剧有《串花珠》、《新三娘教子》、《送郎上前线》、《送公粮》、《张凤娇》、《神仙怕打》、《放小脚》等。

在演出水平提高的同时，群众的业余文艺创作活动也很活跃。许多业余剧团的骨干和农民业余作者都拿起了笔，创作了许多较好的剧目。如配合生产运动的《订生产计划》、《三五减租》、《夫妻开荒》、《合作化人员》，扫除封建迷信方面的《山神算卦》、《常大郎拾元宝》、《二流子偷鸡》等。

陇东老解放区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表现形式有一、二十种之多，如哑剧、活报剧、快板、说书、民间歌舞、腰鼓、霸王鞭、民歌联唱、小演唱、民乐合奏、土电影、拉洋片、秦腔、眉户、道情等。

陇东地区山大沟深，交通极为不便。过去，广大群众很少看到过象样的剧团的演出。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对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极为关心，边区所辖的西北文艺工作团、民众剧团以及联政宣传队、边保剧团、关中八一剧团、抗大七分枝宣传队、三八五旅宣传队、战火剧团、西北文联洋片小组等，都先后在陇东各地巡回演出过，对陇东各地的业余文化活动影响很大。

一九四三年秋，中国民歌研究会陇东分会在庆阳正式成立。分会在陇东地区大力发动群众搜集整理民歌，研究陇东

道情音乐，开展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每逢机关、学校、部队、农村群众开会前后，都可以看到拉拉队互相拉唱歌子，会场上歌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活跃。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也空前高涨了起来。当时，著名音乐家李焕之、马可、贺绿汀、张寒晖等同志都先后带领音乐工作者和音乐巡回演出队，翻山越岭来到陇东，一方面给陇东人民作宣传演出，一方面搜集、整理陇东地区的民歌、音乐。他们在陇东民歌的基调上，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如《拥军爱民》、《军民大生产》、《歌唱豹子川》、《十唱解放区》、《上冬学》、《军民进行曲》等。

在中国民歌研究会陇东分会的组织和带动下，陇东老解放区群众性的音乐活动也十分活跃。群众利用自己熟悉的民歌小调，填上宣传当时政治中心工作和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革命领袖的新歌词，在群众中演唱。群众称这种活动为“旧瓶装新酒”，或“民歌填新词”，这些群众喜闻乐见、亲切熟悉的曲调，唱起来顺口，通俗易懂，男女老少都可以接受，深受群众欢迎。如用“打黄羊”调填写的《慰问子弟兵》、《十二月生产》，用“信天游”调填写的《歌唱刘志丹》，用“绣荷包”调填写的《绣金匾》，用“唐将班子”调填写的《军民大生产》等都曾流行一时，直到今天都还是全国很有影响的歌曲。

解放战争初期，陇东广大农村中还出现过“墙头诗”。群众经常用墙头诗这种形式，诗画结合，把政府当时的方针政策、政治任务公布于众，推动了当时的中心工作的开展。在边境上，群众还用墙头诗揭露敌人的阴谋，警告敌人，开展对敌宣传，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西北解放军部队里，还流传着“枪杆诗”。其中有一首写道：“七九枪，亮又亮，头头红，身子黄，今天回到人民手，掉回头去打老蒋。”枪杆诗对鼓舞部队士气、活泼部队气氛，团结教育部队和群众都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陇东群众有耍社火的传统习惯，几乎所有的村镇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社火组织。每年在元旦、春节、和一些重大的节日里，群众都要耍社火，闹秧歌，到处敲锣打鼓，人山人海，非常热闹。陇东社火的形式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最普遍的是扭秧歌，打腰鼓，打霸王鞭。此外还有“狮子”、“龙灯”、“高跷”、“旱船”、“平台”、“竹马”、“地旦”、“跑旗”、“地云子”、“鹌鹑相争”、“张公背婆”、“二鬼打架”、“武松打虎”等，不胜枚举。当时，在陇东民间社火活动中，有几种民间舞蹈是很有艺术价值的。一种是“夜游八阵图”，它是一种很有风趣的民间舞蹈。人们在地上按计划画好图案，钉上许多木桩，每个木桩都用红绳联系起来构成“八阵图”形，每根木桩顶上插一面小旗，再挂上一盏红灯，人们在“阵”中跳着舞蹈，踏着打击乐的拍子穿来穿去，很有意思。另一种是“夜战马超”，它是一种带有武打性质的民间舞蹈。它是由两队武士打扮的人，先各自舞弄一阵刀、枪、棍、棒，然后对打一阵。在对打中，各种动作都有一定的路数和一定的舞姿，很有古典舞蹈的特点。再一种民间舞蹈叫“地云子”，又叫“地飘儿”。这种舞蹈流行在合水、正宁、西峰镇一带。人们用彩色纸扎成朵朵莲花，把莲花拴在用硬纸做成的纸圈上，纸圈系在姑娘们的长裙下边，莲花内放着燃着的红烛，红烛映照着姑娘们的面庞，红颜朱唇，翩翩起舞，轻盈的步伐象云彩

里的仙子一样飘逸自若。这个民间舞蹈素材，后来被舞蹈家戴爱莲同志改编成《荷花舞》，曾风行一时。一九五四年，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会上，中国青年代表团演出的《荷花舞》获得了金质奖章。

陇东老解放区在开展社火活动中，还出现了一位“社火把式”——刘志仁。刘志仁同志是合水县潮乐地方的一位青年农民，从小就很喜爱社火活动。他经常参加耍社火活动，逐渐学会了许多耍社火的招数，吹、拉、弹、唱，样样都会，几乎每次耍社火、闹秧歌都离不开他，无形中成了年轻的社火头头。他不但会组织群众，而且还会排演，很得群众的拥护。后来，他干脆组织起了一个十五、六人的社火队，取名叫“刘志仁秧歌队”。这个秧歌队虽然只有两把板胡和一把三弦，只有一些简单的服装、道具，但还是经常深入群众，为群众演出。由于他们演出的形式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很受群众欢迎。刘志仁掌握许多民间曲调，并填了许多唱词，宣传抗日生产，歌颂党和领袖，如他编的《共产党像太阳》、《人民领袖毛泽东》、《生产忙》、《保卫边区》等歌词，传播在陇东许多社火队里，都很受群众欢迎。一九四二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文艺会演大会。刘志仁同志作为陇东文艺代表，到延安出席了那次大会，并且在会上被授予“秧歌英雄”的光荣称号，同时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亲切接见。

解放战争后期，陇东几个县的民众教育馆（就是现在的文化馆前身）和边区新华书店的同志一块，在陇东各县农村创办了一种流动文化组织——“文化棚”。文化棚是用竹席和土白布搭成的棚子。在逢集或重大的节日，庙会、骡马会

上，把文化棚搭在集市的中心，一方面敲锣打鼓演出文艺节目宣传当时的形势任务，一方面供应群众文化生活所需的图书、图片。这种组织形式很受群众欢迎，文化棚经常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这种文化棚在镇原、庆阳、宁县、合水、正宁、华池、环县等地曾经有五、六十个活动点。

陇东老解放区的群众文化活动对宣传各个时期的形势、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对于生产、支前，保卫边区，解放新区，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志仁与南仓社火

王育楠 贾治龙

在宁县盘克塬上，提起刘志仁来，人人都知道他是有名的南仓社火头。老刘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还得从头介绍。

(一)

一八九九年一月，刘志仁出生在盘克塬一个自耕农家里。一九二三年十月考入华池国语学校，毕业后由于家庭生活贫困，回家务农。

一九三六年过旧历年的中间，国民党一支军队到北仓村催粮草，和红军游击队遭遇。一个红军战士当时带了花，因伤势重，走到南仓村口，再也走不动了，后面白军又在追赶，就在这中间，恰好碰上了正在排练社火的刘志仁和积极分子宋应歧等人，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那个红军伤员背到山沟一个烂窑洞里藏了起来。当时排练社火的人很多，刘志仁恐怕有人走漏风声，就把在场的人都召集在塬上一座庙里烧香盟誓，相约谁也不能告密。为了使这个红军伤员身体尽快恢复健康，刘志仁决定由他自己负责护理。他白天给这个伤员端吃喝，晚上陪着睡在烂窑里。时间长了，感情也深了。一天夜里，那个伤员热切地说：“老刘，听说你们的社火要得不错呀！”“不行，还差得远呢。”“……你会编歌，能不

能编些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新歌，把大家组织起来，用社火的形式教给大家唱唱、演演，用革命道理教育群众，打击敌人？”刘志仁听后觉得说得很对，连忙“嚶、嚶”了几声，决心按这个红军战士说的办，改造旧秧歌，发展新社火。在刘志仁的精心护理下，这个红军伤员很快恢复了健康。他们亲自把他送到了部队。

从此以后，刘志仁便开始收集民歌曲调和填写新歌词。南仓社火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南仓村群众在刘志仁的宣传影响下，组织了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不久，南仓村划归陕甘宁边区。刘志仁被群众选为南仓村村长。在边区的新天地里，好编善唱的刘志仁，象出了笼的百灵鸟，一首首情真质朴的新歌曲传遍了周围村镇。他编写的第一个秧歌剧《造反》，在新宁县政府所在地的齐家川演出时，县长亲手赠送了锦旗，群众也给刘志仁披了“红”。由于刘志仁的努力，南仓社火越演名声越大，人们到处传说着：“南仓出了能人了，能用社火替穷人说话了。”演员不识字，刘志仁就亲自当教员办冬学，集中起来学文化；没人会拉二胡，刘志仁就派人到马栏八一剧团学习，并请人来具体指导；要社火没有集中的地方，刘志仁又组织青年演员打了一个窑洞，创办了社火窑。村里五十多户群众，差不多每家都有人参加耍社火，人员由原来的一、二十人，发展到六十多人。耍社火没有资金，刘志仁就组织青年人利用晚上时间开荒地十六亩，种庄稼卖粮，积累资金购买耍社火需用的东西。

刘志仁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歌手，时时留心用自己的笔去挖掘农民生活的艺术之泉，反映农民的要求，说庄稼人的

心里话。有一次他碰上村里的一个小脚妇女，从不足十里路的娘家回来，脚疼得走不动了，坐在村口歇息。刘志仁就对那个妇女说：“大嫂子，快放脚吧，活受那个折磨干啥哩。”那个妇女真情地说：“你说得对，我再不叫子孙跛脚了。”刘志仁心想，眼下政府正教育妇女解放思想，开展一个放脚的运动，我何不编个《放脚歌》，来教育妇女。于是他边走边想，还没走回家就编好了《放脚歌》：

妇女们快放脚，

缠脚真糟糕，

走起路来摇摇摆，

你看多不好。

……

村里有个青年小伙子整天游游逛逛，不劳动生产，刘志仁就编了个《二流子》秧歌剧。那个青年看了演出后说：“我要学好哩，不然大家都说演的是我。”南仓有个大地主一九三〇年秋收时挨门挨户去催租子，逼着佃户王步荣给他买玫瑰酒。刘志仁又根据这个真人真事编了《逼租子》秧歌剧，叫王步荣扮演他自己，到台子上一演出，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村子。

风云多变的时代，紧紧地牵动着刘志仁创作的心弦。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打乱了这个庄稼人平静的心境，轰开了这个歌手心里的闸门，他坐在昏暗的老油灯下，歌词象潮水似地涌了出来。刘志仁很快编出了《芦沟桥》、《九·一八》和《日本太狠心》等秧歌剧。

九一八呀九一八，

日本兵在东北把人杀。

……，天昏地暗日头昏呀昏昏黄，
天昏地暗日头昏呀昏昏黄，
四万万同胞快呀快起来，
打倒那野呀野心的小东洋。

……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征收救国公粮时，刘志仁及时编写了《救国公粮歌》：

新谷子黄又黄，
新糜子香又香。
收了一年好庄稼呀，
大家喜洋洋。
喜呀喜洋洋，
快交救国公粮，
多收要多交，
支援红军打胜仗。
多收快多交，
咱们军队吃饱有力量，
消灭那日本狗豺狼！

演出后群众受到了很大教育，赶着毛驴争先恐后地去交救国公粮。以后他还编写了《新十绣》、《新小放牛》等十多个新歌子。一九四二年春节期间，他领着社火队跑遍了关中地区。

(二)

刘志仁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当时一直被选为村主

任，拥军代表，锄奸委员，评判委员会仲裁员。一九四四年十月，又被选为出席边区文教大会的代表。十月十日这天，刘志仁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十月十一日，会议开幕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出席了大会，和代表们一一握手问好。原来就对刘志仁有印象的周副主席一手握着刘志仁的手，一手拍着他的肩头，忙给毛主席介绍说：“这就是那个有名气的社火头刘志仁。”毛主席伸手握住刘志仁的手说：“你这个土文艺专家真了不起。”刘志仁双手紧握毛主席的手，只说了句：“毛主席好！”就激动地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第三天，刘志仁向大会艺术组的同志们介绍了他改造旧秧歌、发展新社火的经验。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走上了讲台。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场面，睁眼一看，周围都是边区闻名的文人，他心慌了，不知讲什么才好。这时，在座的周扬同志鼓励他说：“老刘，随便谈，你是怎么做的就怎么说吧。”刘志仁鼓起了勇气，从他为啥要改造旧秧歌谈起，一直讲到他创造新社火、写词编曲，最后还谈了他自己的创作计划。他越讲声音越大，边讲边唱。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晚上，延安广场灯火辉煌，文教大会在这里举办文艺晚会，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也前来观看。当刘志仁出现在舞台上时，毛主席带头鼓掌。刘志仁表演了他自己新近编写的《毛主席功劳大》和《延安风景歌》等节目，热情歌颂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台上台下掌声阵阵。演出结束后，毛主席等中央和边区政府负责人在会议厅接见了刘志仁等同志，用延安的苹果、大枣招待了他们。毛主席拉着刘志仁的手说：

“你这个人真不简单呀！我们还要向你学习哩。”

十月十六日上午，刘志仁被大会树立为边区新秧歌运动的一面旗帜，颁发了特等艺术奖。边区林主席和李副主席亲手颁给了他“新秧歌运动的旗帜”的布质奖状一张、边区文教大会纪念章一枚、毛衣一件、板胡一把、笔记本三个等奖品。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同志当场在笔记本上给刘志仁题了字。会后，毛主席又亲手赠送给刘志仁一条榆林毛毯。

从延安归来后，刘志仁的创作方向更明确了，干劲更大了，他先后又创作了《反特务》、《新三恨》和《边区政府好》等秧歌剧。由于他的努力，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刘志仁又被陕甘宁边区群英会树立为特等文教英雄。春节前夕，刘志仁接到周扬同志寄来的信和年画、鲁艺工作团编印的秧歌本子等礼物。周扬同志在信上热情地询问了南仓社火和他的创作情况，最后写道：“……现在我要特别告诉你，你这次虽然没来延安出席边区群英会，但却被群英会选为边区英雄，作为全区群众艺术的旗帜了。我相信在你的继续努力、不断进步之下，你会永远当得起这个光荣称号的……。”

一九四九年，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万里晴空，全国解放了。诀别了旧社会的刘志仁，更是诗情横溢，他一边领导大家搞土改，一边编歌。陇东及关中地区的老百姓在新分得的土地上边耕边唱：

马莲逢春开了花，
穷人翻身乐哈哈。
鞭儿吆着黄牛走呀，
种出自家的好庄稼。

下面紫怀林老汉的院子里，共盖有十三间房子，其中五间作伙房，八间作饭厅。东城洼是供给部。宋塔周围住着文工队，还有一个大车队，住在和家窑，共有四辆木轮大车。

抗大七分校的校长是彭绍辉同志。一九三三年春季，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他的左臂不幸连中敌人两弹。当时医疗条件差，左臂被锯掉了。到七分校后，他让铁匠给自己打了一把短柄锯头，一只手抡着小锯头，带领学员一起开荒。他还常常用一只手打裹腿，打草鞋，动作相当麻利。七分校还有一位副校长，名叫俞楚杰，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两鬓染霜，精神矍铄，平常很勤谨，脸上老是笑嘻嘻的。

学员们都很年轻，有从部队选送来的战斗英雄，有从解放区和敌占区来的革命青年，有工人、农民，也有知识分子。他们抱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来到延安，来到抗大七分校学习。

(二)

万事开头难。抗大七分校刚刚建校的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同治年代以前修建的窑洞，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山脚下。窑洞里杂草丛生，蛛网密布，青苔满壁，人走进去，惊得成群鸟雀横飞，野鼠黄狼乱窜。这些已经荒废了几百年的破窑洞，经过一番打扫，便成了学员们的宿舍。但是，人多窑洞少，很多学员还不得不傍山架棚，荒野露宿。晴天还可以凑合，遇上雨天，外面不停地下，里面不停地漏。深夜，学员们常常被雨水淋醒，他们坐起来，把被子顶在头上遮雨。雨点打在被子上，的的笃笃象敲鼓，被子也就变成了雨伞。有时候，岩石还会忽然塌下来。二大队有一个叫杨永福

的班长，就是晚上睡觉时牺牲在倒塌的岩石下面的。

建校初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粮吃。学员们要到合水的太白、华池的山庄往回打粮。既没有驮畜，又没有口袋，学员们就把被里子缝起来，把裤脚扎起来当口袋，自己往回背。顺葫芦河到太白背粮，来回一百八、九十里山路。两天跑一趟。路上饿了，他们就烧洋芋吃，或用石板炒小米吃，渴了，河沟里的溪水就是“高级饮料”。

没有蔬菜，学员们就上山采蘑菇，采木耳，寻野菜。后来，有人发现野杏可以当菜吃，虽然那野杏味道又酸又涩，却成了学员们的上等菜肴。不管那个班摘回了野杏，都要给别的班送一些。

为了弥补粮食和蔬菜的不足，学校还组织学员在川道里打野鸡、兔子，上山打野猪、孢子，下河捉鱼摸蟹，改善学员们的生活。一吃起野味，学员们便互相逗趣地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藏的，山珍海味，吃啥有啥，样样俱全，物美价廉，全部奉送，一钱不收。学员们就是这样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大自然索取财富，不断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

(三)

六月一日，抗大七分校开学了。三个大队驻扎地相距较远，无法集合在一起，只好分别在驻地举行开学典礼。那一天，“独臂勇士”彭校长参加了二大队的开学典礼。他大声宣布说：“同学们，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今天开学了。课程表上的第一课是开荒种地。”彭校长第一个举起了短柄锄头。于是，一场披荆斩棘，向森林、荒山要地的

战斗打响了。欢快的劳动号子回响在苍莽的林海上空。沉睡多年的大风川、豹子川、平定川沸腾了。在彭校长的带领下，三个大队的学员，同时拿起了第一件宝——镢头，投入了紧张的开荒生产。时间不等人，节令不饶人！上级要求每人每天开荒一亩，总共每人平均开荒地二十亩，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

重重的荒山被学员们包围了，学员们象打冲锋一样，排成一列，一个挨一个地举起了镢头。只见镢头在空中飞舞，脚下的泥土哗哗翻过。学员们连喊带叫地冲上前去，真是势如破竹，气吞山河。

为了提高开荒进度，学校组织队与队、班与班、山头 and 山头之间开展竞赛。一个班领了先，另一个班马上赶上来，一转眼又被另一个班超过了。胜利的捷报接连传下来，开荒的高额纪录不断被刷新。

开荒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劳动。尤其这里野草丛生，一镢头下去挖不断土里的植物根，还会把镢头“咬”住。学员们付出的劳动是可想而知的。头一两天开荒回来，学员们腰痛腿酸，两手打了血泡，手指肚压成了平面，四个手指并在一起分不开，手指弯曲着伸不直。脚和腿，腿和腰，腰和膀好象分了家，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不少学员从山上下来勉强吃点饭，烫烫脚，钻到草棚子里一倒下去就睡着了。

当时，学员们一是不习惯，二是不得法，没有斧子，没有锯子，只好用镢头劈树根，一镢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劲越使得大，手越疼。不几天，学员们的双手都垒起了重重迭迭的血泡，一抓镢把，钻心疼。后来，他们开动脑筋，想出了很多巧干的办法，什么对付树根“连根拔”啦，对付丛草

“火烧连营”啦。时间长了，慢慢地大家都锻炼出来了，手上的血泡磨平了，“分了家”的脚、腿、腰、膝重新连贯了起来，一天挺着腰板大于十二、三个钟头，腰不疼，腿不酸，一个个身强力壮，满面红光。最慢的人每天挖地都在一亩以上。

学员们通常五点钟就起床上地了，可有的人，还偷偷地加班加点。为了使学员们休息好，学校不得不命令：不听到起床号一律不准起床；不听到上工号，不准私自往地里跑；不听到开工号声，不准提前劳动；听到收工号响后，要立即停止劳动，不准延长劳动时间。尽管这样，仍有些同志“不服从”，天不明就悄悄起来往工地走。有时被追回来，批评一顿，当面承认“错误”，可过后仍是“坚决不改”。后来有些班实行工具集中管理，也制止不住偷偷干活的现象发生。领导上没办法，只得教育了再教育，劝阻大家不要随便加班干活，并且发动大家订了互相监督合同。谁知“监督合同”却成了“攻守同盟”，订合同以前，是一个人一个人悄悄干，订合同后，变成了一对一对，一组一组悄悄干，真拿他们没办法。

开荒任务终于完成了。一眼望去，黑黝黝的良田望不到边。地肥得就象能捏出油来。接着，谷子种进去了，糜子种进去了，绿豆种进去了……学员们的心也象同种子一起播进地里一样，一天几遍到地里去看，恨不得亲眼看着种子抽芽，看着它长出土来。盼呀盼，谷子终于破土出苗了，糜子长耳朵了，豆类分瓣了，最后，荞麦也探头了。学员们的心情象打了胜仗一样高兴。

庄稼长得真好。眼看着它扬花、吐穗，一天一个样子。大

凤川，豹子川，平定川，千顷碧波，随风起伏，阳光照处，鲜灵灵，光闪闪，满山遍野，油绿油绿，绿得可爱，绿得喜人。

九月，糜子、谷子、荞麦、豆类先后成熟了。千年的荒山，第一次向人们献出了粮食。平均每人收获两石多粮食，合一千多斤。当时，没有装运工具，大家就拿出床单、包袱皮、衣服、裤子，做粮袋。大家整天收呀，运呀，“秋收”变成了“冬收”，直到年底，学员们才从雪地里一袋一袋地把粮食全部背了回来。这第一个年头就打了个大胜仗，一下子就把粮食问题解决了。

(四)

抗大七分校的第二件宝是枪杆子。学员们既是学生，又是战士，既搞生产，也搞练兵和军事训练。练兵内容包括：步兵战术概述、游击战术、排、连、营、团战斗、特种战斗、射击教练、制式教练、体育、刺杀、通讯、爆破、地形学等。学员们常常在操场上和山头上练习班进攻，连进攻，营进攻。有的攻，有的守，互相捉俘虏。地形不熟就请老乡做向导，从中学到了真切的实战知识。

抗大七分校的第三宝是笔杆子。那时钢笔很少，一般都用子弹壳做的笔。铅笔也很缺。没有粉笔，他们就用白土做成棒，当粉笔使用。练字最简便的办法是每个人面前铺一堆沙子，写满字，抹平了再写。写信一般都写在桦树皮上，装在翻过来的信封里再邮出去，叫做“纸皮桦信”。那时候，桦树皮成了学员的宝贝，把它的皮剥下来，厚的作菜盆、饭碗、皮带，薄的写信，作笔记本，不薄不厚的做京剧服装上

的盔甲等。桦树皮，真成了万用皮，它可帮了学员不少忙呢。

学习的其他条件也很差，支起一块石板就是桌子。凳子也是石头的。尽管条件很艰苦，可是学员们学习的劲头却很大，时间抓得特别紧。一有时间，学员们就三三两两地复习功课，或互相口头测验时事，一分钟都不白过。有的人抽空还给《解放日报》写通讯，写诗歌，写自己劳动的心得和收获。星期天，业余剧团还自编自演秧歌剧、话剧、京剧。演《逼上梁山》、《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等。缺少服装道具就用床单代替，用桦树皮制做，缺少乐器就敲洗脸盆、小瓷碗。学员们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是他们当时最高的文艺生活。

学习的课程有政治课、军事课和文化课。政治课主要是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其中，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以及整顿三风的文献是重点精读的课程。

军事课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军事教员向学员辅导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朱总司令的军事著作，并结合讲解战例。在操场上和山头上，学员们从队列一直学到游击战术、集团进攻和带兵打仗的各种艺术。

文化课是最复杂的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还有俄文。学员的文化程度不同，编班也就不同，教员根据各类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所以学员的进步都很快。特别是原来程度差的学员，学习时间抓得更紧，白天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学，晚上凑在小小的麻油灯前继

续学。一本一本的桦树皮作业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作文的草稿和数学练习题。他们在学习上也打攻坚战，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攻下了一个又一个文化难关。

（五）

抗大七分校的学员们既要种地，又要学习，还要搞建设，白天黑夜、没黑没明地干，他们给东华池人民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现在东华池的三十孔石窑，就是当年七分校学员们修的。石窑前面镶有木制圆门圆窗，前有房檐，后有“火墙”。周围还有很多土窑洞，也是学员们修的。有的窑洞直到现在依然完整无损。

七分校学员还盖了一座十五间房大的礼堂，能容纳近两千人。礼堂从设计到施工都是学员和教师自己搞的。这座建筑没用钢筋，没用混凝土，全部是土木结构，造型美观大方，坚固耐用。三十根大柱子端溜溜的，每根长三丈六尺，还有十六根大梁，这些都是学员们从各个山沟里抬回来的，每一根没有三、四十人是搬不动的。学员们出了不少力气。礼堂盖得高大雄伟，气势壮观，在当时华池和陕北都是数得着的建筑物，可惜，后来被国民党军队烧毁了。

抗大七分校除了种粮食，还要种蔬菜，栽烟叶子，养猪、养鸡。为了活跃市场，扩大经济来源，七分校各单位还在东华池街上开办了五个饭馆，生意十分兴旺，每天都有很多人进馆子，晚上往往要营业到十二点以后。

经济发展了，学员们穿的衣服也变了。第一年刚来的时候，学员们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为了解决穿衣问题，供给部派人从陕西买回棉花，又抽调一批女学员组成纺织大队，纺

线、织布、捻毛线、织袜子、打手套，供给学员穿。从第二年起，学员一律换上了灰衣服，一色的帽子上别有镰刀斧头的帽徽，从仪表到精神都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四年南梁政府成立以后，东华池一带群众很快增加到二、三百户。可是，不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中，有的群众被敌人当做红军杀害，有的逃往他乡，二、三百户人家所剩无几。抗大七分校在这里办起来以后，群众有了靠山，外逃的人纷纷返回来。同时，还接待了很多从河南逃到边区的难民。七分校学员们帮助他们安家落户，发展生产，人口逐年增加，经济日益繁荣。萧条的东华池街道迅速发展起来，白天车水马龙，客商川流不息，一到晚上，满街灯火通明，各种摆摊小卖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东华池一下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小城镇。

“国民党曾经扬言要在冬季困死我们，让反动派白日做梦去吧。”学员们豪迈地说。他们硬是在这荒凉的深山古林里，在边区的前沿阵地，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了一座新的城镇，一所全新的大学。昔日那野猪奔走、狐兔乱窜的景象不见了，那令人胆颤心惊的狼嚎豹叫声听不到了，那荒凉寂寞的羊肠小道被改造成为四通八达的马路，车马来来往往，一排排崭新的窑洞和瓦房相互辉映。这里有两层楼的俱乐部，有宽敞宏伟的大礼堂，有会议室、研究室、体育场；有医疗所、中药房；有清洁的厨房、食堂；有仓库、菜窖、马棚、猪栏、羊圈；有酒房、粉房、磨房；还有热闹的商店、邮电所、小饭铺、照像馆等，真可以说样样俱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华池一带的老百姓同抗大七分校的师生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建校初，师生缺少住处，他

们宁愿在石崖下露宿，也不给群众添一点麻烦，他们宁可用裤子背粮食，也不向群众借口袋。可是，群众家里谁有困难，他们都主动帮助解决。农忙季节，学校就分配学员到劳动力少的群众家里帮忙。

每逢过年过节，学校把上川、下川的老百姓请到校部吃饭，和师生们一起会餐。饭菜非常丰盛，还有自己烧的白酒。学校文工队还经常演戏，每次演戏时，学校总是把老百姓请到前面坐，学员们都坐在后面。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反动派撕毁了国共双方的停战协定，又举起了血腥的屠刀，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全面内战。革命形势要求抗大七分校的全体学员迅速开赴前线，投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去。七月一日，抗大七分校举行了隆重的结业典礼。延安联防军政治部还特意派来驮骡电影队前来祝贺，放映了记录片《延安大生产》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下午还举行了庆贺毕业的大会餐。历时四个年头的学习、劳动、战斗生活结束了。三千多名学员离开了这个革命熔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陇东革命斗争大事记

(1911——1949)

李什止 张 伟

1911年

11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起兵响应，甘肃出兵攻打陕西革命军。陇东人民首举义旗，反清援陕。宁县彭四海、汪兆黎聚众数百人，号称“兴汉军”，在早胜镇起义响应辛亥革命。宁州知州被迫投降，交出印信、城钥。接着，起义军攻占合水，后围攻庆阳城不克，退守合水、宁县，为甘军所败。彭四海率所部数百人东走长武，投入陕西革命军。

1914年

7月，西峰镇市民在一个姓罗的经纪商带领下，反对盐局盘剥压榨，包围了盐局，放火焚烧了盐局大门。

1915年

这年陇东大旱。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却严令全省各县加征“验契”等五种新税。天灾人祸，迫使陇东各县人民奋起反

抗。

8月30日，宁县盘克镇居民打死敲榨勒索百姓的县警备队长岑超俊，捣毁验契局。

31日，在盘克镇居民的带动下，宁县五千余名农民扛着锄头、铁铤包围了县城，抗议征收新税。四日后，宁县知事邓毓楨被迫登城宣布向省方呈请停征新税。围城群众散归。

接着，庆阳、合水、环县、正宁、镇原县的老百姓也相继包围了县城，直到县知事答应免征新加税后才散去。

9月11日晚，长工出身的张九才派张士超等冲进环县县署，杀死县知事李炜等人。第二天，张九才在环县县城聚众三千多人，自称张大帅，宣布起义。

10月13日，环县起义农民会同庆阳、镇原、合水等县农民数万人，围攻庆阳城三日，不克。后遭陕甘宁三省官兵三面围攻，起义失败。

1925年

前季，宁县警佐门如镜在平子镇催收烟亩罚款时，高捧浮收，奸污妇女，引起民愤，连同协助收款的劣绅贾老七、警兵胡信子、王奎子一并被群众打死。抗款的群众又聚集到县城交农具示威。陇东镇守使张兆钾派一营兵镇压，杀了为首的贾德仁等三人，动乱暂告平息。

7月12日，宁县东区农民再次包围县城，又被官兵镇压下去。

夏季，在西安西北大学上学的王孝锡利用暑假回家的机会，和同学任鼎昌在宁县太昌小学创立了我省最早的革命青年群众组织——青年社。参加的有教师、学生和社会青年三

十多人，提出“改造社会”、“改造人生观”的口号。

1926年

9月27日，正宁县农民数百人进攻县城，后被驻军击散。

1927年

秋，共产党员王孝锡、王彦圣、王之经和任鼎昌等先后到宁县太昌镇成立了中共彬（陕西彬县）宁（甘肃宁县）支部。王孝锡任书记、王彦圣任组织委员，任鼎昌任宣传委员，王之经任青年委员。

在中共彬宁支部的领导下，组织读书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斗争。

1928年

1月，共产党员唐谢、谢子长等领导的陕西渭河起义余部二十余人到达华池县豹子川，分散隐蔽到群众中活动。

6至7月，王孝锡在宁县策划王瑞珊、邵三纲等发动抗粮、抗捐运动。

7月，王孝锡在太昌镇家中与王瑞珊密议围攻宁县县城。

7月24日，王瑞珊联合邵三纲、傅明玉围攻宁县县城。宁县伪县长效维国采用诱骗离间手段进行分化，收编王瑞珊为宁县游击队长。邵、傅率部继续围城，次日被警察、民团击败。

10月28日，国民军师长田金凯由西峰率兵至宁县和盛

镇、新庄及王家庄等袭击王瑞部，该王在新庄镇被打死。

11月26日，王孝锡在宁县太昌镇家中被捕。

12月30日，王孝锡被刘郁芬杀害于兰州。

1929年

春、夏，陇东大旱，饥民成群，流离失所，纷纷组织饿头队，挖掘地主藏粮。

是年，刘志丹曾到南梁进行革命工作。

1930年

2月，刘志丹在南梁派张殿成、王怀保、邵凤林、王殿斌、张三五名雇农以扩兵名义到陕西甘泉县刘老庄寨子缴了冯会仲民团的四支枪。

夏，谢子长、刘志丹在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部搞兵运，分别以直辖三团团长和该团六营营长身分，率部进入庆阳和吴旗交界处的三道川。

秋，谢子长、刘志丹率部队驻三道川，遭惯匪张廷芝袭击。

10月1日，刘志丹带领我党掌握的保安县民团二十多人，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号，从水宁山来到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用计智毙了太白民团团总黄毓麟、营副王凤珠，收缴枪支六十余支。以后，刘志丹带领这支部队在保安、合水、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31年

2月下旬，刘志丹率部队到合水固城川麻义村，整编队

伍。后被陈珪璋部第五旅包围，部队被打散，刘志丹率百余人钻进子午岭梢山休整。

不久，刘志丹率部经合水，到达宁县盘克塬。在张皮塬遭敌陈珪璋部伏击。

3月，刘志丹与军阀苏雨生接洽，余部编为苏雨生的一个补充团。刘志丹率部转战旬邑县职田镇，开展游击战争。因打土豪得罪绅士，被苏雨生扣押，下狱彬县。

5月，刘志丹从彬县被杜斌丞营救出狱后，奉党指示，去平凉陈珪璋部从事兵运，率部三百余人驻防正宁、宁县。

同月，河套土匪高广仁率部数百人，投靠陈珪璋，陈委任高为十三旅旅长，驻防宁县早胜镇。

6月29日，高广仁以通知刘志丹、刘宝堂开会为名，在早胜镇收缴了刘志丹、刘宝堂的枪支，制造了早胜事件。

7月初，刘志丹被陈珪璋通缉。刘志丹到合水姚家园子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刘宝堂返回平凉。刘志丹部一百余人，编入刘宝堂部。

是月，刘志丹带领马锡五到南梁进行实地考察。此时，赵连璧、杨丕胜、贾生财分别搞起百余人或几十人的队伍。

秋，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集合赵连璧、杨丕胜、贾生财的部队，整编成立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队长，下设三个营，赵、杨、贾各领一营，在二将川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10月20日，从陕北过来的晋西游击队、保运队和南梁游击队在华池县南梁林镇庙会师。

10月30日，谢子长来到南梁，领导游击队工作，整编了队伍，晋西游击队、保运队为第一支队，刘志丹领导的南梁

游击队为第二支队。

11月9日，谢子长率领一支队移驻新堡，刘志丹率第二支队移驻城壕川、张家沟门一带。因供给困难，游击队派马云泽、刘约三前往平凉新编十三师陈珪璋处谈判部队番号、粮鞋军衣、枪支供应以及防地等问题。

经谈判，游击队名号陇东十三师直辖骑兵第二旅，谢子长为旅长，刘志丹副之，师储杰为一团团长，刘志丹兼二团团长，每团设四个营，陈部发给过冬军衣棉帽一千余套，军饷三千余元，拨修枪造炮工具十五驮，工人二十余名，防地为新堡、六寸塬一带，陈珪璋派刘宝堂前来新堡点验整编。

12月，陈珪璋派军队包围新堡。我游击队主动出击六寸塬，歼敌两连后，沿子午岭向盘克、正宁行进。

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负责人梁子卿来到新堡，传达省委指示，要游击队向关中地区前进。

1932年

1月8日，我游击队在庆阳六寸塬消灭陈珪璋两个连后来到正宁县柴桥子村。在北柴桥子正式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下辖二个支队，一支队队长师储杰，二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

下旬，“西北反帝同盟军”到达三嘉塬细咀子、锦章、象牙洼、秦曲、南庄子一带。总指挥部驻锦章村，刘志丹、马锡五等驻细咀子。

2月4日，西北反帝同盟军进行整编。

2月12日，在三嘉塬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共计三百余人。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李杰夫

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各大队成立了党支部，游击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

中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离开三嘉塬，向三水县（即旬邑县）游击。

3月19日，陕甘游击队乘敌陕军十七师与甘军暂编十三师混战于陇东之机，向陇东出击。

3月19日夜，陕甘游击队奔袭伪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

20日，陕甘游击队在山河镇攻坚失利。

22日，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进入山河镇以南的寺村塬，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郭自发任主席。随后，建立了赤卫队，杜兴帮为赤卫队总指挥。组织了农会、贫农团、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没收了西城大地主刘西昆和余家庄大豪绅赵元亨（外号“赵大人”）的土地、粮食等，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处决了“赵大人”。

4月13日，陕甘游击队在当地赤卫队和农民千余人的配合下，再次袭击正宁山河镇。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加之驻西峰镇之敌军派一营兵力援救山河镇敌人，游击队在歼敌援军二百余人后，返回寺村塬。

21日，旬邑战斗后，游击队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旬邑县马家堡改组成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第三支队长，阎红彦任第五支队长。

是月，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撤销了谢子长总指挥职务。谢子长被调往甘肃搞兵运工作。

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

挥。

6月23日，香山战斗失利后，游击队由韩城退至宁县九岷麻子掌。此时，部队中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桥山的争论，相持不下，召开梁掌堡会议，统一思想，最后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阎红彦任总指挥。

7月1日，谢子长派杨林、苏杰儒、高照壁等同志到庆阳国民党警备十一旅发动兵变，并给十一旅我地下党负责人李树林、高鹏飞写了信。

9日午后，共产党员高鹏飞率警备十一旅特务营第一连（高任该连连长）在合水西华池起义，收缴了第二连和营部的武器，扣押了营副潘自立，起义获得胜利。

11日，陕甘游击队在撤头堡召开了全军大会，欢迎西华池起义部队。随后，整编了队伍，高鹏飞被任命为第二大队大队长，阎润平为政委。

7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良担任游击队政委，由于他强令部队坚守只有几户人家的正宁县五顷原子，攻打坚固的敌人据点，限令二十天内分配完土地，建立根据地，同时非法成立秘密队委，推行左倾路线，致使撤头、五顷原子一带的革命政权遭到破坏，部队也受到重大损失。

8月13日，游击队强攻正宁王郎坡寨堡未克，部队伤亡大，被迫由五顷原撤至三嘉塬。

下旬，游击队退到马栏附近，只剩下百余人。李良、黄子文离开部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30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新派谢子长回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此时，敌人对游击队开始了新的“进剿”。

9月12日，陕甘游击队在照金采取声东击西的游击战

术，开耀县民团等敌四百余人，活捉敌民团副总指挥蔡志发等三百余人。

9月25日，陕甘游击队攻打保安失利，退居人烟稀少的平定川、瓦子川一带。

10月1日，陕甘游击队在合水墩儿梁、八卦寺一带，遭敌甘肃警备旅两个营的袭击。

此后，陕甘游击队总结了攻打保安失败的教训，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筹集资金，度过困难。刘志丹领兵在合水塔儿梁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谢子长带领伤病员在合水平定川坚持斗争。

12月，陕甘各路游击队在合水黑木塬会合。子长、志丹率军南下淳化、照金地区，准备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22日，杜衡来到了陕甘游击队，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诬蔑子长、志丹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擅自决定撤销谢子长、刘志丹等的职务，并将谢子长、阎红彦开除出部队。

24日，在宜君转角召开军人大会，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二十六军只有这一个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自任军、团政委。共三百余人，枪一百五十余支。

27日，红二团突袭宜君焦家坪民团，歼敌六十余。接着又消灭了照金和旬邑的民团一部，开辟了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

1933年

3月3日，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照金成立，李

妙哉为总指挥，张秀山为政委。

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由金理科、习仲勋、郝克寿等组成。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郝克寿任团特委书记。

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主持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由雇农周冬至担任，习仲勋为副主席并兼任党团书记。

春，在宁县平子和正宁榆林子交界处的水围台，农民何炳正组织十多名青年农民，杀死了催粮要款的正宁县民团团丁十二人，夺了枪支弹药，和红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成立了陕甘工农红军平子游击队。何炳正任队长，殷云山任政治指导员。编成两个分队，四个班，共四、五十人。在平子、榆林子一带活动。

5月25日，红军在照金北梁村召开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杜衡推行“左”倾路线，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率主力红二团南下终南山。

6月，在杜衡“左”倾路线的指导下，红二十六军红二团被搞垮。

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举行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甘边临时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是月，宁县平子镇半坡村刘永培等在平子游击队的接应下，举行了八月暴动，处决了依仗官府横行乡里的恶绅赵新玉弟兄，带领四、五十名贫苦农民投奔红军。

暴动队伍到湫头原，张仲良代表第三路指挥部对暴动队伍命名为“陕甘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宁县第三支队”。派王得

宽（后叛变，解放后镇压）为队长，李士新任指导员，回半坡村一带活动。

在湫头堰改编时，将平子游击队改编为“陕甘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正宁县第四支队”。

10月4日（阴历中秋节）晚，刘志丹、王世泰等历经艰险，回到照金，开始了红二十六军的恢复和组建工作。

中旬，刘志丹率部北上正宁、合水。

10月17日，刘志丹率红军夜袭合水城，歼敌连长、团总以下一百余人。以后，刘志丹率领部队在盘克塬和从照金撤出的陕甘边党政军机关人员会合，接着又转战庆阳、华池，歼灭城壕川民团。

10月28日，红军在庆阳毛家沟门击溃敌警一旅赵文智团八百余人的进攻，俘敌一百余人。

11月3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党委在合水县蒿咀铺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成立红四十二师。

11月7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合水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三团和骑兵团，王世泰、黄子祥分任团长，共计五百余人。

后刘志丹率部在荔园堡消灭张廷芝三团的梁邦栋连，解放荔园堡，然后回师耀县、淳化。

是月，刘志丹率部返回南梁，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吴岱峰任主任，张策为后方特派员，习仲勋、张策等同志负责地方工作。任务是组织、武装群众，建立根据地，支援红军。合水、庆阳、保安三个游击队成立。合水游击队长张振东；庆阳游击队长杨丕胜；保安

游击队长刘约三。

12月，红军在正宁县一带发展武装，刘志丹写了《军事教育大纲》作为教材，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

正宁县第三支队在子午岭鸭子洼等地与民团土匪作斗争，挖掉了长期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一个土匪窝子。

冬，刘志丹亲自起草了陕甘边关于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在陕北、陕甘边和关中建立三个革命根据地，逐步把南梁同关中地区的根据地和陕北游击区连成一片。

1934年

1月上旬，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返回合水连家砭。王泰吉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刘志丹任师长。

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南梁恢复成立，特委书记由张秀山担任，后为惠子俊。刘志丹为特委军事部长兼军委书记。

25日，南梁根据地在小河子沟召开临时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被选为主席，白天章、牛永清为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化等委员会，分别由张步青（后换成李生华）、张铁贤、呼志禄、杨玉亭、郝文明、蔡子伟担任委员长。同时在南梁、豹子川、小河沟成立第一赤卫大队，大队长郑德明。在玉皇庙川、马连岔成立第二赤卫大队，大队长高生贵。在白马庙川成立第三大队，大队长朱志清。二将川成立第四大队，大队长梅生贵。在葫芦河成立第五大队，共约千人。配合红军，打土豪，保卫根据地。

是月，刘志丹率部在脚扎川消灭张廷芝一个营，又在崖窑歼敌一个骑兵连，在元城子歼灭了谭世麟民团一部。

3月，蒋介石对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围剿”。敌甘军警备二旅六团仇良民部、庆阳五县民团团总谭世麟民团一部、陕军驻三边的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第三团张廷祥部、驻富县的敌四十二师一百二十四旅王勤轩团和驻延安敌二百五十六旅高双城的一个营，分进合击。

我红军主力部队、游击队在刘志丹带领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撤离南梁，转入外线作战，集中力量打张廷芝、谭世麟部，北上陕北，转战华池、庆阳、合水，连续作战，连战连捷。

4月11日，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在西华池步骑配合，全歼敌人警备二旅第五团一个团部和两个营以及一个机炮连，共七百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秋，在荔园堡成立了陕甘边苏区红军军政学校，培养排、连干部，刘志丹兼任校长，吴岱峰任军事主任，并主持全校日常工作。

南梁东沟成立了陕甘边银行。并设荔园堡集市，一月三集（初一、十一、二十一），一九三五年春停止。

成立政府保卫队，队长郭锡山。

5月10日（阴历三月二十七日），甘军警备二旅杨子恒部仇良民团和谭世麟部千余人，乘我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之机，窜入南梁根据地烧杀抢掠。

11日，阎家洼村群众为保存红军物资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3日，敌人在阎家洼子村活埋了我干部和群众数十人。

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全面负责陕甘边红军和各路游击队的作战指挥。红四十二师师长改由杨森担任。

张秀山派马仰西（庆阳游击队宣传队长）担任庆北办事处党代表，负责筹建庆北办事处。

7月25日，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及赤卫队南下，到达南梁阎家洼子村。

28日，在南梁阎家洼子村召开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陕北游击队联席会议，讨论了国内外及边区的形势和任务，总结了四十二师的工作；研究了陕甘边、陕北红军协同作战等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高岗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担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

8月，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红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作战。

是月，庆阳游击队政委王宝珊在杜家河（今华池县温台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田家河区苏维埃政府，李培福任主席。

9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了赤卫队指挥部。统一领导赤卫队工作，指挥朱志清、副指挥郑德明（郑四）、参谋长梅生贵。

9月5日，庆阳游击队第四分队成立，李占义担任分队长。

9月18日，红四十二师一团在正宁湫头组建。宁县、正宁县游击队抽人参加。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辖一、二

两个连，共计二百余人。

下旬，庆阳游击队第四分队配合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攻打三十里铺民团（团总朱寿）。队伍到达后，被民团发现，转向孙家湾子，攻打孙向魁民团。接着又北上曲子镇，攻打李恒泰民团，打死了民团团总李恒泰及曲子区长朱文成、保安队长崇敬义等人，收缴民团枪支五、六十支。

柔远、城壕、悦乐、新堡等地乡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

10月，温台、城壕、悦乐、新堡等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

10日，红四十二师二团在阎家洼子组建。庆阳游击队编入。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辖一、二两个连及先锋连，共二百余人。于此同时，庆北游击队组建。

20日，甘军收编的绿林武装营长郭宝珊率部于柔远城子起义，进至南梁与红军会合。

11月1日，在南梁荔园堡关帝庙召开了南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工农兵民主政府（即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出席会议的代表一百余人。会议开了七天。会议通过了关于土地、军事、政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决议案。选举习仲勋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

7日，召开庆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周围几百里的群众和十八个赤卫大队数千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举行了阅兵典礼，刘志丹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战争情况的报告。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南梁寨子湾，设有军事部（刘志丹兼任委员长）、劳动部（张钦贤任委员长）、土地部（李生华任委员长）、工农检查部（惠之俊任委员长），

财政部（呼志禄任委员长）、粮食部（杨玉亭任委员长）、赤卫军指挥部（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郑德明，参谋长梅生贵）、肃反委员会（赫文明任委员长）政府保卫大队（由原成立的保卫队扩充为大队，大队长郭锡山，大队副宋飞，辖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

此外，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

同时，还成立了华池县和赤安县两个县苏维埃政府，直接受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领导。

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贾生秀。机关设在柯家沟门。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边金山，机关设在吴堡川。

11月10日，在柔远张湾，郭宝珊部一百多人整编为抗日义勇军。

12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在田家窑成立（由庆北办事处转为苏维埃政府）。强加珍担任主席。

是年，在南梁小河沟成立修械所，有十多名工人，主要是修军器，造土药子弹。

是年，南区革命委员会在宜君县的小石崖成立，主席黄子文。成立了党的南区工委，书记张邦英。

1935年

1月（阴历腊月），张秀山率红三、四、二团及抗日义勇军攻打华池县（当时属于庆阳县）五蛟堡子。

庆阳游击队在张志孝、王宝珊的带领下，在城壕打跑了谭世麟民团段团总。

2月，蒋介石令陕甘宁晋四省军阀，以四万兵力，分数

路，采取筑工事，挖战壕，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分进合击的战术，对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敌三十五师马鸿宾的一零四旅带甘警二旅六团（团长仇良民），从庆阳出发到城壕川；一零五旅由合水西华池进到庆阳六寸原；一零三旅进到环县曲子镇；西北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从宜君、黄陵、富县、甘泉等据点进攻；蒋系六十一师杨步飞从正宁、宁县、旬邑一线围堵进攻。

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陕北赤原县周家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统一两地区党政军的领导问题和反第二次“围剿”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地区的工作。还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地区的革命武装。

3月初，马鸿宾部等向南梁根据地发动进攻。敌不明我方实力，不敢贸然进犯，受阻于老爷岭下。

是月，敌人在柔远、元城一线发动进攻，我红军、游击队进行抗击。庆北县被敌人占领，庆北县苏维埃政府转移。

同月，庆阳游击队在元城整编。在庆阳游击队属下成立镇原游击队、环县游击队、定边游击队，统一由王宝珊指挥。以元城子附近半个城川为游击队活动根据地。

春，红一团在金村庙原与宁夏马培清骑兵团遭遇，发生激战，部队被敌人冲散。

华池县保卫队改编为游击队，队长黄克秀，下辖三个中队。

4月3日，我红三团、骑兵团在六寸原战斗中发生误会，遭受敌一零五旅的杀伤。

12日，敌人进犯南梁。

13日，敌人进占荔园堡。我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从南梁迁至保安县石鼻湾，后又迁至洛河川甘泉县下寺湾。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也迁至洛河川下游。

同时，敌人占领小河口。习仲勋带领边区政府机关干部在边区政府保卫大队的掩护下与敌人战斗后撤走。

马步芳军占领我南梁后，悬赏缉捕习仲勋、贾生秀等同志，并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南梁一带变成了废墟。

赵富奎还乡团实行反攻倒算。

4月，马鸿逵部侵占元城子。

下旬，庆阳、环县、镇原、定边四个游击队在麻地台川进行整编，成立了庆北游击支队。队长王怀岗，政委强家珍。

6月，陕北根据地扩大到二十多个县，陕甘与陕北连成一片。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李树林由合水返回温台区，秘密进行革命串连。不久，由田生弟负责成立了庆北游击队。

6至7月，马鸿宾部进犯我新宁县根据地。土地革命工作暂停。新宁县第一支队在金村庙一带给敌以重大打击。

8月，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苏区经陕南长征到陇东合水、庆阳县，从板桥到大凤川、豹子川、瓦子川。

马鸿逵、马步芳等部被迫撤退。庆北县苏维埃政府着手恢复。成立庆北办事处，由李树林、李培福等负责。庆北办事处实际起着革命政权作用。

9月，红二十五军经庆阳到达陕北。

庆北游击队与黄克秀领导的合水游击队合并为庆阳游击队。

宁县第三支队改编为独立营，同时留下少数同志组成游击小分队，继续在宁县、正宁一带活动。

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部队以及驻陕东北军主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分共十万人向陕甘、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妄图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

同月，刘志丹受“左”倾路线的迫害被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

是月，红军回到荔园堡。华池战区成立，高生荣任主席。李培福担任庆北办事处主席。

南梁一带赤卫队恢复。

秋，华池开始建立团组织。

10月，关中特委（书记先后由唐洪澄、鲁賁担任）和南区苏维埃政府在正宁南邑成立，主席张悦，张邦英任副主席，领导新正、新宁等五个县的工作。

同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陇东，在今庆阳地区境内行军七天，经过镇原、环县、华池三县的十二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一百一十三个生产队一百七十六个庄头，行程约五百一十多华里，打击了土豪，民团、保安队等反动势力，歼敌四百三十余人。

毛泽东同志途中曾在镇原三岔镇和环县洪德区的杏儿堡宿营。

12月底，红军军事部驻庆阳县城，后改为教导师。

下旬，关中特委在新正县三嘉堰白沟村吴家圪塔召开淳

耀(淳化、耀县)、三水(旬邑)、新正、新宁四县的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

南区苏维埃政府由小石崖迁至三嘉塬前马堰。

1936年

1月，党中央派贾拓夫任关中特委书记，张邦英任宣传部长。习仲勋回关中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2月，蒋介石令东北军集结数万人，向我陕甘边区实行大规模“围剿”。

东北军向我子午岭山区根据地合围“清剿”。

4月，东北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进行全面“围剿”，关中苏区五个县全被敌人占领，仅余新宁县一个乡(平道川)敌人没有骚扰过。关中特委决定由习仲勋、汪锋等同志组成关中工委，坚持游击战争，成立了南北两路指挥部。

5月下旬，陕甘省委任命马仰西为华池战区书记。

是月，国民党对关中地区清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我干部，妄图从内部瓦解我党组织。

6月，红军西征。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等同志率红军分两路进入陇东西征。一路经曲子、一路经华池，转环县县城西进。习仲勋同志随军西征，在李富春同志为首的中共陕甘省委的领导下，在陇东环县、曲子一带做群众工作。

初，庆北办事处与华池战区合并。名为华庆县，后改名华池县。成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兴高。

红军西征军到元城时，李培福同志带的游击队给西征军当向导，首先解放环县以东八珠塬一带。

6月1日，红一方面军攻克伪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曲子，

情捉治成章（外号“野驢子”），成立了曲子县苏维埃政府。政府机关设在曲子，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培福，县委书记宋文华。

于曲子镇解放同时，环县全境解放。环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苏维埃主席党安民（后名王党玉），县委书记习仲勋。

中共陕甘省委改名陕甘宁省委，从洛河川迁环县河连湾。李富春任书记，李维汉任组织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长，蔡畅任敌区工作部长，肖劲光任军事部长，赖传珠任副部长，自治民任少共书记。

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亦同时成立。马锡五任主席，朱开铨任副主席。下属华池、曲子、环县、固北、预旺、预海、安边、定边、赤安九县。

9月，习仲勋调任关中特委书记。关中地区包括甘肃新宁、新正和陕西三水（旬邑）淳耀（淳化、耀县）等县。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统战关系。

秋，黄克秀领导的游击队在曲子改编为红二十九军独立师第四团，黄克秀任团长，政委刘培清。

10月，关中特区各县革命力量有很大发展，革命政权得到部分恢复。正宁县赵铁娃领导的游击队四大队活跃在正宁山区。新宁县一、二、三、四支队力量也有很大发展。

11月19日，我红军先后集结隐蔽于环县以北山城堡之东、南、西部地区。红一师师长陈赓、红二师师长刘亚楼、红四师师长李天佐等来到山城堡附近。

20日，胡宗南部七八师侵占山城堡及其以西地区。

21日，敌七八师少数部队由山城堡继续向南搜索前进。黄昏，埋伏在山城堡周围之我红一军团及十五军团一部、红

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一部，向敌展开猛烈反击。经一昼夜战斗，将敌七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两个团全歼，消灭了胡宗南主力一个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我红军之追击。这是我红军长征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为实现国内和平开展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

关中苏区全部恢复。红四方面军十二师长征到达庆阳县。

12月，“双十二”事变后，彭德怀、左权同志率我前敌总指挥部直属机关到达宁县。伪县长王序宾设宴欢迎。彭总对王讲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

1937年

3月，我援西军进驻镇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政治部主任宋任穷。

上半年，中共庆阳县委、中共合水县委、中共镇原县委成立。受中共陕甘宁省委领导。庆阳县委书记任质斌、合水县委书记邹群峰、镇原县委书记陈仁祺。

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辖二十三县，其中有陇东的曲子、环县、华池、新正、新宁。

是月，庆环分区在曲子成立，辖曲子、环县、华池、固北等五县。分区党委书记先后由刘景范、马文瑞（10月以后）担任。李景庸任组织部长，李华生、彭飞先后任宣传部部长，马锡五任庆环分区行署专员，王世泰任庆环分区保安司令。

秋，曲子、环县、华池等县先后召开参议会，进行普选，选出县及县以下各级行政领导人员。苏维埃政府改为抗

日民主政府。

红军一部在宁县早胜镇和正宁宫河镇一带改编为八路军，整编后开赴抗日前线。

冬，三八五旅驻防庆阳。

年底，中共陇东特委成立，直属党中央领导，负责陇东陇东战区工作。书记袁国平，组织部长李铁轮，宣传部长任质斌，副部长吴铁鸣，秘书长黄耿东。辖庆阳、合水、镇原、驿马关、宁县五个县委和西峰、固原两个工委。至1937年底，有党员一千五百多人。

庆阳、合水、驿马关、山岔分别建立抗日义勇军和抗日游击队。

1938年

春，环县伪保安大队赵思忠等盘踞甜水堡，派匪兵袭击我河连湾环县党政机关。我保卫大队中队长张俊录等十余人牺牲。事件后，我环县县政府迁往环城。

1月，陇东各地组织抗敌后援会及其他群众团体。

3月初，三岔镇回民组织“抗敌后援会”。

5月，国共两党合作在陇东地区开始实现。

庆环分区党校在曲子东沟建立。

冬，国民党反动派在镇原、庆阳一带制造反共摩擦事件。

12月，国民党165师突然进入我防地庆阳白马铺、赤城一带，并对我步步进逼，声言要消灭陇东八路军。自此以后，国民党破坏我民众组织，劫捕我方人员，公开反共。

1939年

春，我八路军三八五旅司令部、政治部等单位在庆城北五里坡水沟“乱石滩”开荒。

4月1日，伪甘肃省教育厅为阻止进步青年进入陕甘宁边区，在西峰镇设立庆阳师范学校。

4月25日，伪西峰专署密谋消灭我镇原驻军，密调各县保安队向镇原开进。镇原敌驻城保安队二十余人举行暴动，企图里应外合，攻占镇原城，消灭我驻军，制造“镇原事件”，敌阴谋被我驻军粉碎。

29日，宁县敌县长方振武集中全县壮丁七、八百人，配合县保安队百余人夜袭我宁县城驻军，制造“宁县事件”。

“镇原、宁县事件”发生后，敌专员钟竟成调一六五师，增援镇原、宁县，包围镇原、宁县县城。

5月7日，在我方建议下，朱绍良派谭季纯，我方派王观澜，在驿马关进行商议，初步决定撤围启城，但对方不履行。不久，谭季纯返回兰州。

6月29日，谭季纯、王观澜签署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

12月10日晚，敌宁县县长方振武为了驱出八路军驻军而围攻我罗得胜营，我罗营伤亡过半，罗营长负重伤。

12日，合水县国民党县长翟大勋率县保安队百余人，袭击我三八五旅驻合水城之特务连，激战三小时，国民党官兵纷纷投诚，翟大勋被俘，合水县宣告解放。同日，我八路军接管国民党庆阳县政府旧城办事处及第三区署防空监视哨等机关。

13日，我地方武装警七团袁团长率一营赴宁县增援罗营，后又遭敌九十七师齐团、联合保安队包围，我军奋起抗击，冲出重围，退至合水县之西华池。

14日晚，国民党镇原县保安大队向我八路军驻军王营进攻。

16日晚，我王营突围，退出镇原城外。

29日，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率保安队向我环县驻军发动攻击。

1940年

1月1日，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和保安大队副赵老五（赵思忠）率部八十余人，并强迫壮丁数百名围攻环县县城，被我保安队及自卫军击败。

21日，环县车道区自卫军在张廷杰的指挥下叛变。打死我营长白银万、县政府二科长李嘉成等。

环县事变长达三十三天之久，破坏范围达六个区，十八个乡。捣毁我区、乡政府十八处、学校四处，抢劫合作社五处，抢取公粮一百二十担，枪支二十六支。

30日，谢觉哉由延安赴庆阳处理陇东事件。

2月12日，谢觉哉由庆阳到西峰镇，和国民党甘肃省人民政府所派代表李学漠谈判，解决陇东事件，双方口头商定临时解决办法。

16日，我警二团开始进剿赵老五政治股匪。

3月1日，我镇原县政府成立，县长冯治国。

7日，我摧毁赵老五多年盘踞之巢穴。赵老五率十二人逃跑，余部就擒。十八名惯匪被我法庭判处死刑。在甜水堡

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12月，谢觉哉离庆阳回延安。行前给西峰镇国民党专员专员钟竟成写信，劝其省悟，停止制造摩擦事件。是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庆阳创办陇东中学，并由陆为公前往筹办。

4月12日，绅士张廷杰配合敌固原保安队一百三十余人由三条涧（毛井边界）出发，在砖城子与我警二团第一连接触，被我军击退。我军乘胜追击至毛井区的龙家阳峁，打死、打伤三十余名，残部向西逃去。

9月18日，陇东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校长由马文瑞兼任，副校长陆为公主持校务。

1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陇东分行成立。

是年，庆环分区与陇东特委合并。陇东地委、陇东专员公署机关由曲子镇迁到庆阳城。专员公署专员由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兼任，副专员马锡五。中共陇东地委书记为马文瑞，组织部长陈仁林，宣传部长吴铁鸣，统战部长段德彰，青年部长李瑞山，民运部长彭飞，组织部副部长李廷序。地委下辖六个县委，即，庆阳县委，设庆阳城，书记孙君一；环县县委，设环县城，书记刘昌汉；华池县委，设悦乐镇，书记王德明；镇原县委，设孟坝镇；合水县委，设合水城，书记朱敏；曲子县委，设曲子镇，书记苏耀亮。

新宁县委设湘乐镇，书记康润民；新正县委书记由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习仲勋兼。这两县当时属关中分区。

1941年

2月，三八五旅旅部驻东华池。

6月9日，国民党军队进攻我望宁堡，被我击退。

6月6日，马思义率海、固国民起义军二百余人由环县庙儿掌进入边区。是年，华池县征兵、交粮任务完成好，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奖励。

1942年

2月份，抗大七分校来到陇东，在合水县进行了编队工作。

6月1日，抗大七分校正式开学。

秋，中共西北局决定在庆阳成立中共甘肃工委，孙作宾任书记。

冬，庆阳、环县、镇原县开展减租息、减运动。

1943年

8月，马锡五审理封芝琴（刘巧儿）婚姻案。

4月，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开赴华池县大风川屯兵垦荒。

9月16日，陇东地委正式开办整风训练班。地委干部参加整风学习。

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开幕。陇东的王存仁、张振财、刘志仁、孙万福等出席了会议，分别被授予陕甘宁边区特等民兵英雄、文教英雄等光荣称号。

12月9日，毛泽东主席邀请孙万福、张振财等十七名劳动英雄举行座谈会。

1944年

11月，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奉命南下，离开大风川时，曾立石刻纪念碑一座，刻记两年来全团屯兵生产的业绩及英雄模范事迹。

是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推广“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

陇东专署召开文教大会，总结办学经验，大办冬学，还提出民办公助政策，使学校数量有了很大发展。

1945年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陇东分区选出李培福同志为七大代表，出席了会议。

9月，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肃工委）在庆阳恢复成立，负责领导敌战区我地下党工作。书记孙作宾。下设组织、宣传、军事、社会四科，由陈成义、陆为公、丁志明、薛浩平分别担任科长。

10月，新宁县县委在梁掌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扩大解放区。

1946年

3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开会。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华池、曲子、环县、镇原六县选出参议员二十人参加。

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陇东解放区军民为

了与从中原突围的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取得联系，组成了两支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马福吉带领三百余人，从庆阳出发，经过环县、镇原进入隆德一带活动。另一支三百余人，在马思义的带领下于八月一日出发，到西海固地区开展活动。

16日，西峰镇庆阳师范师生为欢送应届毕业生演戏联欢，与在场看戏之国民党驻军一军官发生争执。敌二十八军八十三团施行报复，用机枪封锁西峰城门及师范学校，出动二百余人闯入学校，对在场所师生及三千余观众报复行凶，师生受伤达四、五十人。

8月27日，我军警备第三旅之第七团及第五团一部攻占镇原太平镇。

29日，我警三旅七、五团在镇原屯子镇与从中原突围归来的王震三五九旅胜利会师。

9月2日，三五九旅之七一七团转战陕甘，翻越六盘山，过西（安）兰（州）公路，沿途与敌激战后，由镇原县马渠进入陕甘宁边区。

庆阳县城人民冒雨接应三五九旅。陇东军民加紧备战，训练民兵，组织了担架队和运输队。一千四百五十名青壮年自愿报名参军。

11月，敌军一部向我新宁县边境骚扰，我民兵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粉碎敌人进攻，拔除敌人堡垒十八处，毙敌百余名。敌另一部六十余人向我新正边境发起四次冲锋，均被我民兵击退。敌在庆阳县、镇原县边境挑衅进攻也被我民兵粉碎。

后季，庆阳、合水、镇原三县实行减租和土地征购。

12月1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争取明年春耕前完成边区土地改革的指示》，指出：庆阳、合水、镇原三县减租不彻底，必须认真发动群众斗争、清算个别恶霸地主，深入进行减租、查租等工作。

1947年

春，蒋介石亲自部署、调动三十四个旅（师），约二十三万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所谓“重点进攻”。

2月28日，敌胡宗南部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指挥敌十七师之四十八旅、七十六师之二十四旅、一四四师之新一旅及骑兵第一旅、五旅和青海马步芳部整编八十二师，向陇东分区大举进攻。

陇东地委及分区机关从庆阳城撤至华池悦乐、元城一带领导分区军民开展游击战争。

3月1日，敌占我陇东分区首府庆阳城。

2日，敌占我陇东分区重镇合水县西华池城。

5日，西华池战役。我边区野战集团军主力在中央西北局书记兼政委习仲勋及司令张宗逊的率领下，在西华池给敌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击毙敌旅长何奇，歼敌一千五百余名，收复庆阳、合水。

4月8日，敌马步芳之整编八十二师复占我庆阳。

11日，敌马步芳、马鸿宾部占我环县、曲子、悦乐。

5月，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陕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后，21日挥师西进陇东。

28—31日，陇东战役。我军在华池县将台、悦乐歼敌八十一师暂编六十旅和骑兵第二旅各一个团。于此同时，我

军攻入合水老城歼敌一部后撤出。

6月14——16日，环县战役。我军攻占环县县城，守敌突围。我二纵队穷追猛打，予敌八十一师以歼灭性打击，歼敌一千余名。

8月16日，我西北野战军六纵一部及地方部队一部向关中进行时，敌马继援部八十二师以十倍于我兵力尾追堵截，在宁县九岘西展开激烈战斗。我军打退敌十多次进攻，歼敌二百余，后因敌众我寡，我军失利，牺牲二百余人。

是年后季，陇东地委在刘坪召开会议，开展“四查”。

1948年

元月——四月，华池、曲子、环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在此期间，陇东地委在环县八珠塬召开土地改革工作会议，确定了“抽补调剂”的土改工作方针。

在土改的同时，进行了整党和整军运动。

5月5日——8日，电子战役。我西北野战军主力经过西府战役后，撤出宝鸡，回师北上陇东，准备进电子镇。取肖金镇，打西峰镇。敌马步芳八十二师在飞机配合下，妄图配合胡宗南部歼我军于电子镇。

5日晚，我先头部队第六纵队之教导旅进抵电子镇，敌八十二师三个骑兵团从镇原出发包围我军。

6日，我第一、第四纵队由党原镇、玉都庙向电子镇进攻，歼敌两千余人。

7日，我军在荔镇、肖金镇一带和胡宗南之三十六师及马继援指挥的八十二师之一百旅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追击和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聚歼”我军的阴谋。

8——9日，我军在庆阳三不同和宁县良平子追我军之敌以打击，后摆脱胡、马军，进入关中。

6月3日，我陇东地方兵团一部在庆阳野狐沟经半小时激战，全歼敌徐永南部，活捉徐永南以下四十八人。

1949年

元月，陇东分区机关所在地元城子遭敌骑兵团奔袭，许多物资被劫，干部、群众数十人被屠杀。

5月20日，我军收复庆阳。

7月，陇东解放区人民积极开展支前活动，以四十万石粮食、一万斤食盐、三千余只猪羊支援解放大军西进。曲子、合水、华池等县群众，迅速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担架队随军西进。

26日，宁县解放。

27日，西峰镇解放。

30日，镇原解放。

决 解 保 康

（本区各乡、镇、村、组）

（本区各乡、镇、村、组）

（本区各乡、镇、村、组）

（本区各乡、镇、村、组）

（本区各乡、镇、村、组）

（本区各乡、镇、村、组）

（本区各乡、镇、村、组）